

岁月似水 洗尽历史风尘
文章如火 炙烤逝者魂灵



我所知道的

张学良

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文思/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

盛世才 杜聿明 胡宗南 白崇禧 阎锡山 马玉祥 孔祥熙 杨虎城 张学良 李宗仁 蒋经国 蒋介石

只缘生在马车上才得漂泊百年之命？

“生命的密码”，生死均占“0.1”年

两个四月十七日：生日之谜

两个“九一八”：一荣一辱

两个1月13日：夜幕降临和金鸡报晓

两个36年：72年真爱如歌，一半岁月“非法”

两个45年：大陆生活，台湾被囚各半

两条断子：生前、死后各留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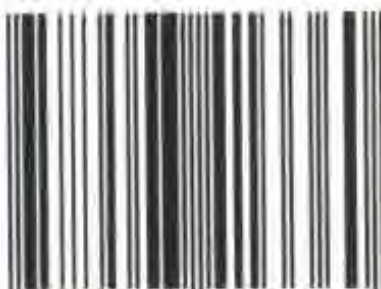
两个关键女人：一为情感鸳鸯，一为生命护卫者

叶落千丈却不归根？

西安事变：道破真相究竟能伤害谁？

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ISBN 7-5034-1336-0



9 787503 413360 >

ISBN7-5034-1336-0/K·0913

定价：16.00 元

岁月似水 洗尽历史风尘
文章如火 炙烤逝者魂灵



我所知道的

张学良

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文思/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所知道的张学良/文思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1

ISBN 7 - 5034 - 1336 - 0

I. 我… II. 文… III. 张学良 (1901 ~ 2001) —生平
事迹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25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军城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625 字数: 239 千字

印 数: 5001 - 7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煊赫家庭 名媛伴侣 蹈险犯难见真情 …………… (1)

本世纪初，香港凤凰卫视隆重播出了纪念张学良将军的专题节目。在节目中，张学良自陈家史：清道光之前，被清朝统治者称为“龙兴之地”的东三省，不准开发，更不准汉人进入。后禁令松弛，其远祖于世居的河北大城辗转迁徙于辽宁省海城县，并以一把银子取得“一箭之地”的权力（弓箭射出所及范围的土地），家族从此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兴旺发达……应该说历史能创造出张学良这样一个人物绝非偶然，除了有祖上余荫的庇护外，更有佳人辅佐的红袖添香：在张学良一生最落魄的时刻，发妻于凤至来到他的身旁相伴，赴美治病后，赵四小姐又义无反顾地和张学良共尝屈辱与苦难。进入晚年，大洋彼岸的于凤至感佩于赵四对其夫的真情挚爱，自动放弃“名分”，白发皤然的赵四始披上新娘的婚纱……张学良的一生不但在政治生活中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个人生活中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中国现代史上同时拥有这种双重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恐怕绝无仅有……

一 煊赫身世 …………… (2)

二 盟兄挚友 …………… (7)

三 元配夫人	(19)
四 红粉知己	(27)

第二章 学贯中西 真情至性 一诺千金重泰山 (31)

在 20 世纪 20 年代，青年张学良堪称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既饱览经史子集，又谙熟英语。西方文化的“天赋人权”和儒家的修身立世潜移默化地铸就了他的性格。他对身边的卫士、裁缝、厨师，平等呵护；对家庭教师，一诺千金；他的人格，迫使郭松龄反奉时都要羞羞答答地竖起“反父拥子”的旗号；就连中国现代史上各类顶尖人物宋美龄、宋子文、张治中、戴笠等都要对他敬让三分，年仅弱冠的他，依仗自己性格所焕发出的巨大凝聚力，渐次顺利地从父辈手中接过了权力的执杖……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豪爽率真的性格也使他的个人事业在他 36 岁那年戛然而止，一生欲施展抱负的空间顷刻瓦解……

一 家庭教师	(31)
二 风神俊逸	(33)
三 公馆裁缝	(39)

第三章 锐意新政 求贤若渴 造福桑梓唱大风 (63)

上个世纪 80 年代，张学良在台湾曾向拜访他的大陆艺术代表团笑谈自己早年和其父在东北经营开发的经济手段绝不是土地主的“扒地皮”（吃地租），而是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建工厂、修铁路、兴矿山、设屯垦区；统制外贸；引进外资；发展金

融；发展工商业；兴办东北大中学校……张学良当年给东北大学一年的经费拨款要远远超过当时中央政府一年的教育经费，高薪聘请了许多国内的饱学宿儒，其中章士钊的月薪高达800银洋……张氏父子借助富饶的土地、勤劳的人民，为自己的事业打下了丰厚的家底，招纳了大批贤士良才……此时的张学良就像一艘蓄势待发的巨舰，命里注定，上天要让他在中国现代史这片风云谲变，暗礁峥嵘，而又波澜壮阔的海域上扮演一个启锚升火的重要角色！

- 一 关山飞渡 (63)
- 二 爱将反目 (88)
- 三 大帅斥子 (90)

第四章 少年元戎 折冲樽俎 易帜统一成大统 (93)

1928年6月日本军阀原想炸死张作霖、造成混乱局势、乘机进占东北的目的落空，遂改变策略，阴谋诱使张学良维持与国民党政权相对立的局面，使东北成为在日本控制下的独立王国。日本首相田中的特使、中国通林权助为此对张学良摇唇鼓舌，死缠烂打。张学良听后直言道：“你为我想得十分周全，但有一点，你没替我想到。”林权助莫名其妙，张学良正色道：“我是一个中国人！”……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张学良成了交战双方——蒋介石和由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组成的“政治联合体”——拼命争夺的对象。张学良的举手投足，决定了双方战事的胜负和个人政治前途的走向……面对内外交困的错综复杂局势，张学良先于1928年12月宣

布易帜,后于1930年9月,发表通电,拥护中央……张学良每一次重大政治决定的动机只有一个:惟有一个大一统的中国,才能使祖国自立于民族之林、人民免于战火涂炭!张学良就是张学良,和寻常意义上的军阀相比,有霄泥之别……

- 一 东瀛野心……………(94)
- 二 统一易帜……………(100)
- 三 政见分歧……………(114)

第五章 痛失疆土 警声鼎沸 血性男儿背罪名……………(12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他立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共商对策: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援无继,可能全军玉碎,并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为保存实力,张学良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但却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耿耿于怀的张学良为此常对身边的人说:“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但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不过,林肯说过三句话: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张学良祈盼着赎罪那一天的到来……

- 一 痛失疆土……………(121)
- 二 白山黑水……………(126)
- 三 黯然下野……………(136)

第六章 民族大义 赤子情怀 惊天伟业震环宇…………… (146)

甫一交手，便被经过二万五千里跋涉、身心俱疲、衣衫襤褸的红军吃掉了三个师。身为“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强烈的震撼，他明白了一个真理：红军是永远捶不烂，打不散的。因为这支军队有高远的志向、坚定的信念和千百万舍命相助的老百姓。他由此悟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迟早有一天会将他赖以收复失地的“家底”消耗殆尽。民族大义，赤子之情，终于使张学良在延安与周恩来双手紧握，竟夜长谈。张学良对周恩来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心悦诚服；张学良首倡的“联蒋抗日”，也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全民族一致抗战的伟大序幕从这里徐徐开启……

- | | | |
|---|--------------|-------|
| 一 | 骤雨将至…………… | (146) |
| 二 | 未雨绸缪…………… | (155) |
| 三 | 事变前后…………… | (161) |
| 四 | 难忘 1936…………… | (168) |
| 五 | 延安谈判…………… | (182) |
| 六 | 临潼扣蒋…………… | (192) |

第七章 摆队送客 南京受审 山崩于前色不改…………… (200)

望着绝尘而去的飞机，匆匆赶到机场的周恩来望着渺远的天穹，慨然叹道：汉卿是看旧古书看多了，他是要学黄天霸，摆队送客呢；睚眦必报的蒋介石惊愕于“北方汉子”张学良亲自护送他回南京的“义

举”；面对李烈钧会审中的严词诘问，张学良面带笑容，直言不讳，侃侃而谈，李烈钧私下赞道“真不愧为张作霖的儿子”……一方面是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无尽牵念：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中共提出释放政治犯名单的第一人即为张学良；1949年，周恩来获悉张群被卢汉扣押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汉卿有救了”；1961年，在西安事变25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流下了怀念“千古功臣”的潸然热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张学良得到的知己是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由千百万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青灯黄卷度余生的张学良足矣！

- 一 身陷南京 (201)
- 二 噩梦伊始 (206)
- 三 军法会审 (212)
- 四 虎落平阳 (219)

第八章 羁旅天涯 传奇人生 少帅英名万古传 (228)

对自由的渴求，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渴求。被幽禁的张学良曾向蒋介石提出是否可以出来，什么事也不做，随侍在蒋身边读书自省。阴鸷狡诈的蒋介石不置一词。八年抗战胜利了，煎熬中的张学良还是身陷囹圄。1947年10月，当张治中在台湾新竹第三次探访张学良时，张学良再次表达了获得自由的渴求。心肠铁铸的蒋介石不屑一顾，倒是宋美龄叹息道“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张学良的后半生是从人生顶峰跌至万丈深壑的后半生。但韬光养晦的他从未失去对

美好未来的向往，教堂唱颂的经诗从未淹没他坚信海峡两岸迟早必定要统一的不泯信念。如磐的岁月并不妨碍他度过百年人生。张学良的人格魅力就像他所钟爱的兰花：馨香致远，愈嗅愈醇；张学良的传奇人生就像一部内蕴深藏的传世经典：字字珠玑，久阅到永远……

一 斜阳暮草	(228)
二 奉化溪口	(235)
三 雪窦山上	(239)
四 恶风邪雨	(242)
五 三访少帅	(267)
六 森严军统	(271)
七 台湾新竹	(280)
附：张学良的身后传奇	(285)

第一章 烜赫家庭 名媛伴侣

蹈险犯难见真情

本世纪初，香港凤凰卫视隆重播出了纪念张学良将军的专题节目。在节目中，张学良自陈家史：清道光之前，被清朝统治者称为“龙兴之地”的东三省，不准开发，更不准汉人进入。后禁令松弛，其远祖于世居的河北大城辗转迁徙于辽宁省海城县，并以一把银子取得“一箭之地”的权力（弓箭射出所及范围的土地），家族从此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兴旺发达……应该说历史能创造出张学良这样一个人物绝非偶然，除了有祖上余荫的庇护外，更有佳人辅佐的红袖添香：在张学良一生最落魄的时刻，发妻于凤至来到他的身旁相伴，赴美治病后，赵四小姐又义无反顾地和张学良共尝屈辱与苦难。进入晚年后，大洋彼岸的于凤至感佩于赵四对其夫的真情挚爱，自动放弃“名分”，白发皤然的赵四始披上新娘的婚纱……张学良的一生不但在政治生活中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个人生活中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中国现代史上同时拥有这种双重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恐怕绝无仅有……

一 煊赫身世

1901年旧历四月十七日，将军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詹家窝铺。将军名学良，字汉卿，别号毅庵（收藏书画多用别号），乳名小六子。将军远祖姓李，世居河北大城，后迁山东。清道光年间始徙辽宁省海城县。其曾祖过继于舅父张氏，始改姓张。将军祖父名有才，娶邵氏，生一女；继室王氏生三子，长名作泰，次名作孚，作霖行三，家极贫。张有才不务正业，性嗜赌博，家曾设赌局，好与人争吵，常打架。因与同村无赖王某结仇，一日夜间，张有才在地头纳凉，被人用镐打死。时值夏令，乡约^① 栾凤泰恐尸体腐烂，用盐将尸体腌上，赶快到海城县报案。该地离海城90里，最快需两日。知县据报，随即率件作衙役等来乡验尸。全身无伤，惟脑后被刃物打破致死。通缉凶手，王某闻风远扬，迄未捕获归案。乡里集资买一薄板棺材，厝埋在别家地头上。是年秋间雨大发水，将棺材冲走。后在叶家铺荒郊



青年时代的张学良

① 在乡里中管事的人

发现此薄板棺材，被一小土岗搁浅，棺材前还有几棵高粱挡住。以前枢埋的所在，并非自己之地，又兼无力搬运，且此处地也无主，顺便就埋在该处，至今仍未迁移。时长子张作泰不足 20 岁，有癆病不久死去，作霖年仅 14 岁。邻里怜其母子等孤苦，多方援助，张母靠双手为人做针线活，养着二子一女度日，生活极苦。时鞠家铺有秀才杨辅庆，字尚占，业塾师，课蒙童数人。张常在窗外，把窗纸抠破窃听。一日被塾师看见，问他在此做什么，张答在此偷听读书。杨令其入学，他说无钱，不能给束脩。杨说我不要钱，可通知汝家白念好了，于是张入学。仅三个月即辍学，因家中要他拾柴，帮着母亲做饭做杂务。他的二哥作孚，给人做童工，以维持生活。张那年 13 岁了。后张当统领时，请杨辅庆老师教其子女等。杨即张学良开蒙之塾师。张 15 岁时，学木工，因过于顽皮和闹情绪，被师傅辞退。张 16 岁时，在赵家庙做小贩卖包子，在郭家小包子铺趸货，余货卖不出时即自食。因此，时常拖欠货款。一日下小雨，货未卖出多少，剩有半篮多包子，遇有几位乡里老太太赌马掌纸牌（与麻雀牌赌法相似），张要参加，大家不带他玩，怕他输钱不给。他说：“我虽无钱，有包子，你们怕什么？”于是勉强加入。恰巧他一人大输，张急中生智，把老太太们的钱抢走不少，提篮向外就跑。大家站起来就追。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哪能跑过十几岁的男孩子呢？他见老太太们追不上，离他很远，转过头来向老太太们做鬼脸，嬉皮笑脸地说：“你们下次别同我玩了！”老太太们气极，大骂了他一顿，只好回去。郭家小包子铺因他赊欠太多而倒闭。后来张当督军时，郭家小包子铺老头来沈阳，找张要账，先与门岗卫兵争吵，后张到门口问这老头：“你认识我吗？”老头说：“我不认得你，我找张作霖要欠账，听说他阔了。”以后张把这老头留在马号看门。

张做小贩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维持，遂改业在同里学兽医。他很留心学习，并喜良马，从此为医马和相马的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气下了二年多，总觉得这行业没有出息，乃辞去，在各处游荡，以赌博为生。一日因输钱不给，在他表舅赵发门前，被绑在树上遭人毒打。张仍破口大骂，毫不示弱。时村中有赵老恒，家道小康，见而奇之，拟将女妻之，惟女母及女舅皆反对，当时未成。

张此时无路可走，乃立志赴营口田庄台，投入毅军。惟军中无余额不能补正名，就当了一名伙夫。时值甲午，正前清与日本战争之时，在军中招募一名谍报员，深入日军后方，探听一切军情。张应募前往，得到不少情报，累次建功，先予以功牌，后擢升哨长。该军营务处袁甲三见张伶俐，调张充任戈什。当时的军人都嗜赌博，长官们在上房赌，他就同米振标、于文孚（于学忠之父）等在下屋赌。军中马有病，张常去医治，但决不做专业。其二哥作孚因讼事在省城羁押，他请假去奉天营救，时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有爱马得病，经过若干兽医皆未治好，张得知，请试医治，不数日治好，依将军大喜，酬巨金，张不受，只求将其兄释放，将军允其请，作孚得释回家。

4 张入毅军充戈什是 1895 年，他 21 岁。想起赵家亲事，他深知内情，只要赵家女母和女舅不反对，这亲事就算成功。他大胆地请两个月婚假，带着功牌和哨长扎委和不少礼物去赵家。先未提起婚事，假说串门，对女母和女舅貌极恭顺，并出示所得功牌和哨长扎委等。过了不几日，女母和女舅竟改口说这少年将来必有出息。他见时机已到，乃托人向赵家求婚。赵老头当然乐意，女母和女舅也无异言。男女双方都 21 岁结婚就算晚了，所以办得很快。赵氏貌不美，且目有斜视病，但甚能干。张好骂人，常与同伙等发生齟齬，经赵氏从中斡旋，赖以相安无事。1896 年

赵氏生一子（不久即死），1898年又生一女，名首芳，后嫁与鲍贵卿之次子莫麟为妻。

一日张见村中塾师卢某之女甚美。张找女舅为其帮首程敬芳提亲，女舅不允，推说：“程是外乡人，不知底蕴不嫁，若像你这样的人才能嫁。”张乃记在心中，不断向卢家献殷勤，甜言蜜语求婚。女舅原想张已有妻，故说了一句“像你这样的人才能嫁呢”，他认真来求婚，女舅说：“你已有妻，我的甥女岂能给人做二房？”张答应两头为大，决不是二房。卢某本拟将女送往北镇县城内逃避，惟路经40余里，尚有其他，必为抢去无疑，比较起来，还是张好点，遂决意嫁张。1900年秋间张娶卢女，赵氏料理一切婚礼，时赵已身怀学良三个月了^①。

1906年张在一年里连娶三位夫人：即三太太戴夫人、四太太许夫人、五太太寿夫人。张在拉帮时，劫夺财物甚多，并劫抢过帝俄一批金币，办团练时又打下其他小帮财物不少，因以富有。性喜良马，不惜出重金收买，当管带时个人有良马10余骑。后赠与奉天营务处总办张锡奎两匹。因张锡奎最爱马，故有“快马张”的绰号。张后来充督军时，因与溥仪之叔载涛有同好，成为好友，故张常诵“美人名马英雄胆”之句。张素重文人，常请教益。虽幼年读书三个月，能粗通文字，将《孙子》十三篇和《尉繚子》兵书常置于枕边。对军士们讲话至少两三个小时，滔滔不断，言之成章，但不能执笔。三太太戴氏原为县内捕盗班头之儿媳，貌极美，经杜泮林设计说亲，用去万金，先在外边居住四月，后与四太太许氏同日进门。后来张初任督军时，因戴打使女被张看见，赶出府门，削发为尼，郁闷而死。

① 据张景惠在苏联时亲口所说，张学良是在他家出生的，产后约五六个月张作霖始将妻子接走（金名世《张景惠与奉派首领张作霖》）。

经阎泽溥介绍，又娶前黑龙江寿将军外家王氏之女寿氏，由奉天接到新民。寿氏聪颖，能说会道，机警过人。寿氏初到洮南时，卫兵列队欢迎，寿亲为讲话，极得体，并有赏赐，因此，部下皆称赞之。

张的大太太赵氏生一女首芳，二子学良、学铭。生学铭时，看门人老薛午睡作梦，见一小喇嘛，直入院内，薛起追之，适与张统领相遇，张见薛问：“跑来做什么？”薛说：“见一小喇嘛进院，故追入。”张骂薛：“胡说，你做梦吧？”此时赵氏适生学铭。张骂：“这小子，找我算账来了。”因张办团练时，在匪帮内有一小喇嘛被他枪杀，因此不甚喜学铭。1911年冬赵氏携学铭来奉找张要钱，赵与学铭住外间，张住里间，因学铭夜啼，把张吵醒，张起来把学铭打了一顿，赵与张争吵，次日即回新民杏核店胡同家中，转年四月间赵氏病死。在赵病时，张先派卢氏往看，自己也去看过，但未说话。赵死后，给张去电报，张先不信赵死。赵氏死时年38岁。时学良12岁，学铭5岁，由卢氏照管。卢氏生二女，1907年生一女名怀英，1911年生一女名怀卿。许氏生二子二女，1911年生学曾，1915年生学思，1909年生怀瞳，1913年生怀曦。寿氏生四子，学森、学俊、学英、学铨。生学铨正值郭松龄反奉之时，生在南满站日本顾问松井家中，乳名太平。后来寿氏又为张在天津娶六太太马氏，生一女怀敏。

1915年，张学良娶辽源商人于氏女，名凤至，长将军三岁。生女闾瑛，生子闾珣、闾玕、闾琪；第三子夭亡。又娶赵氏女，生一子，名闾琳。

（周大文，作者幼年系张学良随读，青少年时为张学良挚友，后为张学良亲密僚属。）

二 盟兄挚友

一、家 世

1901年旧历四月十七日，张学良将军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詹家窝铺。将军名学良，字汉卿，别号毅庵（收藏书画多用别号），乳名小六子。将军远祖姓李，世居河北大城，后迁山东。清道光年间始徙辽宁省海城县。其曾祖过继于舅父张氏，始改姓张。将军祖父名有才，娶邵氏，生一女；继室王氏生三子，长子作泰，次子作孚，三子作霖。作霖字雨亭，即将军之父也。将军生母赵氏，将军8岁时，母病故，由继母卢氏抚养。将军同胞三人，长姊首芳嫁鲍育才，为吉林省长鲍贵卿之次子，将军居次，胞弟学铭。将军弟兄共八人，将军居长，弟学铭、学曾、学思、学森、学俊、学英、学铨等。姊妹六人，首芳（后改名首英）、怀英、怀瞳、怀卿、怀曦、怀敏等。

将军娶辽源商人于氏女，名凤至，长将军3岁，生女闾瑛，子3人，闾珣、闾玕、闾琪，第三子夭亡。又娶赵氏女，生一子闾琳。

将军父雨亭公少年先业兽医，后入行伍，精射击，枪无虚发。日俄战争时，雨公在黑山、新民一带与张作相等组织民团保护农民，里闾有声。清新民知府增楹，伟公才，请其驻新民维乱后秩序，擢任骑兵营管带，后升统领、统制；民国历任师长、督军、镇威上将军、东三省巡阅使，奉吉黑热察绥六省经略使，大元帅等职。是时我国军阀正受东西帝国主义者唆使，内战频繁，直无宁岁。雨公采纳将军建议，于1928年6月9日拍发佳电，通告全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遂由北京率军返还沈阳，东行至皇姑屯被日军暗算，为国牺牲焉。

二、学生时代的志趣

张学良将军 8 岁在家私塾读书，业师杨姓，与表兄赵兴德、表弟杨某同学。1917 年请辽阳名儒孝廉公白永贞（字佩珩）到奉天（今沈阳）为将军讲古典文学。大文同高卓然附学。又请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先生教授英文。1917 年大文同杜泽先医师介绍将军到基督教青年会与阎宝航、肖树军、张国栋、贾连山诸干事相识。后将军与该会美籍干事普赖德、丹籍干事华茂山往来尤殷，时常参加网球竞赛和各种活动。又与王少源、杜泽先、刘玉堂、刘进之、刘仲宜诸医师为友。将军 14 岁与大文结为盟兄弟，后游北京又与李壮飞、胡若愚结盟换帖。将军新的知识日趋丰富，先拟学医，后以医用药品皆来自海外，又立志拟出国学习制药，以应国家之需要。将军因与西方人士过从甚密，一切生活习惯受了不少影响。是时来往人士除教士外，即教育界中人，如文汇书院派克尔夫妇和在沈西人中身量最高的惠特先生等。这一切来往友人的品质皆优，给了将军不少好的影响。将军因见到西方国家富强而祖国贫弱，爱国的思想更进一步树立起来。将军于 1919 年奉父命入讲武堂学习陆军，而多年所想的学习制药遂成泡影。将军为人笃孝，1917 年寒食节约大文同到郊外，焚香烧纸，遥祭生母赵氏，祭毕留连忘归，哀伤之情不能自持，经我劝解始骑车而归，城内已万家灯火矣。

三、爱国言行

张学良将军向来反对内战，主张一致对外。1928 年春与北伐军作战时，由河南给大文和胡若愚拍来电报，使我们在大元帅府酝酿停战空气，我们请朱光沐为代表到河南与将军商洽进行办法，旋将军回京接谈此事。后以条件未妥，未能达到停战目的。

1928年日本出兵济南，借口保护侨民，实际想干涉中国内政，以达其侵略野心。事为将军所窥破，建议雨帅撤兵出关停止内争，免中奸计。雨帅采纳此议，于6月9日拍出佳电通告全国，停止内争，一致对外，遂率师出关，行至皇姑屯，受日人暗算为国殉难，时在1928年6月4日。总之，将军反对内战，始终如一。

1928年将军率军回东北后，东北地方人民公举将军为东北行政长官。将军派胡若愚代表与蒋议和，成立协议。东三省改换青天白日旗，遂与关内各省连成统一局面。

1928年日本派特使林权助到奉天吊唁雨帅。林部属惊叹将军如此青年，能负偌大责任，皆称罕见。将军说：“我与你们天皇同庚，他能统治你们全国，我承东三省人民爱戴拥护和先父旧属辅佐，领导数省有何不可？”

1936年因将军“双十二”兵谏事，蒋令李烈钧为审判长审讯将军。将军侃侃而谈，答辩如流。审毕画供时，将军不视而签押。李谓此事重大，有关史料，岂可不细看而竟签押耶？将军笑说：“自古历史，真实事实能有几许呢！”李以后对人说将军口才甚好，叹赏不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爱国学生等赴将军北京寓所（顺承郡王府）请愿，间有少数学生因年少气躁，出言有些失当，而卫队军士们也属青年，将军恐肇事端，常向僚属们解说：“我们不抗而退，虽属奉命，实际上确是丧权辱国，学生们出于爱国热诚，叫骂几句，又有何妨，我们应该忍辱负重。”于是大家都心平气和了。

将军任东北行政长官时，有日本政友会议员赤冢、鹤见来谒将军说，倘他们首脑床次组阁，对于南满铁路特权和其他特权，可以让步，但须有90名议席方能组阁，希望在物质方面加以援

助。将军慨赠日金 50 万元，派秘书王家桢送往。

将军兴学不遗余力：1926 年将军在奉天小河沿建立同泽中学，后又在大西门里沈阳县胡同兴办同泽女子中学。1928 年在北陵创立东北大学，自任校长，请吉林刘凤竹为教育长，并聘国内知名之士如章士钊、罗文干诸氏等充任教授。

四、爱好与风雅

张学良将军爱好书画，收藏甚富，尤精鉴赏，赝品极少，其最出色者录于下：王大令书法真迹，为沈观裔氏旧藏，驰名海内。黄鹤山樵写《林泉清集图》，有董文敏题跋，谓此图当在《青弁隐居图》之右。《青弁隐居图》为上海狄平子先生所藏，后请先生携此图来京，两图并悬壁上，各有所长，惟气韵则不如《林泉清集》，文敏之所以如此推崇，或在于此。沈石田《荷香亭》图卷，不着款识，疑为唐六如作品，不过笔墨较唐浑厚，所谓细沈无过于斯图，比之石田《庐山高》图尤精。为明项元汴旧藏，明贤题跋甚多，堪称绝品。该卷为袁压先生所藏，让给将军，并另外让给沈翁着色花卉一卷，也极精美，有数段上觉斯蝇头小楷题跋，可谓双绝。赵文敏公六札，书法直逼右军，为明项元汴，清安仪周、梁蕉林等收藏，是溥心畬先生让给的。又有石谷为安仪周所作《松鹤》图卷，别致而有味，百数鹤群飞绕松林，各个姿态不同，画意脱尽凡俗，诚石谷作品中杰中之杰也。将军所藏精品不胜枚举，兹仅述其一斑。将军书画先存于天津花旗银行，经过敌伪变乱，于兹 20 余年，至今未闻确实下落。将军书法家黄庭坚，尤喜作篆书和钟鼎，故尝收集古泉，以其价廉而物美也。将军喜读唐诗，尤喜常诵孟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诗句。将军爱好京剧，如《捉放曹》中一段流水板“多蒙老丈美言讲，知恩不报非栋梁，七品的郎官成何样，同奔原为

汉家邦”，此段唱得烂熟，《武家坡》也唱得很流利。《空城计》一段散板“先帝爷白帝城叮咛就，我诸葛保幼主岂能无忧。但愿得此一去扫平贼寇，也免我亲自去把贼收”，为著名票友琴师陈彦衡先生所教。将军好玩网球，常在沈阳国际俱乐部与国际友人竞赛，擅长发球，时常因此得分制胜。将军又好玩高尔夫球，每暇时辄往球场游戏，数击即到家，不数小时即能通过全局。将军尤精桥牌，常使对方捉摸不定，出奇制胜。将军喜围棋，常与如夫人谷瑞至对局，惜无名手指导。谷氏是吉林风尘中人，性豪爽，有丈夫气，为将军所赏识，1921年与将军同居。1927年将军赠谷氏10万元，为谷氏另择佳偶，而谷氏不收。1946年谷氏病死，将军胞弟学铭亲往葬之。将军好食汤面和西餐黄土汤。将军常下厨亲自烹调，一次与大文和胡若愚各做一菜，将军做大酱烧土豆茄子，胡做炒鸡蛋，出锅时，烹一点酒醋，别有风味。大文做滑熘肉片，厨房内五六位厨师因应付要东西，忙乱一团。后闻厨师们说：“就怕这几位再到厨房来，比做几桌酒席还忙得多。”将军好游山，1916年同大文乘船游东陵，船行中途水浅，船底与河底相接触，我们下水中连推带抬，船才前进，此类情形不下数次，游毕回家已午夜矣。我们赤臂推船抬船，时值初夏，并不太热，然脊背赤红已脱皮。1921年孟冬初结冰时，我们游北陵，因追一只飞鸟，同入苇塘，陷于薄冰中，及出塘，裤已冻在腿上，乘车回家时把汽车上水箱皮套盖在腿上仍觉冷，乃将湿棉裤脱掉，使皮毛接触股肉（俗称毛咬肉），始稍暖，到家时拿来棉裤着后，方下车。我们顽皮淘气情况，可想而知了。

五、创设东北空军

1922年奉直第一次战后，张学良将军退回关外，深感军事力量不足，一面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改善军事，吉林督军孙烈

臣兼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为副监，将军为参谋长，因孙不常在奉天，一切多由将军负责，一面创立空军，设东北航空处，增加新兵种。时有周培炳、姚锡九、杨毓珣前来投效。杨毓珣为袁世凯之女婿，陆军大学毕业，历任团旅长等职，先委在东北陆军整理处任辎重科科长，后调任督军署副官处处长。周培炳系日本东京高等工业毕业，历任北京中央统率办事处军事职务。姚锡九留学法国，先学习骑兵，后学习航空，以上二人派在航空处襄办事宜。后又派冯庸到航空处服务；1924年奉军得胜后，冯曾被派充空军司令，但为期不久，即辞职，创办冯庸大学。东北航空处创设伊始，将军即罗致北京航空学校优秀学员，如赵延绪、伊里布、赵子峰、陈海华、万咸章、王立序、章斌、刘光克等。

东北航空处分为3个部分：

(1) 飞行队，有4个队：

①飞龙队，将军自兼队长，章斌为队附。队中多白俄飞行员，因章通俄语，故派为队附。其余各队无外籍人员；

②飞虎队，赵延绪为队长；

③飞豹队，赵子峰为队长；

④飞鹰队，伊里布为队长。

(2) 航空学校，将军自兼校长，周培炳为教育长，内有外籍教官，英籍教官马根业，法籍教官布类，又由各队中选拔最优秀人员兼任教官，如：陈海华、王立序等。将军学习飞行多由王立序教官教授。所用飞机先是采用法制飞机“高得风”、“布瑞格”，后又有采购英国威克斯公司飞机“威美”、“爱夫罗”。“威美”机能乘11人，在彼时为最大最新之载重机，“爱夫罗”为侦察和教练机。以上两机的发动机为世界驰名的英国饶路饶易斯工厂出品。

(3) 航空机械修配厂，邢契莘工程师任厂长。

1922 年将军建议雨帅，东北军政及各机关，应重用国外留学人员，推行新政，于是各地时贤到东北投效者，络绎不绝，尽予录用，如姜登选、韩麟春、翁之麟、邢契莘、王长春、汤国桢、周亚卫、温应星、王承志、刘本宜、何士礼等，皆在这个时期来到东北。一切作风改善，气象为之一新。

将军每早多半先到航空处办公，上午再到北大营和整理处。

训练军队，郭松龄襄助不少。将军治军兢兢业业，不遗余力，赏罚公平，纪律严明，不到两年即成为劲旅。

当时将军携如夫人谷氏借住东华门周大文宅内，离东北陆军整理处仅一墙之隔，每晚军队干部如郭松龄，航空处干部如周培炳、姚锡九等常来将军所聚餐，用谈话形式，讨论各方改善事宜。有时也到外面饭馆聚餐漫谈。总之，无论朝夕，离不开改善与整理，而对航空事业尤为重视。将军差不多每晚必与航空处部属晤谈，每个飞行员皆有联系，亲密如家人。将军能驾驶飞机，一日将军携胡若愚和如夫人谷氏起飞后，大耍花样，谷、胡二人下机，面色苍白，大吐不止，后不敢再乘将军驾驶飞机。空军建立仅 2 年，即有飞机近 200 架。

1922 年将军创立航空学校，前后招学员两班计百余人，不一年即能编队飞行，各学员也能掌握飞行应用的技术；在学员中有聂恒玉者，对于飞行技术具有天才，且勇敢胆大，不避艰险，任何困难任务皆乐接受，后终于为完成任务而殉职焉。众学员毕业后选最优秀者送往法国学习航空，东北空军徐世英先生，即是该批留法学生中的一人。

六、与国民军倒曹锟的合作

1924 年，张学良将军因曹锟贿选，不修内政，建议雨帅与

孙总理联系，取一致行动，通电全国声讨之。遂分三路出兵：将军与姜登选成立一、三联军正面攻山海关；张宗昌率军出冷口，取滦州、唐山一带，切断京榆线直军联系；李景林率军由锦州取热河。时曹锟派吴佩孚为总司令，率直军嫡系和杂牌军队约近百万援山海关。吴佩孚援山海关时，声势浩大。散发这样的标语：“本总司令神机妙算，张家父子岂是对手。”曹锟又派冯玉祥率国民一、二两军援热河，留国民三军孙岳卫戍京津。京榆路线，因军队过多，运输又无计划，路线车辆拥挤不堪，几乎不能通行，勉强通车也极迟缓。据闻京榆沿线各处军队，因运输不便，粮秣接济不上，有时挨饿。直军溃退后，天津东站、北站之间，发出奇臭，后才发现数辆铁棚车内有抓来壮夫百余人，皆饿死在车内。因直军逃跑过急，忘记把铁棚车门开锁，把无辜百余人活活饿死。

1922年，将军经胡若愚、彭济群介绍，与李石曾先生结识，后经李氏奔走，东北军与国民军合作，彼此成立谅解。在此同时，将军派整理处步兵科长傅兴沛持亲笔函谒冯玉祥，作过初步联系。奉直第二次战争爆发时，将军给国民军物质上的援助日金票200万元，国民军旅长弓富魁收领之。故国民军援热，军行甚缓。及将军在山海关攻破直军，国民军一夜即到北京，囚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捉曹锐，杀李彦青等。

七、与郭松龄的关系

1924年奉直第二次战争时，奉天一、三联军攻山海关正面。第一军军长为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为将军，副军长郭松龄。姜登选和韩麟春本来没有军队，临时拨过几个师，如高维岳师、齐恩铭师、裴春生师、赵恩臻师、孙旭昌师等编成为第一军。怕这些师长们不听指挥，所以组成一、三联军，由将军

和郭松龄共同指挥。孙旭昌师先攻入九门口，直军守将旅长冯玉荣自杀。吴佩孚派直军劲旅靳云鹗师、张福来师增援九门口，奉军窦伦团长战死，将军派两个师增援仍支持不住；后从攻山海关铁路线抽调 8 个精锐步兵团，由郭松龄率领，增援九门口。在此紧急时期，郭有同学阎宗周充炮兵第五团营长来见郭，谓被该团团长陈深撤职。郭在盛怒之下，亲写命令，撤陈深团长职，令阎仍回营长原职。陈深与阎宗周平素不睦，陈在姜、韩面前进谗言，故将阎撤职，韩麟春为此事连夜乘专车返奉，请示雨帅，结果陈、阎两人全不动。郭闻此讯，怒极，竟在某天夜间率此 8 个团离开阵地，向后背进。将军闻讯赶到，派参谋等四处找郭，与郭晤面，两人见面，抱头痛哭。将军晓以大义说服之，令速返阵地，郭无奈，于次晨拂晓进入阵地。直军误会奉军又来增援，不增援尚支持不住，于是军心摇动，开始退却，将军率联军由右侧秦皇岛迁回到石门寨、黑山窑等处包围直军，俘虏无数。此役缴直军步枪 14 万余枝、大炮 200 余门、轻重机枪 2000 余挺，大获全胜。

1924 年奉军得胜入关后，李景林督冀、张宗昌督鲁。随后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以上四人与郭地位相同，而功绩有不如他的，竟得到地盘，而自己仍居原位，心中不平，大为不满。故姜登选回奉路过滦州时，为郭松龄所枪毙，以泄其愤。在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前，将军曾给大文电报，令密呈雨帅为郭要求地盘，情辞恳切。而雨帅仍欲郭松龄在将军左右，将来拟在东北给一地盘，当时未允所请。但郭不甚了解此意，致酿成倒戈之变。

郭松龄在滦州发动倒戈时，有不少人与他都有接头。据说冯玉祥曾给郭电报，愿出 5 个旅协助反奉。郭复电，奉天事奉天办，不要他人管，如果参加，当以敌视之。热河都统阚朝玺派人

与郭联系和他一致行动，但事成之后，须给他黑龙江省督军。郭要阍所部3个旅改编，调充高等顾问。冀省督军李景林先也同郭有联系取一致行动，后因冯玉祥要李冀省地盘，叫李去热河充都统，因此，李又翻转过来。

因郭松龄拥有精兵，奉天与他联系的人也不少，甚至雨帅卫队团长李维一也派过代表，表示欢迎他。

将军后来对郭松龄倒戈的人员，仍然重用，不咎既往。将军气量宽宏，使这些人们感恩，因而起了很大的作用。

郭松龄字茂宸，绰号郭鬼子，因其秉性特别，刚愎任性，不通世故，并且外貌也像印度人，所以有此绰号。郭为将军最倚重的人。将军在讲武堂学习军事时，郭松龄在该堂充战术教官，军事学识有独到处，深为将军所钦佩。惟郭要好过急，时有出轨之处。郭常到旁的教官教室点名检查，有一次处罚过学员半数以上。最突出者，有一次各区队正在操场体操时，郭到操场鸣哨集合各区队长等讲评。时总区队长孙旭昌也在场，讲评乃总区队长应有之责，今郭来讲评，置孙于不问，使孙难堪。孙当日向该堂教育长熙洽提出辞职，经熙好言慰留，并通告全堂，谓分职设官，贵有专责，今竟有人越俎代庖，有乖职守，殊属非是，等语。又经过几番波折，郭终于离开讲武堂，经将军保荐调充奉天督军少校参谋。将军不久充任卫队旅旅长，调郭松龄为该旅参谋长代理第二团团团长，旋升任第八旅旅长。为期不到两年即升到旅长地位，可谓不次的擢用。郭任师长时，同级师长们与他联系事情，他对于这些师长们极无礼貌，因而他们对郭亦不甚满意。

将军对郭无微不至，试举数小事来讲：将军每出去到饭馆吃饭，必约郭同往，倘郭不能来，即作罢，不外出，此类事不止一次。郭喜跳交际舞，每值郭休息，将军必办舞会，处处投其所

好。后郭松龄倒戈被擒处死，将军闻之不胜惋惜，无丝毫恨意，并谓倘郭被我部擒捕，必设法送出国外，以保其生命，将军对郭可谓厚矣。

郭松龄为江省骑兵穆春旅在辽中县老达房村所擒，雨帅当日即派副官郑奎武持其手谕，将郭立即就地枪决。雨帅或知如把郭解到奉天，将军必设法营救之，故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处死之，此 1925 年冬季事也。

八、被蒋看管时代

1937 年经蒋介石军法会审，判张学良将军有期徒刑 10 年，旋即特赦，但由军委会看管。1937 年 1 月下旬某日，蒋派宪兵百余名、侍卫 40 名看管将军，把将军送到奉化蒋氏故园居住，后又迁至雪窦寺中国旅行社。

该看管队有队长、队附。队长名刘乙光，队附为许姓。队长、队附住将军居室之左边一室和右边一室分别看守。将军居室窗外有卫兵两名值岗，居室门外也有卫兵两人值岗。每日午、晚两餐，将军和夫人同队长、队附共桌而食。6 月间，蒋派北京步姓老先生到旅行社为将军讲旧文学。宋子文、戴笠先生到雪窦寺旅行社来看将军一次。前中东路督办莫德惠前后到旅行社看过将军两次，事前毫无消息，至屋门时始传达；莫在该处与将军共食两次。于学忠、杨毓珣同来看过将军一次。将军四弟学思曾来该处看望将军，住过两夜。将军在该处每日读书自娱，并与许队附和军士等打羽毛球或排球等游戏。11 月间一天早晨，该旅行社锅炉房因锅炉火力太猛，把房的木架烧着，瞬间全部旅行社化为乌有，将军和夫人衣物尽付一炬。将军和夫人衣物既被烧尽，时届冬季，无以御寒，该看管队奉命把将军送往黄山，道经徽州，经保姆王妈给买了白本色土布两

匹，棉花3斤，为将军和夫人做了几床棉被，她又给将军一块红绿花条驼绒，勉强凑与一双鞋面，做了一双棉鞋来挡寒。夫人做了一件蓝麻花布面猫皮皮袄（后来又在萍乡城内赶制灰色土布棉裤棉袄一身，蓝棉布大衣一件）。夫妇如此打扮，实为预想所不及，将军着之泰然自若。由奉化到黄山时，本拟住段祺瑞别墅，因打扫不及，暂住黄山旅行社，居住仅3天。晚间该看管队奉到命令，把将军连夜送湖南，先到南昌，转高安住一夜，又去萍乡，先住旅社，后迁民宅。约1个多月，又奉到命令送将军去湘潭，住一夜，过衡阳到达郴州。在去黄山之前，传说不久将军可去庐山，或与蒋有晤面机会，可以撤消看管，将军闻之甚是高兴。不意离开江西而赴湖南，使将军失望，夫人与王妈彼此相视，半日无语，但将军神色依然，照常谈笑。既到郴州，先住五州旅馆两星期，后移居苏仙岭上庙内，惟庙内房屋破乱不堪，地下积尘数寸。王妈同杜差官到郴州县城，买来些杂样白纸，把墙裱糊，暂挡脏污，然将军居之甚安。因连日阴雨，屋内潮湿之气逼人，衣物生毛，多人患皮肤病，于夫人尤甚，该看管队由衡阳接来医生，为夫人和众人治疗。后来终因环境卫生过于恶劣，离开此地，迁住永兴县。将军因步老先生年迈，不忍此老人随将军长途跋涉，请求把步老先生送回原籍休养，不久请准，即回北京原籍。将军到永兴住在该县小学校内，正值阴历春节休假停课之期，是时已1938年春季矣。在永兴住约有3个月，该看管队把将军遣往沅陵凤凰山。在去之先，许队附先到凤凰山一庙内，为将军修饰房屋，并在长沙买来家具布置居室，颇为清洁，所费不赀。有人疑许队附与将军有感情，后终因此而被调走。该庙处于凤凰山之巅，下临沅江，将军每日垂钓，或引江水至河汉，然后再截断江水，与看守军士等捕鱼为戏，以资消遣。在此处约有半年

之久，该看管队接到命令把将军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即昔日王守仁读书之所也。

1938年将军在沅陵时，戴笠曾来访看；将军到贵州，戴又看过一次。1940年宋子文为了鲍文樾参加敌伪组织，请将军给鲍去信阻止。以后王妈听将军对夫人说：“治一不识大体，不知轻重，铸成大错，我若不在此间，他决不会参加敌伪的。”

据王妈称：“我看到将军被看管这两年多来，总是眉开眼笑，从未发过愁和说过一句牢骚话，平时常与看管军士等嬉笑玩耍，有时给他们做饭做菜，如烙馅饼、炖牛肉等等，他老真是心胸宽大，为平常人所做不到的，令人钦佩。”

1940年将军夫人于凤至因患奶疮，须到大都市医疗，于是去香港就医，王妈也随行，并换来赵氏绮霞夫人陪伴将军。

据王妈说，张学良将军来往信件，须通过军委会审核后，派高级将校专送，不经邮局之手。

(周大文)

三 元配夫人

于凤至，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字翔舟。1897年农历五月初八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原怀德县）南岁子乡大泉眼村。于凤至的父亲于文斗在双辽县郑家屯以开粮栈为生。于凤至八九岁时就上私塾念书，这在当时是鲜见的。这位小姑娘一入学就显示出不凡的天资和出众的记忆力。她以孜孜不倦的毅力，把所念的书背得流利通畅，深受老师的赞许。父亲见她有这么好的天资，就接她到郑家屯官学念书。于凤至中学毕业后，考入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在学校是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才生。于凤至是一个既懂事理又温文尔雅的好姑娘，窈窕身材，鹅蛋形的脸庞，细

眉毛大眼睛，闪现出秀丽聪慧的神采，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父母爱如掌上明珠。

正当于凤至在郑家屯念书的时候，张作霖带领巡防营进驻郑家屯。张作霖当时在奉天督军徐世昌手下当统领（营长），因蒙匪经常到郑家屯一带抢劫骚扰，奉命前来进剿，他的指挥部就设在于文斗的粮栈院内。郑家屯一带得到了安定，于文斗对张作霖欢迎备至，时常宴请张作霖，俩人经常在客室里饮茶闲谈。由于彼此交往甚密，张作霖每看到于凤至，都满口称赞凤至姑娘聪明贤惠，标致大方。有一天，于文斗请来一个算命先生，给女儿凤至“批八字”。这个算命先生高声奉承地说：“这个姑娘是凤命，这命太好了。”恰好张作霖走到门外，听得一清二楚。这位特别迷信的军官，在队伍里专门聘请了沈阳出名的算卦先生，一走一动都要算算阴阳八卦。当他听说于凤至是“凤命”，就急忙走进屋内，拿起桌子上刚算完的卦帖，随即说：“我手下有位王先生，是沈阳有名的神算，我拿去让他给核对一下。”经核对确是“凤命”，张作霖喜上心头，学良是“将门虎子”，凤至是“凤命千金”，真是天赐良缘。张作霖遂托自己的亲信向于家提亲。于文斗虽然感到张作霖身为统领，将门出虎子，孩子将来也错不了，但又产生疑虑，就对张作霖说：“你们当官的，将来都得三妻四妾，我闺女嫁到你家，以后受气怎么办呢？”张作霖当时下了保证：“只要你姑娘嫁到我家，我儿子保证不娶二房。”（以后张学良真没有明娶二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张学良10岁、于凤至12岁时即订婚。不久，张作霖把张学良接到郑家屯。于文斗夫妇看见张学良长得五官端正，两只大眼睛机智活泼，见着生人一点也不腼腆，有一股豪爽大方的英气。老两口从心里高兴，便给小姑爷做了一身黑缎子棉袄棉裤。

张学良15岁、于凤至17岁时，于家把姑娘送到沈阳结了

婚。婚后，于凤至回家省亲，回到了大泉眼老家，看到家乡还没有成立学校，回去和张学良一说，张学良当即给于凤至家乡汇款建校，先后两次汇来两万元现大洋，修了两栋砖瓦结构校舍，命名为“新民小学”。学校聘请于凤至的哥哥于凤翥为董事长，刘春田为校长，教员有周祝三、葛东升等人。学生一律免费入学，教师工资和学校经费由东北边防司令部教育秘书处直接拨发。

于凤至结婚后不久，张作霖就任奉天省督军，权高势大，门庭显赫。而于凤至从没有因家势显达而盛气凌人，仍然温雅如初，手不释卷，常赴东北大学听课，以求新知。张学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在军队里从团长、旅长升到军长，并代替父亲张大帅处理某些日常事务。每当张学良统兵出征之前，于凤至都拿出自己的积蓄购置物品，亲往军营慰问；战时又亲赴后方医院，慰劳受伤将士，因而深得将士们感激，在战场上莫不奋勇当先，效命捐躯。

对于公益事业、慈善团体，于凤至积极提倡赞助。她尤为重视教育，热情鼓动张学良在各地开建小学和中学。每逢奉天省举行体育运动大会，于凤至均以私蓄资助奖品，并亲自登台颁发，深得众望。当时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特别是妇女界多要求她出任要职，但于凤至从不为荣誉所动，平居治家，诸事俭约，对公婆孝敬恭顺，对丈夫相敬如宾，对佣人和蔼善良，因此深得张作霖的器重和张学良的敬爱。张学良一向把于凤至称为“大姐”。两人伉俪情深，从没有任何反嘴的情形。因于凤至是长媳，府内许多事务均由于凤至出面料理，件件都做得精心周到，不出一点差错，从没有因内务事给张学良带来烦恼。张作霖的姨太太多达五六个，没有一个不喜欢于凤至的。帅府的佣人很多，于凤至像家人一样对待，甚至把帅府的金银库钥匙都交给佣人王妈掌管。

于凤至看到张学良终日操劳，总是忧心忡忡，由于自己的文

化水平不高，不能在军政事务上为张学良分忧，总想给张学良物色一个高水平的贤内助，充当少帅的秘书，好使张学良在处理军政事务上有个贴己的帮手。这时，于凤至发现天津的赵四小姐赵一荻给汉卿的印象很好。于凤至也很喜欢赵四小姐，她不但长相出众，而且聪敏过人，精通外语，是一个有才有识的女性。每逢赵一荻来帅府的时候，于凤至也如张学良一样亲热地称之为“小妹”。当赵四小姐即将临产时，于凤至亲自缝做幼儿衣裤。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于凤至叫张学良把赵四小姐接到沈阳，就任张学良的随身秘书。赵四小姐到沈阳后，张作霖的几个姨太太有的说三道四。于凤至跟张学良合计，在帅府外购置了一幢小楼，专门给赵一荻住。于凤至看到赵一荻成为张学良的得力助手，就像自己能为汉卿分忧解愁一样感到异常欣慰。赵一荻对于凤至特别敬重，像张学良一样称于凤至为大姐，两人情同姊妹，从没有发生任何不睦。张学良对这样贤惠善良的妻子更是推心置腹，备加亲爱。每遇犯难的事情都要跟“老大姐”商量商量。于凤至在帅府内外显示出不可或缺的作用。

1928年6月3日傍晚，张作霖坐专车从北京回沈阳，路过皇姑屯时被日本埋设的地雷炸亡。当张作霖的尸体运回帅府后，张作霖的寿夫人（即五夫人）和于凤至、参议长臧式毅、医官杜泽生密议：对外只说大帅身受轻伤，不日即可痊愈，帅府只许进不许出。当时，日本人在沈阳附近已调集重兵，如果大帅死讯传出，张学良又不在家，日本人就会趁机进兵。由于帅府内保守机密，诸般事项一如往常。于凤至按时“给张作霖送饭”，饭量日渐增加，每逢送完饭，于就对帅府内的人员说：“父帅的伤快好了，用不了几天就能下地啦。”日本人急等张作霖的死讯，摸不到底细，特意派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夫人和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夫人以探病为由，到帅府观察动静。她们进入帅府后，但见平静如

常，尤让她们感到意外的是寿夫人和于凤至竟然盛装出迎，满面春风。两个日本夫人目瞪口呆。本庄和林久大失所望，致使剑拔弩张的日本人不得不偃旗息鼓。

张作霖死后，手握重权的奉军参谋长兼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霆从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与其心腹常荫槐（黑龙江省长）串通一气，处处与张学良作梗。张学良意欲易帜，归服南京中央政府，一则维护国家统一，二则以免自己孤立无援，一旦与日本人打起来，有了中央政府便有了后盾。而杨、常因别有用心，则坚决反对。日本是外敌，杨、常是内患，内患不除，里勾外连必然酿成大祸。但杨宇霆在东北军里是有功之臣，去留难以决断。一天夜里，张学良久久不能入睡。于凤至深知张学良的焦急心情，为了帮助他早做决断，便对张学良说：“汉卿，我用银元给你算一卦，看看如何？”说着拿起一块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站起来说：“如果人头像着地就除掉杨、常；人头像冲上就留。”她手一撒银元落地，恰恰是人头像着地。于凤至说：“汉卿，你看，人头像着地啦。”张学良漫不经心地说：“我不相信那一套，那能顶什么用。”于凤至说：“你不相信，我再扔一次看看。”第二次扔完，仍然是人头像着地，又扔第三次，还是如此。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鬼使神差，而是于凤至有意使用这个办法，促使张学良早下决心，除掉杨、常。于凤至有意将人头像冲下，当然三次都是人头像着地。张学良下了决心，以少帅和夫人请杨、常过府打牌为名，请来杨、常，使其饮弹毙命，根除了内患。东北的政治局面为之一振，杨、常的分裂势力遂告瓦解，人心统一，张学良易帜的愿望得以实现，保护了国家的统一。

于凤至用来占卜的这块银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走时把它放在卧室的保险柜里。当日寇进占沈阳时，日军如狼似虎地闯进大帅府，一日本军官率领数名日军直奔二楼卧室，费

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打开保险柜，里面却空空如也，只有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这张收据是日本当时在野的“政友本党”得到张学良 50 万元资助经费的收据。张学良夫妇意在告知日军：你们侵华的结果，只能是大失所望。

由于蒋介石下达了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撤进关内。东北沦陷，3000 万家乡父老当了亡国奴，举国上下民怨鼎沸，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住在河北保定的张学良心神不安，内疚不已。这时，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使张学良有所觉醒，内心里产生了向往。张学良将军在《张少帅与张少帅》一书中说：“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仅是对良个人，并已动摇了大部分东北将士。”于凤至跟随张学良抛弃家乡父老，沉痛异常。她深知张学良的沉重心情，期望张学良能看清时局，找到抗日救国的出路，因之时时在观察张学良的情绪，总想找机会劝说张学良。一天，于凤至的姑娘张闾瑛做了一件红裙子穿在身上，高兴地给妈妈爸爸看。于凤至见景生情，问闾瑛：“你喜欢红色？”闾瑛天真地回答说：“我喜欢红色，妈，你喜不喜欢红色？”张学良在一旁看见母女一问一答，若有所思。闾瑛又撒娇地问她爸爸：“爸爸，你喜不喜欢红色？”张学良深沉地点了点头说：“我也喜欢红色。”在当时，共产党的军队称为“红军”，国民党把共产党人称为“赤色分子”，视赤如虎。蒋介石给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日军，把东北军调进关内，是在实行他“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目的是把东北军调往大西北“围剿”红军。而张学良的志愿是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东北国土。蒋介石的决定使张学良难伸抗日救国的大志，因之对蒋介石耿耿于怀。而对坚决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内心里备加赞许。张学良深知夫人于凤至话中的含义，随口应声，托词而出，表示出夫妇二人心心相印。这为以后发起西安事变埋

下了思想伏线。

日本侵占了东北，国内群情激愤，民怨难平。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包袱，五内俱焚。而蒋介石却利用这个机会，另做打算。蒋介石特意到保定见张学良，说现在民怨难平，就像一只小船载了两个人，遇见了险情，必先下一人方可无虞，现在不是你下台，就得我下台。张学良将军甘愿承担“失土之罪”，辞掉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兼陆海空副总司令职务，飞往南京养病去了。他走前没跟任何部下打招呼。养病月余，于1933年4月，张又带于凤至到意大利考察去了。当时蒋介石的居心是把张学良调离东北军，自己好直接下令调东北军去“围剿”陕北红军。因张学良临走时没露任何声色，东北军将士们都不知道。当蒋介石派人调遣东北军时，将士们表示必须张学良将军亲自下令才能开拔。蒋介石只好拍电报追回张学良，并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到西安之后，张学良对蒋进行了兵谏，软禁了蒋介石，迫蒋抗日，从而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在南京的宋美龄和宋子文惊恐万分，束手无策。这时他们自然想到了于凤至。他们认为于凤至曾认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找她给张学良写封信，叫张学良放回蒋介石，她必然应允。当派人到意大利找到于凤至时，于凤至当即回答说：“西安事变，我没在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说，汉卿从来不让我过问他的政事，就是写了信也没有用。”于凤至拒绝了写信，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张学良。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联共抗日，一致对外”的重大决策。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对张学良怀恨在心。当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到南京后，蒋背信弃义，立即把张学良监禁起来，并通过军事法庭以“污辱领袖罪”给张判了刑，将张秘密软禁起来。于凤至接到电报急忙回国。蒋介石把张学良和于凤至秘密押送到湖南沅陵

县凤凰山上的一座古庙里。一个特务头子领着妻子同张学良夫妇同住一间大屋子里，一言一行都受到严密监视。于凤至对张学良百般慰藉，为了排忧解难，于和张学良共同写诗画画，打打网球，保护了张学良的身体健康。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夫妻情谊，使张学良深得宽慰。此间，张学良曾给于凤至写了一首诗。此诗被当时张学良的副官陈大章记在心里。在西安事变 50 周年的 1986 年，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陈老，将原诗公诸于世：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诗中表达了张对于凤至的挚爱，并隐露出对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愤慨。

当张学良被蒋介石押往台湾的时候，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于凤至忍痛割舍了与张学良的夫妻深情，就让赵一荻陪同张学良去台湾，自己领着赵一荻生的儿子和自己的女儿去美国，担负起抚养子女的重任。在美国的几十年里，于凤至把孩子们都抚养成人，成家立业。赵四小姐的儿子已成为电脑专家。于凤至曾几次去台湾看望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由于张学良信奉了基督教，要求接受洗礼。教中的规矩，接受洗礼的教徒必须是一夫一妻。张学良为此给于凤至去信征求意见，于凤至回信说：“我同意和你办离婚手续，愿你早日和一荻补办婚礼，成为合法夫妻。这不但为了接受洗礼，更重要的是因为赵四小姐在你身边多年，尚没有个正当名分，这对孩子们也有某些影响。我在晚年能成全你和一荻的好事，我也深感欣慰。”1964 年 7 月 4 日赵一荻 51 岁时，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台北补办了婚礼。温雅贤惠的于凤至为张学良将军作出了无我的奉献。

(石景芳，辽宁省公主岭市政协文史办干部，该文是其采访于凤至的侄子于兆赢、张学良的老部下荆有岩、郭维城、陈大章等，并参照有关史料整理而成。)

四 红粉知己

我父亲赵庆华（字燧山）生前在军阀时代连任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局长，曾一度升到当时交通部副部长。他在梁士诒（当交通次长时人称为五路财神）做总理时，曾红过一番。1926年我（17岁）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读书，由于家庭关系，所结交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军阀、官僚、买办的子弟。暑期中常去北戴河海滨避暑，在海滨由朱海北（朱启铃之子）、吴敬安、朱光沐的介绍认识了汤国桢、李应超、伊雅格（James, Elder）等等，嗣后又认识了张学铭（张学良的二弟）和张学良。终日在一起游玩、游泳。时常与张学良骑自行车到海边、山上游览景致。他们都当我是一个小弟弟一般，带着我一同进出，非常熟悉。后来张学良从东北或北平来天津，只要有空总找我一同游玩。我17岁开始认识张学良，直到22岁为止，仅仅五年。那时我正在求学时期，相晤次数不多，因此所知有限。

（一）看电影

有一件事当时使我觉得特别新颖，就是在天津晚上吃饭跳舞玩到深夜，游兴尤浓时，竟会打电话去特约订座看电影。在晚上二三点钟还一同去天津黎栈附近一家光明电影院，看美国电影。我们20多人坐在楼上特座看电影，楼上楼下除了我们外，并无任何观众。

（二）绮霞失踪

张学良每次来天津，除了张部下那几位朋友外，总是有我和

我家姊妹以及当时天津的一些名门闺秀，一同在交际场所游玩。1928年我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忽然接到天津家里来电报说我的四妹绮霞失踪，叫我立刻回家。后来才知道绮霞已去沈阳。当时我的父亲极为愤怒，立即在天津《大公报》、《庸报》登载与我四妹绮霞脱离父女关系启事，同时我的父亲向当时政府辞职，终身不再做事。

（三）兄妹关系

我是我家中最小的一个弟弟，绮霞是我家最小的一个妹妹（我家是男女分排行，我排行第六，绮霞排行第四），由于我和四妹从小在一起，感情特深。1929年，她住在北平顺承王府时，时常到清华大学去找我和我的女同学吴靖（现在已是我的爱人），有时进城吃饭，有时一同去逛游北京的名胜古迹，有时到顺承王府去玩，时常遇见张学良。由于我当时专心读书，不问政治，所



赵一荻（中左三）、张学铭（后右二）和众人合影。

以和张学良所谈的仅仅是家常琐事，从不谈国事。

（四）“九一八”

1931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读书，九一八东北事变，日军占领沈阳、长春，举国反抗。当时我心中极其愤怒，怎么张学良会抱不抵抗主义，虽然多次在顺承王府碰见张学良，他总是忙得很，从未有机会能问他。有一次在他寝室书桌上，摆着一封电报，我走过顺便看看，一看是蒋中正打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坚决不抵抗”。我才知道当时张学良的不抵抗，不是张学良自己不要抵抗，而是蒋中正的命令，假借“为国为民”的幌子迫使他抵抗。这件事从来也未对外讲过。回忆当时看见这封电报的愤怒心情，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可惜这封电报没有保留下来，否则真可以陈列在展览馆里让全国人民来看看了。

（五）从鸦片到吗啡

张学良与四妹绮霞平时仅抽抽香烟，后来染上了鸦片烟瘾，出外非常不便，于是请了一名外国“名医”。这个“名医”贪图发财，介绍自己“发明”的自配的戒药针，说什么一打就灵。其实不是戒烟药针，而是轻的吗啡针，一打之后立即见效，鸦片瘾果然断了，可是吗啡瘾染上了，越打越增加吗啡瘾，病更深而医疗更难了。后来我经常看见他们俩每隔不久就必须打吗啡针，他们的臂上针疤打满了，再打腿上。腿上的针疤成千成万，简直令人可怕。后来幸亏在上海美国医师米勒（Dr. Miller）医生替他们俩把吗啡瘾戒除了。听说戒瘾治疗时把人绑在床上很多日子才治好。并听说张学良除了送这医师10余万元外，并送他一所医院（确否不详）。

（六）出国后至今

后来他们出国了，他们到了意大利，时常有信来。回国后，1934年我来上海碰见四妹绮霞，而未碰见张学良。以后就从没

有再见过面。1936年12月，两家外商煤油公司聘请我去西安做经理去，已与胡若愚一同订好飞机于12月8日去西安，张学良为我两人备好寝室。当时我在北平中孚银行工作，年底结账太忙，改期去西安。胡若愚先去，12月10日晚上，在备好的寝室中，胡若愚面上中了两枪未死。我也就不去了。胜利后1947年由于莫德惠去台湾之便，曾托他带一封信给我四妹，莫回来带回四妹的复信和照片。我和她未见面已有29年了。从海外传来的消息，他们俩在台湾还好，听说张与四妹生活上较为自由些。四妹的儿子张闾琳现在美国，听说已结婚了。

(赵燕生，作者系赵绮霞之胞兄。)

第二章 学贯中西 真情至性 一诺千金重泰山

在 20 世纪 20 年代，青年张学良堪称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既饱览经史子集，又谙熟英语。西方文化的“天赋人权”和儒家的修身立世潜移默化地铸就了他的性格。他对身边的卫士、裁缝、厨师，平等呵护；对家庭教师，一诺千金；他的人格，迫使郭松龄反奉时都要羞羞答答地竖起“反父拥子”的旗号；就连中国现代史上各类顶尖人物宋美龄、宋子文、张治中、戴笠等都要对他敬让三分。年仅弱冠的他，依仗自己性格所焕发出的巨大凝聚力，渐次顺利地从父辈手中接过了权力的执杖……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豪爽率真的性格也使他的个人事业在他 36 岁那年戛然而止，一生欲施展抱负的空间顷刻瓦解……

一 家庭教师

东北三省司令长官张学良，是一位中外知名人物，一般称他为张少帅，他 20 几岁时掌握着东北三省军政大权，极力兴建东北。1927 年到 1929 年的三年中，我在他家教过他四个孩子，所

以我对他多少有些认识。

早在1925年我由天津南开高中毕业后，即立志出国学工，遂上书申请，后值郭松龄倒戈就没有下文了。东北大学某教授替我联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工读学校成功，苦无赴美路费，我便持该校许可信去北京亲自向张要求协助成行。当我向他读了许可信后，他奇怪地问我：“你怎会英文，在哪儿学的？”我说我是天津南开高中毕业的。他当面慨允，即时交给我1000元，作出国路费，并说：“你来京往返不容易，再补给50元。”说完又拿出一张大相片，上写“天成乡弟惠存”，下写“张学良赠”。他又说：“回去预备出国吧，我将开办汽车工厂。”道谢告辞后，我喜出望外地奔回东北办理出国手续。然而事情又不巧了，一个月后福特工读学校又寄来第二封信，说停止招收工读学生，这给了我当头一棒。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几天后，我再去北京向张学良说明经过。他问我说：“不收工读生你想怎么办呢？”我说我想入正式大学攻读工程科。他又说：“等我考虑考虑，过几天你再来吧。”过了五天，一见面他就说：“你在这儿给我教小孩吧。”我心里的确有些为难，但无法推却；为难的是出国学工的志愿完全破灭了，更为难的是孩子们的性格习惯能否处得来。出我意外，他们都是极有礼貌活泼可亲的孩子，我这才安下心教他们英文和数学。万字廊南边的八角亭是书房，石室北双圆亭是饭厅。其后，又增聘语文、国画老师各一位。彼时京汉、京沪两路战事正酣，两月后曾由新乡指挥作战百忙中捐回数百元分赠三位老师，以表关注。

东北军收兵回关外，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炸车事件时，张学良仍在关里整编队伍。回东北后，他被选为东三省司令长官，公开为其父治丧。我与别人一样地递送一份悼礼，结果给我单人开了一桌全席送到书房，这样隆重礼仪还是罕见的。

其后，张学良加快建设东北，修铁路、设港口、办学校，以400元的高薪聘请国内一流教授去东北大学任教。在一次招待学生的茶话会上所赠的一首七言诗：“大好河山夕照中，国人肩负一重重；男儿正要闻鸡起，一寸光阴莫放松。”足以说明他对青年人的期待。

三年来，我未曾见过他对任何人发态度。看起来他像一位朝气蓬勃的运动员，又像一位名演员，像一位少年老成的学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人精明机警，作事爽快诚恳，又重义气。就是你初次和他见面谈，你也会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气氛笼罩着你的心身。然而你绝不相信你是在会见一位30万大军的统帅和统治东北三省的长官。我极少和他接谈，但是他和你讲的话完全算数。1929年10月的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准备出国入大学吧，自己办好入学手续就走。”他的话字字落实后，我便是美国密执安大学工学院的一个学生了。直到1933年他出国前在上海忍痛戒毒时，也就是他在政治生活中最失意的时刻，他电令我回国。这样对人负责到底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曲凌，1927年至1929年在张学良家任家庭教师。）

二 风神俊逸

33

我初次见到张学良，是1926年，在北京当时最时髦的社交场所的北京饭店。那是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由美国经营的协和医院的一位刘护士长和她的“未婚夫”（一个美国驻北京部队的陆军上上），招待我和我的爱人唐怡莹跳舞。主人是当时“社交界老前辈”的陈贯一夫妇。客人就是张学良和他的一伙亲信。经陈太太介绍，我认识了张学良，而张学良便立即要求和唐怡莹跳舞。

那天晚上一直玩到深夜一两点之后，才各自回家。

第二天，张学良就登门来访，我们更是殷勤接待。随来的，有一个被唤作小吴的江苏人和李应超（广东人）、朱光沐，还有一个在东北担任铁路方面指导工作的英国人。

我和唐怡莹陪他们到花园中去玩，并请他们坐在池塘中小船上，由朱光沐和那个英国人撑船。朱为要讨张的喜欢，就用滴水的船篙往英国人身上滴，那英国人也毫不相让，两个人便在小船上争夺竹篙，直闹得朱光沐几乎落水，那英国人也从头到脚弄得满身泥污。我们却哈哈大笑。当时我心想：“这个英国人居然和朱光沐一样，为了讨少帅的高兴，竟这样地会‘当差’……”后来我才听说，这个英国人也是靠张军团长吃饭的一个“中国通”，不但深得张的宠信，而且是当时东北军中的一个铁路专家哩。

这天，张学良特别高兴，下船之后，又回到我的书斋吃了家常便饭。张对我说，他平生最爱讲笑话，于是就讲了一两个。

这一天又是在东拉西扯之下，谈到深夜两三点钟才辞去。

张学良是一个文采风流的青年军人，和当时的一般军阀完全两样。例如他平常出门时，在他的汽车两旁，既没有身背大砍刀、在刀环上挂有几尺长红黄二色绸条的武装兵士随车保卫，也没有荷枪实弹的兵士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断绝交通，满载卫兵的大卡车跟在后面。经常只有几个心腹和副官分乘几辆汽车跟在他的车后。张学良在见人时，也不像其他北洋军阀“娘”、“老子”地不住嘴，他对人有说有笑，平易近人。他常对人说，他一天到晚总是在军事政治上费脑筋，因此在玩的时候，不愿再听关于天下国家的事，最好大家聚在一起，讲些开心的事情，跳跳舞，打打球……

朱光沐是他身旁主要红人之一，是个将级军官和掌管军法的重要人物，但在张学良面前，就像一个忠实的奴仆。

有一天，张学良正在看信时，表示得意地说：“我的部下常有人写信责备我。”我问他来信责备你什么？他说责备不应该老跳舞呗。说完便把那封信递给朱光沐，意思是让他记下这个敢说直话的人，打算要奖励他似的。可是朱光沐在接过那封信之后，匆匆一看，便淡淡地说：“这是投机，哼，真不是个安分的人！”这话一出，张学良刚才那种“纳谏”心情就了了下去。

小吴是个江苏人，和张年龄相仿的漂亮青年。有一天，张从我家出来，看到一辆很漂亮的汽车，问是谁的，朱光沐说是小吴的车，张下车仔细地看了一遍，连声夸奖“这车真不错”，可见小吴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秘书了。

李应超是个小个子的广东人，英语说得不错。张学良很讲究穿着，不论是军服或西装，总是在东交民巷的一家外国裁缝店中定做，担当翻译的就是这个李应超。

此外，还有身任北京崇文门监督的胡若愚、任老虎关监督的周大文、任四洮铁路局长的程某、被称为“日本通”的周培炳以及唐绍仪的儿子唐副官等，都是经常陪伴张氏玩乐的一些人物。至于姜卫队旅长和谭海副官，他们虽然也经常随张任护卫之责，但并不能随张同做“升堂入室”的宾客。

有一天，我和唐怡莹正在中央公园看湖社的画展，忽然张来了电话，只听他颓丧地说：“今天我太不高兴了，你们到我这里玩一玩罢！”跟着就派汽车把我们接到前顺承王府。看见他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朱光沐和其他一些人都鸦雀无声、面面相觑地坐着，和平常情况大不相同。我们进去后，他意气沮丧地说：“小姜被打死了，小唐（唐绍仪的儿子、他的副官）也死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后来听他的说明和小朱等人的补充，才知道那次他到张家口去，目的是为了去缴穆春师的械。小姜、小唐就是被对方兵士开枪打死的。

当张学良对姜旅长的死无限悼惜时，朱光沐拿来被押解到北京的穆春师某团长乞命的供词。张学良接过来看也不看，便从床上支起身子在供词上写了“着即枪毙！”四个字。

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自夸道：“我在要杀人时，总是笑着的。”我也认为他是个深沉大度不可捉摸的人。后来听说他在沈阳杀杨宇霆、常荫槐时，当布置停当之后，还犹豫不决，拿出金现洋以卜吉凶。又有一次在他家吃晚饭时，他看到桌上的烧茄子，便感慨地说：“老郭（郭松龄）活着的时候，就喜欢吃这个菜。”我问他：“如果他还活着，你还想用他吗？”他回答说：“我用他，一定还要重用他。”

他对打高尔夫球感兴趣，不是由于他的球技怎么高明，只是为了追求时髦。有一天，在我家玩到天明之后，他忽然提议去打球，于是便分乘汽车到郊外高尔夫俱乐部去。当然在那里以打球代散步运动的球客，不是颇有欧风的资产阶级人物，便是当时驻京的外国使节。这时碰到了日本驻我国公使芳泽谦吉，芳泽和张寒暄了几句之后，故意在张面前大声问我：“宣统皇帝近来健康怎么样？”张听了脸上露出很不以为然的神情，便连忙随着打出的球走开了。这一次他玩得很不高兴。

张学良不但好跳舞，好打高尔夫球，还很喜欢自己开汽车，并以此感到自豪。

他经常约我们到西郊一带兜风，并常到海淀附近我父亲的别墅——蔚秀园去玩。那所别墅是我祖父在西太后经常住颐和园时，从宫中得来的一所官产，房屋早已坍塌无余，只剩下一个荷花池还可供游览。张就经常在那里命跟随的专门摄影师拍照。有一次，在通过一段潮湿而长满蔓草的草地时，每个人身上都沾上无数跳蚤，大家败兴而返，回家以后，都喷射杀虫药水，才算把跳蚤去尽。不久，张来电话说，李应超被跳蚤咬得全身浮肿，向

他临时请了假。

又有一次在海淀附近，看到一所整齐的围墙内坟墓很多。看坟人介绍说，这是明清以来太监的一个公墓，雇有专人洒扫看护。又向张诉说直鲁联军的士兵进来骚扰的情形。张说：“我也有一点小小权力，可以出个布告，禁止一切军人在这里胡闹。”过了几天，就在围墙大门边贴了三、四方面军司令部的布告，禁止一般军人擅自闯入毁坏墓地的条文。这个历史上的遗迹，才被保全下来了。

还有一次，张在从西山八大处的归途中，自己开着汽车当先开路，故意把车开得飞快，其他的车都落在后面。忽然，他从前往回跑，大声说：“我的车出事了！”说完，便登上另一辆车向“肇事”的前方驶去。这时，给我开车的司机笑着说：“没事，没事，他是在逗我们。如果真出了事，他还不像发疯似地大蹦大叫。”

1921年张在河南指挥作战时，曾在保定的“光园”因试开摩托车致堕入池塘内。他来信告诉我，杨宇霆当时吓得说不出话来。我还一本正经地写信规劝他说：“况掌三军安危重寄，负国家兴亡重责，而冒此无谓之险，窃所不取”之类的话语。

张学良平日既不嫖亦不喝酒，也很少看京剧，只喜欢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无事时常把刘和一个弹弦的叫到自己的卧室，他则躺在床上闭目欣赏，每次总得唱七八段才能尽兴。刘宝全每次照例把曲目折子送过去请张点曲，张在点完之后照例把200元钞票掖在折扇内递给刘，刘便按照所点的曲目一个一个地唱下去。张最爱听的是刘的拿手大鼓《大西厢》和《关王庙》。他自己有时也用奉天口音学刘唱一两句“京韵”大鼓，或杨小楼的《连环套》、《天霸拜山》的京剧。

又有一天，在张家吃完晚饭后，大家都在院中乘凉，朱光沐

拿来一叠来信分别交给张和于手。于看完某一信后，便骂了一声“讨厌”，顺手把信撕碎了。张拾起一看，信是东北某要人写的，大意是说于凤至乳母的某亲戚已得到某样位置。张看完大为恼火，厉声说：“我向来不准你托私情，你是怕我知道，才把信撕碎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在北京时，常在北京饭店跳舞，但和一般的小姐、太太，并不轻易接近，经常是找唐将军的太太做舞伴。有一天唐夫人倚老卖老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找别人，专爱找我跳舞？”张回答说：“和你跳舞，我家里的人都会放心。”一句话惹得唐太太恼羞成怒，也成为不脛而走的社会趣闻。

正当奉军围攻冯玉祥的军队于南口的时候，张学良仍是每隔几天就回北京一次，玩上几天。

有一年夏天，各大报上刊登消息说某月某日张学良在光明殿的司令部礼堂讲演，题目是《中国现代青年的使命》，我当然要去听了。那天，会场人挤得很。到时，张学良走上讲坛，下面掌声雷动。张学良大声说：我决不卖国，如果谁发现我卖国，就请写信骂我，也可以当面质问、骂我和处置我。

我最后和张学良见面，是在1928年夏天正热的时候。有一天，他通知我说他在明天办生日，并说已约刘宝全在筵前助兴，约我们务必提前到他那里（那时他已由前顺承王府移居中南海）。那一天只有孙传芳、杨宇霆等几名军政界要人和几名素不相识的客人（后来才知道是阎锡山的代表）。张的神色依然如常，只是不像平日爱讲笑话而已。当孙传芳、杨宇霆和外面通电话时，我才听到一些惊人的消息，特别是听到张在电话中说“大元帅在皇姑屯遇炸，平安无事，吴督军负了伤”，才知道出了大事。当时我对张学良的镇定如恒，还能摆筵请客，心里十分佩服。

宴会之后，张悄悄地对我说：“冯玉祥的军队进来之后，你

们全家最好暂时离开北京，看看风头再说。”

下午朱光沐奉命给我送来 1000 元钱，第二天我和全家乘最后一列兵车到了天津。

以上是我对张学良的全部印象。

(爱新觉罗·溥杰)

三 公馆裁缝

我是怎样进张公馆的

我原名叫赵国清，九一八事变后改名赵新华。16 岁学裁缝，我兄弟赵国栋在兵工厂工作，经他介绍，1928 年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有一次，张学良将军到工厂视察时，我见到了他。这以后又先后见过几次，但都是一走一过，没有说过话。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

记得那阵子大帅府的一些副官常去做衣服。张学良将军有一个副官叫夏宝珠，他同兵工厂稽查员张子明很好，张子明同我是磕头兄弟，通过张子明我认识了夏。

有一次，夏副官随张学良将军一起到兵工厂来，我正好遇上。张学良将军穿一身深灰色料子西服，衣料很好，听说是日本犬养毅首相送给他的，可是上衣做得有点毛病，有一个袖子袖头料子缝没对上，看上去有点往外扭。我就对夏宝珠说：“少帅的衣服有毛病啊。”夏宝珠说：“是呀，少帅早就看出来，可收拾不了。你能收拾吗？”我说：“你拿来吧，我试一试，我琢磨着差不多。”

过了几天，夏副官真的把衣服拿来了。我把袖子拆开，把长的那边去了点，短的那边喷水用烙铁加热后，往出抻了抻，完事又缝上了。这回，缝基本对上了，不仔细瞅是看不出什么毛病

了。衣服做好后，夏宝珠又拿走了，我没有同张学良将军见面，听夏宝珠说张学良将军挺满意。后来，夏副官又让我为张学良将军改过一条裤子，藏青色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兵工厂让日本人占了，我不愿意侍奉日本人，就离开了工厂，我随东北军季殿风旅长带的 100 多人去关里。

当时，日本兵十分嚣张，锦州以东地区都不大安全，遭遇战时常发生，因此在途中我们高度戒备，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准备战斗。

一天晚上，我们行至大凌河东岸的一个村庄住了下来，这个村紧靠公路。半夜时分，哨兵听到远处有汽车的马达声，马上报告季旅长。他一听，知道情况不好，立即招呼大家起身。可是还没等我们上马，村里就挨了两炮，几间房子起了火。季殿风把手一挥，喊了一声：“上马，冲出去！”大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乱



张学良（中）和刘翼飞（右）在二八旅演习中。（1923 年秋）

哄哄地往村外冲。谁知一到村口，立即被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压了回来，村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

一看这火力，大伙就知道是日本鬼子的军队围上来了。季殿凤和大伙一碰头，决定带十几个人先打开一条通道，然后大伙跟着往外冲。于是立即行动，季殿凤带领十几名马技好、手枪准的骑兵突然向路口冲去，其他人在路口附近隐蔽。由于人少目标小，没有引起敌人注意，一次就冲出去了。他们压住了村口的机枪，大伙随着就打出了村。

日本兵一看我们的队伍冲出去了，立刻发动汽车，加足马力紧追不放。敌人不断地向我们射击，密集的子弹落在我们的周围，打得直冒烟。当时被打下马的，大伙也无力援救，没被打下来的就边还击边跑。

跑了一程，天已放亮。忽见前面不远出现了一片小树林，大伙心中暗喜，心想只要我们一拐进树林，日本鬼子的汽车就没用了。可是刚到树林附近，却想不到树林里面有人朝我们打来了冷枪。从那稀落的枪声中断定，树林里埋伏的不是日本兵，而是少量土匪。大伙这个气呀，心想，日本鬼子打我们就够呛了，你们咋还趁火打劫呢？真是太可恶了！季殿凤立即命令侯排长带领一大部分人沿大路往前跑引走日本兵后，再折回来；一小部分人由他带领分两路向树林包抄过去。树林中的十几个土匪一看不好，撒腿就跑，我们就这样占领了小树林。侯排长带领的那部分人往前跑了不远，就下了公路，甩掉日本兵，也回到了小树林。这次遭遇战，使我们损失了好几个弟兄。

我们继续向关里走，走到了天津。在天津东北同乡会，又看到了夏宝珠。他一看到我挺亲热，问我：“你怎么也到这儿来啦？”我把情况一说，他挺同情，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我说：“现在还没有着落呢，得请你多帮忙啊！”他说：“那你就给司令

做衣服。”我说：“那我等你的信吧。”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那时，少帅行营在北平，夏副官家也在北平。我等了一段时间没有信儿，就直接到北平去找他。他见到我以后叹了口气，说：“唉，不是我不守信用，少帅要出国了，现在正在上海戒毒。给少帅做衣服的事就得以后再说了。”他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我给于学忠写封信，让他帮你安排个地方吧。”我说：“那也行。”于是他就给于学忠写了一封信。

那个时候，于学忠是五十一军的军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住在天津海河北。我拿着夏副官的信去找于学忠，他把我介绍给民政厅。民政厅长叫魏健，九一八事变时当过新民县县长。听说我是新民人，待我挺客气，让我到河北省易县去当公安局长。他告诉我易县县长也是你们新民县人，到那儿方便。可是我不愿意干。我说：“我还是干老本行吧。”他同意了。就这样，我到了五十一军辎重总队军工厂上班。这个军工厂其中大部分是东北军兵工厂的老底子，到那儿熟人挺多，又让我当了工长，负责裁衣服。

1934年，张学良将军结束了八个月的出国考察，回到武汉。我知道后往武汉给夏宝珠写过一封信，但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1935年5月节以前，于学忠被调到西安，辎重队也随他去了西安。我们兵工厂在西安东大街路北。这时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已成立，张学良公馆也建立了。听说少帅府的人先来了一部分，不过少帅还没有到。

有一天在兵工厂突然碰到了夏宝珠，原来他已随同少帅府的人先来了。我俩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可真有耐性啊，还做这个呢？这回好了，副司令来了，你就到公馆去吧。公馆里还有你一个近同乡，叫刘海山，是新民旧门人，给副司令当副官，副司令很信任他。我们俩一同跟副官长说，准成。”

第二天，张学良将军的副官刘海山派传达兵坐着小汽车到兵工厂来找我。到来就喊：“谁叫赵新华？”我说：“我是赵新华。”“请你上车吧。刘副官和夏主任请你去。”这时，夏宝珠已经当上承启处主任了。我一看小汽车，车号是704，吓了一跳。我知道704号车是少帅夫人于凤至坐的，这车哪能让我这样身份的人坐呢？”我赶忙问：“弄错了吧？”传达兵说：“你不是辽宁新民县的吗？”我说：“是呀！”他说：“那没错，就找你，上车吧。”这我心才落了底。

上车后直奔张公馆，进院后车头还没拐过来，夏主任和刘副官就迎出来了。夏主任拍着巴掌说：“哎呀！来啦！来啦！我们还怕你上街玩去了呢！来来，介绍介绍。”他指着刘海山说：“这就是你的近同乡刘海山，刘副官。”又指着我对刘海山说：“这是赵同乡，赵新华。”没等他介绍完，我们的手就已经紧紧地握在一起了。刘海山问我：“工厂那边有事吗？”我说：“没有什么事。”“那好，咱们三个出去溜达溜达吧。你是喜欢听戏还是乐意看电影？”我说：“哪样都行。可就是让你们破费了。”刘海山说：“这说哪去了，他乡遇故人，这是幸事。走！”我们来到街上，刘海山掏钱，我们吃了一顿饭，又看了一场电影，晚上回到工厂已经小半夜了。第二天吃完晚饭，他们又来找我，到公馆先洗了个澡，完事又是我们三个人一起上街看的电影。过不多日子，经夏宝珠、刘海山二人给副官长谭海介绍，我就进了张学良将军的公馆。

在张公馆的日子里

张学良将军在西安的公馆，在金家巷五号。这个公馆大门朝北，四周有一人多高的青砖墙。进门后左侧有一排房子，第一个门是传达室，紧接着传达室的是承启处，但与传达室隔一道门，

门边还有一道岗。与第一排房子平行的有三栋楼，张学良将军与家眷住在中楼，卫士与几个处的工作人员住在西楼，秘书与外来客人住在东楼。西安事变前后，有一位刘先生就住在那儿，后来，周恩来、董必武也在那儿住过。三栋楼的后面，还有一排房子，伙房和会计等行政事务部门就在那里。

张学良公馆的外边由手枪营站岗，里边都是卫士站岗。张学良公馆共有 60 名卫士，都是尉官，有八名副官，都是校级军官，副官之上有一名副官长是少将军衔。西安事变前后，副官长是谭海，他也是东北人。承启处有一个承启主任，一个承启副官，一个二等录事，两个当差的共五人。那阵子承启主任是夏宝珠。承启副官是刘世斌，辽阳人。我是二等录事。

承启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登记、接待、安排见张学良将军的人。不见张学良将军的人一般由传达室接待。要见张学良将军的人，由传达室把名片送到承启处，承启处登上记，写明姓名、职务，然后报张学良将军批。记得当时有的批上午见，有的批下午见，有的批明天见，也有批不见的。张学良批回来后，由承启处通知。凡是来见张学良将军的人，一律不能带武器。通过门岗，由传达室过来到承启处，一般都要在承启处稍候一会儿。东北军军官及其他客人，到承启处以后，一般都把风衣、帽子等脱掉，挂在承启处。见张学良将军回来以后再经承启处出去。客人见张学良，大多数是在张学良将军的会客室里，会客室在张学良将军住的那栋楼楼上。

我被调到承启处去当录事是 1936 年 11 月的事。

11 月上旬的一天，夏宝珠告诉我司令部的副官处马处长找我，我去了以后，马处长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调查一下西安城里和市郊各个部队的分布情况，包括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的留守处、办事处、仓库、部队人员及武器装备等情况。马处长交

给我一个簿子和一封司令部副官处的证明信。我拿着信去调查。在调查时，东北军当然没什么说道，西北军也没出什么岔头，就是调查中央军时，遇到点麻烦。

那时，中央军驻在西安的部队有三个，一个是胡宗南的第一师留守处，一个是中央军十二师，还有一个师现在记不起他们的番号了。我们调查到他们那里时，他们不让调查，傲气十足。我拿出了证明信，他们仍然不答理。我回去一说，副官长谭海又给开了个特别证明，另外派了一台小汽车，让我坐着小汽车去，这回他们才让调查。

调查完，我把那个簿子交到司令部副官处，记得那正是西安事变前二十几天的事。

少帅生活点滴

进张公馆以后，同张学良将军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我还没扔了本行，给他做过三套衣服。一套灰马裤呢中山服，一套藏青色的中山服，还有一套灰布红军服。

那套灰布红军服是1936年秋天做的，是少帅上陕北同红军会谈时穿的。这种灰布服当时一共做了30多套，经我手就做四套，要得挺急，要求三天做完。这些服装都由我承办，但我只做少帅穿的一套，别的都是由副官张庭宴到西安福康洋服店做的。

少帅对衣着挺讲究，给少帅做衣服得试三次样子。先是裁好了，用线缝上，试试样子，有毛病再改一改；第二次，除了领子、袖子不上，别的都做好，再试一下；第三次就是都做完了，再试一次。每次试衣服，都是副官李晓晨通知我。

少帅待人挺和气。每次去给他试衣服都挺客气，进屋后，他就站起来，用手示意让我坐下，并让李晓晨沏茶，端上两盘点心，一盘糖果，一盘烟卷。让他试衣服，也没有不耐烦的时候。

后来熟悉了我也随便了。他问我家里人口，父母情况，多少房子地，结婚没有？少帅关心地说：“你家有兄弟，给家写封信，可以叫家里的来。”我当时很感激，眼泪在眼圈里转。以后我给家里写了信，也接家里来关里了。

少帅待人和气、热情，听夏主任他们说，少帅对哪个人最不满意时，也不骂人，只是拍桌子说：“你这个人真混。”对谁最生气的时，他才这么说一句。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在张公馆，早晚都能见到少帅。吃饭他同公馆的卫士、副官是一个食堂，不过他是先吃，我们后吃，饭菜差别也不大。不同的就是他喝牛奶，每天早晨一碗牛奶。那阵子，他生活上比较节俭。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就抽中国烟，喝中国酒。抽烟一般都抽“白金龙”牌香烟，酒一般喝“西凤”、“汾酒”等。

少帅戒鸦片烟很有毅力，听夏宝珠讲，少帅开始戒烟受不了，得打药针。以后药针也不打了，有时受不了，于凤至夫人劝他再打药针。他说：“我宁肯为戒毒而死，也不能为吸毒而死。”一位意大利医生提出营养灌肠的办法，把小鸡和牛肉放在一起熬，然后用汤灌肠，一天两次。10多天就好了。

少帅爱好体育活动，经常打高尔夫球、网球，踢足球。“成城球队”是东北军的足球代表队，就是在少帅亲自关注下建立起来的。在西安比赛还得了头彩，受到少帅的奖励。比赛那天我们都随同少帅去看踢足球，足球踢进网去，少帅鼓掌祝贺，踢不进去少帅为之惋惜。

那时候，于凤至夫人和赵一荻小姐也都在西安。清早，少帅、于凤至夫人、赵一荻小姐领着孩子到楼外散步。赵一荻小姐生个男孩，那年5岁，叫张闾琳，很聪明。少帅很喜欢他，他逗着闾琳在草坪上玩，有时他还教闾琳古诗。

少帅每天在公馆按时去司令部上班，7点多他就在楼下等汽

车。有时不去司令部办公，我们就猜出今天来张公馆的人准多。记得东北同乡、在西安的“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人王卓然、车向忱、宋黎等人常来张公馆。每次，少帅都送到楼口，招手再见。少帅和杨虎城将军亲如兄弟，有时杨将军来张公馆，和我们亲热打招呼。杨将军有时和少帅坐一个车出去，他们在车里谈笑风生，我们几个人见了真高兴。

试骑“盖西北”

1936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八匹好马，其中一匹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7岁口。据张学良讲，马鸿逵送马时说这匹马很不得了，两头见日头，中午喂一次，还能跑800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因此人称“盖西北”。

张学良将军得到这匹马以后，就想找人试一试究竟。他给各军下了通知，找能人试骑“盖西北”。可是通知下去好一阵子，却没有回音，没有人敢试。张学良将军为这事挺着急。

没人敢报名试骑的原因是因为对“盖西北”不了解，一听说日行八百都发怵，一般地说，一天跑个三四百里就算好马了，跑800里还不得像风似的。再说，这马有什么脾气，有什么哑号，谁也不知道，骑不好丢人不说，还兴被拖死。另外，大伙对马鸿逵这个人也心存疑虑，都听说他很狡猾，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不是故意弄匹马逗逗东北军呢？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没有人敢报名。

一天，刘海山副官告诉我说：“司令找你。”因为张学良将军也经常找我有事，所以我也就没加思索便去，见到张学良。他开门见山地说：“赵新华，你敢不敢骑‘盖西北’？”我听了以后，倒吸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马我可没骑过。可是今天少帅提出来了，我说不敢骑，就会伤少帅的心。想到这我就说：“敢是敢，

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张学良将军听了很高兴，就说：“那好，那你就试试。骑不好没关系，总不能老没人骑呀？”他看了看日历，又说：“今天是星期五，下星期一试骑，你好好准备一下。”并让副官夏宝珠通知东北军各军师长和杨虎城主任、邵力子主席参加。

事后我才知道是刘海山副官向张学良将军推荐我试骑的。有一天，张学良将军和刘海山唠嗑，说起“盖西北”的事，张学良将军气得直拍桌子。他说：“咱们东北军40多万人就没有一个人能骑这匹马。传出去多让人笑话。”这时刘海山对他说：“我看不用到别处找，咱们公馆内就有人能骑。”张学良将军说：“谁？”刘海山说：“赵新华。”张学良将军说：“赵新华？我怎么不知道，他骑马能行吗？”刘海山说：“行！不信你找他来问问。”就这样，张学良将军才让他来找我。

刘海山为啥推荐我呢，这里有这么一段过节：我小时候就喜欢骑马。在彰武开军衣庄时，又跟汪柏浒学过骑马。汪柏浒是东北军十四旅留守处一个连长，骑术很高明。他曾经和别人打赌，他骑在马上，把一根绳子坐在屁股底下，绳子头上打个结，他说谁要是把绳子从他屁股底下拽出去，就算他输。有一次三个人拽，把马拉得直往后退，绳子硬是没拽出来。汪柏浒告诉我，马欺负人，你越发怵，



穿戎装的张学良

它越凶势。你放大胆子骑上去，把腿夹紧，它再尥蹶子你也别松手，它跑你就让它使劲跑。越快越加鞭，不管多生性的烈马也能驯服。在他的启发下，我的马术也日渐提高，后来制服了不少烈马，从来也没摔下来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还骑过一匹好马，这匹马是一个外号叫“老八点”的土匪头子骑的。这匹马一天能跑400多里。另外这匹马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跳得高，跳得远。和马头一样高的墙它一跳而过，二丈多宽的沟能一跃而过。再一个是通人性，在街上跑时，你用手一拍它的前档，它马上放轻脚步，紧贴房墙根走。因为这两个特点，“老八点”对它爱如掌上明珠。九一八事变时，“老八点”被东北军骑兵第三旅抓住了，怀疑他同日本人勾结。入狱前他托人保护他这匹马。他说：“谁替我保养这匹马，我出来时除了我脑袋以外，别的要啥我给啥。”后来他的朋友托我养这匹马。我从锦州去天津的路上就是骑的这匹马。“老八点”被放出来，送给我两枝德国造手枪作为报答。这些事我都跟刘海山说过。另外，刘海山平时也看我在马匹管理所骑过马，他觉得我有两下子，这才向张学良将军推荐我。

虽说有这么一段经历，可究竟没骑过这么快的马，所以答应下来之后，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公馆内的老乡听说以后，也都说我太冒失。新民同乡、张学良将军的卫上关维清整整劝了我一天。我说：“我已经在少帅面前答应了，怎么好反悔呢？”他说：“你不好说，我去跟少帅说。”我说：“不用，我估摸凭我这两下子不会有太大问题。”

说是这么说，可心里一直没底。于是我就写了一封遗书，把该谁的欠谁的都记上了，还写上我要死了请转告家人，不要怪别人，是我自己自愿的，我是为了给东北军争光才答应骑这匹马的。

试骑那天，我一早吃完饭，坐车来到了西安北门外的教场坝。这时，教场坝已装饰一新，临时搭起了白布棚做看台。棚内摆着桌椅茶点，军师长们都骑马赶到了。他们听说这件事，一些熟悉的都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工兵司令杜维刚还给我点了一枝烟。不一会儿，张学良将军、邵力子主席、杨虎城将军都到了。张学良将军一到就问：“赵新华来了没有？”副官们都说：“来啦！”这时我也站起来了。张学良将军说：“赵新华，你去试试，看看有啥不合适的没有？”这时，“盖西北”已被马匹管理所的人牵来了，鞍子都准备好了。我走过去试了试，觉得镫皮有点短，就对张学良将军说了。张学良将军马上打发人坐他的汽车回去把我常用的鞍子取来。

准备好以后，张学良将军就让我上马。我心里也有点发怵，就说：“让长官们先上马吧，我后撵。”张学良将军说：“也好。”他就吩咐军、师长们先走。他们骑马一出发，“盖西北”就有点发急，前蹄直刨地。这时马匹管理所的两个人，一人为我拉马，一人为我拽镫，我一手抓住缰绳和马鬃，另一只手抓住鞍子，左脚一纵镫，这马就蹿出去了。结果我一屁股骑到了鞍子后边，忙又搬住鞍桥子，一挺身骑到了鞍座上。这时，“盖西北”像飞一样跑了起来。我往地下一看，地就像大河流一样往后淌。两边的大树像往后倒一样，耳边风声呼呼作响，头都有些晕。我赶忙往前看，这才好一些。只见这马跑起来，两只前蹄都超过了耳朵梢，我的帽子都让风给刮掉了，先出发的那些军、师长们一个个地被甩到了后边。跑了一会儿，我觉得这马快是快，但没啥怪毛病，我的心才逐渐地稳定下来。跑了一大阵子，那马还是一点不减速，越跑越有劲，我心想，真是一匹难得的好马呀。

但是还有一关没有过，就是下马。不少人出事就出在下马上，下不好，摘不开马镫，就有被拖死的危险。为了平安下马，

我就想法让马放慢脚步，可根本不见效。我开始是勒嚼子，任你怎么使劲，它也不减速。我又试着松嚼子，它还是照样快跑。这时，我心里可有点慌了，要是一直这样快，你有再大的本事也难顺顺当当地落地。另外，还不能撒手，要是让马跑了，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后来啥招也不行，我只得让它任着性跑，我寻思，它跑累了或许好办一些。

跑了一阵，前边出现了一个镇子，那天正赶上是集，街上人不少。我一看不好，就在马上大喊：“快闪开，马毛了！”街上的人纷纷躲避，这才没撞着人，不过也把人吓坏了。我一看再跑下去不好办，就下决心下马，我抓紧缰绳，心想，万一摔下去，我使劲拽嚼口，就拖不死我。说来也怪，我刚把右脚从外蹬里摘出来，那马就突然放慢了脚步，我右脚一跨过来，它就站住了。就这样，一点劲没费就下了马。试骑成功了，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高兴。

下马一打听，这个镇子叫草滩镇，离西安 80 里地。过了两袋烟的功夫，那些军、师长们才陆续赶到，大伙看我平安无事，都说我骑术好。

以后，我天天早晨骑这匹“盖西北”去武家坡。把这马的一些习性渐渐摸透以后，别人也逐渐地敢骑了。张学良将军骑“盖西北”去过一次王曲军官训练团。

1936 年 12 月份，蒋介石来西安，听说这事，很感兴趣，非要试一试“盖西北”的速度不可。于是又搞了个车马赛跑，赛程 200 里，路线是从西安到华山附近的华阴站。蒋介石与张学良将军从西安乘火车，刘海山副官骑“盖西北”，火车开起来以后，刘海山骑马开跑。赛跑结果，“盖西北”比火车先到华阴站。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留在南京，这匹马就转到了于学忠手中。

西安事变见闻

1936年12月11日晚，同往常一样，我闲着无事，就和公馆内的一些同事闲聊。

忽然，张学良将军的轿车开回来了，速度很快，进门后没有停，在院内转了一圈，又开到大门口才停下来。可张学良将军没有下车，副官长谭海马上迎上去，张学良将军坐在车内问：“杨主任来了没有？”谭海回答说：“没有。”张学良将军回头对司机说：“走！”小轿车便冲出大门，朝杨虎城公馆的方向疾驶而去。我们看了这个场面，觉得有些异常，好像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过了不久，又看见张学良公馆的手枪营紧急集合，全副武装，乘上汽车出发了。张学良公馆的警卫任务移交给司令部卫队团一营。

一营一到张公馆就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在四周的院墙上架上了高射机枪，贴院墙的里侧又搭上了跳板，人站在跳板上刚好能看到院墙外的情况。看得出，必要时他们是要以院墙做掩体进行射击的。同时，在院子的外边又加派了巡逻哨，真是戒备森严。我们估计夜里一定要有大的行动，但究竟要发生什么事，我们还摸不清。这一晚上谁也没睡觉，都注意观察着动静。

只见副官长谭海守在电话机旁，一步不离，十分严肃。一营长把兵力部署好以后，也各处查看，仔细检查战士们准备情况。

夜里，西安城内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接着，远处也传来了枪响，枪声越响越密。这时，我不禁想起了前些天，让我调查西安城内各部队驻防及武器装备情况的事。看样子是与中央军以及几个警察大队接上火了。

枪声估计响了一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稀下来。突然，副官长谭海屋内的电话铃响了，这响声好像比平时任何时候的声音都大，连我们在外面的人都听得十分清楚。谭海抓起话筒，仔细地听着。我们在外面也想知道个究竟，因此，也仔细地听着。开始，只听他“嗯、嗯”地应答着，后来，听他大声地喊起来：“啊！什么？”接着一拍大腿喊道：“糟了，老鳖子跑了！”——听这话，大伙猜着了七八成，因为当时的东北军，对蒋介石恨得牙根直痒，所以副官长一说“老鳖子”就知道指的是蒋介石。可是，听说跑了，大伙也很担心。这时只见谭海扔下电话，转身出屋，登上汽车就走了。估计他是到前线去了。

第二天上午，才知道在华清池骊山石头缝里终于把蒋介石抓到了，送到西北军一个军长高桂滋的公馆里。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之夜，我在张学良公馆内看到的情况。

12月12日，我们东北军和西北军全部进入战备，气氛非常紧张。天上，二十几架飞机低空盘旋，看样子随时都要轰炸；地上，我们也架起了高射机枪、高射炮，时刻注视着天空的动静。但不知为什么飞机没有轰炸，地面也就没有打它们。公馆内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情况。

事变之后，西安开了一个国民大会，我也参加了。

会上，张学良将军慷慨陈词，讲得十分感人。他讲话的大意是：“这次兵谏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弟兄们都知道，东北已经沦亡了，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正在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我张学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自从旅欧回国以后我就发誓：尽毕生精力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可是，蒋委员长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让我们去打红军。”讲到这儿，他稍微停了停，接着说：“红军是没有家的人，我们也是没有家的人，没家人不能打没家人！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要停止一切内战！谁要打内战，谁就

是我张学良的敌人；谁要打内战，谁就是东北军的敌人。”张学良将军的一番话引起了到会者的共鸣，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随后，杨虎城也发表了讲话。他愤怒地谴责了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并强调这次兵谏，他与张副司令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记得杨主任发言以后，事变前住在张公馆的那位刘先生也发表了讲话。据刘海山副官说，他叫刘鼎。这位刘先生穿着青上衣，蓝色的哗叽裤子，屁股上还补了一块青补丁。开始大伙不知道，后来听说他是共产党。

他说，同胞们：我们坚决支持张将军和杨将军的行动。他们发动的这次西安事变是为了使蒋介石掉转枪口，一致对外，这和我们建立爱国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同胞们，战友们，大敌当前，中国人怎么能自相残杀呢？有志气有抱负的爱国军人应该去打日本侵略者。我们不能看着大片的领土被侵略者任意宰割，全国各党各派要立即联合起来，建立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同心协力，驱逐日寇。

到会的人，都感到他的讲话很对，特别是我们东北军的将士们，深知流落他乡之苦，更希望早日消灭日寇，重返故乡。

三 见 周 恩 来

西安事变前后，我在张学良公馆有幸三次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他那潇洒的风采、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和蔼可亲的态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直至今天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公馆已成了总指挥部，来这里见张学良将军的要人接连不断。承启处也跟着忙了起来。

有一天，一些高级将领刚刚离去，传达室又给我们送来一位陌生的客人。传达室的副官与承启处的刘世斌副官小声说了几句，刘副官就去向张学良将军报告了。

这位客人头戴灰布棉帽，身穿一件藏青色的大衣，个头不高不矮，步伐稳健，两道浓眉，双目炯炯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但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他进屋后，我马上迎了上去，他热情地和我握了握手，微笑着点点头。随后，顺手解开了大衣扣，露出了一身灰色制服布装。看了这身服装便知道他是一位红军。他的衣着虽不讲究，但却十分整洁。我赶紧过去帮助他脱大衣，这对于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可是这位客人却不一样，他向我摆摆手，意思是不用我帮他脱。他自己把大衣脱下来顺手挂在衣帽挂上，接着随手把帽子摘下来，也挂到了上面，又用手轻轻地理一理头发，转身坐在沙发上。之后，他微笑着问我：“张将军在家吗？”我说：“在！”并随手递给他一支香烟。他又摆了摆手说：“谢谢，我不吸烟。”这个人举止非凡、精明强干，可又不是盛气凌人，我仔细地打量着他。想问一问他是谁，但又不便开口。正在这时，刘世斌副官回来了，说：“副司令请周先生去！”听了这句话，我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他就是周先生！记得有一次夏宝珠跟随张学良将军去陕北前线，那时候东北军在陕北洛川一带，司令部的人管陕北叫前线，因为接近红区。几天后张学良将军领着夏宝珠等人回到西安。我见夏宝珠很高兴，不知为了什么。有一天晚上他悄声地告诉我：“赵大哥，我这回跟少帅去陕北前线见到周先生了。”我当时问：“谁？”“周先生，就是共产党那边的周恩来。这个人可好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了不起。”接着他又讲起在陕北张学良将军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形，他说：“这回可好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张、周会谈，不久咱们就可以打回东北老家去。”想不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先生。我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敬意。

张学良将军这时已从客厅走出来了，周恩来迎上去，二人相

见，好像故友重逢，十分亲切。他们在会客厅里谈了片刻，一同出来，就乘车走了。约莫有两个钟头左右，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同周恩来又一齐回到了张公馆，谈了很长时间才离开。

过了一二天，周恩来又一次来到张公馆。这次来还是和第一次一样，到承启处以后，他边脱大衣摘帽子，边说：“还认识吗？”我赶忙起身，回答说：“认识，认识。周先生请坐。”当时，承启主任夏宝珠和承启副官都不在，只有我在屋，我马上到张学良将军的会客厅，告诉了那里的副官，他请示张学良将军以后，对我说：“副司令屋里有客人，请周先生稍候。”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周恩来，他微笑着点点头，并打了一个手势，说：“你也坐吧。”并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我叫赵新华，是辽宁人。”周恩来说：“是沈阳市内的吗？”我说：“不是，我是新民县人。在沈阳西，离沈阳 100 多里路。”“噢，你是什么时候到西安来的？”他接着问，我说：九一八事变以后。周恩来听了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笑容渐渐地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又接着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哪？”我说：“家里还有父亲、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说到这儿，我心中不由得酸楚起来。周恩来似乎看透了我心中的痛苦，安慰我说：“别难过，这回好了，你与亲人不久就能团聚了，蒋先生已经答应抗日了，你们可以打回老家去了。”我说：“真的么？”周恩来轻轻地点头，说：“是真的。”

正在这时，张学良将军出来送客，又把周恩来迎进了他的会客厅。第二次见到周恩来的时间虽然还不到 10 分钟，可他那和蔼可亲的言谈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第三次见到周恩来是在西安城里的长安县政府。当时，张学良将军已送蒋介石回南京，离开了西安。

大概是在 12 月 26 日早晨 5 点钟左右，接到一个通知，让我

去参加一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东北军司令部各处和张学良将军公馆各处的代表，以及卫队的一些军官代表，共有多人。

在会上，周恩来脸色严肃，语调深沉，他说：“革命的同志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亲密的战友们，我马上就要回陕北啦。张将军送蒋先生回南京，同志们大多数还不知道，昨天走的。在洛阳黄埔分校蒋发表了声明，看那个声明他是要撕毁自己的诺言。这样，张将军就可能要晚回来一个时期。”讲到这里，他环视一下会场。接着，提高了声音继续说：“同志们，你们要记住，你们有个朋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张将军回来之前，你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对你们负完全责任。”周恩来的声音洪亮有力，深深地打动着每个人的心。他的话音一落，立刻就响起了掌声。

自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周恩来。

1950年，我由西安返回东北老家，途经北京，住在北京市民政局招待所，等着换车，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叫赵新华，在张学良公馆承启处当过录事，1936年12月曾经见过您。现在我要回东北了，路过北京，很想再见见您，不知您是否有时间。信写好后，民政局派人把信送到了国务院。

信送出的第二天，周恩来就派人来看我，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在外交部工作，姓黄，让我管他叫黄干事。他说：“周恩来记得你这个人，让我给你带好。但他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来看你，请你原谅。”黄干事代表周恩来在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吃饭中间，他说：“周总理让我问你能否留在北京？”我说：“不必了，我老婆孩子一大堆，不方便。”黄干事说：“家属也可以安排在北京嘛。”我说：“请替我谢谢周恩来，我久离故土，奔家心切。”黄干事说：“那也好，你回去以后，要安心工作，有困难可以来信。”我连声说：“谢谢，谢谢！”

保管张学良财物

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飞往南京被扣以后，张公馆实际上就被撤销了。但张学良将军的个人财物却没有受到损失，一直保管得很好，张学良的财物开始是由王博文负责保管。

1939年春天，王博文通过同学的关系要去河南卢氏县当县长，并约我去当民政科长。当时，张学良回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东北军的处境已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好些人都自找门路，脱离部队。因此，能去卢氏县当一个民政科长，对我来说也算是难得的机会了。

可正在这时，魏成允干事找我，让我接替王博文的工作。魏成允是于学忠的外甥，军衔少校，当时于学忠让他负责找人保管张学良将军和于学忠的个人财物。他跟我谈了以后，我也有点犹豫，是去当科长，还是保管张学良将军的财物呢？那阵子，当个民政科长是个美差，而保管张学良将军的财物既责任重大又担风险。但是又一想，张学良将军为国家为民族出了不少力，如今无辜被扣，怎么能再让他的财物出差错呢？于是我就答应了魏干事的要求，从王博文手中接过了保管张学良将军财物的工作。

张学良将军的财物都装在箱子和柳条包里。其中樟木箱子有40多件，柳条包有40多件，此外还有一些皮箱等小件物品。这些箱子中，有一些贴着封条。没贴封条的木箱和柳条包里装有古书古画、人参、鹿茸、呢料服装，还有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姑爷齐亚诺送的两枝自动枪，一枝是用金子镶的，一枝是用银子镶的。古画怕虫子蛀要经常晾晒；人参、鹿茸都放在有大绒底的小木盒内，每到雨季也要晒几回。

这些物品都堆放在一个屋子里，专门有一个排负责站岗。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赵连生，他负责保管于学忠的财物。

我在保管张学良将军财物期间，一直是随五十一军留守处行动。那几年，五十一军留守处比较稳定，一直驻在陕西省安康县流水乡。

保管张学良将军的财物，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张学良将军的财物，都是非常贵重的，也可以说价值连城。当时兵荒马乱，我每天提心吊胆，生怕财产被窃。1944年阴历正月初五的晚上，在我的住处附近，有两家老百姓住房起火，我手下几个弟兄要去帮助老百姓扑火，我出去一看，房子烧落架了，救也没有用了，就没有让去，同时看到不远处有人影活动。我立刻警觉起来，这是奔我这里来的，因为张学良将军的财物就放在我住的屋里。我让弟兄们持枪守卫，才避免事件的发生。事后我听说，是土匪纵火烧老百姓房子，用调虎离山之计，多亏我没有上他们的圈套。

还有一些退役军人要分张将军的财物，朋友事先告诉了我，我亲自去他们中间，说服了他们。

1945年3月，于学忠从重庆打来电报，让我把张学良将军的财物从陕西省安康运送他那里去。于学忠这时已被蒋介石调离了部队，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接到电报以后，留守处安排了两辆汽车，我和赵连生一人押送一台，每台车有一个班士兵护送。这些东西拉了两次才拉完。

交接手续办完以后，于学忠对我说：“你就留在重庆吧，工作好安排。”我为了不给他添麻烦，谢绝了他的挽留，返回了安康。临行时，我对于学忠说：“我想要一点张学良将军的东西做纪念。”于学忠说：“你愿意拿点啥就拿点啥吧。”于是，我就拿了大元帅（张作霖）哀挽录；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时写给东北军各军、师长的手谕。手谕原文是：“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

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注：虎臣是指杨虎城将军，孝侯是于学忠的号），还有东北九一八事变血泪史大画册照片，张作霖、张学良、于学忠等人的一些照片。我为张学良将军保管财物有六年时间，一直没有出现任何差错，于学忠挺满意。告别时，他又送给我 200 块银元，并告诉我：“以后有困难吱声。”

回到安康以后，我也离开了部队，以于学忠给我的钱作为底垫，在杨虎城旧部王耀臣团长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小买卖。卖日用杂货、烟、酒、糖、茶等，以此作为生活来源。直至解放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才返回放乡。

同张学思的交往

在跟随少帅后，同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思也有过几次难忘的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张学思是抗战时期。

同张学思见面较晚，可对他的情况早就有耳闻。听说张学思是黄埔军校南京分校的学生，那时候他要上哪儿念书容易得很，根本用不着考，可他挺有志气，上军校时是化名去的。念书期间，军校谁也不知道他是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大伙知道了这段经历，都说：“张学思这个人够意思。”对他都有好印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五十一军留守处到了河南鄆城，正赶上他也在鄆城。那时他和三十几个军校学生到鄆城找于学忠，打听张学良将军的情况。我听说后就去看他，见面后挺客气，由于人多没细唠。这是第一次见面。后来，听说他上延安了，那伙学生也都到延安去了。

第二次是 1939 年在汉口见的面。当时刘海山家搬到汉口去了，在旅馆包的套间。随留守处驻在湖北花园镇，驻防期间，我

去看刘海山，在那儿住了两宿。回去那天，出门时正赶上张学思进门。一看觉得挺熟，可一下子又想不起是谁。在我身后送我的刘海山握住他的手，说：“四爷来了。”少帅府的老人习惯地管他叫四爷。一听这话，我就想起来了。刘副官对我说：“新华你不认识了？”我说：“认识，认识，我正寻思是谁呢？”说完，我和他同时伸出了手。跟他同来的还有一个王先生。那时他在陕北，恐怕这个王先生也是陕北的。

我们又折回来，进屋坐了一会儿。我因为要赶回花园镇的火车，票都买好了，不能久留。就说：“四爷，我得走了。”张学思说：“那你走吧，别耽误了车。”这次见面时间很短，只有十几分钟。

第三次见面是在陕西白河。那时我们驻在陕西安康，离白河500多里地。那阵儿，五十一军留守处有三个后方仓库，白河有两个，安康有一个。安康仓库都是不急用的东西，随时用的枪支弹药以及其他军需品都在白河那边。张学思到白河仓库想弄点枪。那阵儿都知道张学思是共产党，但老感情还在。按说不能给他枪，可不给一点还觉得感情上过不去。白河仓库那边有个常技师，还有一个梁库员，和我是磕头的。他俩给我去了一个长途电话，问我从安康这边能不能给拿一部分枪去。我们商量了一下，定下来从安康这边给，把安康仓库这边勤杂人员的枪都给他，然后我们再到白河库去领。就那么的，我们这边凑了70多枝枪，由我带两个人给他送去了。

在白河，我见到了他。当时他还装了不少箱西药。我把带来的枪交给了他，他很高兴。我把我自己带的一枝日本造“九四式”手枪也送给了他。他说：“你自己留着吧。”我说：“我回去有枪，买枪也好买，在仓库领枪也可以。”这么说他才收下。后来，我又在仓库领了一部分枪。从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只

是通过信。

记得那是 1949 年的事，安康已经解放了。由于解放初期，我曾利用同乡好友的关系，协助共产党动员三个乡的地方武装缴了枪，因此结识了当地共产党游击队的蔡政委。有一天，蔡政委上专区开庆祝建国大会回来，对我说：“张学思在北京呢，你认识他不？”我说：“认识啊。”他说：“张学思现在是东北政府副主席兼辽宁省主席。”那时，东北有一部分同乡想要回东北老家，回去的路费有困难，还有的回去想找点事干的。我曾和蔡政委提过这事，他说路费好办，回去找事做没有把握。他一直挂记着这个事。听说我同张学思认识，就说：“你给他写封信，先打听打听怎么样。”于是我就给张学思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求他帮助。很快他就回了信，他让我自己先回去，到沈阳再研究下步怎么办。可是大伙都不同意我先走，主张要回去就一块儿走。

1950 年 3 月，蔡政委把我们的情况报告了专区政府，说我们想回东北。上边批回来的意思是要帮助我们回去，给我们开了个沿途各省市县发给车船饮食费用的信。我们全家，还有 20 多个东北同乡就启程了。回到东北，不巧得很，张学思这时已调到海军学校去了，已离开了沈阳。我到沈阳以后，给他写了一封信。

1951 年初，张学思通过车向忱给我来了信，介绍我到丹东抗美援朝总分会工作，叫我拿着这封信到那儿去上班。从 1931 年到 1950 年，我离开老家已经 20 年了，父母见我回来乐得不得了。这会儿，听说我又要上前线，死活不答应，就这么的，我就没有去丹东。

以上这些虽属过去的一些往事，写出来也可能有助于人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吧。

（赵新华，西安事变时在张学良司令部工作，后负责保管张学良的财物。孙震、何再冶整理。）

第三章 锐意新政 求贤若渴 造福桑梓唱大风

上个世纪 80 年代，张学良在台湾曾向拜访他的大陆艺术代表团笑谈自己早年和其父在东北经营开发的经济手段绝不是土地主的“扒地皮”（吃地租），而是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建工厂、修铁路、兴矿山、设屯垦区；统制外贸；引进外资；发展金融；发展工商业；兴办东北大中学校……张学良当年给东北大学一年的经费拨款要远远超过当时中央政府一年的教育经费，高薪聘请了许多国内的饱学宿儒，其中章士钊的月薪高达 800 银洋……张氏父子借助富饶的土地、勤劳的人民，为自己的事业打下了丰厚的家底，招纳了大批贤士良才……此时的张学良就像一艘蓄势待发的巨舰，命里注定，上天要让他在中国现代史这片风云谲变，暗礁峥嵘，而又波澜壮阔的海域上扮演一个启锚开火的重要角色！

63

一 关山飞渡

张学良承父荫，但无纨绔气。幼年时代，只一心向善，旧知识得自前清举人白永贞的循循善诱。新知识由青年会熏染而得。

关于世界知识、英语及正当运动如网球、高尔夫球等，皆在青年会时引起的兴趣。军事知识得之讲武堂。在学期间，教官郭松龄督教甚严，时常晓以大义及将来的责任。因之他对郭亦十分尊重。后任军职时，约为辅弼，颇为倚重。

其父升任奉天督军时，二十七师师长由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升任，当时汤玉麟是五十三旅旅长未得升任，内心甚为不满，谣传将出动乱。在最紧要关头，他曾亲自登门劝阻，晓以大义，虽未能即时扭转汤之蛮干气焰，但终于出走投附张勋，沈阳免于涂炭。可见他虽年幼，却能如此关怀民命（所谓二十七师师长由孙升任，汤不满之说不对，张初任将军时仍兼任师长）。后掌军政，一心向善，此其发轫之行动。

1919年赴日本参观秋季军事演习，当时他认为日本是中国、尤其是东北心腹之患。日本兵力愈强野心愈大，东北首当其冲，所受的威胁愈大。真是触目惊心。他的抗日决心，希望中国内部团结的信念在此种下根苗。回国后，尽力送学生赴日留学。并在东京组织同泽俱乐部（组织俱乐部是以后事），希望借此勉励留日学生，学习日本人的优点，并探悉日本的内情，以便将来整理政治之借鉴。

1921年华北运动会在沈阳举行，他尽最大力量在万泉河上修建了体育场，对各省远道而来的选手，饮食起居照料得非常周到。大会结束时由张于凤至夫人发奖（此节时间待考或是1929年之事。周华章签注）。

1921年，他当卫队旅旅长时，吉林地方土匪猖獗，民不聊生。更兼所练之兵无机以实弹与活人做演习。为除吉林人民的痛苦，他率全旅赴吉林剿匪。所到之处，真的剿匪，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即所用的柴草也都按值付款，老百姓都说少帅的卫队真仁义，而吉林队伍在剿匪期间，吃喝都得白供应。匪帮也说卫队旅

是真打实追，毫不留情，故而不能不逃散。缘吉林队伍多是向空放枪，双方互相谅解，必要时，留下点物资，俾剿匪队伍报捷之用。所以匪愈剿愈多。对少帅的红帽卫队无人不钦敬。

1922年第一次奉直战时，他任第二梯队司令。在杨柳青下车，循唐二里、尤家堡向信安镇进驻，预期进占保定。这时他才22岁，初次指挥作战部队，兴致勃勃。每到前线视察，他和士兵一样，亲自荷枪；在战线上与士兵说话时，士兵都催促他离开阵地，他却很为镇定。正在节节胜利中，忽传西路张景惠溃败，他派高纪毅与中路张作相联络，知其正在混乱中。旋奉到总退却命令，军队按战术规定，派出后卫部队由郭松龄率领，有秩序地退出山海关与李景林的第三梯队严密布防。经与直军王承斌等部队多次激战，双方死伤极多，终于阻止直军未得继续东进。

在此战役中有趣事，如稍有停战休息时，双方的军官即凑到一起聚谈，如我方团长王造周阵亡时，直军的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均痛哭王老师。张学良闻悉此情，不胜伤感，因而种下停战根苗。

双方对峙约两个月，6月17日他奉命作代表与直军代表王承斌停战议和。双方代表同登秦皇岛英国兵舰“卡留号”，议定条件六项：

- 一、奉直两军为中华民国同心协力；
- 二、奉军于18日午前9时撤去前进阵地；
- 三、奉军于19日午前6时撤去二郎庙以南阵地，直军同日午前集中留守营；
- 四、奉直两军于20日午前6时开始撤退；
- 五、两军在3日内完全撤尽；
- 六、直军不得进入东三省。

此条件很顺利地签了字，双方人员在英国兵舰上共进午餐之

后而散。双方均履行条件，毫无延误。铁路即马上恢复通车，改为奉榆、京山两段，各设路局管理。

东北军各归原防，多系散居民宅。张学良认为这样骚扰百姓，极不合理，赶紧在东陵、东山嘴子、昌图、锦州各处，大造兵营房屋。这是他关心百姓的种种表现。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东北方面整军经武。张学良想到未来的战争，飞机最为重要。东北航空处总办原是乔汉章，调安东采木公司理事长（乔汉章名虞云，是奉张旧幕僚。周华章注）。张自兼总办，扩充航空事业与整理陆军并重。一面购备大批新机，一面派留学生到法国学习驾驶等。当时东北的航空事业在国内可算首屈一指。后来对日抗战，东北籍的空军人员贡献也很大。

1924年第二次奉直战争时，他办的航空事业很有成绩。满可使用于战争轰炸，可是他只作侦察用，这是他顾惜民命的具体表现。

整军关于械弹至为重要，奉天兵工厂系由韩麟春创办，不久即被杨宇霆夺到手中，大肆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三、四方面军团长张学良（站立者）和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合影。

扩张，购机器买材料，经费支出浩大，弊端百出。从看货样订合同，甚至验收付款中间手续繁重，一处打点不到，就有一发被牵而动全身之虑，对于杨之弄权贪污，张学良未尝不知，但因杨是其父信任之人，更以为水清无鱼，能将械弹做出供用也算满意。为投鼠忌器，不便追查。后来杨被处死，此其种因之一也。

当时还由李宜春创办了一个迫击炮厂，聘请英籍技师（该英籍技师名沙顿。周华章签）。该厂规模较小，开支少，但出品精良，东北军每团增设迫击炮连，均是由这个小厂供应的。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中作用很大。其实应当叫兵工厂做迫击炮。但他另叫李来创办，张学良有意叫杨宇霆看看，促他自动对兵工厂有所改善，但杨没有理他。

东北旧有军队甚为复杂，连最基本的学识技术也不曾学过。所以一打仗就蒙头转向。第一次奉直战争时，有一趣事，可为说明，写出以备将来参考。有一次，汤玉麟在梯队司令部听侦探报告吴佩孚到战场来了。汤说快去把他抓来。说罢就率队而去。旋即回来说：敌人有炮，不能抓。恰为舞台上丑将军的表演一样，令人可笑又复可耻。他以为汤系父执未予深责。

东北旧有的各师旅帅皆不重学识，既受到第一次奉直战的教训，必须大加整理。于是有东北陆军整理处之成立。统监张作霖，总监孙烈臣，副监韩麟春、姜登选，张学良任参谋长。把东北军改为十八个旅，原三八旅改为二六旅，他与郭松龄分任旅长。整理的计划先由二六旅试验、训练，验证理想与事实能否配合有无障碍，又兼郭松龄精于训练军队，认为可行的然后推行全军。不到两年，军队素质大有提高，后来雪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绩之耻，正是张学良苦干收得的结果。

东北军与孙中山先生的合作，系由叶恭绰奔走联系的。当时很多人都不赞成，独他看到北洋军阀无主义，无组织，终将失

败。极力劝说其父，终于促成合作，并汇给中山先生 100 万元。后汪精卫到沈阳，他也殷勤招待，并派宁武招呼一切。

1923 年冬，吉督孙烈臣逝世，张作相升任吉林督军，他升为二十七师师长，整训的精神与二六旅相同，旅长未动，团长均换学生出身的，气象为之一新。他住在司令部的时候，每日办公早升国旗，晚降国旗，均由军乐连奏国乐，他与一般官兵一样地闻乐声而起立正致敬，颇有朝气。

1924 年，第二次奉直战争开始，他以二十七师二六旅编为一三联军。他与郭松龄担任攻击山海关正面，姜登选担任右翼，在黑山窑向秦皇岛方面进攻。直军主力是彭寿莘、杨清臣所部，双方对峙了月余，不分胜败。郭松龄向喜攻坚，伤亡甚众，后抽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学良（右）和张宗昌（中）、直隶督办褚玉璞（左）合影。

调刘一飞等三团到黑山窑，拟会同姜登选以新增的强大兵力突破秦皇岛，断山海关的后路。姜则以轻蔑的口吻说郭没有能力攻破山海关，乃来利用别人即将胜利的阵地助攻，略示有取巧之意。郭一怒即将所部带走，并扬言不下山海关就自杀。姜登选又利用机会向张学良说，像郭这样行动的军人如不杀掉，前途堪虑。张学良随即就带一部分武装追赶郭松龄。见面

时，他责郭松龄不应随便行动。郭对曰：不能在人家即将胜利之阵地巧夺人家的战功。两人同时痛哭，郭并说，这行动是不对，要杀就请杀吧。他怒郭之行，命急速把兵带上作主攻，果于次日拂晓占领了秦皇岛。常闻兵败如山倒，今竟验矣。仅刘一飞一团竟能缴直军两师的械。

骄兵必败，吴佩孚举全国之兵以为必胜，以官长的行装而论，直军都是缎被褥，吃的用的均甚丰富，准备到奉过年。而奉军行装甚简，团长以上准带毛毯两条，官兵抱定不胜必死之念，故哀者胜矣。吴佩孚增援部队有欠计划，来一部了一部，均被各个击破。

当奉军在山海关获胜时，张宗昌由冷口进占滦州，李景林由青峰口近逼天津。最伤吴佩孚的脑筋者，10月23日，冯玉祥由古北口返师北京，将曹錕禁在延庆楼。大事遽变，直军失去重心，吴佩孚虽仍挣扎，不久瓦解。奉军一雪当年第一次奉直战惨败之耻。

战争胜利后，论功行赏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尊重其父意旨，先尽外来的人优予地位。李景林督直，张宗昌督鲁，姜登选督皖，杨宇霆督苏，只把练兵最勤、战争最力的郭松龄原职未动，郭率领作战之部下，苦恼竟有表现于语言行动者，在郭实亦觉对不起部下。水涨船高，张宗昌、褚玉璞等的部下马弁随从之类，都编为营团长，甚而上之。郭的部下亦因而原职不动，心怀不满。郭内心不免郁结一股怨气，致成为1925年倒戈因素之一。

杨宇霆、姜登选之荣督苏、皖，这是出一般人预料之外。杨向未掌过方面，今竟因宠而得，一味骄纵，不久即为孙传芳所败，逃回奉天。又请张作霖再次派兵南下，企图收复苏、皖，复任苏督。

杨得张作霖的宠信，为所欲为，独对在军队中未得插足，以

为憾事。乃规定所有军队官兵出缺，一律不准自行补充，必须由预备军成建制地给以补充。预备军长系士官出身的于珍。其最毒者叫旧有的东北军，由京汉线打到汉口，再转战山区而夺回南京，以便回任江苏督军。

像这样一来，旧的东北军将损失极重，成建制的士官系预备军就得到插进军队的机会，久之将使东北军全部为士官系所掌握。郭松龄时在日本参观军事演习，奉调回国准备再次南下作战。郭识破杨之诡计，并告诉了张学良，张允回奉向其父转报。一日，张作霖三次电调郭松龄回奉，郭恐于己不利，乃决定倒戈。其通电中“有曳兵之将犹怀卷土之心”。这是骄纵弄权不顾全局横行压迫而产出之倒戈革命，诚为东北损丧元气最大不幸之事。

郭之倒戈失败后，杨宇霆、吴俊升等都力主把这次参加战斗的团长以上的军官均予处死。张学良知道这些军官都是他自己的干部，如此处理就等于解除他自己的武装。他说，一三联军向来是张、郭共同署名发号施令，此次倒戈由始至终，全是共同署名的，部下无从得知悉底细，不能责及部下。故不但没有采纳杨宇霆等的主张，反令各复原职，因之他的势力在东北军中仍居第一位。后能辅弼其父做全国海陆空军大元帅。

1925年，在上海5月30日发生惨案后，6月1日公共租界全体罢工罢市，江苏省长郑谦到沪，认为上海非有驻军不可，乃商请他南下。他见到京津学生抗日的高潮，很为同情，乃率队到沪设司令部于闸北共和路。出发前特制黄缎徽章，横书“保国卫民和平处事”八字。每天接见各界人士，采纳意见，拒绝应酬，日夜办公；终得解决，定于6月26日开始开市复工。这年他才25岁，正是美少年在上海繁华世界，处处都在诱惑人，他居然能有实力把握得住，真算是难能可贵的。

1927 年河南之战，当开封指日可下之时，不料于珍第十军、赵恩臻第十一军相继失败。富双英在上蔡被俘、陈深被处死刑。张学良极不高兴，因与韩麟春共吸鸦片，借以解闷。不久烟瘾就很深，后改为注射毒针以致精神颓丧。直到 1933 年出国前在上海时，经过很剧烈的痛苦，终于戒除。这件事很可表现他的毅力。



张学良摄于 1927 年

陈深原任重炮营长

驻沈阳，郭松龄倒戈时没有参加，因得重视升为师长。特别优遇官兵双饷，陈即妄自尊大，骄气横生。河南战役隶属十一军，向不把赵恩臻军长放在眼里，当战况稍有失利时，陈未受命令擅自撤退，全军溃败。盖基于陈之自由行动，军长赵恩臻请把陈处死以肃军纪。张学良颇想维护陈之性命，但为情势所不许，挥泪斩之。后常照顾陈之家属。

进入河南的军队，陆续北撤，石家庄由万福麟军队驻守，幸而阎锡山未出兵石家庄阻断归路，军团部驻保定。韩麟春军团长因病回沈，旋即脑充血而逝。他很伤感好朋友又少一人。

张宗昌在北京枪杀有名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将及成舍我，张学良闻之大诧说：不经法律审判，随意杀人，成何世界。

张宗昌因而未敢放肆，成舍我得免于死。此乃重视舆论和尊重人权之行为。

当年傅作义率晋军越太行山袭取涿州，东北军将傅军团团围住。张学良认为傅军孤军深入，后援被截，不难解决，因命炮兵不得使用重炮，更不派空军轰炸，免得人民的生命财产遭池鱼之殃，结果由地方士绅联合教会人士调停解围。张对傅军不以俘虏对待，并迎傅作义到保定居住。

1928年3月张学良率领各处人员乘专车一列，到达东光车站校阅于学忠的部队，将干部编入三、四方面军，所有饷械服装待遇与东北第一线对待。从此，张、于二人以诚相待，有始有终。

他生来境遇有似唐太宗，他也未尝不以唐太宗自况。他要读《贞观政要》，曾到处托好友代购，惜终不得善本，后由张弧送给

一部宋崧本甚为珍爱，置案头随时阅读。

韩麟春故后，他把杨宇霆邀作三、四方面军团长，杨总想要抓军权，甚为高兴。杨在京汉线上赞襄军务，常带着许多卫士另乘一列专车。就连一攻一守都要请教术士择吉日择吉时。他不欢迎也未尝反对。说来可笑，有一天，专车停在马头镇站，忽有一白兔闯进车内，旋即逃去，这般术



张学良（右）任奉军三、四方面军团长时与他的代表胡若愚（左）合影。

士说卯酉相冲，下午酉时必有不幸的事，把车退出该站，果于下午有敌之骑兵窜进该站放火烧房，因为凑巧故并志之。

在攻彰德之前，军团长的专车每日白天向南开进，经过磁州马头镇直抵彰河北岸，夜间归邯郸过宿。张学良亲自征求民意，访问地方耆老，在专车上请他们吃饭，详询东北军有无骚扰情事。诚嘱乡老无需顾虑，席间畅所欲言，尽欢而散。

在磁州乡间购得一方墓志，文中有些简字，如国字作囯，他一见就说这是武则天遗物，看末尾果有垂拱年号，顺便带回沈阳，赠给奉天省教育会，磁州上绅听说后，向他请求交还磁州做纪念存物，他已允之。惜“九一八”失去。

河南村庄都是聚居，有很高很厚的围墙，叫寨子，开南北两门曰寨门，有红枪会防守。围墙四角有瞭望台，指挥寨门之启闭。张学良每过这些寨子，必绕道而行，不穿行，以示尊重乡民的纪律。他更极力安抚流亡，严禁骚扰。他还沿途常召乡农父老亲自慰问疾苦，散布些零钱，为数虽然无多，也传播得欢声雷动。

1928年春，奉军处境严重，河北外围尽失，北伐军在京汉、津浦两路愈逼愈近，北京变成局处一隅。彰德的胜利如同空入宝山，大致与第一次直奉战被牵连得不得不败。张学良由保定回北京，劝张作霖的奉军撤回东北老家，他恭送张作霖乘车返奉，专车竟于6月4日在皇姑屯站被炸，张作霖不久身死。

像张、褚这种无知识的败类，只知吃喝玩乐，任何方面哪有不失败之理。他们的队伍概皆乌合之众，到处骚扰百姓，东北军的名声叫他们闹得扫地，后在滦河还要求很大的编制，吃住骚扰于东北各地方，他实在不能允许，竟在滦河与胡玉坤军冲突，被击溃败。张宗昌乘民船逃往大连，褚玉璞回沈入南满站。

阴历四月十七日，正是他的生日，晨起已知皇姑屯炸车之

事，精神很不兴奋。当天虽有宾客来贺，仓促叙谈一会儿就散了。军团部的人员随即乘专车赴军粮城，用电话与于翼之联系，知其父确在皇姑屯殉国，他镇静地布置一切，并沉痛地说：一生不再做寿。

专车开到吕黎，他与杨宇霆均住在铁道北山坡上的庙内。过了几天，秘密地与卫士全换上士兵服装开赴沈阳。据说“是在航空处岔道下车进城。此事弄得很严密，军团各处长都不知晓，后杨率军团专车改驻山海关，军队由参谋长鲍文樾集结完毕，仍有进可攻退可守之力量。

张学良回到沈阳后，东北方面才为张作霖发丧。8月初正式开吊，各方吊祭者甚众。蒋介石也送有花圈，上款称雨公千古的字样。张是哀毁逾恒焦思竭虑。他认为御外侮报父仇必先谋全国统一。双方信使往还已是不绝于途。日本也派特使林权助来吊。他曾特往日本领事馆作外交礼节上的答拜。每次接谈酬答之工，词令之妙，使日人无机可乘。如林问他年岁，这在外交上是很失礼的，他答曰与贵国天皇同岁。这种随机应变的问答，足证聪明绝顶。

日本人办的《满洲报》销路很广，曾举办一次民意测验的花样，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等数十人列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读者可选东三省军政首长一人，奉、吉、黑三省主席各一人，写完剪下寄还该报。杨宇霆利用这个机会，伪造民意，买了几千份报纸，填上他的名字，结果他所得的票数仍不及张学良的多，可见民意所归。白为报馆增卖出几千份报纸，后因杨家卖出几千份报纸，这才泄漏出竞选的秘密来。

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时，捐出其父遗产1000万元，半以扩充东北大学，添筑文、法学院、图书馆、体育场、汉卿楼等。又礼聘了很多有名的学者为教授，一时誉为全国有名学府；另一

半做东北中小学基金，归董事会管理之。

东北为缩减经费开支，整编军队，将军长改为军事参议官，师长改为旅长，裁减细目由军事参议官开会决定。一切进行均很顺利。独有杨宇霆主办的兵工厂反而要求扩充经费。张学良向杨说：经费有限，你是知道的，要增加经费有何办法？杨答：铁路可月拨若干。常荫槐亦当面应许。在此以前，张学良曾与常面商，希望由铁路上筹拨若干经费，补充军费，常绝口拒绝说：不行。今竟为杨而行之，前后相较，足证彼二人互相勾结。后被一同处死，此其种因之一。

军事参议官开会时，张学良因精神不好，不能完全主持。杨宇霆每自任主席。张偶尔下楼有所主张时，常遭杨的拒绝，并竟说“你不知道，你不用管”等语。像这样喧宾夺主的行为表现出极不尊重的姿态。张学良对此虽表面上淡然置之，但内心或因此种下了杀机。且给任何位置全不接受，杨只住在沈阳拉拢文武官员，坐等机会。并流露出来说：张每日注射针甚多，将必自毙。

1928年10月9日，他被任国府委员，次日举行阅兵，他8时入场，着上将服，左臂绕黑纱，骑骏马巡行阅兵毕，登台检阅分列式，空军也在天空作受阅的飞翔，这是东北空前的盛举。

1929年春，距春节不远的一天下午约5时许，张学良用电话召高纪毅直入卧室密告曰：杨、常逼余太甚，阻碍全国统一，并硬要发表常荫槐为东北铁路督办，成立公署管理东省铁路。张说这事关对苏外交，并涉及中央职权，须从长计议。杨就拿出已写就的纸条逼张签字发表。张仍说必须考虑，正到吃晚饭的时候，待晚饭后再研究。等饭后归来，二人进入老虎厅内。张令高纪毅、谭海率卫士六人进厅宣布：奉长官命令待杨、常再来时，立即处死。事后，一面用电话告诉在天津的胡若愚速赴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一面用文字作成军法会审形式，列举杨、常罪名，报

南京备案。据胡谈果有人到南京奔走起诉，当然不得要领。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正式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旗。是由被服厂连夜密制的。易帜后，沈阳市容为之一变。东北军在各街上游行。日本人看之很是惊讶，大概他们负情报责任的人在事前一点也不知要受到处分的。过了几天，张学良在省府礼堂宣誓，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奉天省改辽宁省，省主席及委员亦均发表，同时宣誓就职。中央派方本仁监誓。方为政务委员，常住沈阳，以示双方团结。

日本不甘心坐看中国统一，准备对外，于是由南满铁道派木村理事向张学良要求解决有关铁道问题的悬案。张派高纪毅负责办理。双方议定组织委员会研究办法。但日方委员始终未派出，故未得开会。木村在会谈中表示，日本军方对此极为重视，如不能早日解决，难免发生意外。

在这以前日人强要修筑吉会铁道。中国人都明白，一旦有事，日本可由大连、安东、会宁三路进兵。惜乏实力可以抵御。乃由高崇民等创设外交后援会，因金泽臣也是同志，故借其所办的北平公司楼上秘密开会。参加的人很多，日本人认为不可轻犯，便暂时沉寂下来，这是张以人民为后盾与日本人第一次交涉。1929年，在日本军人的支持下，朝鲜人在沈阳北陵前种稻田，强占民地，并拆毁铁路支线。外交协会当时由阎宝航等领导的东北外交协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日本人竟要求张学良予以取缔，张回答说：这是民意所系，为何能够制止？日人见交涉无结果，更不甘心，后遂酿成九一八事变。关于这点另记于后。

张学良任东北边防长官时，曾特制学生日记本两万册，皮面印有相片，送给沈阳各校中学生。又购《万有文库》1000部送给全省各中学的图书馆，这是他注重教育的表现。奉天商务印书馆经理臧启芳经手特制折扣得与他认识，并很得重视，时常召进

府中谈学说理，后推荐天津市社会局长并代理市长。

张学良喜欢与欧派人士接近，与顾维钧、罗文干约为异姓兄弟。1928年东北军出关，罗文干随到沈阳做东北大学教授，是北陵别墅的常客，后借张之力做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态度剧变，对东北的事特别挑剔，一般人对罗的行为提起来没有不摇头的，他却淡然置之不加评论。顾维钧虽亦属势利之流，尚未及罗之甚。顾维钧在“九一八”之后曾陪同李顿赴沈阳调查。此二人均为自己做官发财计不得不尔，他并不予以深责。

王永江当省长兼财政厅长时，家眷即住财政厅后院官舍。后来刘尚清任财政厅长时，由刘的家眷住入，旋即改组省府人事。不久，刘任省长，他注重学历。张学良因教育厅长祁公亮系留英学经济的，就调祁任财政厅长。祁既喜出望外，便举趾离心不固矣，祁坚要刘省长让出官舍，刘求缓不得，诉之张学良。张觉祁之行爲很不合适，立即撤了他的职，改任张振鹭。祁之财政厅长仅昙花一现，前后不出七日。

王永江在奉天善于理财，更能想到创办东北大学，实属难得，然无大进展，经保安会委他为校长，经他扩充成为全国有名的学府，已如前述。

王永江在奉天理财有功。1927年王病歿金州，张学良深为惋惜。王的儿子在东北大学念书，不知上进，常在舞场和班子里鬼混，张找来劝导无效，很伤感地说：岷老不幸有这样的儿子！

1929年夏，张认为东北既和关内统一，铁路尚分京山、奉榆两局管理，殊不合理，因派高纪毅赴南京陈述合并意见，深得蒋介石的赞许，即改为北宁铁路局，任高纪毅为局长。

1929年，张学良认为东北的铁路运输及吐纳港口均受日本人控制，令高纪毅妥拟对付办法，呈候核夺。经高详细研究，除铁道网须按步施行外，并拟出两种办法：

一、把沈海、吉海、吉长、吉敦等四路联运起来，名为东四路联运，把打通、四洮、洮昂、齐克等四路联运，名为西四路联运。这样，可以把日人控制的南满铁道包围起来，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物产运至营口、秦皇岛、天津，经海陆联运出口。

二、建筑葫芦岛港口，每月由北宁路局拨出 50 万元专款，半作修筑港口，半作修建商埠之用，并与荷兰制港公司代表商得同意，按月付款。

高以此方案来当面请示，以他的英明判定，认为可行，张学良同意这一计划，面嘱急办。

高奉此命后，一面与荷兰制港公司签订筑港合同，一面呈铁道部备案。说明是奉张长官的命令指办的。并拟在路局设港务处驻该岛专管筑港事务。铁道部批准备案。递批派定处长，路局如急需开工，派宁武为副处长先行组织到港开始办公。

1930 年 6 月 21 日，是他三十初度，也是张作霖逝世第二周年忌日，他早已有言在先，一生不作寿，面张群、吴铁城辈大献殷勤，以三十整寿又逢全国海陆空副司令新发表，硬要给他作寿，也就有人借口按旧历计算他的生日，比忌日晚四天。作寿这天，北陵别墅高搭彩棚，唱了堂会，热闹通宵。张群等人实属逢迎无耻。

1930 年 7 月 2 日，举行葫芦岛筑港开工典礼，他亲莅主持，并在西山上竖立一座石碑，书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碑。

典礼盛况空前。张群、吴铁城等均随来。山西派崔廷献，南满铁路派两位理事，东省铁道派理事华局长，并由津沈对开一次专车，招待绅商，大家全在很高兴的气氛中闭会。张着海军制服登“海圻”舰校阅海军，又在岛上住了两天，然后去北戴河。

阎锡山联络汪精卫、冯玉祥等在北京开扩大会议，和蒋介石打得很激烈。事前，张学良曾在 3 月间发出冬电，谓“政见无妨



张学良（中坐左一）任东北葫芦岛海军学校校长时与学生合影。

磋商，而不可为意气用事之争，武力有时必需，而不可为萁豆相煎之具”。他苦口婆心希望和平，而事与愿违，双方交战至六七个月。倘再任其拖延下去，不但百姓苦遭涂炭，甚至引进外侮，亦实堪忧。为维护国家统一，他又于9月18日发出巧电，有云：“素以爱护民众，维护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庶几国际地位可免堕落之虞”。此电一出，东北军随即入关，阎、汪、冯等的扩大会议瓦解。国家统一局面得以维持。

北京改名为北平，东北军第四次入关，以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周大文、胡若愚分别为北平、青岛市长，臧启芳为天津市社会局长代理市长，张学铭为公安局长（后任市长）。山西省主席、绥远省主席以旧晋军将领商震、傅作义分别任命。东北军未进驻两省，阎锡山的原有组织亦未拆改。此对1928年阎未向石家庄派兵截断归路之因果相循。

北方的事大体布置就绪，又曾改军税制，免除苛杂，崇文门税务等一律免除，对入关的东北军训勉破除已往的恶习，华北局面为之一新。然后去南京与蒋介石会商。他由天津到浦口后，登

威胜舰过长江，沿站都贴满欢迎标语，停在下关的军舰都放礼炮，表示欢迎。南京并已布置好了副司令行辕。并由政府公布各部及省市对副司令行文都用“呈”等表示优崇。不过在南京的一般人，均未料到他出席报告东北的内政外交时，说得透彻详明，连胡汉民也称赞他毕竟不凡。在易帜后，中央党部拟选他为中央委员，因年岁不够，今年整30岁，但已当选为中央委员。政府推他为国府委员。

他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宴会各院部长，招待新闻记者，均在欣欢的气氛中度过，间与宋子文畅游金、焦，饱览江南胜况，然后北返。先在津小住，过1931年的新年才回沈阳过旧历年。王树翰的文官长、刘尚清的内政部长、刘一飞的察哈尔主席均在这时期先后发表。

回沈后，东北选举国民会议代表。在竞选中，东北大学有几位教授因得票较多，另有些不甘自己失败的人向他告密说这些教授有垄断选举的嫌疑，失掉选举的真精神。张学良把东大教授孙国封、汪席珍等人邀进府中，责以不当有门户之见，朋党之争。两人均留学欧美者，当然以民选应当竞选作争执，弄得他勃然大怒，掷以纸笔，叫他们写遗嘱，准备处死。旋大家促王树翰到府恳切地说：“不能这样做。在他们原系故意做作，为的是传到南京，叫他们知道东北的选举不像南京似的伪造民意，搞什么圈定指派等鬼花样。”当然准了这个人情，反过来对孙国封诸人不特未逼写遗嘱，还温慰有嘉，叫他们回作正当的选举。但他后来却深悔此行为憾事。

国民代表选定后，各自报到。1931年5月，张学良去南京出席国民会议，会议对东北代表表示特别欢迎。东北代表的提案件件通过。会后拍全体照片时，中间给张学良留有空位，恰好班禅来到，他把班禅拉到他与蒋介石的中间。

宋子文对他十分要好，择做盟兄弟。张在宋家吃饭。因为多吃了芒果，肠胃发炎变成伤寒，回到北平就病倒在床。因协和医院治疗得法，得脱危险。在逐渐康复中，沈阳日人所办的报纸滥造谣言，扰得东北人心惶惶。最后《新民晚报》把他病愈在协和医院照的相片刊登，谣言始息。

在他病愈出院的晚上，曾到开明戏院去看梅兰芳演出的《霸王别姬》，借慰病久住院的苦闷。哪知苦闷更大，当晚沈阳来电话，日本兵正在袭击北大营，参谋长荣臻请示办法。他回府后即电报蒋介石请示，以便传令荣参谋长照办。

自他继掌东北军政大权，一切措施没有一事不使日本人看之眼红的。旧的悬案既不能解决，而新的木村交涉亦不能满足其要求。在日本人对他的想法也许会说：勿使枝蔓，蔓难图也。尤其在日本军人更为浮躁，想开疆拓土，要立功勋。以“九一八”作为试验，胜则继续进展，不胜则作为地方事件，随时可以结束。恰巧就遇到当时的南京中央不令抵抗，听候中央办理。坐使日本军队在无抵抗中得寸进尺，几天的工夫就占了东北。

荣参谋长奉到不抵抗的命令后，即转达于北大营第七旅王以哲退至东山嘴子。到天明，日兵已把沈阳城郊占领，以致航空军亦未得起飞。计东北沦陷到日军手里，前后共有14年之久，而在南京中央向未主张抗战，总以外交解决。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南京中央一方面主张不抵抗，另一方面使全国舆论骂他不抵抗，而他始终维护国家体面，宁肯忍痛含冤，未尝予以申辩。

日军占据沈阳大帅府，门户洞开，所掠夺去的财物无法统计。本庄繁因为做过他的顾问。事后还假惺惺地为维护交谊，把剩余的东西装上木箱用轮船运到塘沽。可是他始终未派人去取，后来不知此物落在何处。

北宁路局把英籍职员全部派到沈阳，勉强维持客车通到沈

阳。对行车员工简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前工作。得到他的命令，按照战时规定从优给恤。故员工皆振奋爱国，不顾一切把车通到沈阳约有三个月之久，在沈阳之文武员工及爱国的民众志士得到入关之方便。

沈阳沦陷后，在锦州成立辽宁临时省政府，以米春霖为主席。他在北平召开过一次会议，秘密宣布得到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同意，以锦州为缓冲地带。两国进行交涉，东北军以关内为第二家乡，须严肃军纪，冀得民心等痛心之谈。但日本军人正在得意忘形之际，哪肯听什么首相之话。日军继续进攻，锦州既失，乃把军队退入关内。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将日本的侵略罪行向国联提出申诉，在日内瓦国联召开大会。当时东北人只有听信政府，看国联的行动。国联派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中国调查。张学良很重视这次调查，命北宁铁路局预备一列很舒适的客车。每个代表有一辆火车，内有客厅、卧室、浴室，另有洗衣理发等设备。在车上不次于在家，各代表甚为满意，很想乘此车出山海关，被日人拒绝。调查团在北平时，他曾亲自陪同到八达岭游览万里长城。

82 东北空军有十几年的历史，九一八事变仓促未得起飞，沦陷敌方，实为可惜，但有爱国思想的驾驶员等设法进关，依旧投祖国怀抱，加入杭州笕桥空校，成为中坚分子。抗日战争时特别立功者，多系东北籍的驾驶员，这是张矢志报效祖国的成果。

他对航空既感兴趣又有经验，在1932年冬偕端纳、刘多荃、雍医生等人乘自己飞机到杭州笕桥参观空校，并对该校学生讲话，特别对东北籍的学生格外勉励，杭州学生执旗结队向他请愿，要求他加紧抗日，他很感动地接受这个意见，并很诚恳地说：此志不渝敢告天日，在湖边蒋的别墅小住两日，经汉口返回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最关心的是热河的防务，日军随时有侵热的可能。热河一失，即威胁北平。张学良为坚守热河，屡向南京请求作有计划的抵抗。南京政府不得已才派宋子文前来视察，敷衍面子。张学良曾亲自陪宋子文等到热河承德视察，宋子文拍着胸膛说：你们抗战，军费包在余的身上。在百忙之中，有人进入行宫游览，尚发现有做“白面儿”的设备，真是丢尽东北人之脸。

热河都统汤玉麟是个毫无胆识，见利忘义的人。他为优遇父执忘掉国家的责任，并把第一次奉直战，曾作为像演戏一样说：去活捉吴佩孚，因敌人有炮即返的丑剧也忘掉。张学良竟要汤守卫热河，真是荒唐之极。若要换人，又怕汤投降日本。但是贩烟土，做白面儿，早在洞鉴之中，张不能早为之，所以致日兵未到，就弃甲曳兵而逃，丢尽东北人之脸皮。也不能怪宋子文失信，倘如早派胆识俱备的人镇守热河，城亡与亡，使日本人及南京看看有多么光荣，蒋亦无词可措叫他下野。

汤之弃城逃走，固是出他意料之外，赶紧派兵堵防古北口。诸葛亮误用马谡，但马还是战败而失街亭。今汤玉麟未战而失热河，这是他知人而却未能善任的恶果。热河失守，蒋介石利用这并为维持他自己的地位，电约张学良到保定会谈，蒋坐专车到石家庄，先派宋子文到保定，向张说明要请他下野以缓和国内的空气，他慨然应允。蒋的专车才开来保定，与张面谈。张学良回北平后即通电下野。第二天即乘飞机到沪，住福煦路181号，戒除毒瘾。

在沪住了一个多月，作出国的准备。行前电嘱诸将领不要远道来沪送行。南京方面有吴铁城、宋子文颇献殷勤，舱位定的是意大利康佛罗素号轮船，是航行欧亚间第一条快船。同行的有于夫人、赵四小姐和三个子女，及顾问端纳、苏格兰人伊雅格、翻

译沈祖同夫妇。在船上不过二十几天，就到达罗马。举室同行，当不致过于寂寞。

他甫离沪上，张继突然发表一段谈话说：他带走颐和园几张名画，必须归还。按颐和园属于北平市，市长周大文急切声明说：他在北平为鉴别真伪曾借几张画做研究资料。过了几天，在飞沪之前，曾面交余送回该园，有经手人为证，这才算了结张溥泉的这段谈话，张在南京可算是一个老实人，爱护国家财物是对的，但对国民党拿走的最珍贵的珠宝磁铜书画等名物运赴欧美，名为展览，不闻运回，连国子监的 10 个石鼓都不知去向，张却闭口未闻一谈，独对他做望风捕影，下井投石之谈，绝非燕赵之英雄好汉。

意大利古迹既多，人民也温和易近，加之驻中国公使的齐亚诺私交尚好，来电坚约，所以他到意大利在罗马小住，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他先参观了意大利的飞机，又往法国参观空军，赴丹麦考察农业，并送子女到英国留学，然后再回到罗马，这已用了大半年的光景。他看到西欧各国的强盛，感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回国之念油然而兴。顾问端纳先回中国预为布置。说明东北将领纷纷电恳他回国领导，已得许可，他便携眷搭邮船回国。一般旧部及各方代表特来上海，在四马路浮水码头附近等候邮船，船将要靠岸，这般欢迎的人热烈欢呼，蜂拥直前，一到船边，方知他已由海关专轮接到浦东早已上岸，这时便都赶到已租定的莫利爱路住所去晤谈。在门簿上登记之数近千人，颇极一时之盛。

从前做他顾问的日本人柴山兼四郎曾亲自到沪，传述倘或蒋对之有不合适的话，如拟离开时，在江边备有军舰一只，可随便登用。他是一心爱国，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哪肯上日本兵舰，特派王树常去婉言致谢。

张学良回国后，蒋介石派他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打内战。张虽觉事与愿违，也只好勉强接受，他却认为应当少安毋躁，终有达到救国目的的一天。他曾发表过，果因抗日而战，就立刻跑到前线，情愿当名士卒。再看看何应钦在他出国之后签了《塘沽协定》。丧权辱国，遭国人唾骂，更给他一个严重警惕。即赴汉口就职。办公地点先设在银行公会，后移武昌旧巡抚衙门。他每天除到公外，忙于接见东北军前来谒见的各将领。蒋介石对他不放心，派钱大钧为参谋长，二人无丝毫摩擦。张学良在武汉年余，将大部分东北军调到内地，参加剿共。1934年夏，蒋介石调东北军将领到庐山受训，张学良也住在牯岭，到庐山训练团讲过话。

有时同端纳爬山，足力甚健。

日本这时疯狂特甚，吞吃了东北，依《塘沽协定》又特殊化了华北，尚尤以为未足，还压迫南京不准中国作抗日的言论和运动。东北籍的杜重远为了一篇《闲话皇帝》，入上海监狱。杜是留学日本的，在外交协会为重要角色，也是抗日的积极分子，因与他颇契，亟谋营救，遭蒋拒绝，颇为痛心，曾派人到狱中探视慰问，另无他法可以救杜出来，只好听之自然。

1935年他在南京参加一个大会，遇到汪精卫正在入门时，发现刺客，他在当场很勇敢地飞起一脚将刺客的手枪踢掉。这时人声哄杂中，蒋的随从将刺客枪杀，致无活口。他这种救人急难行为真是公而忘私，实在令人佩服。后有人赞赏他的勇敢，也有人说他无意中违背了蒋的意旨。

1935年10月，张学良改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迁驻西安，于学忠调任甘肃主席，东北军也纷纷向陕甘调动，准备“进剿”到达陕北的红军。

到处为家的东北人也纷纷随之前往。他曾建筑了东北新村，

使这些人生有安身之所，他同时又顾及到死有葬身之地，他命高纪毅在北平筹办东北义园。高筹款 10 万元，买定王怀庆、邵英两个花园略加修理，于 1936 年请以正式开幕，直到现在东北人之作古北京者能有葬身之地。同时曾拨给天津张作相 5 万元，虽购得一块土地，惜未修筑，钱存银行，已不翼而飞矣。

东北军调到西北与八路军作战垮了两师，总合双方伤亡，确是对外实力上一个绝大损失。他认为自相残杀的内战万不能再拖延下去。蒋还吵嚷着攘外必先安内，就是坚决打内战。他这才深自警惕抗日的事必须自己来做。这时已与陕北中共取得了联系，并很秘密地在咸阳与共产党要人见过面。据周总理说，他曾送给共产党二万元，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在西安组织了救国会，高崇民、车向忱、陈先舟、栗又文、阎宝航、卢广绩、周京文、杜重远诸人都是中坚分子，抗日救国运动很快展开。先创办《西北向导》和《西北文化》两个期刊。并想将北平《晨报》全部迁到西安，为宋哲元所阻，仅拆运了一架机器，发刊《西京日报》，号召抗日。东北大学也迁来西安，学生情绪特别兴奋，对抗日运动更起了很大的作用。

西安总部参谋长晏道刚名为幕僚长，实是监军，事事掣肘，使他与蒋的摩擦日有增进，抗日的事哪有希望。他认为非下决心向蒋痛切陈词贯彻主张不可。第一次在 1936 年夏，他飞往南京，略陈抗日理论，蒋是决心打内战，当然不会赞同的。

第二次在洛阳蒋做五十寿，一般人都是胁肩谄笑，大献谀词。他独密谈联合抗日，当然遭到蒋的严词驳斥，致使裂痕逐渐露骨，蒋办寿毕，于 12 月 4 日率领文臣武将到西安。他是率着部下在机场欢迎为仪。蒋进城稍作勾留就忙着赴华清池去住，每天传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讲些共产党现在被迫缩驻一隅，力量有限，如经痛剿，不难根除等谬论。诸将领全不耐烦。

这时西安的学生听说蒋来，自动地结成大队在城内游行，要赴临潼请愿。学生大队走到半途，被他劝回。他发誓说，一定替大家要求。这几天他不断到临潼向蒋陈情，比在南京、洛阳两处所说得更为透彻详尽。怎奈蒋是执迷不悟，一定要先剿灭共产党，最后说到无转圜的余地，他就决心使用兵谏。于是导演了临潼捉蒋。

华清池之役，钱大钧脑部受伤，毛裕礼、蒋孝先和宪兵多名被打死。同时更有个不幸事件发生，即属于十七路军的孙蔚如警备旅一部在西安招待所打死了邵元冲，伤了胡若愚。

他一天到新城去数次，很热烈地希望蒋领导抗日，而蒋却默默寡言，又说：你办好啦，何必问余。他在西安的住宅是借高桂滋的房子，距新城较远，往来不便。14日下午把蒋接到他住宅。同日端纳飞来与蒋同住对面平房，他派自己的飞机送蒋鼎文回南京，说明西安真实情况，原自蒋被扣，南京各方已乱作一团。何应钦、顾祝同主张施用武力，而宋子文、孔祥熙辈力主缓和，正在焦急之际，听说蒋鼎文回来，确悉蒋尚在人间，于是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戴笠等相继同来西安，这时蒋的另一副假牙亦带来，蒋被扣时不食，并非绝食，是无牙之故。

宋子文兄妹在西安很尽力疏解，蒋就逐渐开腔，答应了八大主张，不过蒋要求先回南京方可施行。宋子文兄妹也口头保证必施行，更无恶意。这时东北各派在这严重局势下，组织了大会，由高崇民领导，对于放蒋事，都说蒋是不顾信义的人，尤以鲍文樾大声疾呼说，政治与道德不能相提并论，不能以很空洞的“答应”两字就送他返南京，这成为一致的主张。但在12月25日下午4时左右，他就同蒋到了飞机场，准备同往南京，这时一般人都不知道，据周总理说：赶到飞机场已起飞矣。

他到南京后住了三天，政府组织军法会审。鹿钟麟也列为委

员，据鹿说：张在公堂上很慷慨地承认为抗日救国，用兵谏委员长，这完全是其个人的主张与行为，实与他人无干。据闻军事法庭判徒刑10年，蒋后生诡计，呈请取消判刑，改为交军委会管制，但未定年限，实即无期徒刑，直到现在仍未能予以自由，可叹也夫。

(高纪毅，曾任张学良的副官长、副官处长及奉天省警务处长、辽宁省公安管理处长、北宁铁路管理局局长等职。)

二 爱将反目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役以后，张学良任京榆一带驻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东北航空处总办和东北讲武堂监督；郭松龄任京榆一带驻军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①。张时常往来于京、津、奉天之间，军部事务大都由郭处理。当时经常随张来往办公的，有军部上校军需处长鲁穆庭、中校军械官周濂、第四师中校参谋鲍文樾、少校副官黄显声（黄被派为营长后，其职务先后由王某及第六师少校参谋姜化南接替）、少校军法官朱光沐、东北航空处上尉处员汤国桢等人。

88

当郭松龄举兵反奉之前不久，约在1925年11月中旬，我们随张学良由奉天来津，22日傍晚又匆匆乘车返奉。专车开动后，姜化南和朱光沐对我们说：“今天少帅和郭军长谈话时，好像有些异样，几个高级将领的态度有点傲慢，不似往昔，怕有什么变化。”但我们当时对郭松龄决心叛变尚茫无所知，嗣后才听说郭已于当日发出要求张作霖下野的通电。

^① 魏益三在《郭松龄和奉军的矛盾》一文中说，郭松龄时任第一军团第十军军长。——编者

我们到达山海关外前所车站时，驻军工兵营长吴树滋已在车站迎候，张探身窗外，面谕吴营长率队开赴山海关，简单告诉他一些情况，并命他通知驻山海关附近的一个团（好像是第十九团，团长为张廷枢）迅速布防。专车继续东开，由于前面情形混乱，开到连山车站即停。当时连山车站还停留由东往西的客车一列，姜化南听说客车中有奉天官银号的人押运现款赴津，他因临行时未带现款，经请示张学良后将款接收下来。随后，张叫专车转到连葫支线，开抵葫芦岛。我们在东北海军学校进晚餐后，又去镇海军舰上。记得军舰先往东开又折回西行，大约在海里游荡了一两天的时间，还听说舰长凌霄有通郭之嫌。接着军舰开到秦皇岛，当地有一个炮兵连驻扎，姜化南去找连长刘多荃说明郭松龄反奉情况。刘表示惟张之命是听。姜回舰报告后，又上岸叫刘等待候命。一次，张立在甲板上，看见一列一列的兵车经过秦皇岛的铁桥往东行驶，有一个青年中尉炮长向张说，军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和兵车，请示是否发炮。张摇摇手说，“都是我的部下。”有一天晚上，张问我：“你新来不久，要是我们上山，你去不去？”我答应说去。这几天张不断用无线电同奉天通电报，等到杨宇霆与日本方面接洽好后，军舰就开往大连。到达大连后，张带同鲍文樾、朱光沐、姜化南和谭海先回奉天省城，旋前往兴隆店。隔了一夜，我们也回到省城，并急忙赶到兴隆店，在张临时设立的司令部内办公。

这时，由省城开来的部队，有戢翼翘和朱继先两个旅。张学良临时委派陈深为炮兵司令，并将后方各种类型的炮和兵工厂所存的炮全部调到前线来。嗣后，骑兵旅长于芷山率部由关内绕道冷口到达兴隆店，吴俊升亦率黑龙江骑兵前来。时值严冬，我们随张到前线视察时，雪深没膝。在餐车上，见有日本兵五六人，穿戴中国士兵的皮袄皮帽，正在吃饭，据说是日本炮兵，前来帮

同瞄准射击的。

不久，郭松龄的团长富双英、刘振东等陆续来归；郭兵败出走后，他的参谋长邹作华也由白旗堡车站来电话，说他已能控制一切，请张放心。郭松龄反奉事件至此即告结束。

（汤国桢）

三 大帅斥子

我于1925年7月供职奉天省署一科。在郭松龄反奉时被调到大帅府当秘书厅录事，亲眼见到当时大帅府内和张作霖的一些情况。在此以前，我就常听人讲张作霖有些手段，善于笼络人心。

1925年12月29日，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张作霖在大帅府办公厅召开三省军政善后会议。反奉期间，郭松龄曾在新民发表告奉天父老书，对张作霖大加指责。张作霖曾被迫通电承认因连年参战，影响人民生活，表示在反郭战争结束后，将引咎告退，还政于民。因此在战后不得不有所表示，以符前言。此外，张又想利用这次会，贬新派，扬旧派。

参加这次会的有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杨宇霆、王永江、袁金铠、王廷五以及各厅处长等数十人。

张作霖走进会场后，摘掉四喜貂皮帽子放在大案子上，向会场环视一周，然后用低沉的语气说：“今天这个会虽然还是由我主持，可我是出来向大家作交代的。”他望着袁金铠说：“四哥，你把通电先宣布一下，明天就发表！”袁高声朗读了通电，大意是：“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今后将东北行政交王公岷源（永江）、军事交吴公兴权（俊升），请中央另派贤能来主持东北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

后经吴俊升、王永江的谦辞和杨宇霆等多人的劝解，张作霖方才站起来用手往下一压，让发言人坐下。他说：“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干！行，将来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让贤。”这时张作霖脸色遽变，眼光四顾：“常荫槐来没来？”常从后角落里站起来说：“我在这里。”张作霖忽然大声喊道：“常处长（常为军政执法处处长），我命令你坐专车去把张学良给我抓回来，我自己枪毙他！你要让他逃跑了，拿你的脑袋来！”常刚想转身，吴俊升站起摆摆手说：“唔……常处长，你慢走，我有话说。”张作霖怒冲冲地对吴说：“你有什么说的？”吴说：“唔……过去没有张军长还将就，现在没有他一天也不行……”“你胡说！”张作霖把脚使劲一跺，全场震动。吴俊升连忙说：“唔……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两万人马在山海关，若和冯玉祥一合股，比郭鬼子力量大几倍，打过来，奉天就顶不住。唔……收编郭军，谁也办不到。唔……我不敢去，大帅也不行，非张军长不行。他一招手，那些人就都回来。张军长再往前一挺，天津、北京就落在咱们手里，那时候我才敢保你上北京。”

这时张作相也站起来要发言，张作霖又大喊一声：“你住口！我姓张的用人，向来是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并不是我自己养出来的都是好的。小六子这个损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什么他妈的讲武堂、教导队，花了几百万块现大洋，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地装他妈的了不起。这帮杂种算狗屁！‘天下好’（即王永清，当土匪时的诨号）带一个骑兵团就把这帮兔崽子打得懵头转向。郭鬼子、小六子瞧不起吉黑两省的军队，瞧不起于兰波（于芷山）。我的天下就是这些人打的。我姓张的用人向来一秉大公，李景林、张启坤、许兰洲这些人都是外来的，和我素无瓜葛；还有于孝侯（于学忠）是吴子玉（佩孚）的外甥，谁不知道

我和曹、吴对头多年，可是我对他外甥是重用的。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激得把他妈给我当老婆都愿意。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平辈。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教他学李世民，清君侧。我若不亲自毙了小六子，对不起在座诸位……常荫槐！你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先枪毙你！”

这时杨宇霆站起来说：“请大帅息怒，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得对，为大局计，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得授给他统帅全军的大权，扭转大局，非张军长不可。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归罪他一个人。”

王永江站起来说：“近来大帅操劳过度，应该为国家保重身体，我建议马上休会。”这时张作相、吴俊升二人上前一左一右架着张作霖退席。张作霖边走还边喊：“张学良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这次让贤的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王翔麟)

第四章 少年元戎 折冲樽俎 易帜统一成大统

1928年6月日本军阀原想炸死张作霖、造成混乱局势、乘机进占东北的目的落空，遂改变策略，阴谋诱使张学良维持与国民党政权相对立的局面，使东北成为在日本控制下的独立王国。日本首相田中的特使、中国通林权助为此对张学良摇唇鼓舌，死缠烂打。张学良听后直言道：“你为我想得十分周全，但有一点，你没替我想到。”林权助莫名其妙，张学良正色道：“我是一个中国人！”……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张学良成了交战双方——蒋介石和由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组成的“政治联合体”——拼命争夺的对象。张学良的举手投足，决定了双方战事的胜负和个人政治前途的走向……面对内外交困的错综复杂局势，张学良先于1928年12月宣布易帜，后于1930年9月，发表通电，拥护中央……张学良每一次重大政治决定的动机只有一个：惟有一个大一统的中国，才能使祖国自立于民族之林、人民免于战火涂炭！张学良就是张学良，和寻常意义上的军阀相比，有霄泥之别……

一 东瀛野心

1928年6月日本军阀用野蛮手段炸死张作霖，原来是想造成混乱局势，混水摸鱼，乘机进占东北，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它就改变策略，用拉拢的手段来鼓动张学良，阴谋诱使东北集团维持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局面，使东北成为一个在日本控制之下的独立王国，以实现其分化中国、宰割中国的阴谋。在张作霖被炸死后一个多月，东北当局宣布治丧的时候，日本政府特派林权助为吊唁专使来奉天致祭。林权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的公使，日本派这样一个人物来做吊唁专使，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个阴谋。

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林久治郎把这个消息通知我们后，我即和张商量招待林权助的日程。当时张学良不愿与日本人多所应酬，所以在我们安排的招待日程中，张学良出席宴会的次数很少。其中一次是林久治郎在日本总领事馆设宴招待，中国方面出席的只有张学良和我，日本方面出席的也不过七八个人。宴后举行会谈，日本方面参加的为林权助、林久治郎、河野领事，还有另一个日本领事（记不清名字），由我任翻译。

林权助在这次会谈中正式提出了反对东北易帜的问题。会谈开始后，首先由林权助说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地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

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打算。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他的意见告诉我们。”张学良当时的答话非常得体，大意是说：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从这开头，双方就各持己见争论起来。争论到了最激烈的时候，林久治郎竟然指手画脚，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我也照着林久治郎的语气，大声翻译给张学良说：“他以命令式的口吻说，不准你挂旗。”张学良听了勃然变色，说：“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林权助又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惟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林权助接着又说：“你说你还没有和他们来往，那很好，希望你不要急于和他们来往。”张学良这时态度也缓和下来，说：“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这次会谈连同吃饭时间在内，共历四个多小时，夜10时半始散，临散时新闻记者曾摄影数幅（我还保存一份）。后来外边有张学良答应日本在三个月内不挂旗的说法，显系以讹传讹的谣言。

张作霖出殡后不久，林久治郎总领事要回国述职，张学良在大帅府设便宴为他饯行。饭后张和林久治郎举行会谈，由陶尚铭任翻译，我在场作陪。林久治郎提出一个新问题，他说：“我们日满关系这样的密切，可是现在还有些人为的障碍阻挠我们的亲善发展，那就是：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享有居住权。日本政府为率先表示对张将军的好意起见，愿意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倘若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内地有居住权的话。”张学良听了这些话，没加思索，就连声答应说：“好，好！我们可以这样办。”我急忙从旁插嘴说：“就是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吗？那么租界和附属地、商埠地的呢？”当时林总领事也没答复我的话，张学良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和林总领事说的是日本话。

林总领事走后已经很晚了，我就跟着张学良到他的卧室，和他说：“你和林总领事刚才说的话，找的麻烦可不小。他想拿一根针来换你的一头牛，你怎么能随便答应他呢？他回国向日本内阁一报告，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张学良说：“取消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呀！”我告诉他说：“林总领事所说的取消领事裁判权，是在东北内地根本不存在的领事裁判权。因为日本人在东北内地和非商埠地的商租权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绝对租不到房子，所以他们就不能、同时条约也不允许他们在内地居住。没有日本人居住的内地，哪来的领事裁判权呢？倘若你允许他们有内地居住权，他们就可以买地押地，倚仗日本政府的势力，那还得了！他若是将租界、附属地、商埠地的领事裁判权取消的话，那自然是可以答应的。”张学良说：“那怎么办呢？我

答应他的话已说出来了。”我建议请他写封亲笔信，就说今晚谈话很重要，惟恐翻译有差错，所以将谈话扼要告诉他，以免误会。张学良同意这个意见，并叫我立即起草底稿，我就在他的卧室外屋将稿拟好。这时已近午夜，我敲门请他出来亲笔书写，叩门很久，没有应声。我正疑惑间，于凤至夫人出来说：“他疲倦极了，有事明天再说吧。”我说：“不行，明早林总领事就走了，今晚非将这信写好不可。”张学良那个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还是勉强将信写好交给我。我拿信回家，已过午夜。次早我即将信交与林久治郎，并陪他上车站送行。林久治郎和我说：“翻译并没有错误，因为我们河野领事听得很清楚。不过这事也很关重要，张学良将军既然有亲笔信，我们只有以信为凭了。”并笑着对我说：“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谈谈，我们对阁下的意见非特别重视不可。”

当天下午，张学良即用火急电话召见我，见面头一句话就问我将他的亲笔信拿回来了没有。我将林总领事的谈话详情报告给他，他还是叫我将他的亲笔信要回。我问他是对信的内容有不同意的地方，还是反悔不该写这封信。他说，全不是，就是不愿意将亲笔信留给日本人。我只得打电报到朝鲜汉城车站投交林总领事，请他将信阅毕掷还。林久治郎当即回电说，俟到东京，信用毕后即邮还。我将林的电报拿给张学良看，他一笑就了事了。那个时候，我们全是年轻人，因为我逼他午夜写信，他就给我出出难题，叫我出点冷汗。从此以后，他每逢会见重要的外国人，会后常常问我：“我今天说的话，有什么错的地方没有？”我也每次都是忠心耿耿地竭诚以对。

三

在东北尚未正式挂起青天白日旗前，日本昭和天皇举行即位

大典，各国都派遣专使前往祝贺，东北政权当然不能例外，所以张学良就派莫德惠和我为正副专使前往祝贺。我们带了贵重礼品，偕同秘书蔡公智、科长安祥径赴东京，在东京与各方应酬了一个礼拜，然后到京都正式参加典礼，因为典礼是在京都举行的。原来明治迁都东京时，曾亲自允许京都作为陪都，并且规定国家大典必须在京都举行。我们一行在东京就受到了日本方面的隆重招待，特别是满铁对我们的招待更是无微不至。那时我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和我们虽然有来往，可是日本人对他却甚冷淡，例如大臣们请我们吃饭，从不请汪公使参加。

我们在东京的时候，日本外务省就和我们约定说，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希望在京都和我们举行一次恳谈。我们到了京都第二天，晚上6时田中义一邀莫德惠和我在他的官邸便餐会谈。会谈只有我们三人，因为莫德惠不懂日本话，并且他要我不必当场翻译，事后告知他即可，所以实际上就是我和田中义一两个人的对谈。我们的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具体的铁路交涉，谈到日本和东北的政治关系，以及国际局势，张学良将军的地位等等，谈了四个多钟头。详细内容我当然不能全部记忆，但是关于谈话的重点，因为印象很深，所以虽然事隔多年，还能记忆犹新。例如：关于东北的地位与张学良将军的前途问题，田中说了很长一段话企图说服我。他说：“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四省，幅员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物产、气候也都比德、法两国不差。从各方面看，满洲都比我们日本得天独厚。张将军掌握政权以来，也很得到你们这帮人的辅助，政绩日见显著，真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了。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张将军的雄图壮志怎么样。张将军是想投靠蒋介石，归顺国民政府，做一个地方政府的高官呢？还是想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呢？我们日本政府当然赞成张将军能



张学良（张群右侧）到南京谒蒋介石时，蒋的代表张群（戴礼帽者）到码头欢迎。（1930年）

够抒发宏伟大志，采取后一种办法，并且我可负全责声明，我们将全力支持他的这种事业。当然啦，张将军也许会说，我受日本政府支持的事业，我们的老百姓是不会赞成的，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明白地请你转告张将军让他放心，我们绝不叫他为难，我们绝不向他要求什么新的权利，甚至我们还可将旧的权益拿出一部分来让我们共同享有，作为亲善的表示。”我插一句话问他所指的这些权益是什么，他说：“比如说，在南满铁路公司里，我们可以设几个中国理事，”同时他着重说：“当然，这是随便举的例子。”接着他又说：“王先生，你呢？你是一个年轻有识、大有前途的政治家，你不愿意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当一个开国元勋吗？难道你就心安理得地永远做一个地方官的助手吗？他还说了好些和解的和两国应该如何亲善的话，但是同时他也作了不少威



秘的态度，我简直猜不到他所说的“内部人事变动”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由大帅府出来，就到辽宁省政府找翟文选省长。不料翟文选这时正为省政府内部的人事问题纠缠不清，所以所问非所答，我不得要领而回。

这里顺便提一下辽宁省政府内部的人事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东北新旧两代的人事纠纷和斗争，也可以看出张学良的用人原则。

原来张学良和翟文选并没有什么个人间的亲密渊源。翟文选是吉林省双城县人，前清举人，旧国会议员，做过多年东北盐运使，论岁数、论行辈，是属于张作霖时代的人。在盐运使任内，翟有刚直廉洁的声名。张学良掌握政权之初，求治求贤的心非常殷切，又鉴于张作霖对王永江知人善用的先例，所以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就请翟文选当了省长。但是组成省政府的有力的厅、处长却都是追随张学良多年的三、四方面军团的人，如财政厅长张振鹭、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官银钱号总办鲁穆庭等。这



张学良（前左）和蒋介石（前右）在中山陵。（1930年）

些人觉得天下是他们打出来的，翟文选既不是他们圈内的人，又不是辽宁人，怎能高高地在他们的上边呢？其中尤以张振鹭为最跋扈，他常常连吵带骂地说：“真看我们奉天没有人，叫翟大麻子来做我们奉天的省长。”因为这个缘故，省政府内部人事纠纷闹得很厉害。当我向翟文选谈到“内部人事变动问题”时，他就把这问题引到自己身上来，说：“有什么内部人事变动能引起外交上的问题呢？反正我是干不了啦！这些不学无术的小子简直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太欺负我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大约三四点钟的时候，我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侍者来告我说：“大帅府来电话说，总司令请您就去”，我一面叫侍者打电话要汽车（我用的汽车一向放在大帅府车库），一面起床穿衣；同时又在想：“一定又是打了一宿牌，散局后忽然想起什么事来叫我去；也许等我到大帅府，他已经睡熟了。”所以我没有慌张，慢慢地盥洗完毕，等我出门上汽车时，东方已经发白了。

车一开出大门，司机何润德告诉我说：“昨晚半夜，把杨督办、常省长的汽车扣住了。”我没有吱声，因为我没有理会到他说活的意思。等车进小西门时，差不多有一排人在警卫着，并检查出人的汽车，我这才感觉一定出了什么事了。这时何润德又告诉我说：“昨晚杨督办、常省长的汽车被扣后，他们俩就没有出来。”我这才联想起日本人一向的挑拨离间和造谣生事，这两个人一定被扣押了。

当我进大帅府一楼大厅时，看见站在西屋门口的孙传芳向我摆手，好像不要我进东屋似的。东屋是经常接待客人的老虎客厅（因为有两只老虎标本陈列在室内）。我正在犹豫间，张学良从西屋门口探出头来，说：“好，你进屋来！”我进屋一看，满屋子的人，东北首脑人物如张作相、翟文选、万福麟、王树翰、王树

常、袁金铠、莫德惠、刘哲、臧式毅、孙传芳等全在场。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差不多全到了。张学良把我招呼到里间屋内对我说：“你到郑秘书长那儿去看看他们拟的电报，回头可以向外交方面将这件事解释清楚。”

郑谦秘书长正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和刘鸣九处长心惊胆战地草拟一件电报，尚未草拟完毕。我在一旁阅读，那电报很长，列举杨、常怎样吞扣军饷，怎样任用私人，怎样贻误戎机，怎样图谋不轨等等几大罪状。后来我看到“正法”两字，不觉大吃一惊，说：“怎么？正法啦？”郑老先生说：“两个尸首还在老虎客厅里呢！”我这才恍然大悟是怎么回事。

我没看完电报（他们还没有把电报拟好），就到日本总领事馆去了。林久治郎总领事才起床，他接见我，说：“我知道您这么早来，一定有要紧的事。”我把杨宇霆、常荫槐二人如何图谋不轨、发动叛变的事告诉了他，并且说：“幸亏我方及时发觉，当场捕获，沈阳未蒙灾祸，实是万幸。两个罪犯已就地枪决。”林久治郎听了这消息，一面甚为惊讶，一面感谢我及时将这正确的消息告知他，使他可以及时电告外务省，以免为一些新闻消息所混扰。我离开日本领事馆后，本拟再到英国和苏联两领事馆去解释一番。但我转念一想，还是不去的好。因为向日本解释是迫不得已，日本在东北有偌大的势力，若不买它的账，有时就吃眼前亏。昨天张学良那种谨慎持重、迟疑不决的态度，以及他所谓的外交上的关系，主要的恐怕也是指的日本。至于英、苏两国，就没有必要将纯属我们内政的事向他们去解释。所以我由日本领事馆出来，就径回大帅府复命。

当我走到大楼正厅前的台阶时，正值人们将地毯包裹着的杨、常的尸首分别由老虎客厅抬出来。西客厅的人已经全散了。走进里间屋的门口时，张学良突然由一张小床上跳下地来，说：

“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唉！树人（我的别号），咱们可得真正好好地干啦！若不然，那太对不起凌阁（杨号）、翰香（常号）在地下了。”我把去日本领事馆的情形和没有去英、苏两领事馆的原因报告给他。他没有说什么，又上床躺下了。于是我又说：“您好好休息吧！不过这样突然的大事，人心总难免浮动，特别是杨、常两个家族一定很恐慌。基于罪不及妻孥的原则，您是不是可以对这两个家族设法安慰一下？”张学良听了这话后，又腾地跳下床来，高声叫道：“叫刘统带来！”刘多荃刚一进屋，他就说：“你赶块去慰问杨大嫂、常大嫂，各送慰问费1万元。”

过了没有几天，张学良拿出一大堆材料，全是明信片大小的照相卡片，叫我审查，并对我说：“这些东西，我花了不少钱才弄到手的，你要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照相卡片，大约有一二百张，我拿到家里，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明白上面写的是些什么。我仔细看了十几张后，才明白这就是杨、常罪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一多半是日本车站附属地警察署的情报，一部分是日本特务机关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是日本人用5元至50元的现金从一帮专门贩卖情报的中国人手里收买来的，当然也有专门人员搜集的东西，不过很少。日本人又将这些没有什么价值的情报，故作神秘地照了相，再卖给中国人，内容全是些似是而非的日常琐事：如某某人到杨公馆密谈了两个钟头，杨家的私人某和常家的私人某为了避免外人的耳目，在一家小饭馆密谈许久，等等。还有些无中生有的事，如说杨为解决常组织的省保安队2万人的武器，不惜叫兵工厂工人加班加点等（杨时兼任东北兵工厂督办，谁都知道，东北兵工厂工人有一两万人，从没有加班加点的事）。我费了好几天的工夫，看完了这些材料，真叫我又气又恨。恨的是这些日本人随意欺弄中国人，气的是中国人太没有志气，甘受日本人的愚弄。我很坦率地将我的看法和我的意见向张学良说了。他

没有说什么，只是把那一堆材料往旁边一扔，说道：“事情已经过去了，算了吧！”

现在我再谈谈当时我对于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的观察和感想。

1928年我们从关内回到沈阳不久，有一次张学良对我说：“杨督办常说你的坏话，你和他熟吗？”我答说：“不熟，仅见过一两次。”我当时认为这是赵欣伯等挑拨所致，亦是政界常事。从此我亦很少和杨宇霆接近，仅有一次和他长谈过。那次他说的话比较多，涉及到东北政治的趋势、对日外交的重要性以及对张学良的评论。他的整个谈话给我的印象是：这个人精力充沛，自视甚高，对张表示亲切，但带有轻视的口吻，认为张只不过是一个好玩的公子哥儿罢了。可是他对东北政治与日本问题的分析还是很透彻的，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这期间，日本顾问们，特别是土肥原贤二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等对杨宇霆不断加以诽谤。我每次听到这些攻击，就有一种“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感觉，认为日本人总是故意挑拨离间我们内部的关系。因此，我就从来没有把这些不利于杨宇霆的言论告诉过张学良。张偶尔和我说起日本人对杨的评论时，我总是劝他不要鼓励外国人干涉中国的内政。

在张作霖时代，杨宇霆是张作霖的左右手之一，叱咤风云，盛极一时，驰骋中原，曾做过江苏督军，是张作霖的言听计从的总参谋。在那时候，他已与郭松龄结下了不解的仇恨。迄郭松龄叛变失败后，三、四方面军团的人（军团长是张学良，实权完全操在副军团长郭松龄^①手中）便以张学良为中心，执掌了东北的

^① 《东北大事记》（《吉林文史资料》第七辑）记载：郭松龄倒戈反奉时任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兼第十军军长。——编者

政权。这些人觉得郭松龄叛变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倒杨宇霆。现在郭松龄虽然死了，不过张当了权，目的也算达到了。但是，为了替郭松龄报仇，他们对杨宇霆怎能善罢甘休呢？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倘若能够认清局势，韬光养晦，或许不致演成如此惨局。可是杨宇霆不但不自收敛，反而比张作霖在世时更显得目中无人，飞扬跋扈，自炫聪明，乱出主意，借作寿炫耀他的势力在东北比任何人都大，对张学良俨然以监护人自居。不在他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也强作主张。例如东北换旗事，主要是由张学良和蒋介石方面接洽的结果，可是杨宇霖同时又与桂系李、白有所勾搭。他与人谈话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好像他是东北惟一的主人似的。这些都是张学良最难忍受的地方。实际上，在当时东北已有不少人趋附于杨的门下了（我这里所说的不少人指的是文人，即所谓政治活动家，至于军事方面，杨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力量）。

常荫槐是杨宇霆的私党。在张作霖被炸、东北军撤退到北京的时候，张学良是殿军，最后撤退的。当张的撤退列车经过各火车站时，所有车站的水塔都被常所属的交通部队炸毁一空。当时三、四方面军团的人们，对此恨之人骨。可是张学良在东北执政时，仍给常以黑龙江省省长的重任。这说明，张不以私人恩怨而忘公，渴望将东北的事情办好。因为常荫槐当时在东北人的心目中是最有本领的干才之一。他的为人虽然有些粗野，学识也不见得怎样高明，但是办起事来，精明强干，魄力很大。打通铁路（从打虎山到通辽）就是由他负责，在日本人不知不觉中迅速修筑成功的。北宁铁路（北京到沈阳）也是经他的手整顿成为中国的模范铁路之一。他在黑龙江省省长任内，也能大刀阔斧，励精图治，可惜时间不长，尚未作出显著的成绩。他的缺点也和杨宇霆有相似之处，自负甚高，目中无人，对张学良都满不在乎，其

余当然不在话下了。

当我知道杨、常两人在老虎客厅里当场被张学良的心腹五六人击毙时，我马上感觉，这是张学良自毁长城，中了敌人之计了。同时又特别感到刺激的是，张学良的这种行动还是中世纪争夺政权的喋血亲友的表演。依我当时的书生之见，认为最好的处置方法，是将二人免去一切职务，让他们以在野的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在国外或在中国内地休息，等我张学良干不好的时候，你们再来。次一点的处置方法是：将他们看管起来，肃清他们在当时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最坏的处置方法才是将他们处决。但是我的这些想法，被杨、常事件以后的一些实际政治生活证明不一定是符合实际的。因为自杨、常二人以叛变罪伏法后，东北的政治空气为之一变，张学良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事无掣肘，人心统一，充分发挥了人治的效果。这时我才想起他向我说的“以后我们若不好好地干，那真对不起凌阁与翰香于地下了”这句话的深刻意义。我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和苦恼的，若不下此决心，那就是让卧榻之侧，任凭他人鼾睡。东北政局既不能定于一，就不能不政出多门，人心散漫，意志又怎能统一，政权又怎能巩固呢？但是当他下此决心时，多年袍泽，又哪能不为情感所扰呢？他的那种沉重、苦恼、复杂而矛盾的心情，就只好寄托在那块袁头银元上了。

据说张学良在下决心杀杨、常之前，曾踌躇再四不决，最后在一天夜里，曾用一块袁头银元占卜。在占卜时，他曾默祷天地神灵显示，假如杨、常可杀，银元的袁头面向上；假如杨、常不可杀，银元的袁头面向下。张祷毕，用手将银元扔向空中，很偶然地扔了三次，银元落地时面都向上。张因此乃下定决心杀杨、常。及至杀了杨、常以后，一切顺利，张于是将那块银元妥藏在保险柜中，以作纪念。这就是日军在“九一八”时在他卧室的保



蒋介石在私邸接见张学良。图为接见时合影，从左至右：张学良、宋霭龄、于凤至、宋美龄、蒋介石。（1930年）
险柜中所发现的那块银元。

收买日本政友本党

张学良回到东北执掌政权一年多以来，对日本一些主要交涉，如对皇姑屯炸车案的追究责任问题、东北换旗问题、吉会铁路草约交涉问题、撤换日本顾问问题等，大抵已经结束或告一段落。这时东北与日本的关系正是比较正常平静、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张觉得很得意，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咱们年轻的人干得也不错啊！他们还很佩服我们哩！”

1929年晚夏初秋的时候，有两个日本众议院代议士拿着介绍信来沈阳找我，介绍信上说他们两位是来东北考察和观光的，愿意和我谈谈。这两个代议士，一个姓赤冢（名字忘了），以前做过驻沈阳总领事，也做过张作霖的顾问；另一个姓鹤见（名字忘了），是律师出身。二人全是属于政友本党的议员，政友本党

是由政友会分化出来的、以正统派床次竹二郎为中心组织的一个新的党派。床次竹二郎原来是日本第一次政党内阁，即所谓平民宰相、政友会总裁原敬内阁（1919—1921年）的内务大臣，为当时政友会的第二号头目，人极能干，有铁腕之称。原敬被刺身死后，国内外的形势，对于日本这个保守性很浓厚的政党——政友会很不利，在野时间稍长一点，人心就显得涣散。他们于穷极无聊之余，请出军阀田中义一大将做总裁，又重掌政权。不料田中暴死，民政党滨口登台，政友会又离开政权了。一个以争权夺利为目的的集团，一旦离开了政权，最容易闹家务，政友本党的出现就是这样的产物。

1928年年底，床次本人携同秘书曾来东北考察，当时我们盛情地招待过他。他年逾七旬，精神还很焕发，议论风生，颇有政治家风度。这次他的两个心腹赤冢、鹤见来沈阳，当然不是像表面上所说的那样，是来东北观光游玩的。我和他们接谈一次后，就知道他们是抱有特殊目的来的。据他们说，日本在这次选举中（日本第十七次大选已决定在1930年2月间举行），无论从人心背向上说，或从人物的号召力上说，都是非政友本党莫属了，并举了好些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选举经费问题。因为他们是新成立的政党，没有什么准备，所以经费特别感到困难。两个人又互相吹嘘一番，鹤见说：“赤冢先生在东北多年，不但做过总领事，并且深得张作霖阁下信任，做他的顾问很久，东北简直是他的第二故乡。我党一旦掌握政权，日本对东北的事只有依靠他了。”赤冢也说：“鹤见先生是我们党里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我们党掌握政权的时候，他当然是大臣级的人物呀！”两个人又吐露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筹集选举经费而来的。我对当时日本政党的情形还比较熟悉，觉得他们的谈话有些夸张。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们是自告

奋勇来满洲找选举费的呢，还是奉了政友本党干事会干事长的命来的呢，还是受了床次本人的委托来的呢？”经我这一问，他们的态度显然严肃多了。他们肯定地表示：他们是受床次本人的委托，并且干事长也同意这样做的。换句话说，他们是代表政友本党来筹集选举经费的。于是我就说：“承政友本党和床次先生看得起我们，愿意和我们合作，那么肯定彼此能够对双方都有利益的事，作出各自的贡献。我愿意先代表张学良将军将这一点肯定下来。”

我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报告给张学良，得到了他的许可，就和他们两人商量细节。他们说：这次选举只要能将政友本党系统的人选出 90 人，床次先生就可以组阁，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元（日金）。他们希望我们能担负三分之一（折合中国钱为 150 万至 200 万元之谱）。我就提出：若是床次组了阁，日本在东北保有的不合理的特权，如在商埠地及南满铁路附属地所设的警察，应该合理地另行规定有限制的职权等。他们于是说：那么主要的条件是，日本应允许将南满铁道公司逐渐改为名实相符的中日合办公司，像中东铁路公司（中苏在北满合办的铁路公司）那样。我们双方并约定：在日本大选以前，我到日本面见床次恳谈一次；不过我和床次见面不能在东京，恐怕为人注目，必须在日本的某处温泉或休养地邂逅相遇才好。

我将这些商谈的结果报告给张学良后，他很兴奋地说：“多少钱都可以，不用说 200 万，就是再多也可以。”我说：“我的意思是先给他们 50 万元，等我见了床次以后再说。因为床次所领导的政友本党在日本的声望，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大。当然，我们能和日本的一个政党挂上钩，就是它现在拿不到政权，也划算得来。”张学良同意我这种谨慎的做法，并且决定由我亲手先交给他们 50 万元，用现款而不用支票，以免发生意外波折。

我在张学良处拿了由他签字的领款条子，便到官银钱号去取款。官银钱号没有那么多现票（因为沈阳通用奉票，现大洋兑换券有时缺乏），我又找官银钱号总办鲁穆庭帮忙。这位谨慎的总办觉得我用款太多，不愿意一次付清，我又不便向他说明这笔款项的用途，几费周折，才将现款领出。不知道官银钱号是否与我故意为难，付款全是五元以下的小票，50万元整整装了两大柳条包。我将这笔现款交给赤冢、鹤见二人，他们也无法清点，就给我写了一张收据了结。

赤冢与鹤见和我将密契商洽妥当后，二人就携款归国。我和他们约定：我们提出的要求需要床次先行批准，并确定我和床次见面的日期，因此他们二人之中必须有一人在最近期间再来东北一趟。他们这次在东北期间并未与张学良见面，原因是他们非常谨慎，怕为人所注目。

他们返国，不过两个多星期，鹤见就又回来了。我们商定的条件，已由床次批准，床次并约定我在日本大选前去日本某处温泉与他会面。这一次鹤见和他的夫人同来，在沈阳住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过从也比较频繁。他透露了他希望和我合伙做大豆生意的想法，我婉辞谢绝了他，但对他说明，倘若他能在日本议会里对我们特别帮忙，我们当然可以对他个人事业给以帮助。他欣然答应了。

这年年底我和张学良作了详细的商讨，带了充足的现款，第三次（从我随同张学良回到东北后）踏上去日本的征途。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到日本的旅行。我这次去日本因为有以往的经验，行动比较谨慎，在人日本国第一个港口下关时，就避开了新闻记者们的纠缠，一直坐火车到那个指定的温泉休养地（名字忘了，是在下关与东京之间离开铁路不太远的地方，不是一个很出名的温泉）。我在温泉旅馆休息一宿，第二天就找到了床次的住址，由

旅馆的人代为联系，约定了会见的时间。

床次由于被汽车撞伤，在这儿养病已经很多日子了。我和他见面时，他像会见了多年的朋友似的，很热烈地欢迎我。他很自豪地说，他虽已70多岁，伤口缝线好得非常快，医生都觉得吃惊。他暗示他的政治生活前途还很远大呢！他谈到赤冢和鹤见由满洲回来传达的我们的盛情和意见时，表示了感谢之意。他以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政治纲领能吸引海外人士的共鸣和赞助而感到自豪。我们畅谈了好几个钟头。他这次给我的印象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了。当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他正是原敬平民宰相的内务大臣，我觉得他能干、正派，有进步的思想。他前次到东北访问的时候，我和他虽然没有多大的接触，但是仍然觉得他的气度不错。这次和他长谈了以后，我才感觉他已经落后了。在政治上，他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并不能代表日本的进步力量。他所纠合的一帮人，是一些典型的官僚政客。而他所津津乐道的，也不过是夸耀其过去罢了。所以我这一次来日本的目的——帮助政友本党选举，由于和他这次的谈话，失去了不少的信心。我在温泉只住了两三天就上东京了。

到东京，正是大选竞选开始的前夕，人们和报纸上都在谈论着选举的事。我访问了几个熟人，并和我的驻东京办事人研究了一番日本的政局。我的驻东京办事人也认为政友本党这次很少获胜的机会，不过保守势力可能占上风。倘若是那样，床次可能分得大臣一席。我的这位办事人的判断还没有大错。不过这次选举是民政党获胜，若槻登台。经过一年多的挣扎，政党内阁就全部垮台了。组织官僚联合内阁时，床次得到了递信省大臣一席。

当时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支持以床次为首的日本政友本党的竞选，虽然是一种秘密外交，也可以说是互相勾结利用，但是，对于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由于当时中日关系的复杂，我们

在商谈过程中都采取了极端慎重的态度。谁也没有料到这张由赤冢和鹤见具名的 50 万元的收据，后来会在日本政治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在张学良的卧室的保险柜中发现了这张收据。1934 年，日本法西斯军人荒木曾以这张收据来反对冈田内阁，同时并以叛国罪嫌疑犯将赤冢和鹤见两个代议士扣押起来，并涉及到当时递信省大臣床次竹二郎和政友本党。日本报纸曾公开揭露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床次病故，政友本党亦消声匿迹了。

(王家楨)

三 政见分歧

1928 年 6 月，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组织的北京军政府宣告结束了，东北军陆续撤退至关外。当时的军阀政客如孙传芳、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都在奉天。而以作过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最为张学良将军所礼遇，帅府（张学良住宅）内设有孙联帅办公室，位列上宾。与张过从甚密。此时我由日本留学回国不久，充张学良将军随从医生。一日，张令我暂随孙联帅服务，我即随孙到其官邸。孙住在商埠地齐宅，为一所二楼西式房，我的住室与孙相对。从此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我又作了孙的随从医生。

在奉天时的地位

孙在奉天，每日赴帅府办公，像张学良将军的一位贵宾，又像高等顾问。他们两人很亲近，由军事、政治以至家庭琐事，无话不谈。当杨宇霆指挥军队驻守榆关、昌黎一带时，孙曾亲至前

方慰问东北军。那次坐的是专车，有米春霖、王烈诸人同行。我私问孙到前方去做什么。他说：“你们总司令对杨宇霆不大相信，不知他在前方搞什么名堂，让我去看看。”及至前方军事结束，杨宇霆回奉天后，孙白天仍到帅府，夜间多赴杨宅与杨周旋。但他向不访晤别人，即万福麟来谒，亦未回拜。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一日，孙对我说：“现在要成立一个屯垦委员会，由我主办。”并说：“希望你去当兼任秘书。”我当即婉辞。此时孙很高兴。但这个委员会筹备不久，又发表邹作华为“兴安区屯垦督办”，他的梦想不过昙花一现而已。

有一次，我们一同到杨宅，刚坐下，杨宇霆说：“阿斗为何还不见来？”少顷，张学良将军亦到。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每晚均到杨宅，与杨极力周旋。在归途中，我问孙：“阿斗是谁？”孙笑答：“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们总司令。”我说：“为什么这样称呼？”孙说：“他一向是这样说法。”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默然不语。

出走大连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伏诛。翌晨孙仓皇出走大连。10日晚上，我回家住宿，11日早4时许，孙忽派车来接。我到孙宅后，见孙衣冠楚楚，立在寝室外间的小客厅里，不觉惊奇，问他说：“联帅还没睡吗？”他说：“我适由帅府回来，你知道这件事么？”我实际并不知道，顺口答曰“知道”。孙说：“汉帅（指张学良）英明，做一番事业，不杀几个人还能镇压得住么？”我即问：“几个？”他说：“只两个。”我又顺口说：“我听说是四个。”他说：“只杨、常二人而已。”在他未说出人名之前，我已想到一定有杨宇霆，因为他太专横太骄傲了。我又问他赴帅

府的经过。他说：“昨晚我被邀至帅府，汉帅一见我就说：‘馨远（孙字），我又放了一炮。’我问他什么事。他说：‘麟阁和翰香被我处决了。’我即时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一番大事业，不杀几个人还行么？杀得好！’以后我们便商量怎样宣布他两人的罪状和向南京发电的措词。”继而孙又向我说：“杨宇霆取死有道，他与汉帅的关系，究竟是君臣，还是朋友。如果是君臣，就应该北面而朝之，以部下自居；如果是朋友，就应该洁身隐退，仅备咨询。而他现在要居于汉帅之上，事事过问，甚至对汉帅发号施令多所阻碍，真是古今中外所少有的，怎能不死。”他引经据典讲了一大篇道理。最后说：“东北局势已定，我一定帮助汉帅做一番事业。”他议论风生，滔滔不绝，直谈到早8时。他嘱我上班，我也劝他休息，乃散。

我上班后，总觉心中有事，匆匆料理一些处务，于11时回到孙宅，见楼下物品似有移动模样。急问究竟，始知孙已搭9时火车赴大连。但他的家眷未走，遂上楼见孙太太。她说：“大连方面（指孙的另一位夫人）来电说，患病甚重，联帅到大连看她去了。”我才恍然大悟，孙之所以催我上班，不令我回室小睡者，原来为此。我出孙宅即到帅府，向张学良将军报告一切。张乍听之下，诧异地说：“他没有什么呀，何故走去？”又问：“他的家眷呢？”我说：“没有走。”张绕室沉思少顷，忽抬头问我说：“你看呢？”我说：“孙白天到府里来，晚间到杨宅去，他认为东北只有两个人，要两面交好，旁的我没有看到。但是，他不能不多心啊！”最的，我问张：“我是否由孙宅搬出来？”张说：“还照旧住在那里。”

一封来信

孙出走之第三日，我接到他由大连寄来的一封信，并附给张

学良将军的信。给张的信寥寥数语，大意是：“因为内子患肺病，咯血甚重，来连一视，匆匆未及走辞。好在连、沈相距咫尺，朝发夕至，如有见召，随时可以回沈。”但给我的信长达千言，详述离沈原因，主要词句有：“我对于东北，无尺寸之功，而位居诸大老之上，平时无事尚人言啧啧，而况此次杨、常事件之发生！我来东北后，本想在军事方面对汉帅有所匡助，但形势有所不能；又想在政治方面能有所贡献，而情况亦所不许。最后想在实业方面略尽绵薄，亦未能做到。长此下去，对于汉帅毫无裨益，对于我身边危险实大。此兄之所以不能不离沈也。”这充分说明他离沈是不想再回来的，也可以看出他出走的主要原因。我即时把这两封信送交张学良将军，并说明孙给他的信是寒暄，给我的信才是真情实话。

翌日，孙太太忽对我说：“你们总司令还通缉联帅么？”我说，“何以知之？”她说，“你看看这张报纸。”我接过《盛京时报》，看到东北当局通缉孙传芳的消息。我遂即向她解释，“张将军与联帅友谊极笃，绝无其事。这是日本报纸造谣中伤，万不可信。”她仍有怀疑，要我同她去见警务处长高纪毅询明真相。我陪同她到高宅时，适高处长外出，由高太太再一次说明，报载纯属子虚，绝无其事。孙太太这才稍为安定。可是数日后她对我说，要全家去大连。我得到张学良将军的同意，送她们至车站，并由张将军派人给她们买好车票。从此，孙传芳结束了在沈阳的政治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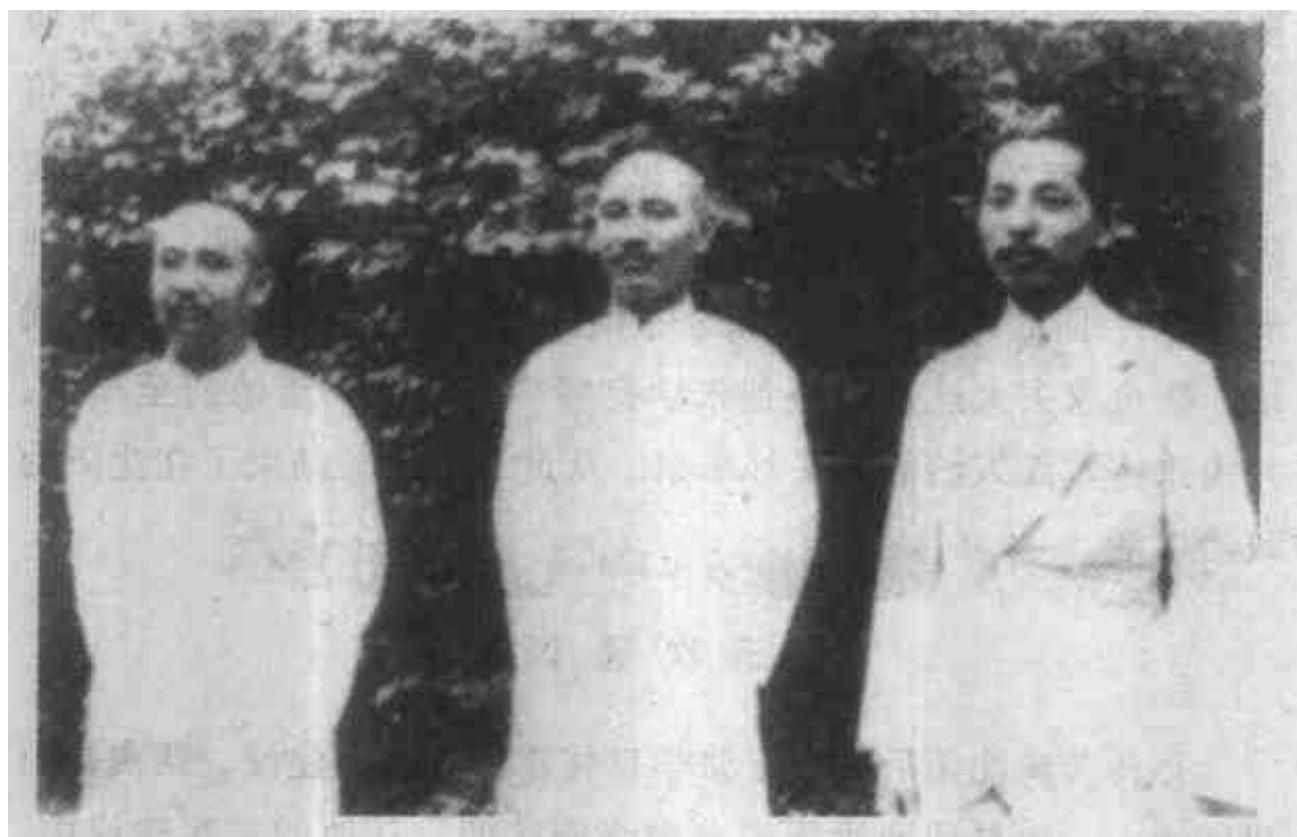
三 次 建 议

孙传芳离沈阳后，对于张学良将军曾有三建议，两次是由我转达，一次是他到沈阳亲自向张面述的。从他的三次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张学良将军的路线是完全相反的。政治主

张上的分歧才是他离沈的根本原因。

1929年，孙的长子家震在大连结婚，我去祝贺。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孙对我说了以下的话，嘱我回沈转达于张学良将军。他说：“东北处于日、俄两大国之间，外交方面极为重要。为东北计，必须亲日联俄，方能图存。稍一不慎，外患立至。汉帅只注意国内而疏于对外，危机已伏。我自到大连以来，与各方面接触，深为忧虑。现在日本蠢蠢欲动，不可不早为之计。至于对内，东北远处边陲，在地理上占有利条件，把山海关一守，其他无庸顾虑。对于南京方面，只要不即不离，虚与委蛇，亦足以应付裕如。”我回沈后，把他的的话向张将军一一转述。

1930年，当汪、阎、冯组织所谓北京国民政府时，孙亲至沈阳，住日本站大和旅馆，曾约我去谈话。他说：“现在内地局势已有变化，汪、阎、冯在北京组织政府，对抗蒋介石，东北应该早定大计，参加北京方面一致反蒋。我决定进关襄助，特为此



张学良（右）和蒋介石（中）、阎锡山（左）在北平外交大楼前。

事来沈与汉帅一谈。”恰在此时，我从《盛京时报》上见到一个简单启事，大意说：兰姊妆奁已筹备就绪，出嫁有期，特此通告亲友。我当时认为这个启事有些古怪，与孙的出山不无关系。这时孙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东山再起，逐鹿中原，不料他又失败了。东北军不但不参加汪、阎、冯所组织的北京政府，反而进兵关内，一蹴之下，使北京国民政府土崩瓦解。事后我知道，孙确曾进关参加了这个组织。怎奈昙花一现，又成泡影。

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我当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医务处长，随着公署撤退至锦县。因为在沈阳的卫生材料库沦于敌手，全军的药品器材补给顿成问题，乃赴天津设置卫生材料厂，乘便赴英租界去看孙传芳（事变后他迁至天津）。寒暄毕，他慨然曰：“汉帅不听吾言，果有今日。为今之计，汉帅应速派一位全权代表（敢于负责的人）回沈阳，与日本方面折冲，从速解决争端，然后自己赶回沈阳坐镇，保持东北领土。尽



张学良（前右二）和夫人于凤至（前右三）游览南京金山寺。（1930年）

管在权益方面有所损失，仍可掌握军、政大权，东北仍为中国所有。如果迁延日久，木已成舟，东北将为朝鲜之续，他也无以自处！如果放弃根据地，带几十万军队寄食关内，不但为蒋所不容，亦为地方所不许，那就同我如出一辙。你可去北平，把此意转达于汉帅。”我到北平即把这些话告诉张将军。

两条道路

孙传芳初来东北，与张学良将军过从甚密，终以政见相左，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孙的本心是，陈兵于冀、鲁之间，侧身于张将军左右，内地一有机会，便可借东北之势，率旧有之师，逐鹿中原，仍不失为一路诸侯。所以他主张东北应成一割据形势，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造成一个特殊局面。所谓亲日联俄，实际是投入日本怀抱，以日本为靠山，扼守榆关天险，伺机待变。俟条件成熟，东北军便可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如此，他也可借机再起。他的看法与杨宇霆很接近。杨之为人，野心勃勃，东北军几次进关，皆其策动，固不甘局处一隅。因而孙、杨的关系日益密切。杨宇霆以张作霖的幕僚长身份，以辈自居，对于张学良将军桀骜不驯，孙知之甚详。不意张将军掌握东北政权后，第一件大事，便是突然易帜，拥护中央，完成国家统一。第二件大事便是主张外交由中央主持，地方政府不单独对外，使日本不得逞其挟持伎俩。第三件大事便是处决杨、常，统一内部，放手从事建设。杨、常伏诛，出孙意外。他看到张对于辅佐其父、同自己共事多年的杨、常，竟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加以处决，焉能不大吃一惊。而且杨死后东北与南京合作之形势已成，孙的内心计划皆成泡影。所以，孙仓皇出走，朝不待夕，与其说是怕有牵连，毋宁说是路线不同，留而无益。

（任作楫）

第五章 痛失疆土 骂声鼎沸 血性男儿背罪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他立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共商对策：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援无继，可能全军玉碎，并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为保存实力，张学良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但却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耿耿于怀的张学良为此常对身边的人说：“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但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不过，林肯说过三句话：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张学良祈盼着赎罪那一天的到来……

121

一 痛失疆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我正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

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办公，现将我当时所知关于张学良在事变时的情况，追记于下。

张学良自5月28日起，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治疗，直至9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羸弱，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彼时日本图谋东北的阴谋，已很为显露，其见之于积极行动的，有增兵朝鲜，满洲改置常驻师团，更换南满铁路公司正副总裁与朝鲜总督等等。同时，石友三在华北叛变和阎锡山突然由大连返晋，也都是与日本有勾结的。9月12日，张学良曾接国民政府外交部电，大意谓：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张学良乃急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答复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关于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的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玘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商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不料日本军阀竟不待交涉的解决，突于9月18日的夜间悍然发动进攻。

9月18日夜间，张学良偕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媿小姐正在前外中和剧院^①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今晚10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

^① 罗靖寰《张学良对日本要求修筑敦图路的处理经过》说，是新明戏院。——编者

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持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19日午夜1时许^①，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

19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会议（张学良在沈阳时设有东北外交委员会，顾维钧等人均系该委员会的委员），咨询对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当时发言较多的为顾维钧、汤尔和二人。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

^① 《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还有“十八日夜”一种说法。——编者

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汤尔和说（汤新由日本返回沈阳，于9月11日由沈来平），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正抑制日本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汤又说，币原外相曾经亲自和他谈过，日本如吞并满蒙，实不啻吞了一颗炸弹，我们如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随后，张学良又邀请当时平津的名流李石曾、胡适、吴达淦、周作民、朱启钤、潘复、张志潭、胡惟德、陈策、曹汝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以及东北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27人，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由于这两次会议，张学良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赖国联的思想更深了。在第二次会议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申述关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23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万、鲍二人回平将此意转达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研商大计。于学忠曾经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议，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当时说：“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翥生（荣臻的字）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翌日晚，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谈话，推托说：“因为荣翥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经赶不及照办。我已

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

在这个时候，平市各界人民、东北籍旅平学生以及东北军的中下级官兵，都要求与敌人作战，群情激昂。张学良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们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他又召见东北籍旅平学生会的代表们说：“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二事与同学们相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间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他又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分别讲话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在这时，张学良对于东北的问题，国难家仇，痛苦极深，战乎？和平？矛盾丛生。而在军事上的布置，外须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内又无东北军作战的整个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只有把一切幻想寄托于国际联盟。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对事变的措置情况。

（洪 钊）

二 白山黑水

任人唯贤

张作霖被炸时，我正在中学读书，在思想上认为张学良继承其父张作霖而接管东北是理所当然之事。他接管东北之后，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所采取的方针及其果断措施，如“东北易帜”、“杨常事件”之解决等，都符合当时的社会性质和客观实际要求。历史证明，从此东北军内部矛盾（实质是领导权斗争）已基本解决，使东北有了近三年时间实施革新，并取得一定效果。

张学良将军革新的措施，首先是培养人才和广纳人才。在地方上他创办同泽中学、东北大学，自兼校长。九一八事变后，在关内又成立东北中学。在军事教育方面，1924年起他主办东北讲武堂和东北军官教育班，对其中优秀者还送往日本军官学校深造；为了提高东北军军官文化素质，又招收中学毕业生成立学生队。他把培养人才，重用贤才之事放于首要地位。为了把东北讲武堂军事教育搞好，他还多方搜集人才。仅以录用王以哲为例，以说明之。王是黑龙江宾县人，1922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他满怀爱国之志，拟投效东北军，在沈阳奔走多日，毫无头绪。王以哲则写封自荐信给当时的少帅张学良：“目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举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后，来沈阳投效东北军。经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军纪不整，扰民特甚，为军官者不知其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豕狗。个人固不敢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

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困潦倒于旅途之中，食住皆成问题。望钧座量力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请速赐回音，以绝留恋之念，俾别作打算。”

王以哲以为这种批评性的自荐信，不会有多大希望，正准备行装，投奔他乡。不料当天晚上，张将军即派人来领见。他真没有想到张学良能听逆耳之言，而又如此之快地召见了。将军接见了王以哲之后，当即委王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中尉排长。王上任后尽心竭力，其所带之排，成绩突出，学术科考试成绩为全队之冠。第二期开学，王被提为上尉连长。他被提升如此之快，遭人嫉妒，诬他“标新立异”，对他的严格要求竟诬之为虐待学生。张将军为了查明真相，亲到教导队视察，举行操场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刺杀等测验，王以哲连的学生成绩又为全队之冠。张将军非常高兴，喜得王以哲这样一个干才。在检阅总结大会上，张严厉谴责了诬告王以哲的人，并当着大家的面，把诬告信销毁，鼓励王以哲大胆地努力去干。他说：“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信就是对你的表扬书！”

教导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时值郭松龄反奉，又以教导总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把教导总队三个营编为三个团，王以哲由少校营长提升为上校团长。不久张的卫队旅长姜化南在张家口遇难，张又提王以哲为卫队旅少将旅长。张对王以哲的晋升，大都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不到六年即被提升到旅长、将军衔。1933年擢升为东北军六十七军中将军长。以后王以哲又成为张将军联合红军的最得力的助手。1937年王以哲被害，将军闻之失声痛哭，给于学忠的信中写道：“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张将军对军官的任用，十分重视年轻、有学历（军校）、有知识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东北军炮六旅十一团一营担任战炮排和

指挥排长时，两个连连长都是高中毕业后，考入讲武堂学生队炮科的。

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边防长官司令部，张就任用不少留日的人才，委以秘书职务。将军在工作上能倾听他们的意见，如1929年，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卢乃麋等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以国民的名义对日交涉，将军在暗中支持。日方总领事小笠原找他，他就推说他们是国民的组织，以不能硬性干涉为由而推脱。在一次时事报告会上，共产党员杜兰亭正在作报告，军、警、宪联合稽查处长雷恒成指挥部下上台逮捕了杜兰亭，接着一系列大逮捕，捕去共产党嫌疑犯19人，计有李禄申、王纯一（心斋）、刘丹岩、赵尚志、郭民任、宋未波、赵子和等人。审讯之后，国民党政府来电命将军把这些共产党嫌疑犯解送南京。这时将军的幕僚王化一和丁惟汾都向他建议，不能把这些青年解送南京，那样他们都是雨花台上的鬼了。他考虑之后，对王化一说：“我太忙，一时照顾不到，你去通知军法处处长顾文海，传达我的意见，不许用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批人解走，尽量拖下去。”因此，这些人终于得以幸免。

九一八事变后，张将军的幕僚绝大部分都不甘心做亡国奴，进入关内，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将军在暗中给予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同时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像高崇民、阎宝航、卢乃麋、王化一、杜重远等，张将军都曾和他们思谋过救国大计，有时也与霍郁文、赵雨时、孙一民、韩奠邦、王卓然商讨。有不少重大问题，如对东北义勇军之支持，重要人事的任免，对国联调查团的接待等等，都与他们探讨过。1932年，共产党人张德厚（希尧）与黄宇宙，因印发共产党宣传材料被捕，他们都是“东北民众救国会”成员，大家向张力保，张通知了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关了两天即予以释放。

九一八事变之后，高崇民等人没有固定职业，生活无着落，救亡工作也缺乏活动费，张将军以发放车马费之名义予以解决。1933年张将军被迫出游西欧之前，对此还专门做了安排，一直延续到西安事变后，张将军亲送蒋介石回返南京被扣押才停止，由此亦可以看出张将军对幕僚之重视与关怀。

拥蒋合作

1933年3月4日，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蒋介石却逼将军下野出游意大利。将军走后，何应钦接替他为北平军分会主任。何上任后，于7月10日解散了张将军支持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卢乃赓、王化一、王卓然等救国会的负责人，又于1933年9月18日，在北平秘密成立了“复东会”，坚持抗日救亡，支持东北义勇军。

1934年1月8日，张将军游欧回国。1月22日，去南京见蒋，谈了他旅欧感想。

张回到上海，王化一报告了“复东会”成立的经过。张学良于1月30日去杭州参加航空学校开学典礼，就便与蒋谈了“复东会”是东北一些旧属，为收复东北而搞的救亡活动。蒋当即表示，只要能合作，“复东会”可以存在，也可以发展。张认为“复东会”已得蒋谅解。但是，蒋介石对“复东会”仍有疑虑，2月中旬派刘健群到天津、北平了解情况。王化一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张学良。张考虑到蒋既然对“复东会”不放心，不如把它取消，另和蒋的亲信共同成立一个统一组织。3月18日，张密召王卓然和王化一去武汉，谈了他取消“复东会”与蒋共同成立另外的组织之想法。二王应允，并于3月28日去南昌，4月1日谒蒋，蒋对张的主张表示满意，命与戴笠、刘健群、邓文仪等人商量，提出具体意见，呈候核示。4月2日，他们五人开会，决定

了四项原则：（一）彻底融合蒋张二公之干部，拥护惟一领袖，以肩起复兴民族之重任；（二）继续东北工作，以作大战时之准备；（三）对外守秘密，组织名称定为“四维学会”，地点定汉口或南昌，干部由委座指定；（四）“复东会”由张公负责改组，一切请委座指示。蒋介石很快即批准了这些意见。4月10日，二王向张汇报南昌谒蒋经过及蒋的指示：“四维学会的领袖为事实上之领袖（即蒋介石），不拘名义，形式上由理事会负责，就近请张公指导。”张认为取得蒋之如此信任，也很满意，决定当晚即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张立即让王化一回北平，向“复东会”理事们传达。王化一4月14日到北平，15日晚即于高崇民家召阎玉衡、卢乃赓、韩立如等人，讨论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问题，讨论五个小时，大家意见不一致。主要是高崇民和阎玉衡反对，他们意见：四维是礼、义、廉、耻，一点抗日的意义也没有。王化一再解释，这是张副司令主动为使国家统一，蒋、张二公干部共同合作，为国努力。高崇民说：“合作也可以，但不一定取消‘复东会’。”4月26日，王回波由汉到平，经过二王给高、阎二人做工作，认为这是张副司令主动求团结而提议的，既已向蒋公允诺取消“复东会”，再改口不好办。高崇民考虑不能为此事得罪蒋又得罪张，被迫同意取消“复东会”。5月5日，“复东会”的全体理事从北平到汉口，住中央旅社。5月7日晚，张副司令接见崇民、玉衡、乃赓、佩恒等，张说：“此次请你们来是开‘四维学会’成立会的，咱们东北人的目的，要回老家，若中国不统一，无法回家，所以只有努力统一，这是我这次出国吸取来的德、意两国的经验。目前只有蒋介石有资格做领袖，咱们须拥护他做惟一之领袖，蒋公已批准‘四维学会’以复兴民族为己任，且让我们继续进行东北工作。我们应该忠诚地和他合作，取得抗日工作的合法。”他认为这是使国家真正统一的

步骤，从中亦流露出对蒋介石寄予的希望。

5月9日，在汉口银行公会开成立大会，拥护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名誉理事长，贺衷寒为理事长，王卓然为副理事长，刘健群为秘书长，另外设15名理事，蒋介石方面为其十三太保，如贺衷寒、刘健群、戴笠、邓文仪、曾扩情、邱开基等。张学良方面有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乃赓、关佩恒、吴淦愆、黎天才等。又确定候补理事五人。开会时，刘健群为主席，王回波报告筹备经过，张副司令训话，内容要打破自私，服从领袖，团结御侮。蒋介石派贺衷寒为代表，到会训示，贺大讲：“蒋委员长是中国惟一的领袖，要绝对拥护，绝对服从，‘四维学会’的事也要一切听从委座指示。”高崇民听了贺的讲话，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独裁，哪有一点抗日味道。加上这个组织机构的阵容就是要以蒋氏为主，吃掉“复东会”，他满脸怒气退出会场。以后经吉林同乡吴淦愆和杜重远的劝解，让他不要使张副司令太为难，还要从团结大局出发，他终于参加了“四维学会”。

5月13日，蒋召“四维学会”理事去南昌训话。“四维学会”理事与候补理事17人，5月15日到南昌，16日蒋即接见训话，谓“四维学会”成立之始即声气过大，为胡汉民所反对。为此，要把“四维学会”绝对秘密起来，以后不准用“四维学会”的名义作任何活动，并且训示要严格入会手续，反对分子不许随便加入云云。他这一番训示就把刚刚成立的“四维学会”取消了。实质上蒋之目的在于取消“复东会”，并不需要一个新的团体。蒋虽然口头上说尊重副司令的意见，实质上是他独裁。不少人都快快不快，高由此即离开南昌回北平。

王化一、阎玉衡等回汉口向张副司令汇报，张对蒋的企图也有察觉，但还希望与蒋合作，他指示他们八个字：“做事认真，

处人和气。”意思是，既组织了“四维学会”，就要认真去做，还要跟蒋的干部搞好关系。张决定：大事请示南昌蒋公，次要的他负责，小事常务理事会解决。

张将军在南京开五全大会之时，虽决定在12月16日召开“四维学会”理事会，高崇民觉得“四维学会”抗日是幌子，现在连幌子也不打了，参加之，实际毫无意义，他决心不参加会。张将军闻之则函电交驰，让高崇民赴汉。1935年3月8日，张副司令接见了高崇民，征求高的意见，研究东北军的出路问题。做记录的是张的秘书郭维城。高对张说：“这次你召我来武汉，不能富贵我，也不能贫贱我，我是来和你商量救国大计的。”高提出来：“东北军是东北的子弟兵，他们要以收复东北为己任，不应随人摆布消耗在内战之中。”张副司令十分诚恳地说：“我也如是想法，只是目前国内不统一，无法抗战，我们区区几十万军队，是不能单独对日本作战的，我若脱离蒋，东北军不出三个月就得饿饭。国内不统一，无法对外。我主张成立‘四维学会’，也是想运用这个形式使抗日合法化。你说他不抗日还为时过早，应该走着瞧。”张挽留高崇民在武汉为“四维学会”多出点力。由于张的至诚，说服了高崇民留在武汉。

这时候张虽与蒋各有心事，但对蒋抱有幻想，认为只有“拥蒋抗日”，统一中国，国家才能得救。

力主抗日

1934年春，我在南京军校第十期学习。十期的学生中东北籍的320余人，约占总数的20%。张去军校看望他的四弟张学思，在军校大礼堂为全校师生讲了话，介绍其出国考察的体会。又召集我们东北籍学生讲话，着重介绍他应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的邀请，对意大利进行了考察，齐亚诺介绍

了意大利国内情况，齐亚诺说：“你们国家之所以不能很快富强，就在于领袖太多，主张不统一，力量不集中。”这话给张之影响很大，他回国后，极力主张要效法德、意国家，实行一个领袖，集中领导。他认为“中国要抗日，走向强盛，就得像德、意等国那样，绝对拥护一个领袖，中国的领袖只能是蒋介石。”他同时也讲了德、意两国的民众，都是一心一意在一个领袖领导之下，为国家富强而工作，他盼我国的民众，都要励精图治，不惜“牺牲一切，为国家强盛贡献力量”。他鼓励大家学好军事本领，毕业后到东北军去，共同为收复失地而战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1936年7月中旬，我在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学习班学习，王以哲将军任教育长，因张将军不在西安，不能亲来报告，他印发了张将军在第一期训练班上的讲话稿《中国出路惟有抗日》。从其内容来看，他接受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意见，再不提中国要走独裁的道路。他提出“拥护统一，也惟有对日抗战”。他说：“我们决不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我们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这说明他强调了抗日而不赞成“先安内”的政策；他在怎样实践抗日问题上，提出“拥护领袖，集中国力，长期抗战”。这时候把拥护领袖的内容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我们拥护领袖，是把意见贡献给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向领袖有所诤谏，甚至如古之为臣者以尸谏，亦所不辞。”张将军是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他向共产党建议，要逼蒋抗日，他自己也向蒋介石一再苦谏、诤谏、哭谏“停止内战”，均遭蒋的拒绝，甚至要惩处他的部下王以哲，他若不“剿共”，就把东北军调往豫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兵谏”。在西安事变后的五六天，张在西安南苑门总部的大厅内就讲过：只要蒋先生答应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张学良一

定亲自陪蒋先生回南京。在蒋答应了六项条件之后，他亲自送蒋到南京，足见张将军说到做到，言而有信。他这种为国为民的一片赤诚，公而忘私的崇高精神，为国人所赞许。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战局面形成，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先父称赞张将军“叱起风云留正气”，“乾坤扭转话凌烟”。

泪洒席间

1961年12月12日晚，北京饭店一楼大厅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邀来参加纪念会的同志们，相继步入大厅。他们是高崇民夫妇、张学思夫妇、张学铭夫妇、李维汉、林枫、南汉宸、杨明轩、杨拯民、赵寿山、吴德、刘鼎、薛子正、申伯纯、冯仲云、强晓初、邹大鹏、王一夫、阎宝航、王化一、赵毅等20多人。一会儿周总理和邓大姐莅临，他们和蔼可亲地和大家亲切握手，招呼大家入座。并由总理首先致词，他说：“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于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转变关键。从此建立了两党合作的必要的前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他这个英雄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但用在抗日上就用对了”，“张、杨两将军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个人都作出了重大牺牲，成为千古不朽的功臣。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席间，大家议论了张将军在台湾的近况，并就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进行了猜度。心情最为激动的是张学思，他回忆起过去大哥对他的教育与培养，如今，天各一方，怀念之情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起立向周总理敬酒时，竟至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怆然泪下，大家怅惋不已。这时邓大姐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总理沉默一会儿，无限深情地对大家说：“我

流下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那时候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 20 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总理的话情真意切，含义深远。

当时我父亲高崇民也热泪潸然而下，当场赋诗一首：

兵谏功成廿五年，乾坤扭转话凌烟；
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

饭后周总理对我父亲说：“你的诗中‘憔悴’二字太消极，不如改为‘奋斗’二字为好。”古人有“一字师”之称，周总理堪称“二字师”了。不过，它的意义并不止于此，而是表明周总理对张将军的高度评价和殷切希望。宴罢归来，我父亲仍然思绪万千，回到家中久久不能入睡，又提笔赋诗二首：

其一

深谋远虑系台湾，炮击金门非等闲；
海隅终当还祖国，将军归卜在何年。

其二

轩辕黄帝好儿孙，举义英雄宇宙存；
叱起风云留正气，白山黑水忆将军。

“将军归卜在何年？”这是我父亲的心声，也是张将军的老部下、亲属、幕僚、故人、学生以及千万人的共同心愿！

（高存信，1936 年至 1937 年任东北军炮六旅排长、副连长，1938 年参加八路军。）

三 黯然下野

—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伪满政权以后，又谋进取热河。它的办法首先是利诱，企图使汤玉麟自己上钩。如利诱不成，就作出威胁姿态，想不战而取，要汤玉麟自己投降。若再无效，才以武力夺取。

1932年4月伪满在长春成立^①后，曾特命汤玉麟为热河省长兼热河军区司令。汤玉麟退还了伪满的委任状。

136 这年冬天，日军占领了锦州，进窥热河的门户北票，用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日方代表有武部六堂，外加关东军参谋长代表和锦州日本驻军代表各一人。汤玉麟派公安管理处处长张舜卿前往参加。会上日方向张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说汤是满洲国委任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负责的人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第二，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要汤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长修建到承德。第三，为了加强联系，要汤同意日本军部在承德设无线电台。这三条由张舜卿电告汤玉麟，并直接电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复电令张舜卿断然拒绝。

日军这时企图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编组了不少伪军，一部分是招募土匪，另一部分是强拉农民。内中不少爱国人民，不甘心为虎作伥，常把日军的军情通知我方，有的还倒戈投诚。

^① 《日伪统治东北时期大事记专辑》（《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记载，1932年3月1日，伪满“建国宣言”公布，7日为建国大典。——编者



张学良在北平清河机场，准备赴沪
出国。(1933年3月)

就因这种情形，一个日本军官松井大佐坐飞机侦察，被我义勇军用步枪打下，落地后松井被俘。经报告北平张学良，张命就地处死。

日军图谋热河和汤玉麟不可靠的情形，天天载在报上，惊动了上海爱国人士，主要是上海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以黄炎培为首的上海地方协会内，有穆藕初、刘鸿生、钱永铭

等，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共同努力，推动了当时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要他急急设法挽救热河和华北危局。

宋子文为了表示关心热河防务，增加自己政治资本，于1933年2月11日偕秘书周象贤、顾问端纳飞到北平，与张学良商议热河防守问题。杨杰以军事专家身份，上海爱国人士黄炎培、穆藕初等也先到。他们会同当时北平爱国人士朱庆澜、熊希龄及东北的杜重远、王化一等积极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于2月16日下午假东城外交大楼举行成立会，出席人还有张伯苓、蒋梦麟、胡适、周诒春、张嘉森、章元善、汤尔和、丁文江、阎宝航等60多人，公推张伯苓为主席。宋子文与张学良亲临致词。会上通过章程并决议：（一）通电全国人民报告热河后援会之成立，要求全国一致起来援助；（二）通电全国军政官兵，请一致

团结御侮，并推定朱庆澜等数人为常务理事，又决定朱等次日同宋子文等去热河，察看情形，进行援助。

2月16日晚8时，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作去热河的准备。宋子文、杨杰均出席，还有万福麟、宋哲元、商震等将领十数人。张学良将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红蓝铅笔俯伏地上准备划防地，首先仰面向宋哲元说：“明轩你可把守这一线（指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宋哲元当时厉声拒绝说：“我的兵力太薄，装备又差，怎能担当了这么一个大面。”张说：“不要紧，你的右翼有何柱国，他可以支援你。”宋又很不客气地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靠不住，我怎能信他，我不干！”张听了这样不客气的回答，极感难堪，约有几分钟没有抬起头来。后来说：“再商量吧！”

宋哲元为什么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呢？因为在锦州失守后，何柱国任临永警备司令，山海关为临榆县治之所在，是关内外的门户，何的责任即守卫山海关。日军在1933年1月1日借词向山海关进攻，用猛烈炮火打毁城的东南角，守城的何部第九旅营长安德馨浴血抗战，壮烈牺牲。接着第九旅即撤出山海关，致使华北门户洞开。宋哲元的那番话，实系有意挖苦。

当时张已与宋子文商定发表张作相为保卫热河的统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任副司令。张作相原是张作霖、汤玉麟的老“把兄弟”，对于张学良是父执，素有“浑厚”之名。他原是吉林省的省主席，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锦州原籍为父治丧。张学良怕汤玉麟疑心，用他以安汤心，以利指挥，也算煞费苦心。受张作相指挥的部队按编制应有六七万人。但张作相也是不学无术，既无威以制人，也无智以服人，无信心，无决心，也毫无准备。在热河危急的当头，被临时“拉夫”上台，去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胜败之数已注定了。

2月17日晨4时许，宋子文与张学良、杨杰偕同随员卫兵数十人，分乘汽车、卡车30余辆为一路，朱庆澜、黄炎培等乘车10余辆为一路，浩浩荡荡向热河进发。据说事先汤玉麟闻讯，怕对他不利，大骂说：“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是不是勾结宋子文等来打我的主意！”经左右人说：“宋子文是代表中央，张汉卿是华北直接指挥的长官，因热河防务吃紧，前来视察，阁帅（汤玉麟字阁臣）可趁机向他们要些钱，要些东西，是有利的，应当表示欢迎。”汤这才无话，于17日下午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至郊外20里处广仁岭迎接。宋、张、朱等于当日下午5时到达承德，分别宿于都统公署和地方机关。当晚只与汤玉麟稍谈，定次日举行会议。

18日中午是汤玉麟同地方各界预备的欢迎午宴，计主客共60余人。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杨杰和后援会的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杜重远等，还有一个天主教法国人敏司铎参加。宋子文首先说话，表示南京与全国皆非常关怀热河的安危，要大家保国卫土，所需饷械，他当负责，并与张学良随时接头办理。他说的是广东调的官话，在座的人多有听不明白的，于是由杜重远起为翻译说明一遍。张学良接着致词，勉励大家誓守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继由汤玉麟起来答词，表示“决心”与日军周旋。这样，这个礼节上的欢迎会历时二小时完毕。按理张学良、张作相应带一些高级参谋人员与汤玉麟举行一次详细会议，就抵御日军作一些知己知彼的估计，和攻击防守上的安排。但这样的会没有开，就把由北平带来的两电稿由承德发出。一个是由宋子文、张学良署名，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大意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军的侵略，现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请向国联和全世界声明；另一电由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等27名守卫热河有责

的将领，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援。张作相听说发出这样一个通电，叹气说：“一点没有准备，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岂不是惹祸吗？”他的意思是说日本人看见这样一个通电，会恼火起来，加速进攻热河。宋、张于下午3时带领全部随员离开承德，夜宿古北口，于19日下午1时许返抵北平。

2月22日，距宋、张热河之行仅四日，日军即大举攻热，由日本关东军司令率领约三个日本师团，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兵三路：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并配有张海鹏和于芷山的伪军。防守主将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有一半以上尚未到达防地，根本未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又加士气低落，真是将无决心，兵乏斗志。日本人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了几下，又出动几部坦克车。就这样，开鲁一线，汤部的崔兴武旅即首先投降，万福麟的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溃退，朝阳亦即不守，三条阵线同时溃败。复有平时受日军收买的汉奸作为向导，因此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汤玉麟于3月4日晨先撤出热河，日军于4日午后1时以128人先行，由承德商界代表迎接入城。汤玉麟带领他的文武官员及家属退走时，从未看见过一个日本兵，更不用说有什么抵抗了。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代表的力量，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后盾的热河后援会，此时在唤起民众支援抗战上，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张学良曾接受他们的建议，决定把汤玉麟捉住正法，以振士气，而励人心。但汤玉麟畏罪逃往察哈尔，竟得幸免。

二

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南京的军事和外交。

张学良更被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于3月8日^①电南京辞职，略谓“……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詎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戒；一面迅派大员接替，用伸国纪。转还之机，在此一举……”此时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主要落在蒋介石的身上。他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先用视察名义来北平，自己也作北上督师、筹划反攻的虚伪宣传，偕宋子文北来。先止于石家庄，与阎锡山、徐永昌等会晤，并电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3月8日晚12时，张学良轻车简从，偕端纳、汤国桢、王卓然等由西便门登上早备好的一列专车，并对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会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补充一二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得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今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得对不对？”次早（3月9日）5时到达保定。蒋、宋等原约定同时到达，此时尚未到来，车站上也无消息。张学良亲到站长室向石家庄要电话，宋子文接电话说：“蒋先生有一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谈。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张放下

141

^①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1933 年《大事记》3 月 7 日记载：张学良电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编者



张学良（前左五）在法国。（1933年）

电话回到车上，面色阴沉。端纳忙问：“T. V.（宋子文英文名简称）怎说的？他们怎还不来？”张说：“我的预料果然不差，T. V 先来传达蒋先生重要意见，这里大有文章。我估计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更谈不到全面向日本宣战了。老王（王卓然）你好好译给端纳听。”于是大家猜测纷纷，并共劝张上床休息，静观事变。

约 10 时，宋子文的专车到保定。张立时登车与他接谈，约二三十分钟，张匆匆下车，神情紧张。我与端纳趋前急问，他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我已干脆告诉了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会休息休息，要他急告蒋先生不必烦心。”张与我们谈话时，宋子文已去车站向石家庄打电话给蒋。大意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

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下午4点蒋的专车到保定，进入张的专车站台另一边。张的卫兵吹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车停后，张与宋子文立刻登上蒋的专车进行商谈。蒋不待张开言，首先很庄严地向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张唯唯说：“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申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蒋闻张语连说“是的是的”。这样相谈不过十几分钟，张看蒋似不愿多谈，即行退出。张退回自己的专车约有5分钟，蒋偕宋来到张的专车回拜，无非用好言安慰张，并劝他次日（即10日）即飞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说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名义和手续，当妥为安排。约有10来分钟，蒋即出来。张随下车，送蒋上了他的专车，立于车门之外。蒋连说：“汉卿，再见吧，再见吧。”并且目视宋子文说：“子文你留在后面，多与汉卿谈谈。”话说完，蒋车即向石家庄开行。

蒋去后，宋来到张的专车。张吩咐预备晚饭，即与宋商谈善后。大致是将东北军编组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个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原参谋长鲍文樾调为办公厅主任，并调中央军第二师黄杰和

第二十五师关麟徵开赴古北口，以抵抗日军的前进。至于张建议动员全国全面开战，以关系太大，留待中央从长计议。宋的专车和张的专车挂在一起。到夜 10 时半抵长辛店，两车分开。宋辞回自己专车，连说：“汉卿，一两天内上海再见”，就开回石家庄向蒋报告。

三

宋子文走后，我们的专车即向北平进发。我在客厅，正与端纳闲话，忽然副官谭海跑来说：“王老师，副司令大哭，你快与端纳过去劝劝。”我急同端纳进张的卧室，见他正伏枕大哭，非常沉痛。端纳说：“Young marshal, be a man, brave and strong.”意即“作一个大丈夫，要勇敢与坚强。”我说：“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吧，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患无柴烧。”我与端纳正待他的反应，他突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急拉端纳和我坐在他的床上。此时汤国桢与谭海皆在旁呆立。他说：“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接着还讲了一个笑话，嘲讽南京的对日外交政策。过了一会儿，谭副官进来报告说：已到西便门车站，请副司令下车。于是我伴张学良驱车回顺承王府，到达时已午夜 12 时。张学良在下汽车时，我问他：“蒋要副司令马上飞上海，你想想我可帮你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他沉思一下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仿佛记得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我

进屋翻参考书，查出原文是这三句话，译文是：“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我送交他时，已是午夜2时，他还在阅读文件。

(王卓然)

第六章 民族大义 赤子情怀 惊天伟业震环宇

甫一交手，便被经过二万五千里跋涉、身心俱疲、衣衫褴褛的红军吃掉了三个师。身为“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强烈的震撼，他明白了一个真理：红军是永远捶不烂，打不散的。因为这支军队有高远的志向、坚定的信念和千百万舍命相助的老百姓。他由此悟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迟早有一天会将他赖以收复失地的“家底”消耗殆尽。民族大义，赤子之情，终于使张学良在延安与周恩来双手紧握，竟夜长谈。张学良对周恩来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心悦诚服；张学良首倡的“联蒋抗日”，也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全民族一致抗战的伟大序幕从这里徐徐开启……

一 骤雨将至

张学良将军的思想转变

(一) 1934年归国后在武汉时的张将军

张学良将军于1934年1月从国外归来，2月就任豫鄂皖三省

边区“剿匪”副总司令，驻武昌。7月，我到武汉见到张将军，这次见面与以往情形不同，以往无论在沈阳或北平，他会见一般客人，都是对面站着说几句话，很少坐下来交谈的。这次他和我坐在“总部”小会客室里，谈了两个来钟头，颇能使人讲出要讲的话，他的形体和精神面貌同以往完全判若两人了。我请张将军把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向我指示。张将军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确到了很危急的时候，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交至迭来，万分危险。我们要抗日复仇，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这当然是对的。但日寇是强大的，单凭20万东北军能够行吗？加上中央军也不见得有什么把握，何况内部还有捣乱的共产党。因此，必须全国真正统一，集中力量，再加上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给予支援，才能谈到对日抗战取得胜利。这就是说，中国要真正抗日，必须先求中国真正统一，要求中国真正统一，就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实现。而要安定国内，消灭共产党，集中国力，抵抗外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和领袖是办不到的。为今之计，惟有拥护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先把国内搞好，然后再对外抗战。所以，蒋委员长的‘安内攘外’是正确的国策，现在我们惟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安内攘外’的国策，使国家达成真正统一，然后全国一致，对日抗战，才能达到挽救国家危亡，收复东北，复兴国家的目的。”

回想1932年，张将军在欢迎我们十几个留学生归国宴会上的谈话，可以看出他的变化。那次他讲的是：“美国人对于我们对日本侵略不抵抗有怎样的看法？”他说：“李顿爵士率国联调查团到东北调查，溥仪可能说出一些对我们有利的真情实况。”又说：“国联既派李顿爵士率调查团前来调查，调查清楚后，国联可能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解决中日纠纷问题。”从这段谈话可以看出张当时对国事并无办法，只幻想从美国和国

联得到帮助。而现在他对这种幻想已失望，转而寄希望于蒋介石，所以决心拥护蒋介石做中国的领袖，贯彻“安内攘外”的国策，认为这就是救国大道。这不能不说张将军有决心抗日，可惜向右转了，向错误的方向滑下去了。这有种种原因，主要是：他这次出国虽然到过英、法等国，而居住时间最长的是在意大利，他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及女婿齐亚诺都处得很好，深受法西斯思想的蛊惑，极崇拜墨索里尼；回国后，更看到蒋介石正在法西斯化。于是，他就任“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副司令”后，对于“安内攘外”实际上即只“剿共”不抗日的政策完全赞成，拥护“领袖”的呼声比别人喊得更高更响。因此，听蒋介石的命令，把东北军大部南调与共产党作战；他又召集在北平的东北救国会负责人王卓然、卢广绩、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杜超杰等去武汉，还有在武昌“剿总”任机要组长的黎天才，与复兴社分子丁炳权等，组织“四维学会”。这个会是模仿复兴社并与复兴社有联系的组织。这几件事证明他由不抵抗转向“安内攘外”的不抵抗。

我当时就感到他这种思想不对，向他表示了我的看法同副司令的看法有些不同。他说：“你可以谈，没关系。”我说：“我觉得中国不应内战——‘剿共’，而应对外抗日，抗日是中国的生路，不抗日而‘剿共’是中国的死路。因此，中国的出路是在于国策的转变，东北军的出路是抗日，而不是‘剿共’。‘中央军’人数多、力量厚、物力丰、配备好，尚且屡次‘围剿’而不能取胜，东北军如不警惕，前途将不堪设想。因此，在国策未转变前，东北军必须保存实力，勿作无益而有害的牺牲。”在我讲这段话时，张将军始终听着，但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可以看出：张将军当时的思想虽然是“安内攘外”，但尚未僵化。

1935年春在上海，张将军曾叫我代表他去探望因《闲话皇

帝》案被法院判处 14 个月徒刑而住在虹桥疗养院的民主爱国人士杜重远。我自己也去探过。

1935 年夏在武汉，张将军叫我组织东北大学校友会。校友会成立时，我被选为执委会主席。

（二）到西北后的张将军

由于日寇的要求，蒋介石、汪精卫要撤换并调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职位。张将军原不同意，但蒋介石认为非调离河北不可，表示可让于改任河南或甘肃主席，张将军才同意调于到甘肃。这时，共产党红军已完成二万五千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左）和蒋介石（右）在一起

里长征到达西北，蒋提出调豫鄂皖三省的东北军到西北去“剿共”，张将军也同意了。于是东北军从豫鄂皖调往陕甘，“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了，张将军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的职务。

1935 年 9 月，张将军飞西安，我随行，这是我第一次随张出门。同行的还有办公厅科长洪钊以及两个参谋和两个副官，还有张将军的女友赵媿。飞机是张自备的“波音”，驾驶员是美国

人巴尔，工程师是美国人布鲁斯。到西安时，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和省主席邵力子等在机场迎接，下榻于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杨虎城将军当时表面上对张将军很尊敬，每天早晨一定来，有时还到我们住的屋里稍坐一会儿。

到西安后，张将军的思想和行动，有下面三项值得一述：

1. 《绥寇纪略》

初到西安，住在绥署新城大楼的时候，张将军有一天拿来一部吴伟业著的《绥寇纪略》叫我看，这部书是木版印的线装书，共四本。张将军嘱咐我看后把书中要义讲给他听。这部书的内容是记载明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农民大起义及起义军与官军斗争过程以至明朝灭亡的历史。书中关于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牛金星和明朝将领孙承宗、洪承畴、杨鹤、何腾蛟等，以及两方面斗争、战争情况和胜负因果，都记述很详。看完后，我向张将军介绍了书中主要内容，并说：“这部书的名称实在名不副实，‘寇’没有绥得了，而是明朝被‘寇’亡了，怎么能叫《绥寇纪略》呢？”我想张将军所以要我看这部书，大概是他想从这部书中找到些什么历史经验，但这里边实在找不出来。我从书中倒看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教训来。我顺便向张将军谈了我的意见，我说：“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军事废弛，外敌纵横。崇祯皇帝和大臣们若能认清局势，彻底改革，刷新政治，整饬军旅，招抚‘寇’军，一致对外，坚决抗清，结果当不至败于‘寇’而亡于清。然而明朝却认为‘寇’是心腹之患，而清是癣疥之疾，于是采取了灭‘寇’第一，抗清第二的政策。因此，终致内则‘寇’不能绥而反为‘寇’破；外则敌乘其敝而入关亡明。现在，中国情形与明末相类似，但实际不同。共产党同李自成、张献忠则不可同日语，因为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为中国前途着想，如联共抗日，中国当

不致蹈明末的覆辙。否则内战不已，正如鹬蚌相争，必贻渔人之利。”我说完之后，张将军没有责斥我，也没有赞同的表示。

2. 对军队的讲话

到西安后的九十月间，东北军开到西北，路过西安的有沈克的一〇六师、江惟仁的一〇七师、常经武的一二〇师，张将军都到城外给他们讲过话。这几次讲话内容大致是一样的。主要是：“我们的老家——东北已被日寇占领，日寇正阴谋积极向关内入侵，国家实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应当举国同仇，抵抗日寇，这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共产党偏偏捣乱，危害国家，我们要抗日，他们就在后边扰乱，使我们无法集中力量对日作战。必须晓得，日寇是强大的，我们必须集中全国力量，再联合友邦，才能把它打败。而要集中全国力量，就非把捣乱的共产党消灭不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又说：“为国家民族前途，为东北军前途，希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一齐努力，不畏艰险，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事业，建立统一功勋；然后出师抗日，集中全国力量，打败日寇，收复东北，返回老家。”

这几次张将军对部队讲话时，很用力气，每次都讲一两个小时之久。并且他命令我和苗剑秋把他的讲话作出记录。可见这时的张将军的思想还是以“安内攘外”为主流。到西安后，张将军对我更加亲切了，我已成了他的随从秘书。

3. 靡不暇暖

自到西安后，张将军与杨虎城主任、邵力子主席以及西安各方面人士交往频繁，且在三个月里，他曾先后飞往成都一次、平凉一次、兰州一次、宁夏一次，最后飞到南京和上海。每次我都随行。去成都是9月间，因蒋介石当时住在成都，张将军去找他商量“西北剿总”的编制和经费问题。东北军的经费200万元中原有华北协饷70万元，宋哲元不愿再出，蒋要张与宋交涉，

后由张将军与孔祥熙交涉才获解决。这次同去的有孙铭九、洪钊，住约三四天。到平凉是10月中，去视察东北军，住约十几天，同行有参谋一人，还有赵媿。到兰州、宁夏约在10月末，是巡视甘肃、宁夏一带驻军并与于学忠、朱绍良、马鸿逵、马鸿宾、邓宝珊等人见面，住约四五天，同行的有参谋一人，还有赵媿。到南京是在10月末至12月中旬，是参加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随张将军同机去的有邵力和邵的女儿、参谋秦靖宇、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和我，之后还有些办公人员搭火车去的。到南京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率领军政部官员在飞机场迎接。飞上海是在12月中旬南京开会完了之后，住三四天即直接飞返西安。去上海随行人员只有侍卫副官刘令侠和我二人，其余在南京人员都乘火车回西安去了。去上海时在南京机场送行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从上海回西安时在机场送行的有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等人。

（三）张将军思想逐渐转变的迹象

在南京开会和会后到上海这一短短的时期内，我觉得有下列行动可以看出张将军思想逐渐转变的迹象。

在南京开会期间，11月下旬，从西安“总部”来电知道一〇九师在郿县直罗镇被红军歼灭，师长牛元峰阵亡；一〇六师一个团被歼于黑水寺。这个消息使张将军异常震动，态度上表现很苦恼而愤慨的样子，思想感情上受到很大折磨。本来在9月，一一〇师劳山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10月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在榆林桥遭受严重损失，团长高福源被俘后，张将军对与红军作战已告诫部下将领要小心谨慎，不曾想到在他不在西安的时候，参谋长晏道刚和军长董英斌竟擅作主张，又遭到这一次重大损失。于是我以沉重的心情向张将军说：“副司令！三个月损失了我们差不多三个师，阵亡了两个师长；副司令是存心抗日的，但

‘共’永远‘剿’不完，‘日’便永远不能抗。东北军与中央军不同，他们牺牲了可以补充，可以扩大；东北军损失了便不予补充。到抗日时候，我们连一点本钱都没有了，我们还拿什么披甲还乡，收复失地呢？”张将军也很沉重地说：“你说的有一部分道理，我要仔细考虑考虑。”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的意见也就有错误的成分。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反对蒋委员长的‘剿共’政策，这就等于说，我们要联合共产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而单单不团结委员长。这是不行的，这就不能团结全国的抗日力量。抗日救国不能凭意气用事，必须想得周全，实事求是。委员长是握有全国军政大权，是最有实力的。他要‘剿共’，你就没法停止内战；他要不抗日，中国就没法抗日。我想为了团结抗日，应该设法说服他，不应该反对他。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战是对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反蒋呢？也许因为蒋委员长要‘剿共’，因此，他们也就不能不反蒋，也许他们对中国实际情况还了解得不够清楚，我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张将军这时已经有了初步的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

11月下旬，在南京开会期间，日本特务土肥原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北平、天津两市常有汉奸、流氓组成的队伍，夹杂着日本浪人，打着各色旗号，在街头叫嚣，甚至袭击国民党政府机关；同时，日寇军队也加紧在平津近郊演习，坦克车纵横街衢，形势异常险恶，颇有要发生事变的样子。张将军得到报告之后，非常愤慨，他亲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叫参谋王殿禾即时乘火车去北平，把信面交在北平军分会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瓚和宪兵司令邱文凯，命令他们，如日寇在北平发动事变，一定要誓死抵抗，不许退却。后来由于南京政府屈从日寇的要求，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改设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

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又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日寇没有在北平即时发动事变，张将军这道手令自然也就没有实现。但可以看出张将军对日寇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态度，这是否与一一〇师和一〇九师的损失有关呢？我想不能说没有。也是当时，日寇无止境地疯狂入侵，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东北军军官思想的变化，对于张将军的思想也有很大影响。

12月初，在南京开会完了之后，张将军曾飞到上海住了几天。在此期间，原武昌“剿总”总务处长汤国桢、原辽宁省教育厅厅长也做过几天财政厅长而被刘海泉等排斥掉的祁公亮、原在辽宁时做过张将军秘书的宁梦岩（即宁武）都来看过张将军。张将军曾同李杜会过面，问李出国准备情况，并向他提出找共产党负责人联系的问题。李说可以设法。张将军曾到虹桥疗养院看杜重远一次，表示慰问。杜重远谈了些上海抗日救国运动的具体情况，并劝张将军改变方向，改“剿共”为抗日。张将军回西安时，我留在上海准备和李杜一同出国。等了一个多月，李杜还是没有一定行期，而春节到了，我就回到北平我的家里去了。春节过后，于1936年2月初，我又回到西安。

1936年4月初，张将军到洛川视察，住约10天左右。六十七军军部和一〇五师师部都在这里。这次随行的有栗又文、孙铭九和我，此外还有一些参谋和函电工作人员。

在洛川看见了一位新人，后来回到西安，这位新人便住在金家巷张将军公馆里，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刘鼎。也就是这时，才约略知道张将军与共产党已经有了秘密的联系。刘鼎是由江西出来先到上海想进入陕北的，因为李杜代张将军找党联系，上海地

下党组织便把刘鼎介绍出来。当时李杜快要出国，张将军已经不让我跟李杜出国而改让赵毅去了。赵毅到上海后，李杜就让他偕刘鼎来西安见张将军，刘鼎见张将军后，谈得非常融洽。4月初，张将军到洛川也偕刘鼎一起去的，从洛川回来，刘鼎便长住张将军公馆里了。

（应德田，张学良秘书、政治处处长及抗日同志会书记。）

二 未雨绸缪

张学良办王曲干部连

自从延安秘密会谈以后，张学良将军就在东北军中积极地展开促蒋抗日活动，先在西安城南王曲镇于5月间成立干部连，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为连长，以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激流为排长，选拔东北军中校级以上的优秀亲信干部108人为学员。我就是在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来延安秘密会谈后，即刻从陕北酈县杨继业点将台于执行护路任务行军中调回干部连的学员。我奉命之后，即刻由陕北乘汽车回西安到王曲干部连报到。我们当时住在窑洞里，以督城隍庙为课堂，在绝龙岭上搭草棚掘地为桌凳以为食堂。张学良将军亲自主持训练，他除星期六到西安城内办公外，其余时间全在干部连生活，做到同吃同住同学习，朝夕与共，互相认识，彼此达到推心置腹生死与共，还做到敢想敢说敢干的地步。训练的目的，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枪口不对内，打回老家去，抗日救国复仇，收复东北失地。张将军也不止一次地说：“国难家仇，只有抗日才是我们东北军的出路。”尤其常请东北流亡父老如莫德惠、刘尚清、车向忱、阎宝航、高崇民等来干部连讲述东北沦陷家乡的苦况，东北人民沦于水深火热之中，盼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每讲

到日寇在东北奸淫烧杀暴行，闻之无不落泪。思家报国，杀敌复仇之心，油然而生。

我们在王曲干部连的事迹颇多，只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王曲干部连从外形上看，我们没有漂亮的房舍，只是住在自己挖的窑洞里，以破烂不堪的城隍庙为课堂，在绝龙岭上搭草棚为食堂，校舍十分简陋，但调来的学员都是东北军的青年军官，个个生龙活虎一般，投笔从戎杀敌报国为怀。尤其张学良将军住在王曲，亲自主持训练。除星期六外，绝不进城办公，以进步的与中共联系最早的军长王以哲为连长，执行教学。而学员又都是东北军中较有进步思想的骨干，还有一部分是张的秘书，也有中共地下党人如刘澜波等。这些人都是张学良的亲信得力干部。开始我们都是各有戒心，都以谨小慎微的态度，说些学习话，经过一周之后，则大为改观，我们敢说心里的话，不愿意打内战，愿意抗日，博得大家的同意，此起彼伏，越说越有劲，就有了共同语言。

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天晚饭后，正是狂风暴雨，把草棚吹得呼呼乱动，但是我们还是照例晚饭后大家自由讲心里话，砥砺抗日救国的意志。有人问张副司令：“听说‘九一八’之夜，您同胡蝶跳舞，有没有这件事。”张副司令用沉痛的语调说：“‘九一八’那天夜里，我招待英国大使，陪同他们夫妇在北京戏院看戏。忽然接到荣臻参谋长由沈阳来电话说：‘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怎么办？’我当即请示蒋委员长，他不让我抵抗。我只能服从命令不抵抗。”

“要说我和胡蝶跳舞没有这回事，我和胡蝶‘九一八’前，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只有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二人，这是既成事实，不必讳言。今天我们是天敌当前，收复东北失地的时候，你们可不能纳妾了。既成事实的我不管，再娶就不行了，你们也应

当这样做。今天不是我们吃喝玩乐的时候，今天是我们停止内战，联合一切党派抗日的时候。东北是我们丢掉的，我们有责任收复回来，我们必须收复回来，才对得起我们的祖宗，对得起我们的子孙。”他讲完了这番话，使我们都认为是推心置腹，激动涕零。

还有一次在干部连，张学良将军给我们讲话说：“‘九一八’不抵抗的责任，究竟谁来负责呢？我是东北最高的长官，当然不能辞其咎，但我还得听中央的命令。我们都是多年的袍泽，生死与共。从东北至北平，至武汉，来到西安是同呼吸共命运，过着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生活。我张学良父仇未报，国土未复，我有何面目见东北父老，也无颜对待大家，我忍辱多年，关于国家存亡的大事，不能不向你们说明了。我受了多年的闷气，担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现在我向你们说明。”他从皮包里拿出当年“九一八”时蒋介石给他的电报，一字一句地念给大家听，“沈阳军事行动，可以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张将军接着说：“这是‘九一八’时蒋介石给我的电报。他是中央负责人，我当然要服从他。但不抵抗的罪名却落到我的身上了。现在何、牛两师在陕北失败，不给我们补充，还叫我们打内战，我是不下了。大家都是我由东北带出来的子弟兵。我们的枪口决不对内，我们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祭扫我们的祖宗坟墓，我们才叫做人。”张副司令说完了这段话，他落了泪，我们大家也都痛哭起来了。这种悲惨情景迄今思之犹有余痛。

从此以后，我们干部连的同学都敢说，决不打内战，抗日到底死而无悔，紧跟张副司令联合各党派抗日，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誓死跟张副司令干革命到底！

继之王以哲连长说：“我们大家都是一条心，同生死共患难

的弟兄。我们紧跟张副司令干革命到底，忠贞不移，副司令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我们以副司令的意志为意志！这是始终不渝的。我们坚决不打内战，不‘剿共’了。但我们同学在干部连里怎样说都行，而蒋介石的特务密布，我们对外人一个字也不能谈，绝对保密，绝对不能谈，这是我们的一条纪律。我们永远跟着张副司令走，联合各党派、各军共同抗日，更不能忘记我们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们衰老的爹娘……”大家无不垂泪，誓死跟着张副司令干革命，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各军联合抗日、联共抗日的革命情绪日见高涨！

我们当时在干部连，唱的歌曲就是《大路歌》、《毕业歌》、《流亡三部曲》等等，这些歌曲歌声嘹亮、斗志昂扬，干革命的朝气焕发了东北军的革命青春。

我们经过干部连两个月的训练，初步受到了革命教育，稍微懂得了一点马列主义思想。同时我们认识了张学良，张学良也认识了我们，已成为推心置腹的亲人，生死与共的长官部下。他在西安事变时叫我去临潼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就是信而无疑，迄今我对张学良将军还是想念不已的。

张学良将军亲自主持训练干部连两个月，毕业后，我们这些人员充当张、杨合办的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一期的干部，提高东北军和西北军连长以上的军官的抗日觉悟。在东北军内部还成立了学兵连，共300多人，大部分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秘密介绍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同时东北军中有地下党工作的师团部队，如黄显声的东北军一一九师，吕正操的东北军第六九一团，万毅的东北军六二七团，陈大章的东北军骑兵七团也都吸收了平津各地的抗日学生。张学良将军还成立了抗日同盟会，参加的成员中大多数是抗日时期的积极分子和进步的青年军官，为抗日做思想和组织准

备。整顿东北军内部以培养抗日力量。张学良将军还写了一本《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日》的小册子，宣传他的抗日主张。这本小册子在东北军中普遍发行，唤醒了东北军官兵的奋斗目标，打下了停止内战抗日的基础，它对于西安事变亦起到推动作用。

东北军对红军的物资帮助

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会谈密约后，东北军在思想上、政治上受到了影响，初步接受了革命教育，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东北军对于中共红军给予物资帮助，从此东北军与共产党就化敌为友了。

据我所知张将军与周副主席秘密会谈密约后，东北军第一二九师驻在洛川期间，曾由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代处长吕伟绩担任秘密给红军后勤总部补给弹药和军用物品的情况如下：

吕伟绩曾对我说：自从1936年4月中旬，东北军第一二九师驻洛川城内，因张将军与周副主席肤施会谈后，东北军与红军已密令停止战斗。在甘泉、肤施两地已停火，化敌为友了。双方开始夜间有联系和联欢，但还是秘密地避免蒋中央的特务耳目。我们向肤施我师第三十八团补给军粮，并为红军后勤代买电池、电子管、蜡纸、油墨、甘油等22驮，送到肤施东10里的天主教堂，由红军后总联络站刘同志接收，我东北军一二九师押运员是副官处中尉副官吴惠民。4月中旬，奉张学良将军密令，将洛川第三兵站所有步枪子弹尽数秘密拨给红军，是由我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兵站，向第三兵站全部发出后，派副官吴惠民、少尉副官陈洪涛带马驴驮400驮，送往肤施东10里天主教堂交给红军后总联络站，经手人是小刘同志。共送了两次，大约数目是210万发。另有雷管两箱，甘油一大桶（50加仑）。以上物资弹药是张

学良将军秘密命令吕伟绩（吕曾给张学良将军当过侍卫副官，是亲信者）经手负责指挥上述行动。据吕伟绩说：“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密约协议，张给红军补充弹药总数为1100万发，由东北军一二九师及一〇八师师长张文清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部分别补给。”并绝对保密，以下诸事如此。

1936年5月下旬，红军总部小刘、小赵两位携带十几驮白银（元宝）来到东北军一二九师副官处找吕伟绩，向西安购买布匹及一部分通讯器材和药品，经双方协商，他两人换上我东北军一二九师的军官服装，一位是上尉军需，一位是中尉副官符号，由东北军一二九师情报队长郭振中陪同，到东北军一二九师西安留守处找杜景阳上尉副官，由杜设法将硬货币变成通用货币，再向市场采购各项物资，用东北军一二九师在西安的三部大卡车分批经洛川进入苏区（夜间）。小刘是我们吴、陈两副官接头的熟人，还有一位姓温的同志，大概是首长，和我们两位副官也很熟悉。

我们东北军第一二九师驻延安第三十八团少将军需王德环是代表我方的直接联络负责人。因此项秘密补给工作绝对保密，我东北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就是监视我们部队行动的。万一戏法变漏了，不但个人有杀身之祸，东北军全局也都输了。由于吕伟绩担任东北军一二九师代理处长，秘密给红军补给步机枪弹和军用物资等的事实是可信的。所以在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致张学良将军的信，毛主席写友军二字岂偶然哉。

1936年8月，日伪军联合进攻绥东。张学良将军又拟派东北军与红军成立援绥联军。这都是东北军自从张、周延安密约后决心联合抗日的具体表现。

（李铁醒，曾在东北军一〇五师任营长、团附等职。）

三 事变前后

1934年初，张学良将军返国，主张安内必先攘外，统一救国，励精图治，收复东北。乃接受蒋任命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代行司令的职务。原任总部参谋长钱大钧请求辞职出国，经蒋批准。张将军拟调我为参谋长，吴家象为秘书长。经我力劝仍以钱大钧任参谋长为宜，乃派我赴南昌请蒋收回成命。并准将王以哲军调驻豫南，何柱国军调驻鄂东，刘多荃师调驻平汉线南段，对鄂豫皖边区红军徐海东部作战，徐部旋走陕北。

张将军自回国以来精神焕发，身体强健，已恢复1927年以前之健康。他时常到鄂东、豫南出巡，常与部下畅谈旅欧见闻。他说在英国参观国会辩论，乃真是发言自由，态度和蔼，有民主作风。有人问他，中国是否可以学英国的民主来救国呢？他的回答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经验，民主作风深人民间，金钱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尚未产生开明的、大的资本家，所以政党政治很难稳定下来。我们军人，要想领导民主政治更是南辕北辙。他又说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用开明的集权政治不可，国家的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亦只有此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线：一为法西斯蒂路线，一为共产主义路线。可惜我不能到苏联游历一下，就我所知，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又无外患的情况下方能实行，我国是半殖民地状态，是不适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模仿德、意，乃能迅速复兴中国。墨索里尼说过：“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法西斯蒂召开大会，如领袖缺席时，要选举新的领袖，才开大会。资本家的利润有限制，工人不许罢工，彻底执行法令。德国希特勒亦是

如是作法，一定很快复兴。他说回国后曾劝蒋模仿这种办法，蒋答：“也许五年以后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他又说：“蒋手下各派如政学系是人才多而无政治基础，CC是有基础而无人才。我们是军人，只可以与黄埔系连成一气，共谋救国。所以我要在东北干部中组织四维学会以训练人才，与黄埔系打成一片，但部队的带兵军官不能加入此组织。”后来又因广西李、白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常与中央分裂，蒋极感不安，有用武力解决之意。

1935年，江西红军已突围西走，以北上抗日为号召。武昌总部于是改为委员长行营，张将军任行营主任，以陈诚为整训处处长，整军经武，拟作抗日复土之准备。首先划一军队的编制，补充装备，并将所部之骑兵向西北推进，在咸阳集中，逐次沿西兰公路西进，以防止红军打通西北之国际路线。其先头骑兵团胡竞先部与北上红军遭遇于六盘山麓，未能阻止。北上红军不足1万人，遂到陕北与刘志丹部红军会合。蒋遂令张将军组织“剿共”总部于西安，将东北军逐次向西北移动。王以哲军驻陕北延安、洛川一带，董英斌军驻陇东庆阳、合水一带，何柱国骑兵军驻邠州（今彬县）、平凉和西峰镇一带，刘多荃师为总预备队，控制于西安以北地区。又值华北何应钦为日所迫签订《何梅协定》^①，以东北军有抗日情绪不宜于驻华北为由，乃将于学忠部逐次调驻天水，以商震继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旋亦任甘肃省主席。是年秋后，王以哲部何立中师自延安南调换防，途经甘泉北方劳山隘路，何中伏身死，所部损失颇大，张将军乃决心改取守势。又值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召开，张将军偕我以军队代表名义出席南京五全大会，并通令所部在开会期间不许有

^① 1935年7月6日何应钦致函天津日本驻军司令梅津，全部承认日方提出的旨在取消一切抗日团体及活动的无理要求。

所行动，以便在政治上有所活动。张将军曾赴沪与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并闻红军绕道川西北上时，与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于松潘毛儿盖，张国焘主张在四川进行阶级革命，以此为根据再图进展，毛泽东主席则坚持北上抗日。张将军曾说：“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从前我认为非先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则认为非抗日则不能统一。”当时杨虎城将军亦与人民阵线有密切往来，杨、张之间本有误会，经此一行得以解除。会期方毕，忽接西安总部来电，董英斌部牛元峰师自合水东进应援王以哲军，牛在直罗镇中伏身死，所部损失甚重。张将军大为震怒：前已有令在开会期间不许行动，因何违令？急欲飞返查办此事，乃匆匆告知我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之中，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200米，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的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今富县）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加斥责。

163

1936年，张将军时常坐飞机出巡于洛川、西峰镇和西安之间。一日，张乘机低空飞行，他自己驾驶飞机，游览于咸阳北原汉武帝、唐太宗、文王、武王、秦始皇各陵寝，慨然叹曰：“人贵有所建树，以垂史册。否则建筑工程无论如何壮丽伟大，若此许多陵寝，亦不过只剩黄土一抔。”又登华山有感而题诗，末句有云：“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人非。”足见其心情。是年初夏，张将军经被俘团长高福源之联络，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

来会于陕北，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道。周允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绝对反对法西斯蒂主义。张将军乃与杨虎城将军秘密取得一致意见，使高崇民写《活路》一小册散发于东北军中，鼓动打通西北路线，联络新疆之盛世才，乃能抗日复土。并于军中教唱《流亡三部曲》，转变东北军士气。是年夏，成立王曲训练团，组织抗日同志会，鼓吹打回老家去。并因陕西省党部擅行逮捕总部秘书，张将军以中央执行委员之地位搜查该党部，查得该部密件，对张将军、杨虎城将军、邵力子主席均作了许多不利的报告，因而促成三人之间有所谅解。张将军与红军联系从此益密，并常驻有代表，所有军事冲突都是假意掩饰。但蒋介石已起疑心，逐次调派中央直属部队移驻西北。拟以蒋鼎文设前线总指挥部于平凉，以东北军任驻剿，防守碉堡线，以中央军任进剿，扫荡红区，并派陈诚援助山西阎锡山，且有调张将军为洛阳绥靖主任之说。时两广六一事变已完全解决；红军西路军北上拟打通新疆之国际路线，在河西地区为马步芳等军所歼灭；胡宗南军跟踪北上，已到甘肃中部地区。于是，蒋乃亲来西安，宣慰东北军而有所布置，并准许设立东北军整编委员会，由张将军主持，我副之。东北军因此重立预算编制，要求中央有所补充。10月底，蒋赴洛阳避寿。张将军前往祝寿，并请求批准东北军整编方案。阎锡山亦来贺寿，并共同与蒋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问题。蒋仍主武力解决。张将军问蒋：“中国前途归宿如何？”蒋答：“是社会主义，但不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阎劝张不必再有所建议。翌晨，阎先飞返山西。张将军出席听蒋对洛阳军官分校的训话，蒋大骂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张将军为之色变。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对我说：“不知内容者，此话尚无重要关系；知道内幕者，听到此话实在太过火了。”嘱我劝张不可误会，并说蒋的脾气说过就完。他想从中弥

补裂缝。蒋训话完毕，张将军随即登机飞返西安。在机中，我将钱大钧之话告张，张说：“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干什么，我的太太亦无从知道。”张返西安后只谈整编东北军之事，不谈“剿共”之事。蒋复来西安，轮流约东北军师长以上餐叙，个别谈话，誓言：“有我蒋介石在，一定可以带你们回东北，你们要听命令，不可听谣言。”12月初，中央军万耀煌部已开抵咸阳附近，谣言四起，情势日急。张乃借词阿拉善旗之定远营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活动一事，拟派骑兵第六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前往查办，率此二人前往临潼华清池见蒋，请蒋指示方针^①，实乃借此使白、刘熟悉蒋之住所途径。12月9日，乃北平学生运动一周年纪念日。杨虎城请中央来陕各将领听秦腔，即欲扣蒋及其以下各将领。张将军以准备未周，乃延至11日晚，由白凤翔、刘桂五率队突入华清池蒋寓所，不料为蒋宪兵觉察开枪拒之，蒋乃越墙逃避于骊山。杨虎城则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各将领。直至12日晨8时，尚未搜寻得蒋之下落。张将军在绥靖公署对各同僚说：“若找到委员长，我能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一定拥护他，并自己请罪，以增加他的威信而维持军纪；若找不到他，我便将头割下来，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反而引起内战。”旋得报，已将负伤之钱大钧送来绥署。张将军遂前往慰问钱大钧，钱破口骂张为“叛逆”，并谓再有10年亦不能恢复中国现状。张将此次事变之宗旨对他解释，并谓：“你亦要负责，假使你允来西安担任参谋长，上下不至有所隔膜，也不会演成此事变。”钱仍愤愤。因伤势甚重，张劝钱住在我家中善为治疗。旋得报，蒋已有下落。先由邵

① 一说借口送白、刘回热河打游击，谒蒋请示。

力子前往谒蒋，陈述此次事变之内幕，再由张将军往谒，张将军口称：“委员长受惊。”蒋谓：“你还叫我委员长，你还是我的部下吗？”张答：“当然，我惟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抗日。”蒋谓：“那么你应当即刻送我到洛阳，否则法币、公债都要完了，经济崩溃，就想抗日亦无从说起。”张答：“总要商定办法，然后回去。”蒋15日写一电报给宋美龄，表示：为国牺牲绝不屈辱，对经国、纬国，要视同己出，勿以我的生死为念等。并绝食抗拒。南京空军连日在西安上空示威，陆军则自潼关推进渭南，东北军亦调来渭河南北布防对峙。张将军调我为参谋团主任，会同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西北军参谋长李兴中、红军参谋长叶剑英策定作战计划，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一面备战，一面派机于14日往接周恩来，周以事不能即来。17日再派机接周恩来共商大计。周到后亦主张和平解决。遂放蒋鼎文回南京，说明此间并无害蒋之意。南京方面亦先后派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来西安参加谈判，往返洽商，双方终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条款。张将军还表示要亲送蒋回南京请罪，以增加蒋之领导威信。红军改编条件则由周恩来与蒋直接商谈。至于一般条件，均已商妥。张将军遂于12月24日召集王以哲、董英斌和我三人，密告送蒋的决心。三人均阻之，最后建议至多送至洛阳。张嘱咐，关于联军军事听命于杨虎城，关于东北军军事听命于于学忠。翌日下午，张将军约杨虎城同至蒋寓所（前数日蒋已迁住张寓所附近高桂滋宅），随即于25日下午由张将军送蒋登机，并陪同飞赴洛阳住宿。26日晨，蒋自洛阳飞南京，张将军也亲送。张在途中即来电给杨虎城，嘱将被扣南京方面各将领一律释放，后于28日用飞机送返南京。张将军在京有被迫作请罪表示，不料竟军法会审，由李烈钧、鹿钟麟、朱培德等主持之。过庭时，要摘下张将军之佩剑，张知事已变卦，乃大骂不守信用的政府，说：“剩我张学良一人

也要革命。”张被判决10年徒刑，由政府特赦，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时蒋在奉化溪口疗养腰伤，张将军亦被移往溪口雪窦寺中。

蒋派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前往潼关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又任命陈诚等几路司令作武力解决之准备。其时，西安各将领意见不一致，东北军与西北军中之少壮派主张武力争取张将军之归来。高崇民、王以哲、何柱国则主张不应改变团结抗日之初衷，即为争取张将军归来，亦只有和平解决才有希望。其利害得失，屡次开会辩论，终无结果。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孙铭九等袭杀王以哲、徐方等，我避入杨虎城的新城大楼，幸免于难。前线之东北军军长刘多荃、缪澂流等抗不受命，并电诘杨虎城，若于（学忠）、何（柱国）有意外，则向西安进军。杨要我再与潼关之顾祝同电话商定执行和平方案，即东北军移驻西兰公路陕甘边区，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于学忠仍任甘肃省主席；西北军移至渭河、泾水以北地区；中央军进驻陇海线。顾祝同遂于2月8日进驻西安执行行营主任职务。经此内变，东北军将领对于留驻西北维持原来商定之和平方案已有异议，并有坚决主张出关者，互不信任，意见分歧。顾祝同乃派我飞赴南京，前往溪口，将此情势报告张将军，并希望张将军来一手书指示要点，使东北将领步调一致，以便办理善后。我到南京后，许多要人均来告我，西安事变张学良为功为罪要待历史来评论，目前是办善后要紧。即与何应钦商量到溪口先见蒋面陈事实，均主张东北军出关沿淮河流域驻防，并安徽主席由东北人充任。我将各种情形面报张将军，并详述在西北已不能再维持“三位一体”。相谈之下，黯然神伤。事已至此，只可执行此方案。张乃亲函各将领“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口头嘱我转告各袍泽：“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

后维持此一友谊。”我返西安后传达此意，东北军遂开始遵令出关。中间虽有人作祟欲拆散东北军，后经于学忠和我以不负办理东北军善后之责任相抗议，并联袂赴溪口再向蒋面陈，乃得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副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第五十一军驻淮安附近，第六十七军由吴克仁继王以哲为军长驻阜阳附近，刘多荃部改编为第四十九军驻南阳附近，骑兵军则留驻西北，在开封开整编会议。是年6月间整编完毕。

（何柱国，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

四 难忘 1936

1936年，承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三次电召，我们东大学生代表赴西安在其身边工作，直至他送蒋介石回南京。那难忘的1936年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三邀学生代表 五次长谈抗日

东北军是张学良将军“披甲还乡”依靠的军事力量。1935年9月至11月，东北军与北上抗日的红军交战，连续被消灭将近三个主力师。东北军广大官兵普遍厌恶内战，如今士气更是一落千丈。“剿共”惨败，南京政府又取消了被歼灭师的番号，使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广大官兵处于极度震动与苦闷之中，普遍感到红军是抗日的正义之师，是消灭不了的，东北军绝非对手。“剿共”只能两败俱伤，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有利。不停止内战，打回东北老家的夙愿将难以实现。加之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党内外进步力量的影响和东北军官兵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推动，张学良将军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能否救

中国产生了怀疑，开始寻求联共抗日的新途径。恰在这时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流亡北平的东大学生慷慨激昂，奋不顾身走在运动的前列。张学良将军得知后，以东大校长名义电告校方：“北平学潮未息，请将主动分子名单开来，并促其来陕一谈。”当时学生不知张学良将军在军事上受到重创后的思想状态，对身居“剿匪”副司令要职的张将军颇有疑虑。又因电文中把学生运动称“学潮”，把学运中的领导都称为“主动分子”，误认为有敌视学运之意。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商讨后，决定拒绝派代表赴陕。随之第二封电报又发来：“……请邀主动分子促其来陕一谈，弟实善意。”东大学生救委会经商议后，又予拒绝。张学良将军见学生拒绝派代表赴陕，乃委派“总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原东大法律系教授赵翰九为他的代表，专程携款到北平慰问东大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东大召开大会予以欢迎。赵代表张学良将军致慰问词，我代表学生在会上报告了学运情况。赵返回西安后，张学良将军发来第三封电报：“请派民主代表前来西安。”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几经慎重讨论，认为形势有变化，张学良将军似有诚意，因此学生都主张派代表前去。于是，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正式推举韩永赞、马绍周（后来叛变）和我，作为东大学生及北平学联正式代表，同赴西安面见张学良将军。我们三人中，当时只有我是共产党员，党组织指示我“见机行事”。

1936年1月底，我们到达西安时，正值张学良将军在南京。国民党特务对我们侦察、监视。为了抵制特务监视，冲破封锁，打开斗争局面，我们走出住地，到学校宣传“一二·九”运动。西安师范校长田杰生接见我们时表示：“戡乱时期，召开大会不合时宜。”我们遭到拒绝后，便在学生中散发准备好的“一二·九”抗日宣传材料。接着，我们又去西安二中，校长罗端先排除

种种干扰，毅然召集 2000 多名师生，听了我们做的“一二·九”抗日运动及东北军民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报告，收到很好的效果，可是第二天罗校长却因此被撤职。我们十分愤慨，为鸣不平求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杨将军盛情款待，诚恳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我们向杨虎城将军详细介绍了“一二·九”运动，讲述了十七路军、东北军、西北人民、东北人民应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杨将军十分赞成我们的观点。在杨虎城将军邀请下，我们向十七路军参加孙总理纪念周的 700 多名尉级以上军官讲述了上述内容。会上群情激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杨虎城将军十分激动地走上讲台，慷慨激昂地说：“抗日学生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同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手握枪杆的军人岂能坐视不动！”说到这里，领头振臂高呼：“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月上旬，张学良将军返回西安，立即让副官通知我们等候接见。当天，副官用专车将我们接到公馆。未及寒暄，张学良将军第一句便问：“谁叫宋黎？”我认答后，他赞许说：“你们来得好，来后做了不少好事。”闻此言，实出我们意料之外。见张学良将军持此态度，我们稍释疑虑，为了争取张学良将军的同情与支持，我们围绕事先准备的有关“一二·九”学生运动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情况，改组东大、为抗日培养人才，东北军应枪口对外、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三个中心问题，同张学良将军畅谈。他连续安排了五次时间同我们长谈，我们谈时他听得十分认真仔细，时有插话、提问。他曾坦率地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们佯做没听懂，他便直截了当问我：“宋黎，你是不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员不能随便暴露政治面目，所以我回答：“不是。”后来听说，他当时即判断我是共产党，曾同别人讲过这一

猜测。

经过五次长谈，张学良将军认真看了我们写的意见书和宣传材料，感慨地表示：“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先父坟墓还在东北，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东北青年、东北军、东北人民应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将军初述衷肠后，要我们暂留西安，并持其名片拜访杨虎城将军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我们回答：“杨将军那里已经去过了，并得其赞助。”张学良将军强调说：“正因为我没在家，杨将军照顾了我的学生，才请你们再去代为致谢。”当时，我们只当此举为官场礼节往还，并不了解张、杨两将军为了抗日都在努力团结对方的良苦用心。

东北军奉命进驻西北，在国民党特务的挑唆下，张学良“失之东北，收之西北”的感言时起时伏，造成误解。杜重远、高崇民、车向忱等为了东北军、十七路军、东北人民、西北人民，以西北为依据，团结抗日收复失地，努力与之疏通。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均有抗日图存、团结合作之意。我们至西安直言团结抗日，杨将军已表示支持，此时由我们执张学良将军名片代表他再行拜谢，正是借此表明所思趋一，愿与之合作抗日。

主动营救东大在平被捕学生

1936年2月底一天晚上，张学良将军派副官将我们三人接至公馆，手持电报告诉我们：刚刚收到东大文学院方院长来电，内称东大有40多名学生被捕。并直言不讳对我说：“你也在通缉之列。”听到消息后，我们说：“请校长想办法营救。”张学良将军说：“北平方面诸多情况不明，我正在设法了解。”分手时嘱咐我们：“你们先不要回北平。”晚上回到住地，韩永赞接到爱人东大学生徐琳从北平来信。当晚，我们决定，由韩永赞绕道天津，返回北平了解情况，速去速回。

当时“一二·九”学生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为了镇压抗日力量，北平当局根据南京旨意，在北平大肆逮捕，东大40几名学生，在此次大逮捕中遭到囚禁。我们正为之着急，几天后，张学良将军又把我们接去告知：北平局势紧张，我去电给宋哲元、刘哲，均未回电。据说当局拟杀八个学生，不知确否，也不知有没有东大的。事不宜迟，你们可从“总部”物色一合适人选，速去北平了解情况。我们再三思考，觉得“总部”众多东大毕业生，虽不乏人才，但已离校日久，情况不熟，困难重重。我们商量后，向张学良将军提出，北平情况我们较熟，还是由我们回去为好。张学良将军顾虑我在通缉之列，所以沉思良久，问我是否与北平司令部邵文凯相识（邵原是东北军驻北平的宪兵司令），我回答不认识，也没见过。张学良将军说：“你持我的亲笔信去北平见邵，把东大被捕学生营救出来。”随即亲自为我化名宋梦南，以其秘书身份赶赴北平。他在给邵的信中写道：“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对家乡子弟要更加爱护。特派秘书宋梦南全权处理被捕学生事宜。”他又交代说：如果学生没问题就就地释放，如已判刑在北平释放有困难，带回西安释放。待学生问题处理完，你再去拜访王卓然，只说我带有口信给他便可。临行时嘱咐我：“你在北平若遇到什么麻烦，立即电告。”

我潜赴北平后，径直面见邵文凯，邵为张学良将军部下，得知我是张学良将军秘书，热情款待。他看信后说：“我给张副司令添了麻烦，实在对不起。”他向我介绍说：“被捕的学生闹得太凶，我给他们戴上了手铐、脚镣压压火。这些学生没什么，我可以就地释放，请副司令放心。”我说：“副司令听说要杀八个学生，他非常关心。”邵文凯摇头：“没有这事。宋哲元对学生很有气，但无此意。”接着他又说：“现在抓了些学生，可是头没抓住。头子是宋黎，他是共产党，听说在西安。请你转告副司令，

务必把他逮捕。另一个是邹素寒，他去上海了。”听到这里，我已知道了对方的底细。随之，邵文凯遵张学良将军旨意，将东大被捕学生就地释放。

我去拜访东大秘书长王卓然，传达了张学良将军的口信。他听后说：“张校长转变了，我跟不上了……”

过一会儿，有侍从通报，外面有人言称要捕家中来客，现因在家中不便，只待出去就捕，于是我告诉王说：“请你给张副司令发电报，告诉我在你家中遇到难处便可。”王卓然忙解释说：“哪里，哪里，你是张副司令秘书，又是全权代表，邵文凯敢把你怎样，我就去见他。”大约一小时后，他回来说：“邵文凯讲，既然宋秘书就是宋黎，这人胆量真大，倘发生问题，更对不起张副司令。他要你从速离北平，要么还得派人保护你……”当夜，我索性宿在王卓然家。第二天，乘王卓然汽车离开那里。

东大40几名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和我能在北平安全地完成任
务，是张学良将军全力营救和保护的结果。张将军救出的这批学生均为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后来多数成为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张将军对东大学生关怀备至，临危抢救之情，始终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我从北平返回西安，汇报了营救东大被捕学生经过，张学良校长很满意。他为了培养抗日人才，毅然改组东大，选派周鲸文先生接替东大秘书长，这充分显示了张将军对东大前途的关心和对
学生意见的重视。

创办学兵队 为东北军抗日培训骨干

3月，我从北平返西安复命不久，“东大”和“东中”在西安的学生代表组成联合代表团，以慰问东北军的名义到部队宣传抗日打回老家去。我们请张学良将军派了一辆卡车，并向他

募了款，用以筹办慰问品、宣传品。联合代表团打着大旗出发后，张学良将军密召我立即去洛川。我被安置在洛川的一个院里，吃住条件都很好，就是不准走出院门。十来天的时间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来看望过三次，他透露：“副司令调你来，是想让你做代表跟共产党谈判。”后来张学良将军对我讲：“原让你去开的会，现在我亲自去。你以秘书身份，到洛川前线部队去考察。”按其吩咐，我先后到东北军六十七军各师及一〇五师一部，分别召开连、营级军官座谈会，一面了解情况，一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前后历经一个半月。考察中发现，东北军抗日复土愿望虽然强烈，但多带自发性。连、营级军官，不仅数量不足，政治素质也很差，旧军队习气甚浓，而且多受“攘外必先安内”影响，是军官中抗日最薄弱的环节，需要充实和加强领导。

考察结束，我草成报告，分析了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现状，提出应及早办千人规模的陆军学校，以培训东北军抗日骨干。军校培养对象应主要是中下级军官。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交由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另一份请他转送张学良将军。他看后对我说：“你虽然是个学生，但看出了我们部队存在的要害问题，我一定转给张学良将军。”

174

返回西安，我向东工委书记刘澜波汇报考察始末，他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和建议，要我再向张学良将军详陈设想，以促军校早成。我按其所嘱，进一步详细阐述设想，呈交张学良将军。

7月，张学良将军将我接至公馆，对我说：“你写的两份报告我都看过。办陆军学校，为东北军培养抗日中下层军官，这一设想很好。但军校统一由国家来办，东北军自办军校南京不会同意，莫不如办个学生队。学生学当兵总是可以吧！”张学良将军紧接着又问：“学兵队员从哪里招收呢？”此议至关重要，倘若学

员素质差，则短时间很难培养成抗日骨干。我向张学良将军建议：“应从学生运动中挑选积极分子受训。”他说：“很好，最好是家乡子弟，办学生队具体事宜你同参秘室主任应德田商议处理。”

承担任务后，在卫队二营筹备招生的同时，我又将详情向刘澜波汇报。他高兴地说：“这件事由你来做，两全其美，既可保证党对学兵队领导，张又满意。”随后，刘向北方局汇报了拟成立东北军学兵队情况，得到赞许与支持。在北平地下党、学联支持下，选拔“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分两批由北平至西安。从8月底至西安事变前，先后编成三个连。第三批因西安事变交通中断，有的回了北平，有的去了延安，极少数辗转到西安参加了学兵队。

张学良将军对学兵队寄以厚望。西安事变发生后，学兵队员立即调至重要部门，如军警督察处、抗日先锋队、报馆、文化机关、电台等。大部分队员分配到军、师、团编为五个宣传大队，任宣传员，广为宣传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提的八项主张；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之意义。为稳定军心，提高觉悟，密切官兵关系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特殊有贡献。

175

改组《西京民报》 广泛宣传抗日

《西京民报》是东北军的机关报，当时在西北影响较大。为了占领这个舆论阵地，我曾经与北平学联姚依林联系，邀请他来办报。他很快复函，愿意前往。正在这时，张学良将军在抗日观点上与原主编赵雨时发生分歧，赵因此被撤职。7月底，张学良将军找我，介绍了撤掉《西京民报》主编的情况，问我能否找一位合适的主编，我回答能够请来。我正要向张学良将军推荐人

选，恰值他告知其弟张学曾推荐张兆麟，问我是否合适。该人刚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是共产党员，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学生会主席。在此之前我便与之相识，此人选很理想，又为张学良将军提名，我极表赞成。张学良将军便要我设法将张兆麟请来，我应允去函相邀。张兆麟见信后，即赶至西安，又根据我的建议返回北平物色编辑，并请来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刚毕业的积极抗日的东北青年刘克夷。随同黄诚来西安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北平学联代表何东辉，也答应留在西安办报。又留下了阎宝航介绍来的、原《西京民报》外勤记者吴雪生，由他们四人组成新的编辑部，张兆麟任主编，我与张学良将军直接联系。张学良将军时常过问办报情况。

陈翰伯、魏文伯等调到编辑部后，增强了该报社的力量。改组后的《西京民报》主要面向东北流亡集团，反映和增强东北军官兵及东北父老的民族意识，发动群众，争取共同抗日。该报同《西北文化日报》等进步刊物相配合，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东北军、西北军团结抗日，宣传西安事变主张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诸方面，颇具声色，为舆论界所关注。

尊重民意 支持群众抗日运动

176

由于我党争取东北军团结抗日的工作卓有成效，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6年8月29日晚，国民党特务先后逮捕了东大和北平学联两名学生代表马绍周和我。“总部”职员关时润来取学兵队的材料，也被隐藏在我们住室的特务逮捕。在押送省党部的途中，我拒捕呼救，被十七路军宪兵营巡逻队从特务手中截夺下来。十七路军宪兵营巧与特务周旋，在西安绥靖公署一些官员的帮助下，杨虎城将军得知后，决定通知张学良将军，张将军立即派人把我接到张公馆。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代表和职员，

下令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事后张将军得知，此次捕人是根据蒋介石的密电，当天深夜立即按此密电名单逮捕了刘澜波，第二天逮捕了孙达生。这一天按韵目排列是“艳”字，因此这天晚上发生的上述事件被称为“艳晚”事件。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及东北军、十七路军，不惜冒政治风险把被捕的人员全部营救出来，使其幸免解往南京审讯，我们永志不忘。

“艳晚”事件实际是西安事变的前奏。这一事件对增强张、杨两将军及东北军、十七路军两军的团结，东北、西北人民的团结，促进逼蒋抗日局面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艳晚”事件发生后，西安很快发布了“援救宋、马及声讨特务蹂躏人权、执行日寇使命的宣言”。“艳晚”事件后，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一扫西安沉闷的政治空气。

“东工委”为了有组织地进行抗日活动，更有效地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积极主张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参加者上至东北军将官，下至东北普通百姓。“东救”是西北第一个公开成立的，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抗日救亡组织。1936年9月18日，东北民众救亡会筹委会组织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大会。与会人员有东北军官兵、东北讲武堂、东北大学分校、东北子弟小学师生、东北民众和西安各学校师生，计有万人。张学良将军应邀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他心情激动，态度明朗地说：“东北军没有忘记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和白山黑水，绝不负乡亲们所寄期望，一定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将军胸怀坦荡，明确表示抗日决心，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为“东救”大壮声威。“东救”成立，对东北以及广大群众抗日运动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成了群众抗日运动新起点。“东救”成立不久，秘密成立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公开活动了，对发动和组织

西北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绥远，西北成了国防前线。

绥远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一致声援。西安各救亡团体为援绥抗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各阶层人民群起响应。学兵队全体同志为表决心集体绝食募款。为此，张学良将军接见全体学兵队员，对大家关心时局表示嘉许。他语重心长地讲到自己身负国难家仇，抗日复土之心与大家相通。但抗日绝非一时血气，须举国齐心协力，方能达到驱逐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国内意见不一致，问题不解决，抗日只能是空谈。真情大家尚不了解，现在不便言及。张学良将军最后表示：“我要尽快促成一致抗日局面，绝不在你们面前食言。”11月27日，张学良将军致电蒋介石，请求率东北军援绥抗战。他在电文中恳切地说：“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他诚恳地请求“迅颁宠令，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但被蒋介石断然拒绝。而群众的抗日援绥运动却在继续发展，直至西安事变以后。

178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逼蒋抗日，为了更加坚定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走上抗日战场的决心，地下党组织决定，于“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发动西安各校学生及市民，举行游行请愿示威。在游行前夕，“西救”、“东救”、学联邀集近百人讨论，写成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上蒋委员长的万言书。为了试探国民党反动派动静，训练游行队伍，鼓舞斗志，在各街道组织街头讲演，宣传抗日。蒋介石的军警、宪兵特务未敢阻拦。经过三天的街头宣传和周密准备，西安学联、“东救”、“西救”在12月9日，共同组织了纪念“一二·九”一

周年游行请愿。事前我曾请张学良将军向游行队伍讲几句话，表示一下抗日态度。他忧心忡忡地说：“蒋委员长住在这里，我不便出面。如坚持游行，我虽有军队也无法保护群众，学生吃亏将在眼前。”

果不出所料，国民党特务、宪警竟开枪打伤一名竞存小学学生。游行请愿队伍盛怒之下执意赶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面陈。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连忙带人前去阻截游行队伍，灞桥一带如临大敌，架起机枪。蒋介石急令张学良将军制止事态发展，否则“格杀勿论”。张学良将军知道事态严重，立即找我劝阻游行队伍前进。适时，我正在为游行队伍筹集食品，没有找到。张学良将军急不可待，驱车径直追赶游行队伍。至离临潼只15里处的十里铺才相遇。游行队伍高呼：“我们愿为抗日而死！”张学良将军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站立在一个土墩上，大声疾呼：“你们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我的要求比你们还强烈。祖宗坟茔尚在东北，我无时不挂记抗日复土，倘一息尚存，最后一滴血也要洒在抗日疆场。请把请愿书交给我，我一定转交委员长。请大家放心，一周之内，我将以事实回答大家。”游行队伍听从劝阻，返回西安城里。

赤胆忠心 为民请命

179

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全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蒋介石却调集30个师左右的兵力，对西北形成包围之势。12月4日，蒋介石偕陈诚等20余位军政要员，亲临西安坐镇，向张、杨两位将军摊牌：或按军令“剿匪”，或奉命将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予以“整训”。蒋介石限三日作答，并已内定蒋鼎文取张而代

之。张、杨两将军与蒋的矛盾日趋白热化。

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多次向蒋介石陈述国亡无日，应该停止内战。12月7日、9日，张将军又一次进谏，面陈用军事围剿的办法消灭不了共产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行不通，统一中国只能政治解决，抗日才是中国惟一的出路。他一再苦谏，乃至哭谏，均遭蒋介石严词拒绝。张、杨两位将军既不能按军令“剿匪”，也无法奉命调出“整训”。为达逼蒋抗日的目的，毅然决定“兵谏”。12月12日通电全国，发表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将军撤销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组建了“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委任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集团军指挥官，何宏运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克日北上，光复失土。因西安事变，南京讨伐西北而未能实现。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救”、“西救”、西安学联等18个团体联合通电全国，响应和拥护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八项抗日主张，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联共抗日。”16日，“西北各界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抗日主张市民大会”，于西安革命公园隆重召开，计有10余万人参加。乐曲声中，张、杨二位将军及各救亡团体代表、欧洲华侨代表、工农商学兵妇女界代表登上主席台。落座后，张学良将军压低嗓音问我：“没请马占山将军吗？”我回复已请过。张学良将军吩咐我再派人去请。抗日将军马占山派他的代表来参加了大会。

市民大会由西北爱国民主人士杨明轩主持。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先后讲话，阐明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张学良将军说：“我同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

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乘军用飞机去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大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切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上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双十二’的事件”，“置生死毁誉于不顾，为民请命”，“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至于最后胜利，还赖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争取……本人一定竭尽智慧，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民族解放目的，誓不休止。”市民大会最后通过了“请求政府立即召开各党派的救国会议，建立救亡政权”，“请求政府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收复失地”等15项提案。

12月17日，由周恩来副主席率领的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及随行人员先后到达西安。中共代表以中华民族大业为重，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得到张、杨两将军的赞同。12月23日，以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周恩来副主席为一方，同

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①。24日谈判达成六项协议。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保证，执行这些决议。至此，伟大的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25日，张学良将军为示诚意，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从此我与之一别转瞬50载，我常常默念张学良将军“万里碧空孤帆远”的诗句，追忆往事，不胜依依。

（宋黎，原为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西安事变时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五 延安谈判

洛川会谈前的形势

1935年9月底到11月下旬，红军在陕北消灭东北军三个师。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消灭一一〇师，击毙师长何立中。10月22日又在甘泉东南的榆林桥消灭了东北军一〇七师的六一九团团部和四个营，生俘团长高福源。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和十五军团会师，11月21日在富县西南直罗镇消灭一〇九师。在黑水寺又消灭一〇六师的一个团。这样，就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整个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政治上，党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对于洛川会谈有着直接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① 《周恩来年谱》1936年12月23日记载：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谈判。同日另记：和宋美龄谈话。12月24日记载：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

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俘后，根据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治伤，生活上备加照顾，经常给他讲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在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影响下（程子华和彭德怀都先后做过高福源的思想工作），高福源主动请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抗日的主张，说服东北军，包括张学良在内和红军联合抗日。他向红军保卫局局长（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李克农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报告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毛、周都同意，周副主席指示，要高福源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之后多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6年1月初，高福源回到东北军，通过他的同学，六十七军参谋处长佟铁肩见到了王以哲和张学良，面报了他这几个月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张、王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要他赶回瓦窑堡，请红军派一位正式的代表来谈判。

1月16日，高回到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后，李将他带去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王以哲。

我原在军委二局工作，临时抽出来随李克农一起去洛川。大约是2月10日左右，李克农和我去见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说：“根据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这次出去和东北军张学良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有一定的困难和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精神准备，力争谈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谈和。谈判要按照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中央决议来谈。”同时指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的问题和经济通商问题。这次出去，任务很重，重大的问题要及时请示，电报中央。周副主席还指示：克农是正

式代表，代表团总的负责人，镜元负责机要译电工作。并指定了密码，研究了密码携带隐蔽的方法。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激动，精神振奋，深感任务艰巨，决心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不怕任何危险，坚决完成中央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我们出发前两天，周又以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我方代表李克农等四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洛川会谈

2月21日我们从瓦窑堡出发。李克农是正式代表，穿中山装，我负责机要译电，着学生服，钱之光是国民经济部贸易局局长，他负责采购物资和药品，当时戴礼帽、穿长衫。还有一位警卫员，负责保卫工作，穿便服，高福源带路，他是农民打扮，头包白毛巾。我们全都骑马，另外有几位护送人员和马夫，也都是农民打扮。

我们去洛川谈判是绝对秘密的，整个谈判工作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周恩来亲自布置的。毛主席于1936年1月上旬、周副主席2月下旬先后离开瓦窑堡东征，我们谈判的情况和请示报告都直接以密电发往前线——山西石楼。

25日，天下着鹅毛大雪，路滑雪深，行走困难。中午我们到了富县，先在富县城外山下一个小村子休息。高福源先进城联系，山上守城部队东北军的一位团长立即出城迎接我们进城，东北军的一位师长宴请我们。中午饭后，护送我们的同志和马夫牵着马回瓦窑堡去了。我们骑东北军的马，是骑兵用的马，一色纯白，由东北军护送，当天下午5时左右到了洛川。

王以哲六十七军的军部在洛川，王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热情接待我们，让我们住在离军部很近的一座独院里，是四进的院

子，我们住在最里面。我们于2月25日晚上，即电告党中央，李等四人已安抵洛川。我们没有带电台，是由东北军六十七军的电台，用自己的密码发出的。同时，王以哲亦于当晚电报张学良，汇报我们到达洛川的情况，张学良回了一个电报，说他因事要到南京去，暂时回不来，要王以哲、赵镇藩先同我们商谈六十七军和红军局部合作问题。重大的问题等他回来以后再谈。

这样洛川会谈，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是从2月26日开始到28日，经过二三天的谈判达成以下口头协定：

1. 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

2. 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即富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 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柴草、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告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送进城内，恢复正常通商关系。

4. 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

5. 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前往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暂时掩饰外人耳目，红军去白区办货，东北军入苏区办货均穿便衣。

2月28日上午8时，我们电报中央。28日23时中央回电同意商谈结果和协定。双方约定口头协定，于3月5日秘密下达到部队实行。

在谈判期间，王以哲掩护我们的采购人员两次到西安采购物资。并收集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西安各大城市的报纸。他们还送给我们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四省的军用地图。当

时红军准备向这四省发展。

红军东征打了许多胜仗，中央经常电告我们，我们把电报内容稍加修改，把主要战果先后告诉王以哲、张学良。这对谈判顺利进展很有好处。我军2月20日20时开始，胜利渡过黄河。2月21日占领三交镇，歼灭守备敌军一个营。22日占领留誉镇，歼敌一个营，同时占领石楼，歼敌一个营。26日在关上村又歼敌独立第二旅一个团。3月初，我军越过吕梁山，进至总久峪，逼近同蒲线，并迫使原先进占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晋军四个旅全部撤退。我军威大振，政治影响极大。军事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越打胜仗，谈判就越谈得好，他们越热情接待我们。到洛川的第二天早上，王以哲来看望我们，在互相寒暄后，王以哲说，日常生活，接待方面有不周到地方，请随时转告副官长和参谋处长。在整个会谈期间，对我们招待得非常周到殷勤，生活供应也十分丰盛。当时经常陪我们的是两名副官，参谋处长佟铁肩和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也常来。每天吃过晚饭还经常一起娱乐，一起下围棋。我们到陕北后，在瓦窑堡磁窑烧了黑白围棋子，我略懂皮毛，其实以下棋为名，继续交换意见，互相了解，增进友谊。佟铁肩对我讲：三民主义主张世界大同，共产党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也是世界大同？我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完全一样。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好的。可是他不承认有阶级，不主张阶级斗争，只认为中国有大贫小贫之分。共产党认为中国有阶级，有地主、有资产阶级，有工人和贫、雇农，我们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制度。不消灭阶级，不消灭剥削制度，怎么能实行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佟、宋二人表示赞同。

3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同参谋处长在一个套间的外屋下围棋，陪同我们的一个副官在下棋的套间里屋对副官长说，军部特

务营长今天下午向他报告，特务营一个连长打了士兵，因为在大街上这个士兵没有向连长敬礼，认为士兵看不起长官。但被打士兵说，正向营长敬礼，来不及同时向连长敬礼。如再责打，就跑到山北边去，山北那边的官长和气，不打骂士兵。副官长听后说，要转告特务营各级官佐，今后对士兵要讲道理，不要动辄打骂士兵，听到套间里屋的简短谈话，想到我军在直罗镇、榆林桥、劳山战役中，俘虏了数千名东北军官兵，经过我们优待俘虏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后，愿意留下的就留下参加红军，愿回原部队的都发给3元路费，释放归队。这些被俘归来的人，都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在特务营的士兵中，就有不少人听到了“神奇红军”和“神圣抗日”的宣传教育。并且，在东北军各部队中都起到了义务宣传“神奇红军”和“神圣抗日”的作用。东北军上下发生了很大的思想变化，认识到红军是朋友，东北军应该联合红军共同打日本，打回东北去。在前线的东北军连队和红军连队，由互相对峙，变成了友好的芳邻。我们的统战工作，在东北军的基层连队，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3月3日，张学良回到西安，3月4日，他自己驾机飞到洛川，一下飞机就到我们住地看望我们。他化了装，银灰色长袍、黑绒马褂、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颇似富商。他来到我们住的大院，是王以哲陪他来的。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大家都很亲切，不感拘束。在会谈开始前，王以哲、赵镇藩把同我们商谈的情况，红军与六十七军合作抗日的口头局部协定内容，向张学良又作了汇报，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吃过午饭，下午3点开始谈判，这是洛川会谈的第二段。张学良首先说，完全同意关于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局部口头协定。并说，我这次是整销，不是零售。李克农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会谈气氛十分融洽，风趣盎然。接着，张学良提了几个问题：1. 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不包括蒋介石？2. 要抗日，如何抗法儿和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3. 共产党为什么不西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靠近苏联，担心我们吃阎锡山的亏）。4. 红军和东北军派代表到苏联请苏援助中国抗日。

李克农根据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和党的政策做了说明：

1.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把东北三省送给了日本，华北也岌岌可危，内战一天没有停止过，还残酷镇压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救亡运动。所以我们不能把蒋介石列在抗日民族阵营中。如果蒋介石放弃反共反人民、不抵抗日本的反动政策，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2. 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争取国际的援助。战争真正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决定于人。发动全国民众，这个力量是伟大的，惟武器论是错误的，抗战是长期、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利用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3. 红军东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东渡黄河去山西，还可以适当解决我军军需和兵源问题。

会谈的气氛是融洽、坦率、诚恳的。有时为了一个问题，李克农和张学良会争得面红耳赤。张学良在其他几个问题完全同意李克农的看法。另外在几个问题上达成口头协议：

1. 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一次商谈。地点定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2. 红军去苏联的代表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

3. 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以灰色名义掩护。

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一结束我们马上将谈判结果电告党中央毛主席，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3月6日上午中央复电嘉勉，完全同意谈判的结果，并要我们到山西石楼汇报。

由洛川到石楼返回瓦窑堡

3月7日，克农和我，以及一位警卫员，离开洛川，北上走延长，到清涧的河口过黄河。钱之光已到西安，采购物资和药品。3月16日到达石楼，我们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张闻天、彭德怀等。李克农汇报了谈判的详细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中央3月27日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应与他做进一步的谈判，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重要。当时中央会议决定由周副主席为全权代表，立即偕李克农到延安谈判。

会后，周恩来、博古、邓发、李克农和我，还有电台机要人员和—个警卫排，离开石楼。于4月5日回到瓦窑堡。本来约定4月初到延安谈判，因张学良患喉疾，推迟到4月8日。

延 安 谈 判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给张学良发电报，内容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20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为：

1.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逼进问题。

3.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 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学良先生有何提议，即祈预告为盼。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我也随行。

我们从瓦窑堡出发时，天就阴着，8日到了川口附近，先是下大雪，后下大雨。我们带的电台和东北军联系不上，中央的电台（在石楼）和东北军联系上了。9日晴空万里，上午张学良带着王以哲、刘鼎由洛川飞到延安。晚6点多钟，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这时周恩来和李克农换上便衣，周是穿一身黑色的中山装。周、李随来人进城谈判，我们在川口等着。我们警卫部队控制了机场，在谈判没结束前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会谈的地点是在城内的教堂里，这个教堂后被日本飞机炸毁，有些人就误以为谈判是在桥儿沟的教堂，在桥儿沟无法保证安全。参加谈判的共五个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还有刘鼎，他是从上海到西安的，张学良知道刘鼎是共产党员。延安谈判后，他作为我方联络代表常驻西安。

谈判开始，张学良首先把他关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坦率地说出来，请教恩来。张学良说他对国民党不抱什么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法西斯的道路。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现在开始有了怀疑。想听听周恩来先生的意见。

周恩来说：法西斯主义是独裁、专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最反动的产物，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只能走共产党引导的道路。中国要抗日必须首先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抗日还必须实行民主，要发动全国

广大群众，全国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比伟大的，依靠全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获得抗日的最后胜利。

张学良又问，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应如何对待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在统治着，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他根据回国两年的观察，蒋介石还有抗日的可能。张学良对于要抗日必须首先改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表示完全同意。他说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设法把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并说，他现在不能反蒋，如果蒋介石投降日本，他一定离开另作打算。他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就是为打通西北，自成抗日局面做准备。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

周恩来说：在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斗争中，对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问题，是可以考虑的，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重要方针政策，他个人不能决定，愿意把张学良先生的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再作最后答复。这是张学良对我们战略决策的一个帮助，他了解国民党的情况。周恩来对张提出的其他问题，也做了具体的答复。张学良对周恩来精辟的论述，科学的分析，高度的政治修养，政治家的风度，十分敬佩。他是心悦诚服。

另外还达成了口头协定：

1. 我们赴莫斯科的代表由新疆到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后中央派邓发同志去苏联。

2. 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张学良完全同意。

3. 张学良没有公开表示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占苏区，六十七军准备开到延安以北一带来。1936年6

月，我们主动让出瓦窑堡，即是恪守延安谈判协议的一例。

4. 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5. 张学良认为红军主力在山西恐难立足，去河北太早。最好去绥远靠外蒙。如我坚决东进，他可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6. 互相通商。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他们代购，子弹可供给。

张学良对谈判十分满意，他拿出二万块光洋，说是他私人的钱，支持抗日的，谈判后他又送给我们 20 万法币。

谈判 10 日早 4 点结束。4 月 10 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刘鼎一起回到川口，当天下雨，在川口住了一天一夜，马上给中央毛主席和张闻天、彭德怀发了一封电报，简单地报告谈判情况。11 日 20 时又发了一封长电，详细地汇报了谈判的情况。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的，并及时译成密码发出。

4 月 12 日我们由川口动身，很快回到瓦窑堡，一路上天气很好。到瓦窑堡后我们各回原位，我回到军委二局工作。

（戴镜元，时任中共谈判代表团译电员。）

六 临潼扣蒋

蒋介石来西安

1936 年 12 月 4 日，蒋介石再次来到了西安，住临潼华清池。在这之前，蒋曾在 10 月 22 日由南京飞西安，他在逛了两天华山后，就宣布大举“剿共”计划。张、杨均表示反对，但蒋仍坚持其反动主张。并在 10 月 26 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引起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在华清池同张的争论，更为激烈。张学良请求蒋介石释

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等七人，蒋拒不答应。张说：“你这10年，就是袁世凯第二了。”蒋气急败坏地嚷道：“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唠叨。”

此次蒋介石来西安，是为了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同时解决西北问题，即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进行“剿共”，否则即调离陕、甘逐步消灭之。所以，这时的西安空气是非常紧张的。

张学良暗中准备扣蒋

蒋介石是非常顽固的，但张学良仍想劝他改变政策。12月6日前后，张还抱着劝蒋回头的愿望，向他恳切陈词：叙述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惟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说话间，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勃然大怒，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违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甚至是反革命。蒋拍案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由此张和蒋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上这时又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华密”电报^①，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南开福建，加以消灭。因此，为了联共抗日救国，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张学良必须破釜沉舟。

^① 1936年12月初，王化一由武昌打电报给张学良，说：何成浚秘密告知，他在洛阳时，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分离开，请副司令有所准备，等等（大意）。“华密”电报是张与王单独约定来往的电报密码本的称呼。——作者

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请示张学良派卫队营的士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张同意，我即命令王协一连长派该连的王振东排长率领士兵20人跟随游行队伍。

张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乃亲自乘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劝阻学生，对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张表示：“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张学良说的都是内心潜藏已久的话，记得在金家巷公馆吃饭时，他曾对吕正操和我以及秦德纯等人说过：“谁都有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有‘赌’的哲学，虽然输一次两次，但只要不散局，总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捞回来的。”

学生们听到张学良的话，都很感动，觉得满意。天色已暗下来，队伍停留在凛烈的寒风中，经领队的布置，有的立即回城，有的当夜留在十里铺。我们派去保护学生的那20名士兵，和他们一道住下。这20名士兵后来参加了扣蒋的战斗。

9日晚间，张学良又一次在华清池与蒋介石争论。蒋当时怒气冲冲地对张说：“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

与他拼命。”张一直到深夜才愤愤而归，烦闷地对我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10日上午，我又要求到华清池察看一下周围的形势，又叫王协一连长亲自率领沈连峰排士兵30人到十里铺去，会合王振东排长，加强力量，再向前进到灞桥，夜间不要撤回来，其用意是尽量缩短与华清池的距离。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告诉我说，他已和杨虎城谈妥了，要我做好充分准备，并说：“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急。”根据张的指示，我即派商亚东（同昌）副营长率领张连长等约一连人再去灞桥，与王协一连长等会合，日落前到达宿营地。

下午6时许，我又命令卫队营营部王副官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的汽油。9时左右，我叫王副官速派车去灞桥待命，以供卫队营行动时使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结果是，张负责临潼扣蒋，杨负责扣押蒋的军政大员和城内警戒。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在积极紧张地进行着，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就要发生。

11日，白天张仍然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和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不料这时蒋介石打电话将张学良召去了，我请求随张同去华清池，张坚决不许。

195

“兵谏”前的最后动员

晚8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去做宴会的主人。10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到达会客厅时，已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激流、董英斌等人坐在那里。张见了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

没等我回答，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

这天的晚间，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其余高级将领均来到张的公馆。张在宣布“兵谏”计划时，用极沉痛的话对大家说：“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张说完后，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一个人问：“第二步怎么办？”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

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动员之后，张学良即带领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澂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

我到开元寺白凤翔家，白迎我坐下后说：找刘桂五共同商量。我因张未对我说有刘桂五，即说：“我们俩商量决定后，由你转告他吧。”于是我们约定后半夜两点钟，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入口处）碰头，由白乘小汽车接我，然后一同去灞桥与卫队营队伍会合。这时已是深夜 12 点多钟。

被扣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首次见面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

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

上午 10 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直回东城门楼上卫队营营部，向卫队营的学生队简要地介绍了临潼扣蒋的情况。

蒋介石迁居

12 月 13 日晚间 11 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

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

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1点钟了。

次日（12月14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当日（14日），端纳飞到西安，他是宋美龄请他来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就拍了电报给宋，说““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宋接电后请端纳于13日由南京起飞，因气候不好，在洛阳停留一天，14日才抵西安。端纳与张学良见面后，张告知一切经过情况，郑重声明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够联共抗日，不打内战，还是拥护他的。并请端纳告知蒋，是为了他的安全，才请其搬到金家巷附近新房去住的。

蒋一见到端纳非常高兴，又从他口中证实张学良要他移居的真意，就同意迁居，于是随同端纳一起搬到了高桂滋公馆。

（孙铭九，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

第七章 摆队送客 南京受审 山崩于前色不改

望着绝尘而去的飞机，匆匆赶到机场的周恩来望着邈远的天穹，慨然叹道：汉卿是看旧古书看多了，他是要学黄天霸，摆队送客呢；睚眦必报的蒋介石惊愕于“北方汉子”张学良亲自护送他回南京的“义举”；面对李烈钧会审中的严词诘问，张学良面带笑容，直言不讳，侃侃而谈，李烈钧私下赞道“真不愧为张作霖的儿子”……一方面是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无尽牵念：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中共提出释放政治犯名单的第一人即为张学良；1949年，周恩来获悉张群被卢汉扣押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汉卿有救了”；1961年，在西安事变25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流下了怀念“千古功臣”的潸然热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张学良得到的知己是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由千百万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青灯黄卷度余生的张学良足矣！

一 身陷南京

1936年西安事变那年，我正充任西北“剿匪”总部办公厅第二科（机要科）科长。张学良将军于12月25日释放了蒋介石，并亲送回南京。当晚西安方面决定，派我于翌日搭释放陈诚等人的飞机去南京，为张将军担任秘书工作，因之得伴随张将军度过他失去自由以前的最后几天，直到他于同月31日晨去受审判为止。

释蒋的那一天

西安事变进行到12月20日以后的那几天，人们已经多少有些感觉：要变。但不知怎样变，更没料到蒋走而张将军还要亲自随送。

25日上午，我在新城联合办公室，隔窗望见张将军和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钊在杨虎城将军住的洋房外空地立谈，许久才散。过后，我才知道谈的就是关于释蒋的事。听说洪当时向张将军陈述了意见，张将军曾说：“是功是过，将来自有定评”洪答：“从古至今，信史是不多见的。”也谈到不要送。张将军说：“我这次不去，南京以后总是要去的，就索性这次去。”

25日下午，我们正在新城西厢办公室内办公，秘书郭维城从外面回来，没等坐下，就说：“走啦！”随后又说：“蒋老总走啦，副司令也走啦！……”我听了，心里感到无可奈何似的。

原来25日下午释蒋，张将军随送，分乘两架飞机。当晚到洛阳，住一夜。翌晨，由洛阳飞南京，乘的仍是两架飞机。张将军和宋子文同机到南京。和蒋乘一架飞机的为黄仁霖等，张将军的内差于锦文也在蒋的机内。这是因为蒋在西安时从新城移至高

桂滋住宅以后，都由于锦文侍候，现在蒋虽然放了，可能认为于的任务并未終了，所以仍上了蒋乘的飞机。当飞机要在南京着陆以前，黄仁霖对于说：“飞机到南京后，我们就回家了，你下飞机，可在机场等候张副司令。”所以于下机后，待张将军所乘的飞机到达，径随张去北极阁宋子文宅。

北 极 阁 六 天

26日上午10时，送陈诚等人的那架飞机，由西安起飞，我和总部副官处上校副处长周文章都上了那架飞机。但周是单独行动，没奉谁的派遣，所以他到南京后，也没和张将军常见面。那架飞机共搭释放的人员10余人，除了陈诚之外，还有蒋作宾、朱绍良、陈调元、蒋方震、陈继承、万耀煌、钱大钧、晏道刚等人。钱大钧因为负伤，在飞机内仰身半卧。中午稍过到达郑州略停，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曾到机场周旋一番。继续起飞后，于下午三四时到达南京机场。场内欢迎的人不少，而且正燃放爆竹。我和周文章最后下机，在场内见到阎玉衡（即阎宝航）先生，他说：副司令上午已到，住在北极阁宋宅。因即同他一起去北极阁，向张将军报到，张将军也把我介绍给宋和宋左右的人。从这时起，我们在北极阁宅住的，张将军以下，有王庆三、刘海山等八名副官，加于锦文和我，共11人，以后未再增添。

宋子文那时在南京，住在北极阁，局面不大。北极阁在南京城内鸡鸣山之巔，因地势较高，即在房内四望，也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灿烂灯火。但我们那次在南京，就无心及此。尤其事变如此结束，来到南京只有听命于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那几天，来看张将军的人不多，即使来，也不过寒暄安慰而已。宋子文当然是经常陪着张将军的，有时也一同出去。不断来

的，还有戴笠。孔祥熙也来过，他和张将军闲谈，张玩笑地说：“我这次，是听候处分的人了！”孔也开玩笑地回说：“有处分，我陪绑去。”东北籍的人来看张将军的，有金毓黻（静庵）、魏鉴（镜如）等。西北总部驻京中校参谋秦靖宇也常来。后来听说，在西安事变中受伤致死的“中委”邵元冲的太太来到北极阁，声称要和张将军算账。但这山，当然不会让她上来的。

那几天，需要秘书办的事不多。一次，张将军向我说：有一册书名叫《革命与变乱之技术》，是拔提书店出版，要我去买，我少停即下山去买，值已售缺。回来，张将军和我说：“雨农（戴笠的字）已经替我找到了，不要买了。”又12月30日夜，楼上静极，张将军正在窗前伏案写什么，忽转过身来叫我，当即交我一短稿，要我在电报纸上译成电码，以便拍发，是发给西安金家巷的，电文大意，是要收电人代查一项消息见复。但这时宋子文来了，张将军和他小语后，转而和我说，那电报不发了，要我烧掉。

31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9时，我正在楼上用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秦靖宇惊慌失措，请我快送他下山。约11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那天傍晚，宋又和我谈，仍重复“不骗人”的话，并说：“我今晚要回上海去过年，北极阁这里没人了，你可以和我一同去上海，但五天转眼就到，在南京等候，比较方便，你两人（和于锦文）可以到财政部去住，我已经接洽好了。”我同意留在南京，当晚在万家灯火之际，我和

于锦文就移到市中心财政部宿舍，各得门证一枚，可以自由出入。

我们从12月26日至31日，在北极阁住了六天，张将军在这几天内，是相当镇定的，较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情景，恰是鲜明的对比。

在财政部宿舍

我和于锦文住在财政部宿舍，等待“五天后回西安”这一句话的兑现。等五天届满第六天的到来，心情上盼时间过得快些，一方面又觉着时间过得特慢，体会出“度日如年”。想起宋子文说的：“我姓宋的不骗人”这七个字犹余音在耳，不会有错。但如果万一有失，我们将无可奈何。那五天招待得还好，也没有多大监视的意味。只是当如果有人来访我们，停得稍久，传达室有时也来电话问一问：客人是不是走了？官方照看我们和常到我们宿舍闲聊的人，有陈大斋、边科长、邵专员等人，而以邵每日必到。

那几天我办了以下几件事：

一、有几位在南京的东北人，每天晚上要到中央饭店交换些消息，议论一番，我也每晚必去。这些人有王化一、关吉玉、吴瀚涛、吴焕章，以及秦靖宇等。号称东北元老刘哲、莫德惠，最后两天也到了，就住在中央饭店。

那几天大家所谈论的，几乎包罗万象，例如：

（一）副司令送蒋到南京来，南京方面的人“炸”了，认为副司令瞧不起他们。

（二）委员长已被包围，像戴季陶等都垂泣以道，一定不让副司令再回西安。

（三）无所谓包围，主要还看委员长自己怎样决定。

(四) 陈诚已经说过：委员长饶，他也不饶。副司令的对头不少。

(五) 宋子文可能保证力争，但也恐怕孤掌难鸣。

(六) 副司令为啥要亲自送来，为什么要离开西安？

(七) “摆队送天霸”，送下山就可以了，还送到老营来！

(八) 副司令如果再回西安，到西安后，将是怎样个情况呢？

诸如此类的话。直到1月5日晚，我到中央饭店，大概是王化一第一句话就说：“回不去了！”这简直是给我当头一击，五天来望眼欲穿，希望终归幻灭！

张将军经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徒刑10年。1937年1月4日，“国府”明令特赦，但结尾处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这是特赦推翻了徒刑10年，而严加管束推翻了特赦，结果等于判处了无期徒刑。经过就是这样，真使人啼笑皆非！

二、那八名副官被押在南京宪兵第八团，我和于锦文前往探视一次。其后（大概是五天以后）我和阎玉衡先生为了营救他们，又到上海一次，去见宋子文，经过一番周折才开释了。

三、一天晚上，戴笠的办公处通知我们去收译西安来的一件电报，我去了。电报内容，还是为张将军受审事，询问情况，但电报是谁来的，记不清了。

四、张将军被管制后，由南京移奉化。留在西安的首脑们，曾由米春霖、鲍文樾以及秘书李荫春去奉化面见蒋介石，拟对张将军之事有所陈请。米、鲍过南京时曾停留。及抵奉化，蒋介石对他们说：“汉卿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我是留他在这里多读几年书。你们回去吧！”米、鲍等略受招待，逛一逛四明山水，就扫兴北返。

二二事件时，我还在南京、上海等地滞留。因为当时在西安的首脑们对蒋介石还存有幻想，还认为张将军有可能回西安，令

我继续等候，以便同回。直至4月初，我始奉西安指示，回到西安。

(王中立)

二 噩梦伊始

我去见被扣留后的张学良

1936年12月28日，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第三天，我接到宋子文的通知，约我到北极阁他的公馆一谈（张学良刚至南京时被扣在此）。我怀着对张学良的生命安全的焦虑心情，立刻前往。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又说：“我已经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这个似从天外飞来的任务，使我当时惊讶而又欣喜，我表示接受后说：“我可以和张副司令见面谈谈吧？”“是的，副司令就在小客厅等着你呢。”宋子文边答应边带路。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说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但是到底有什么把握呢？我沉默地注视着他，期待着他的答复，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我领会了。我说：“好吧，我去一趟吧。”张说：“你走以前，还要去和蒋夫人谈谈。”“是的，我就去。”我边辞去边答应着。

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保证”

我离开北极阁，就去见宋美龄。她说：“阎先生，你辛苦一趟吧，这回事情险些闹出大乱子来，子文和我也跟着吃了苦头，告诉东北、西北军将领，副司令几天就回去，大家要安心，不要再闹出什么问题来。”又说：“见着杨虎城先生，说我问候他的老母亲，在西安时没得机会去看望她。”我答复一切照办之后，问道：“你和子文都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可有什么保证吗？”“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她宣誓样地答复。“好了，那我就这样对东北、西北军将领传达吧”，说着我就告辞出来。

一 蒋介石背信弃义

次日晨，蒋介石的空军司令毛邦初偕同派去西安接收飞机的两个军人来到机场，毛把这两人向我介绍一番后即离去。当日飞抵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立往新城。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无论新知旧交，大家相见甚欢。当我传达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踊跃。杨虎城看过张学良的信后表示，“这没问题，飞机给他们放回去。”

1937年的元旦，西安举行了阅兵典礼，我被邀参加。正在庆祝新年，欢腾鼓舞，准备迎接张副司令的时候，鲍文樾从南京飞来，气急败坏地报道，张副司令已受军法审判，从宋子文公馆迁往别处，任何人不准接见。蒋介石背信弃义的骗局揭开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顿时感到愤慨莫名，当场一致表示必须要求南京履行“诺言”，放回张学良将军，由东北军、西北军将领联名分函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戴笠、张继等，交我带回。

临行前夕，刘多荃师长邀我吃晚饭，在座的有孙铭九、应德

田等，周恩来同志也来参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在这次密商如何争取恢复张副司令的自由的谈话中，我郑重地复述了张学良的指示：“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要争取他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坚持团结到底。”我说了这句话之后，又向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

何应钦企图继续内战

元月3日，我乘鲍文樾所坐的专机飞往南京，还有杨虎城应何应钦的要求而派去南京的李志刚、王芑生也搭同机去南京。

次日抵达南京，下榻中央饭店。探悉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戴笠等均已去沪，只有何应钦、张继两人在京。我同李志刚商定先去见何应钦。我们一就座，何应钦便问道：“西安情形怎样？”我答复：“很平静。”何应钦捏造说：听说挂红旗了？我说：“没有这样事。”“阎先生，你对西安事变善后有什么意见？”何又问道。这是出乎我意料的一问。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思想强烈地指导着我，“和平解决，不可打仗”，我严肃地回答。又说：“这次西安事变，张副司令、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是为了抗日，并不是为了争夺权利和地盘。而且，他们和共产党已经联合起来了，如果打仗，不论结局如何，总是抗日的损失。”何应钦忿然而起。大放厥词：“非打不可。”我插入一句：“还应加以考虑吧？”他说：“这有什么考虑的。”接着大骂张学良，“他抗日，我们不抗日，我们的抗日计划都被他破坏了。”这时我觉得谈不下去了，示意李志刚，一同辞出。

张继口中传出的“审判”

我从何应钦处气愤地走出来，同李志刚去看张继。一进屋，张继不等我们说什么就开了腔：“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姑念他拥护中央不无功绩，国民政府将予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管束。”从此，张学良将军失去了自由，东北军失去了领导，抗战力量受到损失。

蒋介石拒绝接见宋子文

形势的变化发展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以利于全国统一抗战的实现；二是如何保障张先生的生命安全，徐图恢复自由。由此两点出发，我决定去沪找宋子文和宋美龄商谈。我对李志刚说：“我今晚乘夜车去上海见宋子文去，你在这儿把未交到的信设法交到。”这时，何应钦公馆忽来电话请李志刚去，我心里一惊，觉得事机不密，恐生阻碍，不应该对李志刚说出我去沪的行动，不管怎样，由他去吧。

我抵沪后速赴宋子文公馆，很愤慨地对宋子文说：“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宋默然无辞以对。我又把见何应钦的经过和谈话讲给他，并坚决表示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绝不可打仗。张学良将军的生命安全必须有所保障。宋表示赞同我的意见，并说：“你要去奉化和蒋先生谈谈。”接着宋转身又和宋美龄通过电话，回头说：“蒋夫人也同意你去奉化见委员长。”我表示：“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作用，你们对这件事负有道义的责任，不应推却不管。”宋说：“请李石老（李石曾）陪你去好吧。”他即刻用电话邀来了李石曾。李了解此行任务之后表示同意，并和我一样坚持要宋子文同去，宋乃首肯。我们三人

马上驱车到虹桥飞机场，乘宋自用的飞机飞向奉化。

我深以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为虑，在飞行途中向宋、李两人提出：向蒋建议先把张副司令接到奉化，一则以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之心，二则可能借助于张副司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宋、李均表示同意我的建议。

飞机在飞，我在沉思。西安方面如果能按照张的指示行事，坚持团结，张恢复自由仍有希望。其实，在西安方面和中央军两军初步对峙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日报》已经放出有必要时可让张副司令回西安去的空气。飞机徐徐下降打断了我的沉思。我们被接待在武陵中学。

午饭后，宋子文忽然对我说：“阎先生，你同李石老在这儿，我要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这是怎么回事？没见过委员长，你怎么就要回去呢？”我愕然地问道，李石曾从旁递过个眼色：“让他回去吧。”宋走后，李石曾对我说：“刚才公馆来电话，说蒋先生不见他。”

可以推想，宋子文自己对这件事尚有一点责任感，又鉴于西安方面坚决要求他履行“诺言”，见蒋时可能还要争论，至少这样做来敷衍搪塞一下，也算说得过去。而蒋介石决心扣张学良不放，拒绝接见宋子文是势所必然的。

210

蒋介石同意张学良到奉化

次日晨，李石曾来告诉我，昨天深夜，蒋接见了，蒋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还谈了将接张副司令来奉化的意见。李最后说：“还有关于你的‘闲话’。当我问蒋先生知道不知道阎宝航先生也来了，他说知道。我又问：见不见他呢？他说，‘我身体不好，派布雷去见他吧。’当我起身告辞的时候，蒋又说了一句话，‘阎宝航怎么言语挑拨呢？’”

这段“闲话”的由来是这样：当我被骗作为“和平使者”在西安和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晤谈的时候，曾说：在蒋被扣时候，南京是“戏中有戏”，这是指何应钦阴谋企图蒋被杀死或用他们自己的飞机把蒋炸死，然后勾结日本来继续反共扩大内战。我揭穿何应钦的阴谋，这段话无疑地被李志刚所闻悉。我们到南京之后，在何应钦单独传见他的时候，他就把这段话作为表示效忠的情报了。继而我去沪偕同宋、李去奉化见蒋，何亦得知，于是，先发制人，迅电蒋以我进行挑拨为词，以防我口。而“戏中有戏”这一情节，蒋介石从宋美龄托先赴西安的端纳带给他的信里早已知道。因此，蒋对这个“言语挑拨”的闲话仅一提及，更不追究。

何应钦对我行动的监视，更有以下证明。

我从奉化返回上海后，又去见宋子文。宋很关心样地说：“你不要走动了，住在我这儿吧，有特务跟着你。”我说：“我不怕这个，我还要奔走，谢谢宋先生的好意。”这个跟踪我的特务无疑是何应钦所派的。从那个时候起，直到抗战胜利，何应钦不止数次公开威胁说我是共产党。莫德惠和万福麟两人曾为我向何应钦说项。莫德惠且以身家担保。而何冷笑地对他说：“你不懂得共产党和我们的斗争，你也不了解阎宝航的一切。”

211

张学良在雪窦寺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同刘尚清去奉化，我与刘尚清一同被准去见张学良。这时候张已被接到奉化，住在雪窦寺。时在2月初旬，山上积雪未消，寒气侵人，日色黯淡，一踏入雪窦寺，令人不禁有凄凉萧索之感。

刘尚清和张学良晤谈约半小时，退出后，我被引进一间小屋里。屋里生着火炉，而窗户则斜开一扇。和张相见之下，我不知

话从何处说起，转念间，急欲把前此奔走经过作简要陈述。每人话题，张辄以手势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窃听。我最后说：“汉公，为国为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吧。”张微微点首，默不一言。

辞别下山，数十步外，回望张学良，犹伫立门前，目送我们离去，形影孤单，特务环伺。大敌当前，侵略未已，民族危机如此深重，张汉卿总已亲见内战之停止，而身仍系囹圄。

（阎宝航）

三 军法会审

西安事变初起，全国震惊。我当时忧心忡忡，深恐酿成内乱，曾分别致电张学良与杨虎城，劝告他们努力自拔。

致张学良电文如下：

来电阅悉。君非雨亭公之嗣乎？父仇未报更酿内乱，何以为子？以怨报德，威胁主帅，何以为将？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何以为人？为今之计，惟有遵行冯公所示第一条办法，并肉袒负荆，晋京请罪，则过也如日月蚀，前所见，天地之心也。失路不反，闻道犹迷，君岂其然？

致杨虎城电文如下：

文电诵悉。自兄等劫持主帅，海内震骇，人心激愤，斯为特甚。夫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中央之于诸兄倚畀至深，如有意见，尽可商陈。御侮救国，中枢年来积极筹划，已有显著之成绩，兄等宁不知之有素，何冒此大不韪

耶？度兄处乱军中，亦不克自主，然当努力自拔，曷速图之！

事变发生后半个月，至12月25日，蒋始脱险。是日适为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往年此日，我不论住在哪里，一定要宴请知友，以为纪念。但今年无此兴会矣。这一天，中央很多要人都聚集在我家里，会商营救蒋之办法。正议论间，何应钦忽接到电话，据称蒋已平安离开西安，飞抵洛阳，翌晨即可抵京。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高兴。我于是在这天晚上，大开宴会，举杯痛饮，庆祝蒋之平安归来，并纪念云南起义再造共和。

26日，蒋返抵南京，我和中央很多要人都到机场欢迎。蒋下机后，向我表示感谢。

27日，中央党部召开会议，欢迎蒋平安返京。蒋在会上，简要地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会上有少数人严厉谴责张学良，他们说，国家以法令纲纪为重，这次事变的主犯张学良既已同来，应开军事审判，以治其罪。于是决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公推我为审判长。^①

29日，国民政府下令特任我为本案审判长。旋得军事委员会通知，约我到会座谈。我当即前往，见冯玉祥和何应钦都已先到，坐在那里。我和朱培德、鹿钟麟到后，冯即宣布开会。我和朱、鹿作为列席。冯担任主席，他说：“西安事变，全国震惊，现张学良已送蒋委员长回京，经中央决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国民政府已特派李协和先生为审判长，审判官的人选亦应从速决定，请大家提名。”何应钦接着说：“审判官的人选，

213

^① 鹿钟麟《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一文说，决定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是1936年12月29日的事。推李烈钧为审判长也是这天。此处似有误。

应尊重审判长的意见，最好请审判长提名。”我心想：朱培德曾经是云南讲武堂的高才生，蒋、何对他都很信任；鹿钟麟曾经驱逐溥仪出宫，与冯久经患难，现他们二人都列席参加这次会议，如果我提他们二人的名，冯、何一定会同意的。我于是起立提名朱培德与鹿钟麟二人为审判官。冯玉祥要我另外提名。我说：“此案关系重大，应使天下人共见之，必须有北方的贤达参与审判，乃有价值。”经我解释以后，冯宣布决定任命朱培德与鹿钟麟为审判官。

散会以后，我邀请前最高法院院长、法学家徐元浩到我家里，对此案作初步研讨。次日，我又邀请了徐元浩以及和我熟识的法学家 20 余人到我家里会餐并商讨此案。徐元浩先发表意见，他说：“张学良等在西安，对蒋委员长的安全，非但没有尽到护卫之责，竟敢胁迫统帅，勿论其为主犯，还是从犯，其为要犯无疑。此案关系重大，应请审判长从严议处，以申法纪。”在座的人都赞同徐的意见。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不觉已到下半夜两点钟了。我准备了酒食招待来宾。同日，我向国民政府及军委会要求暂调军法官与书记官各二人参加高等军法会审。当天，陈恩普等四人奉命来向我报到。我把他们在这次军法会审中所负的职责交代了一番。又将审讯张学良时准备提问的问题，给他们传阅。他们都表示遵照办理。

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見。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見。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見，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

30 日，我去见蒋。蒋让坐后，问我：审判长对此案将如何处理？我回答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

害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而释放他。”我完全为蒋着想，愿蒋借释张而使国人因此崇拜蒋胸襟的“宏伟”。我接着又说：“我国历史上有两个人，一个是齐桓公，他不追究管仲对他曾有射钩之仇，却拜管仲为相。另一个是晋文公，寺人披几次要谋害他都未得逞。后来有人要谋害晋文公，寺人披闻知赶到晋文公处告发。晋文公先不见他，经寺人披说明来意后，晋文公宽恕他，并接见他。晋文公终于免受一次暗害。这两桩历史事件可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委员长核示。”蒋未置可否。我临走时，又对蒋说，关于此案我将依军法审理。”蒋说：“君慎重审理之。”我于是告辞而出，筹备明日开庭的事情。我对军法审判，素有研究，但此案所关重大，我将慎重审理。

31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偕同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法庭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为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学良回答：“我不知道。”

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样胆敢出此？”

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学良说：“民国2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我说：“是的。”

学良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没等学良讲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朱、鹿两审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从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讞。我将审判经过，分别呈报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鉴核。蒋嗣即呈请国民政府给张学良以特赦，张学良判处之罪刑，免于执行。

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如下：

判 决

被告张学良

右列被告因对于上官暴行胁迫案，经本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理判决如左：

主 文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事 实

中华民国 25 年 12 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12 日黎明，张学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时因公随节赴陕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肖乃华及随从公务人员、卫兵等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月 25 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事变初起，奉国民政府令交本会严办，兹又奉交张学良请罪书到会，经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理终结，认定事实如上。

理 由：

本案报告张学良率部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动，但该被告实为主使发动，亦极明显，自应负其罪责。核其所为，实犯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百零二条第一项之罪。但查其所犯诸罪乃一行为而触犯数项罪名，或犯一罪之方法与结果而触犯他项罪名，应援陆海空军刑法第十五条、刑法第五十五条，依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从一重处断。惟该被告经奉蒋委员长训责后，尚知悔悟，随同旋京请罪，核其情状，不无可恕，并依刑法第五十九条，于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

条第二款前段，减处有期徒刑十年，并依刑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褫夺公权五年，特为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 25 年 12 月 31 日

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 审判长 李烈钧

审判官 朱培德 鹿钟麟

军法官 陈恩普 邱毓桢

书记官 袁祖宪 郭作民

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李烈钧审理西安事变案日期及经过内容

交 办 日 期 25 年 12 月 29 日奉军委会法丙字第一七八〇七号令委为西安事变案高等军法会

审判长（系抄原令稿）

会审日期及地点 25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10 时在军委会军法处高等军法会审（开庭审结）

会 审 人 员 审判官朱培德、鹿钟麟，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桢，书记官郭作民、袁祖宪。

判 决 主 文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判决原文抄附如上）

判决核准日期 25 年 12 月 31 日以法字第一七八九二号呈国府核示，奉国府 26 年 1 月 1 日指令核准

备 考

后 记

抗战期间，李烈钧曾到昆明，住安宁温泉我（李希泌）家里

我所知道的张学良

养病。他在精神较好时，和我谈过他在西安事变时充当最高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经过。他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谋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他问心无愧，有什么畏惧呢？当审讯张汉卿时，张问我在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谏止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何罪之有？他几乎把我问倒了。我无可奈何，只得不让他再讲下去。当时国民党中央很多要人如冯焕章等都是同情张汉卿的，主张赦免对他的处分，释放他。蒋在由西安回南京前，可能表示过保证张送他回南京后的安全。军法会审判处张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是准备把好人让蒋介石来做。不料蒋以德报怨，表面上特赦了张，实际上把张终生禁锢。”

（李烈钧，李希泌整理。）

四 虎落平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蒋介石终于接受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同月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飞返南京。

蒋介石和张学良到达南京后，都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蒋发表的谈话说：“……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于西安事变，理应负责。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心至为耿耿……”张发表的谈话说：“今日仅愿与诸君见面，无可奉告。此来待罪，一切惟中央及委座之命是从。”

当时可见，西安事变虽取得和平解决，但是从蒋、张所发表的谈话看来，其中还大有文章，耐人寻味。蒋介石对张学良究竟怎样处置？一时便为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所注视。

当时国民党内部，对张学良的处置问题，显然存在两种意见：一派主要是属蒋嫡系的人们，认为张劫持“领袖”，罪大恶极，主张严加惩治。另一派主要是非蒋嫡系的人们，认为张既肯来京待罪，非无可宥，不妨从宽发落。这两部分人们的意见，从表现的方式上看，也有所不同；前者到处公开叫嚣，大有非此不可之势；后者多属私下议论，对外却都讳莫如深。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则模棱两可，严加惩治也罢，从宽发落也罢，好像都无可无不可。

当然这些人们的意见，无足轻重，不足为凭，只有蒋介石的态度，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幕前一套，幕后一套，的确令人眼花缭乱。虽然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固然直接与其为人有关，主要还另有原因，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实有其难言之隐。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这项诺言，几为人所共知，情势所迫，难以出尔反尔，不能不装出大仁大义、宽大为怀的模样。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且受尽惊惶，吃尽苦头，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西安事变以来，对张学良的处置，一直就是被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所决定。关于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像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且这套把戏不久便大白于世了。

蒋介石和张学良到达南京的当天，张即给蒋上了一封亲笔信，原信写道：“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腆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

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察！专肃敬叩钧安。”蒋旋即根据张的这封信抄同原件分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原呈写道：“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乞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追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为处理西安事变有关事项，首先举行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由居正主席，即席表示欢迎蒋介石平安旋节的意思。蒋遂将西安事变的经过，作了简略的报告。然后就西安事变解决后应行结束事项，作出一系列的决定。最后提出蒋介石的“为西安事变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案”。结果通过了这样一篇充满阿谀逢迎的决议，说什么“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接着举行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仍由居正主席，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移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呈为张学良亲来都门，束手待罪，应如何办理请裁夺案”，并未作何讨论，即

作出决议：“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当时，席间有不少人争相发言。异口同声地说：“国家以法令纪纲为重，主犯既同来，应开军法审判，以治其罪。”于是，在决议之外，还作了一项内部决定：推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飭军事委员会遵办。使人很自然看出，这一系列的布置，显然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同时也极易看出，这完全是奉蒋介石的“意旨”行事。

国民党中央散会后，军事委员会即呈请国民政府特任李烈钧为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的审判长，主持张学良案的审理，并令克日进行工作。接着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由冯玉祥主席，宣布开会理由说：“西安事变，全国震惊，中央既命组织高等军法会审进行审理，审判长已经任命李烈钧委员担任，审判官二人的人选尚未决定，究应如何办理，请各位发表意见。”何应钦首先发言：“关于审判官人选，应当尊重审判长的意见。”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李烈钧在敦促之下，就与会人员中提名朱培德、鹿钟麟二人担任，并且说道：“朱系云南讲武堂高才生，鹿乃驱逐溥仪为张垣久共患难者，此二人烈钧知之有素，足堪胜任。且二人功在党国，又皆属陆军上将，尤为适当。”冯玉祥即席对李烈钧所提名的审判官人选发表意见，对提名朱培德首先表示赞成，对提名鹿钟麟则主张另推。而李烈钧坚持原议，并且说道：“此案重大，应使天下之人共见之，必须得北方之贤达参与审判，乃有价值。”经与会人员的一致支持，最后始得通过。冯玉祥所以作如此的表示固因鹿为其旧属出于谦逊，但这与当时他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处境也有关^①，且窥出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无非是蒋介石

^①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蒋的嫡系一直认为冯玉祥与张学良之间必有关系，冯处境恶劣。当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大举围攻和轰炸西安的时候，冯玉祥曾向宋美龄痛陈利害，促宋出来反对何的主张，致使何的阴谋无由实现，因此何对冯的怨恨尤深。——作者

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已，别人徒供利用。散会后，军事委员会又由该会军法处调出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桢及书记官袁祖宪、郭作民，参加高等军法会审工作。

李烈钧受命后，即开始进行筹备。首约集朱培德及鹿钟麟，商讨了一切应行决定的事项；次召见陈恩普、邱毓桢、袁祖宪、郭作民，指示应行注意之点及所负的责任。此外，复邀前任最高法院院长徐元浩及法律专家学者 20 余人，征询意见。其中徐元浩争先发言，说什么“委员长有伟大勋功于党国，全国人民，莫不景仰推戴，而张学良等在西安，非特不能护卫，竟敢威迫统帅，勿论其为正犯，抑为从犯，其为要犯无疑，斯事异常重大，应请审判长严予处置。”经过这样一来，别人都不便再持异议，纷纷随声附和，即告结束。

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要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并且偷偷问过鹿：“瑞伯，这件事您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才好？”鹿曾答：“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一边点头，一边称是。

在高等军法会审开庭的前一日，即 12 月 30 日，李烈钧为此特往谒蒋介石请示。据李述当时情况，蒋见李至，先开口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处理？”李坦率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进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后的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

领，忙把话头转过来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谈到这里，李便乘机辞出。

自从李烈钧出任审判长主持高等军法会审的消息传出后，一时李家门庭若市，不少所谓党国要人前来访问对张学良案处理的意见。当时据李说，其中特别是宋子文、傅汝霖二人最为关心，一再流露出请求为张缓颊的意思。

31日，高等军法会审假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上午9时以前，李烈钧暨朱培德、鹿钟麟即陆续到达，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桢，书记官袁祖宪、郭作民早在此等候。李见参加会审的人员到齐，乃于休息室召开预备会，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预为拟妥的审问要点逐项交换意见，大体没有什么异议，只其中照例要问的几项，如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等，鹿认为对该案说来似嫌过于形式，为照顾事实，且免得张难堪，提出可否省出不问，径代填上，李颇以为然，当即采纳。至10时整，李偕全体会审人员走进法庭，分别人席。坐定后，李命鹿先至候审室巡视。当时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已在该室听传，鹿和张相见，先与之握手，继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怀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答：“是的，身边并无武器。”鹿接着说：“好，请稍待。”鹿即返庭复命，回人原席。李旋宣布开庭。张学良被带进法庭，含笑直趋案前，李以张为陆军上将，所犯又属未遂，特赐以座位，而张则始终鹄立，没有就座。开始只就西安事变经过事实进行问答，共计八项。之后，李问：“你何以竟敢出此举动？”张答：“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李问：“你知道你的这种举动是为国法所不容吗？”张答：“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条款。”李给张看了陆海空军刑法，并给他提出所犯的“胁迫统帅”有关条款。然后，李问：

“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抑自己所为？”张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自作自当，我决非任何人所能指使的人。”进行至此，张忽谓：“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李答称：“可以。”张谓：“民国2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有无其事？”李称：“有。”张谓：“申讨袁世凯是否为了打倒专横独断呢？”李称：“正是。”张自负谓：“我在西安的所为，正是对中央的专政独裁，冀求有所谏正耳。”李叱责称：“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变，自寻末路，夫复谁尤？”朱培德及鹿钟麟见到双方渐趋僵持，又以李素患高血压症，遂请李宣布暂时退庭，陪李至休息室稍憩。顷刻之后，继续开庭，李正颜厉色地告张：“你在西安所为的根本目的究竟何在？是否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应该据实招供，否则，将会对你不利……”至此鹿打断李的话，插言道：“汉卿，审判长待人宽厚，你非不知，切勿失去这个良好的机会！”张称：“是，是。”李接着告张：“委员长勋业彪炳，待人宽厚，你何以会出此大不韪的举动？快快说来！”张直言不讳地说：“我在西安发动事变，确有颠覆政府的意图，^①而根本目的仍无非要求委员长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李追问：“既然如此，又为何亲送委员长返京？”张接着说：“我在事变中，看到委员长的日记，从日记中看出委员长被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及恐日病等分子所包围，其本人还不是没有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想法，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所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节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进行至此，遂宣告结案。书记官将记录呈李，李阅后对

^① 当时李问张答，均为“颠覆政府”；而外间见到的记载却都为“改组政府”。——作者

张说：“今天你所招供的话，都记录下来了。现在给你看一下，其中如有错误之处，可提出更正，如无错误，即签字缴回。”李把记录递给张，张看完对李说：“没有错误的地方，无须更正。”张签字后缴回。李将记录签署并交由全体会审人员传阅，分别签署后，便送请蒋介石核示。计算时间，恐尚未寓目，蒋即把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根据此授意预为拟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布判决。

宣布判决后，即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将判决书连同早就准备好了的呈文，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名义报请国民政府核示。翌日（元旦），国民政府以第一号指令照准。

高等军法会审退庭后，李烈钧以张学良在法庭上，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私下曾向人称道：“不愧为张作霖之子。”

当高等军法会审对张学良案按蒋介石交下的判决书“照本宣科”宣布判决后，紧接着蒋介石又迫不及待地罗列了一大篇理由，呈请国民政府，为张学良请求特赦，原呈这样写道：“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飭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10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自当，从轻减处，已见宽法。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国家设刑典所以儆凶顽，立赦条所以待俊悔。此次该员中于荧惑，大触刑章，变讯传播，举国骇愤，若其遂过怙改，竟复逆施冥行，在国家固不难制裁，然元气必更以耗竭，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此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挽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当今国家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

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銜勒，犹冀能有补益，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昔我总理惩乱嫉恶，投法必严，而宥过施仁，涵容益大。中央矜恤有辜，当更使天下感动。为此不避罪嫌，贡此愚谬，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要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

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于高等军法会审宣布判决后两小时，即当日下午2时送达国民政府。翌日（1日）上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便发交司法院核议。司法院顾不得新年休假，马上做了一番“虚应故事”的核议，当然不会持何异议，当日即以“尚属可行”呈复国民政府。新年休假期满，4日上午，林森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出席的有：王伯群、邓家彦、马超俊、李文范、经亨颐、陈立夫、叶楚傖、宋子文、李烈钧、张继、冯玉祥及王正廷等。列席的有：居正、戴传贤、魏怀、吕超及陈其采等。由林森将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连同司法院的核议，提出做了说明，旋付表决，一致通过准予特赦，并于当日下午由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从此，张学良虽被特赦，而蒋介石却以“严加管束”为名，把张无限期地拘禁起来，剥夺了自由。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鹿钟麟）

第八章 羁旅天涯 传奇人生

少帅英名万古传

对自由的渴求，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渴求。被幽禁的张学良曾向蒋介石提出是否可以出来，什么事也不做，随侍在蒋身边读书自省。阴鸷狡诈的蒋介石不置一词。八年抗战胜利了，煎熬中的张学良还是身陷囹圄。1947年10月，当张治中在台湾新竹第三次探访张学良时，张学良再次表达了获得自由的渴求。心肠铁铸的蒋介石不屑一顾，倒是宋美龄叹息道“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张学良的后半生是从人生顶峰跌至万丈深壑的后半生。但韬光养晦的他从未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教堂唱颂的经诗从未淹没他坚信海峡两岸迟早必定要统一的不泯信念。如磐的岁月并不妨碍他度过百年人生。张学良的人格魅力就像他所钟爱的兰花：馨香致远，愈嗅愈醇；张学良的传奇人生就像一部内蕴深藏的传世经典：字字珠玑，久阅到永远……

一 斜阳暮草

1936年间，我给特务头子戴笠当警卫副官。西安事变后，

我又被戴笠亲自派去看押张学良达二年之久。在这二年中，我同张学良将军朝夕相随，对国民党当局如何对待张学良将军和张将军苦闷的囹圄生活至今仍记忆犹新。

张学良抵宁前后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采取果断行动，宋美龄、宋子文等宋氏兄妹及亲蒋的南京政府要员们，绞尽脑汁地策划着救蒋的办法。

当时戴笠掌握着全部特务情报机构的大权，系蒋介石可靠亲信和重要耳目。此时此刻，他感到报效主子、立功讨封的时机已到，便百般殷勤，大显身手。他除利用原在西安的特工人员探听消息外，还派了大批人马去西安四处活动。这样一直折腾了两三天才得知蒋介石被扣押后人身安全无恙，宋氏兄妹和戴笠他们才略感宽心，但整天仍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在决定去西安接蒋的当天深夜12点左右，戴笠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和空虚，张学良究竟是真心放蒋，还是想以放蒋为诱饵调虎离山一网打尽呢？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狡猾、老练的特务头子戴笠来说，是不得不首先考虑的。他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进出出，踱来踱去，一会儿同这个密谈，一会儿找那个训示，有时拿起笔来写一阵，有时伏案苦思冥想，在他看来此次西安之行凶多吉少，必须做好各种思想准备。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他亲笔写了一张“去，如何如何……回不来，如何如何……”的纸条，尔后便叫我去把他的秘书毛人凤找了来，二人密谈了很长时间，最后戴对毛说：我走后或者万一出了问题的话，局里的一切责任你要担当起来。毛则满口答应，并要求戴笠亲自写一手令给他，以后也好对部下讲话，戴笠答应后便写了一个手令交给了毛人凤。

第二天上午8点钟，戴笠由南京鸡鹅巷53号他的住处，乘

车去城里明故宫机场，乘专机去了西安。

身陷囹圄

过了几天，戴笠从西安给毛人凤发来了电报，命他在晚上8点钟以前派车到机场接他，并要选人另备汽车接张学良。

原来张学良将军是善良、直爽、仁义之人，他满以为“兵谏”已经奏效，便决定放蒋，并要亲自送蒋回京，以礼相待感化蒋心，达到“既往不咎，重新同委员长真诚合作，共同抗日”的目的。可见张将军以礼义代替了理智，真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岂不知蒋介石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张将军送蒋回京只能自投罗网，一错铸成千古恨！

当天晚上8点多钟，三架载着蒋介石、宋氏兄妹、戴笠及张学良等人的飞机在机场降落，机场上迎接的人比较多，大小专车各接其主，一时比较忙乱。在接到戴笠的电报后，毛人凤立即选派了南京交警总队长周伟龙和南京警察厅特警科长王得龙二人乘车去机场接张学良。可是周、王二人，对张不甚认识，再加之机场人多、车多，又是夜间，二人竟没有接到，只得空车而归。

五 易 其 居

230

张学良将军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正义主张，合乎国情，顺乎民意，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爱国进步力量拥护。因此，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当即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爱国进步力量的谴责，纷纷要求立即释放张学良将军，并调转枪口，共同抗日。而蒋介石深知，如果释放了张学良，他必然会同共产党在行动上合为一体，破坏了他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只是“剿共”、不抗日的政策。所以他置全国人民的坚决要求于不顾，要尽了反动伎俩。他一方面慑于全国人民的压力，

不敢轻易除掉张学良；另一方面他视张如虎，认为如其纵虎归山，倒不如囚虎于笼，将其秘密地囚禁在一个僻静而安全的地方，使其与世隔绝，消磨其志。然而，在抗日烽火燃遍全国的时局里，到哪里去找一个合意的世外桃源呢？蒋介石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以保证张学良将军“人身安全”为名，在扣押期间，共迁居了五次之多。

张学良将军开始被扣押在南京津江别墅，蒋介石感到极不安全（所谓不安全，不是怕张学良被害，而是怕有人营救张学良），第二天就下令用飞机将张学良将军由南京迁到了奉化溪口，住在武陵中学旁边的一座小楼上，并派军统少将特务队长刘乙光始终专门“相陪”（名曰相陪，实则进行监视），配备有便衣警卫 30 人（我是该警卫组组长）和一个特务宪兵连，还配备了电台一部、报务员一人、邮电检查员一人、厨师二人、医生一人、高射机枪二挺、大小汽车 11 辆，这些人员与装备全由刘乙光直接指挥。另外还有张将军原有随从副官二人，伺候其太太于凤至的老妈子一人。

在看押张学良中，上峰规定的纪律是非常森严的。临迁溪口之前，戴笠就亲自向我们暗授密令，给我们规定了很多条条。大体内容是：

（一）要严加看管，不准发生任何事故，不准其逃跑和自杀。

（二）看守人员不准与张交谈国事，更不准与外人、亲友通信涉及张之住处等事宜。

（三）除持蒋之手谕或电谕者外，不准张学良同任何外人接触。在我对其看押的二年中，只有汪精卫和邵力子夫妇来看过他一次。

（四）张之行动只准在住处的 10 里以内，10 里以外须经请示批准后方能照办。

(五) 看守人员要各负其责，宪兵连担任外围警戒，发现可疑者要严加检查、询问，内卫由便衣警卫分组轮流值班，室外警戒，室内监视，并要将张学良每天的言论、行动当天电报军统局。

在溪口住了三天，又奉命迁至四明山，住在中国旅行社上海分社专供旅游者住的一处房子里。在这里住了达八个月之久，因上海、南京各方面战事吃紧，恐遭日机袭击，经蒋介石指示必须立即迁往湖南的僻静山区，于是即派人去湖南选择地点。经勘察选定了湖南南部的郴县。在郴县境内的苏仙岭上有一座庙宇，将道人赶走，把泥胎神像毁掉，殿堂加以修缮，这就算张学良将军的“修身养性”之地了。在此处又住了5个多月，日寇日趋迫近长沙，郴县也逐渐受到威胁，因此又将张学良将军由郴县迁至湘西的沅陵。住在沅陵附近凤凰山上的一座庙宇里，在此处共住了10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分兵几路蚕食中国，不到二年的光景，日寇的铁蹄几乎踏遍了我半壁河山，眼看整个湖南将全部沦陷，湘西也不是久留之地了。因此，于1939年冬，又将张学良将军迁至贵阳息烽的阳明洞，在贵阳住了不多日子，我就向军统局申请调动工作，后经批准我便离开了张学良将军。临走我去向张将军及其夫人于凤至告别时，张将军大有恋恋不舍之意，对我说：“为什么要调呢？又没出什么乱子！”我向他反复解释说：“不是因犯了错误，是局里来电要我回局部另派工作。”但他仍不太相信。后来我因公去贵阳，又顺便带了点食品去看望了他，同他谈些闲话，张将军这才放了心。谁知道这竟是同张将军最后的一次漫长诀别，后来闻听张将军于1943年又从息烽迁居而到了台湾省。

张将军的囹圄生活

要知道，作为一个惯于驰骋疆场的爱国将领，一旦被剥夺了保国卫国的职责，不能拯救万民于水火，而眼睁睁地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被外寇蹂躏，他的心情将如何痛苦，这对于每一个有良心的爱国者来说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作为押者的我来说，对张学良将军在囹圄生活中的心情也是深有感触的。总的来说，漫长的囹圄生活，使他在身心各方面受到莫大的摧残，其在押期间的心情和生活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初到南京期间，尽管周围警备森严，到处笼罩着刀光剑影，但这时张将军对蒋介石能否赦免他，放他回西安还是抱有一定幻想的。因而在心情上表现得泰然自若，在寝食上也比较正常，大概他随时都在等待蒋介石的召见。

二是迁往奉化以后，张将军的心情即随之起了变化，可能是对委员长的动机产生了怀疑。对赦免的幻想破灭之故，他在精神和表情上表现得非常苦闷。整天坐立不安，沉默不语，徘徊不停，饮食也比以往大减，大概他的忧国、忧民、忧己之心甚切，每时每刻都在揣度着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及前途。

三是几个月之后，张将军对长时间的囹圄生活已习以为常，赦免的念头也彻底打消。开始是沉默寡言，后来似乎是看破了“红尘”，逐渐有所好转了，性格也变得开朗了，整天在饭后茶余，以弈棋、打球来掩其拯救国民之远大抱负，以游山逛水来消磨时光，代替其漫长的囹圄生活之痛苦。

张将军在押期间，只有其太太于凤至每隔月余来看他一次，每次住上半月或20日；赵四小姐在张的身边时间多于太太，基本上或从西安、或从上海来往不绝。此外张将军身边再无亲人，惟独两夫人能在生活上、精神上以慰其心。

记得有一次太太于凤至来张处住了不几天就要走。我问王老妈子：“太太为什么刚来不几天就要走呢？”王悄悄地对我说：“太太与少帅闹意见了，她埋怨少帅不该亲自送蒋回京，少帅也承认了亲自送蒋回京是失策。”可见张将军在长期的囹圄生活中已体察到自己送蒋回京的错误，但已经铸成大错，悔之莫及了。

张将军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对部属和下人从不摆架子、发脾气或提苛刻的要求。每月发给他的一切生活费用本来可由其自己随便支配，但张将军却很少自己支配，都是由厨师或他人建议使用，他从不嫌这嫌那。有时他要去百里之外游山逛景，都是头天晚饭后向我们提出，我们便发电报请示，批准后即去。如不批准，第二天看我们没作出发的准备，他自知不准，也就不加追问。正因为张将军具有这样一些可贵的美德和爱国的情操，所以尽管他是一个在押的重要“犯人”，但是作为我们这些看押者大多数对他都是内心敬佩，从不对他进行刁难或者施以非礼。

张将军爱好球类，特别是对网球最为擅长。每逢迁往一地，他都建议在住地修一球场，每天早晨和饭后我们看押人员都要陪他打一场。有时也让我们陪他去游览或游泳，晚上或饭后茶余，他总是愿和我们一起下象棋、打扑克、聊天，但他深知自己所处的境况而从不谈国事，不问政治。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想将其忧国忧民之心和囹圄生活之苦淹没在悠闲的漫长岁月中而已。

我同张学良将军相处，尽管只有二年左右的短暂时间，但是对他的印象却是深刻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尽管是看押与被看押的矛盾关系，但他那忧国忧民的信念，大义凛然的和平易近人的性格却不时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到今还怀着对他无限的思念。

（韩庆恂，作者原系国民党军统上校特务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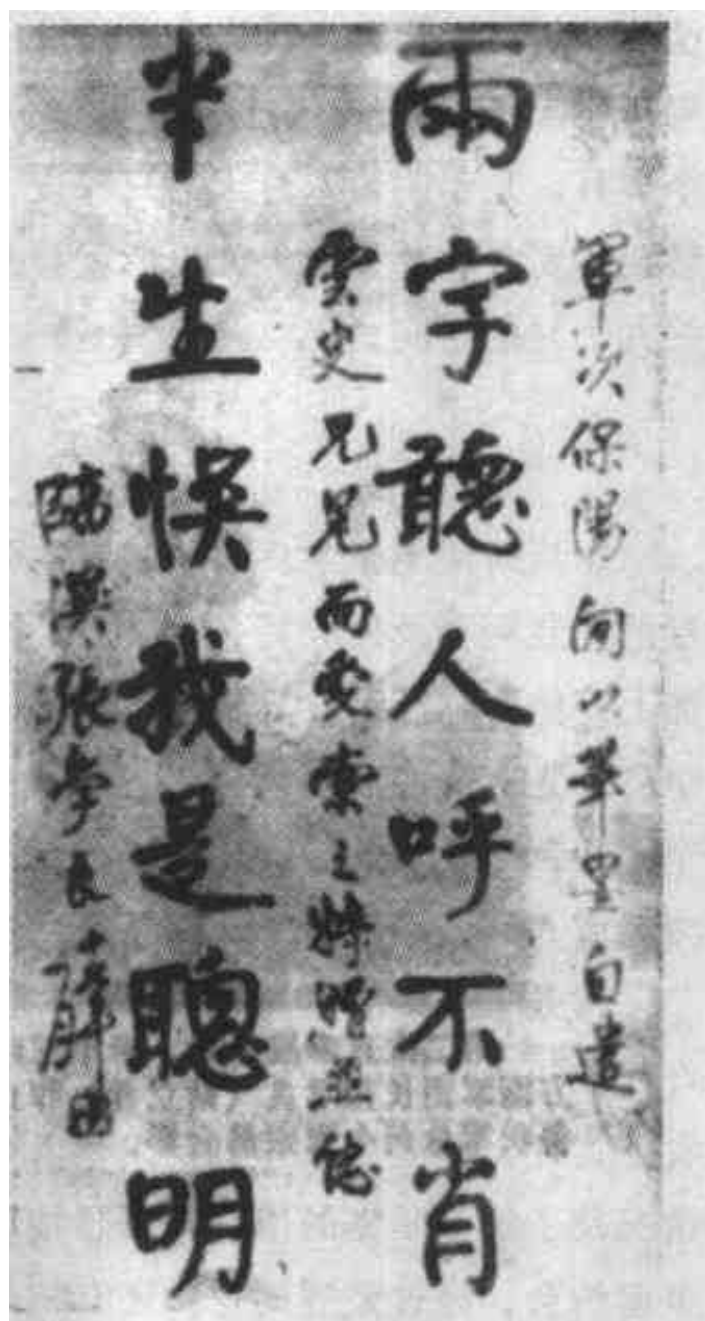
二 奉化溪口

从 1937 年 1 月开始，张学良被软禁在四明山南麓雪窦寺右首一所洋房内，那里离我家只有 4 公里。张学良的侍值员张宝顺与我相识，而监视张的工作人员中，也有很多是与我相识的奉化同乡。我撰述这篇资料，大部分是他们亲口告诉我的。

—

1936 年 12 月 26 日，蒋介石由张学良亲自护送乘飞机返南京。一回到南京，蒋就将张学良扣押起来，交给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当时，蒋介石的胞兄蒋介卿，寓居奉化，年老体弱，养病在家，猛听到西安事变消息，惊骇莫名，认为其弟多方树敌，不得人心，此次被扣，决无生还之望，于是焦急烦闷，病势突变，竟至一病不起。后来蒋介石虽然回来了，介卿终以病人膏肓，拖延到 12 月底就一命呜呼了。蒋介石在京接到这个消息，于 1937 年 1 月 2 日飞返奉化，料理其兄丧事。接着将失去自由的张学良押禁在溪口。当时张曾要求面见蒋介石，而被拒绝。从此，张学良



张学良在保定时，书赠杨云史的自拟对联。（1928 年）

就被软禁在奉化溪口。先在蒋母坟庄里关了几夭，不久又移转到离溪口 15 华里的中国旅行社雪窦分社别墅里。在那里扣押了八个多月。是年阴历八月十七日深夜，别墅突然起火烧毁，张乃移转至雪窦寺软禁了九天，以后就移往他处。张学良在奉化扣押计约九个月的时间。

二

据当时侍卫张学良书室卧室的张宝顺说，南京派往雪窦寺别墅的武装宪警及便衣特务共为 50 余人，多数是戴笠的部下，再加上其他厨师、工友、轿夫以及勤杂人员等 20 余人，为软禁张学良一人所需的监卫杂务人等总计竟达 70 人以上，俨然形成一个小兵营。千百年宁静的山区，自从来了这位特等犯人，立即变为严肃、紧张、戒备森严的特殊区域了。

特务头子戴笠是监视张学良的主要负责人，他派了刘乙光、许建业两个正副队长以及宪兵队陆文康等人，担任雪窦寺的临时看守责任。戴笠自己每月至少从南京来溪口上山一次，查看警卫情况及了解张学良的生活和思想情况。任何人去见张学良，必须事前约会，经过戴笠同意。还有杭州市市长周象贤，每月亦上山一次，他主要是安排这里的给养问题。

蒋介石为其兄蒋介石料理丧事，先后两次回溪口，一次在 1937 年 1 月 2 日，一次在 4 月 4 日。

邵力子夫妇也上山在别墅里住过一个时期。这是张学良惟一可以接谈的人，邵夫妇去后，客人就少了。据接近他的张宝顺说，张学良外出时，表面看来，似还安静，但当他独自在书室内踱来踱去，俯首沉思的时候，看出神情是极度苦闷的。

监卫张学良的特务，都是经过戴笠精心挑选的。张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每次出去，至少有一二十个特务跟着，荷

枪实弹，如临大敌。如果到远地去，当然更多。

三

张学良初到奉化时，带有于、李、杜三个亲信副官。移雪窦寺后，这三位副官就不许与张随便接近了，而代之以戴笠派往的特务供张使唤。初上山时，幸有邵力子夫妇亦上山与张同住两个多月，终日伴着他闲谈解闷。邵去后，只有于、赵二位夫人轮流伴随他。最初经蒋介石允许伴居的是于凤至夫人，后经张一再要求，经蒋特许，赵氏方来与张同住，监卫者都称她为“四小姐”。从此赵来则于去，于来则赵去，二人很少同时居住，但以赵氏上山住的日期居多。

别墅周围警卫森严，山坡旁有一片广场，清早就有武装特务进行操练。张学良本人生活作息均有定时，每天上午7时起床，晚9时睡觉。吃的是小米饭、馒头，佐以北方口味的小菜，饭后供应水果、咖啡等。

张在软禁期间，除阴雨天外，在室内时间比较少，常好出外游逛。星期天还到离山五华里的亭下余市去游玩，再从亭下坐竹筏顺流而至玉溪口，在街上逗留一会儿再回别墅。每次上街，监卫人员前呼后拥，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带了卫队出巡，绝想不到他是被监护的犯人。

237

张初上山时，正值寒春时节，天气还很冷，常着长毛皮袍。夏天穿着香港衫。他平时爱好运动，不时与监卫者打篮球或羽毛球。其他时间，偶尔看看书画，很少见他伏案写作，而对游泳却有特殊爱好，在夏天里常到离山10华里的沙堤大溪里去游泳。从别墅到沙堤大溪，中间有五华里是险峻的山坡，上下需用藤轿代步。监卫人员后来就在寺旁挖一小池，专供张游泳，从此就不到沙堤大溪去了。

经张特别请求，还到外地去游访三次，每次游访当然离不了特务严密监视。第一次是1937年2月26日到宁波东乡天童寺去游览。回来时还想去拜访蒋介石平时所敬重的奉化士绅孙表卿老先生，就顺道路过肖王庙，孙适不在而归。其后又到新昌大佛寺去玩了一次。以上两个寺院，是浙东有名的古刹。

张虽失去自由，在一定范围内尚可游山玩水，看来似乎很安逸，其实，他内心苦闷只是不形露于色而已。有一事可证张在被软禁期间的复杂愁闷的心境。雪窦寺前面有个高达40余丈的千丈岩瀑布，其旁筑有观瀑亭，亭前可俯瞰倒悬的瀑布，可凝神倾听潺潺的流水声。张常到观瀑亭前燃放爆竹，静听山谷回音。有时还燃放百子小花爆，劈劈啪啪，放个不停，习以为常。乡人不知，还以为这位少帅犹有孩童玩乐的脾气，实则胸中积愤，无处发泄，借此聊以解愁而已。

张对监卫人员很好。每遇年节，对身旁侍卫者赏以法币200元，其他司厨、轿夫等亦有赏给。他还在离别墅北约百步水涧岩下出资建造了六间土平屋，但到完工为止，一次也没有去住过，此屋现已倾圮无存。

四

1937年阴历八月十七日夜里，囚禁张的别墅突然起火。山上缺乏救火用具，一时火势炽烈，整个别墅被毁。当时外间对起火原因，纷纷揣测。有人说因张学良不愿久留山居，故意放火；亦有人说，个人被辱软禁，不愿留下这个历史污点，故意引火灭迹。其实这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揣测之词，不能置信。

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

后，就出钱叫厨师大量仿制，预备分赠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焦，一时引起火灾。时值深夜，监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张学良在急迫中叫大家全力抢救四大箱书画，对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还说，“书画是花钱亦买不到的”。说明他对书画古玩爱好很深。

之后，张及全体监卫人员只得在雪窦寺内暂住。那时抗日烽火已起，举国沸腾；“八一三”浴血抗战，京沪震动。当然溪口亦不是一个安全的后方。所以，张氏在雪窦寺只住了九天，又被特务押解离山，循新昌、嵊县陆路西去。

(张明镐)

三 雪窦山上

1937年1月至9月，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附近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度过了八个多月的幽居生活。当时，我在雪窦山中旅社担任经理，与张将军朝夕相处，整个情况比较了解，现口述如下：

雪窦山中国旅行社，位于雪窦寺西侧，1934年初开始建造，6月落成营业，内设6间客房，一个餐厅，旅游旺季，借用雪窦寺厢房搭100多只帆布床。开业以后，生意颇好。1937年1月，蒋介石派人通知，说有要人来住，命我停止营业。我对来说，停止营业要通过上海总社，签订合同，方可生效。于是，国民党军委会与上海中旅社南京分社订下了包房合同。通知到后，我即腾出房间，进行了整修，安装了火炉。半月以后，我才知道前来住宿的要人就是西安事变中赫赫有名的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上山时，陪同和跟随人员很多。陪同的有当时陕西省

邵力子和他的夫人傅学文，还有当时的杭州市长周象贤，以及杭州市的警察局长。张将军随带的有赵一荻小姐（当时以私人秘书身份）、俞副官、杜副官和一位姓滕的女护士。张将军一到门前，似乎感到意外，紧锁的双眉舒展了一下，高兴地说：“啊，中国旅行社。”我知道张将军过去常借西安中旅社举行宴会，对中旅社印象颇好，加上被判“严加管束”之后，进住不带政治色彩的组织，这或许是张将军感到高兴的原因吧。

张学良住下之后，蒋介石派了一名老秀才，天天给张学良讲四书五经，从上午8点到9点半。当时张学良不信佛，不信教，对四书五经也不感兴趣，但是这一个半钟头是非坐不可的。老秀才讲课时，有时我也旁听。讲完之后，张将军似乎得到了解脱，就和我们一起聊天，借以消闷。上午一般就这样过去了。

由于我社停止了对外营业，我的主要任务就变成管理好这所房子，照顾好张学良的生活。张学良喜欢打球，我就为他开辟了球场，他喜欢拉杠子，我就为他设置了一副单杠，他喜欢游泳，我就为他选择了一条深度适中的溪水，他喜欢爬山，我就陪他攀登风景幽美的山头。当时张将军的活动范围只有10华里周围，东不出镇海口，西不过曹娥江。在中旅社张将军卧室隔壁住着专门“守护”他的警卫队长刘乙光，在雪窦寺驻有一连宪兵，张将军的一举一动，尽在别人监视之下，真所谓困居山中，插翅难飞。

在我与张学良将军相处的日子里，张将军沉默寡言，语言谨慎，有时只隐隐约约地吐露出他当时的心情。他曾在爬山休息时说：我们东北人个性直爽，说话算数，一人做事一人当，两个肩膀一个头，杀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他最恨阎锡山，说他言而无信，出卖朋友。张将军当时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爱国之心从未泯灭。当他听到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心情十分激动。平时一般在房间用膳，这天特到餐厅吃饭，慷慨激昂地说：

“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抗日，这一天终于给我等到了，以后我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了。”我们在场的人听了，无不为之感动。

张学良在雪窦山中旅社居住期间，曾经委托我办过几件事，我至今印象仍深。张将军到我社住下不久，就对我说，你这么小的一个旅行社招待所，给我包下来，怎么行？我回答：有人付钱，你放心住着好了。张将军说，不好，我给你一点钱，你在附近找地方给我另造一所房子。说完，拿出500英镑，交给了我。我按照他的意思，到县里办了买地手续，在附近水洞岩这个地方给他造了三间两层楼房，房子依山而筑，上宽下窄，下层每间约12平方米，还多下不少钱，替他买了家具杂物。房子造好后，我向张将军交了账。张将军向刘乙光提出搬迁的要求，刘先要请示南京军委会，结果未获同意。张将军对此极为愤慨，说：“算了，不搬也罢，我死也死在这里了。”说完一声长叹，表示无可奈何。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往返沪杭等地，张将军常托我带信买物。这年夏天，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从美国回来看望张学良，在雪窦山中旅社居留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赵四小姐下了山，住到上海马思南路（今思南路）二号张公馆，我去上海，张将军就托我带信给她。于凤至返回美国后，赵四小姐仍上雪窦山照顾张学良的生活。平时每次到上海，张将军都要托我带些他所需要的用品。

241

这年8月中秋前后，厨房起火，中旅社招待所焚毁无遗，此后张将军即移住雪窦寺，四五天后，离开溪江，移往别处。我由于到上海总社报告起火情况和向保险公司领取保险金，没有赶上送行。回来后看到张将军给我留下一封信，内容大致是：在雪窦山居住期间，得到我多方面照顾，表示感谢，嘱咐我把他个人出资在水洞岩造的房子交给雪窦寺的当家。

（钱君立，时任雪窦山中国旅行社经理，王舜祁整理。）

四 恶风邪雨

在南京孔、宋公馆里

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将军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与戴笠等密商后，即布置囚禁张学良将军。

我是在1936年12月27日由军统局特务队调去参加看守监视张学良的警卫之一，一直从南京到贵州。

张将军此时被安排在南京宋子文的公馆里，我们也随之住在宋子文公馆中。12月27日张将军在南京出门拜客。这一天他的行动还是“自由”的，只不过出门时一共是四部汽车，张乘一部，侍从们乘一部，南京警察厅的特务乘一部，我们特务队的便衣警卫乘一部。他的车子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这一天，张将军仍然神态自若，并没有意识到他即将被囚禁，失去自由。

31日上午，张将军要乘车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去，据说是开会，我们仍然乘车同行。到了军事委员会，汽车停在门外，只有张将军进入军委会，所有随行人员都在外边等着。过了半个小时，只见宪兵第二团团团长罗友胜带领着一批武装宪兵从军委会出来，把随同张将军前来的侍从、秘书的枪缴去。这时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预测要发生对张将军不利的事件，但谁也没有说话。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看见张将军神色沮丧地从军委会出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登上了汽车。据说当他进入军委会后，才知不是开会，而是遭到“审讯”。是由以李烈钧为首的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讯的。

张登上汽车后，车子并未开回宋子文公馆，而是开到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这幢华丽而又很雅静的孔公馆，所有房子都是空

的，孔祥熙及其家属也没有住在这里，这是事先就腾空了的。张将军被安置在二层楼的一间陈设得很漂亮的房间中。

监视看守张将军，当时由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负责。军统局方面是由该局书记周伟龙（又名周道三）负责，派有军统局特务队队员 15 人，由王芳南任组长。宪兵司令部方面，是由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实际上是由该部中校处员欧阳湘负责。另有宪兵特高组组员七人。还有武装宪兵一排担任孔公馆大门和房屋周围的武装警卫。

从这时开始，对张学良将军的监视，就从暗中变为公开了。在二楼张住房的楼梯口，站有武装宪兵，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还各派一人配合武装宪兵在住房门口监视。楼下周围设有宪兵和便衣，并有游动哨。孔公馆的门外也站有武装警卫。自到孔祥熙公馆后，张将军就完全失去了自由。

张将军被逮捕审讯后，在孔公馆他整天不发一言，送去的菜饭也吃得很少，每天都闷闷不乐，蒙头大睡。也没谁和他讲一句话。

在张房门口监视的警卫，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子就睡在这背心上，便认为这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开去检查，即向负责的特务反映。于是他们便派宪兵特高组的一个组员，在张睡后翻身的时候去检查。当这个特务偷偷摸摸去检查时，什么东西也没查到，却被张将军发觉。张非常不高兴，大声对这个特高组组员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这就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愤懑！

张在孔祥熙公馆只住了两天。在这两天中，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和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每天都要来看一下，周伟龙也来过一次。但他们只在房屋周围转了一下，并未上楼。监视不惟

没有取消，反而更加严密，不准张外出一步。

张将军被囚禁在孔祥熙公馆，对外是绝对秘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只不过是怕遭到蒋介石特务的监视而不敢前来探望。在31日那天，正值我在孔公馆门口值班，突然有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校军装的年轻人来到门口。他操着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学良的弟弟，请求你们允许我去看看我的哥哥。”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立即回答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他又再三恳求，我们仍板着面孔生硬地回答他：“无此人！”“告诉你，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感到万分失望，他明白再恳求也是毫无希望的，便不再恳求我们，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满眶泪水，若有所失地一直站立了一个多钟头，直到我们喊他走，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就是张将军的弟弟张学思。那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回到东北以后，他就组织和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抗日，他领导的队伍成为一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军队。

迁居奉化溪口雪窦山

1937年1月1日，我们奉到军统局的紧急指示，要立即把张学良迁到浙江奉化溪口去。众所周知，奉化溪口是蒋介石的家乡，要把张迁到那里，目的也就是便于严密监视。因为张将军在南京的故旧友好是不少的，在溪口，就单纯多了。当天，军统局派了四个便衣警卫，陪同张将军乘一架专机到奉化，其余的人都是乘汽车去的。到了奉化，将张将军安置在溪口的武岭学校里。这时，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也在溪口，并与张会了面。在武岭学校只住了两天，又把张学良迁移到距离武岭学校有五六华里的雪窦山去了。军统局先是派赵世瑞负责对张的监视，没有几天改派特务队队长刘乙光负责。当时军统局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监视的组

织，美其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这个组织设有队长、队附、副官（负责经费开支）、事务员（负责给张经办伙食及购买物品）。还有队员约30人，分为四个小组，担任便衣警卫。每天并派有值班人员，任务是将张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作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军统局特务队的全称是“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

雪窦山是我国著名的名胜之一，风景幽美，游客众多。中国旅行社在山上建筑了宽敞的房子，各项设备在当时算是高级的，房间有十几个，我们全部包了下来给张住。有寝室、会客室、读书室、洗澡间。和张同住在旅行社里的只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距离旅行社约500米，便是有名的雪窦寺，庙宇宏伟，古色古香。我们特务队便衣警卫23人和宪兵一个连全部人员都住在雪窦寺中。

在雪窦山，对张将军的监视是严密的。在他的住房、饭厅、前门后门都布置有监视的人。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兵，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惟一要道。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便衣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游客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

就在张将军心情极端苦闷，精神万分颓丧的时候。张的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使沉寂的雪窦山气氛为之一变，活跃起来。这对孤寂苦闷的张将军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也是精神上极大的安慰。随同张夫人来的有副官四人，其中一个叫李英杰，其余三人姓杜、于、李。张夫人还带来一个老妈子叫王奶奶。他们都是为了照顾张将军的生活而来的。不用说，张夫人他们是经过蒋介石、军统局允许才能登上雪窦山的。自从于凤至来

到雪窦山后，张将军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了笑容。

张夫人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张将军回到上海自己的住所去了。以后又有赵绮霞来陪伴他，因她排行第四，一般人都叫她赵四小姐^①。她和张将军感情甚笃，性格也较为开朗。在这段期间，于凤至和赵绮霞是轮流来陪伴张的。每逢周末，这个由上海乘轮船来宁波，那个就由宁波乘江轮去上海。她俩也曾共同住在一起过，相处得很和睦，不过时间很短。赵绮霞称于凤至为“大姐”，于凤至叫赵绮霞为“小妹”。她们对张的生活起居都很关心，尽量设法使张心情愉快。他们三人还共同出外去游玩过一两次。都是张走在中间，于、赵在两旁。

监视张将军的特务组织，对于于凤至和赵绮霞从上海来是极不放心的，惟恐她们暗中带来枪支和子弹等。当时表面上假惺惺地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去接于、赵，而暗中却又勾结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详细检查，但一直并未发现于、赵来去带有什么“违禁物品”。于凤至最后一次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走了，没有再来，后来听说她去了美国。以后就是赵绮霞伴随张将军度过漫长的囚禁生活。我们称于为“夫人”，称赵为“四小姐”，称张有时叫“司令”，有时称“张先生”。于凤至样子很温和，对人很客气。大约是1937年5月间，一个星期六，她由上海来雪窦山时，拿了很多物品交给特务队队长刘乙光，赠送给全体警卫人员，每人珍珠罗翻领汗衫一件，卡叽布短裤一条；队长和队附另加送派克钢笔一支。

我们这批人大都是浙江人和湖南人，因我能讲北方话，于凤

^① 据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王益知先生说：赵四小姐之父名赵庆华，浙江金华人，曾任津浦、沪宁等铁路局长，家住天津。——编者

至就问我是东北人，我告诉她，童年时我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由于我当时搞事务工作，她对我比较熟。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又没有戴草帽，真是汗流浹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在溪口，没有服装店。我们这些便衣警卫的制服，是由副官应汉民去宁波和江北的利康西服店约好，由该店老板每周带着衣料来一次，给我们丈量尺码。由于他常来，知道张将军住在这里，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总要拿些高级的西服衣料样本给张看，张都未理。只有一次，张做了一条花呢的长灯笼裤，价约十七八元。后来张说：“那个西服店老板总想做我的生意，我衣服很多，我也不穿西服了，做一条跑裤算了！”张将军身体很好，当时是一个胖子，头发已经开始秃顶了。春秋天气他很少穿上装，都只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常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穿一件茄克。夏天穿一件短袖衬衣、短裤，脚下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在溪口时，张将军每天起床后，都要叫人抬一张椅子放在露天走廊，他坐下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有时是赵四小姐与他同吃，有时是四小姐送到房间里去给他吃。他喜欢吃火腿蛋、牛奶、花旗橘子。吃完后就到书房读书一小时，然后回寝室。在未吃中午饭以前，他要到饭厅或走廊活动一下。午饭照例是由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陪着他夫妇吃的。午饭后他略为体息，有时找我们警卫中的人下象棋。下得较好的余鉴声、吴时泰、王文晓、韩庆勋等都陪他下过。由于他棋艺高明，我们常

常都输给他。有的不愿与他下，他发觉后就说：“我让你们一个车。”下得更差的就再让车、马。有一次，张找胡祥林来下，他风趣地说：“我让你车、马，要是谁输了，就打三下手板。”后来胡下了两盘都输了，硬挨了两次手板。以后他再喊胡来，胡不来，张就哈哈大笑。

在炎热的夏天，每隔两三天，他都要到山上风景较好的地方去野餐。由他提出要游览的地名，或把雪窦山的地图给我们看，我们就根据他提出的时间、地点，先行布置，准备好游览和野餐的工作。记得有几次我们去千丈崖，这是离我们所住的旅行社较近的一个风景区，有一大瀑布，高数百丈，水流湍急，很是壮观。外地游客必来此游览。千丈崖有一寺庙，这里的和尚都请游客在石台上扶着栏杆观看瀑布，和尚用美观的盘子装了许多枚大爆竹（又名“天地响”），供游客作游戏。游客将大爆竹点燃以后，用力向对面大瀑布扔去，爆竹发出的声音特别响，游客就给和尚钱。张将军去千丈崖时，我们有四五人随同前去。开始去时，和尚每次都用盘子端出“天地响”来，张很感兴趣，但我们并没有每次都给和尚钱。后来有两次张再去时，和尚就没有端出爆竹来给张，我们开口向和尚索要，和尚也只拿出二三枚来。有一次，我们又耍，和尚干脆答尚未买来，张很扫兴。在归来途中，张对我说：“可能是我们没有拿钱给和尚，所以他不肯拿出来，以后我们自己买来放吧！”以后张去千丈崖，总要带着自己买的爆竹去。

每天吃晚饭时，副官应汉民都要请示张，明天吃什么菜，他说了后，就叫大师傅照着做。每天吃的约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他喜欢的是花旗橘子、美国苹果，其他好的新鲜水果也喜欢，还喜欢可口可乐汽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宁波购买他吃的海味、水果等食品。花旗橘子宁波有时买不到，就买点外国水果

罐头。宋子文曾给他寄来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买些运来。他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平时他很少喝酒，也很少吸烟。有时在饭后，只偶然吸烟，但吸半支就不吸了。

张将军是爱好运动的，有时要在住所门口打排球，由队长刘乙光指定几个警卫陪他打。宪兵连的个别排长也陪他打。他还喜欢游泳，而且技术很好。我们警卫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张有次游泳时，要他也下水游，他执意不肯，张看见王的那个窘相，便在水中纵声大笑起来。

张的游兴最浓，除雪窦山的名胜经常去游览外，他得知奉化附近的新昌县（离溪口约 100 公里），有个名胜叫大佛寺，便通知队长刘乙光，要前往游览。经刘反映，得到上级准许，于是张和赵四小姐、队长、队附乘小车，我们警卫 10 余人乘大车到新昌，直达大佛寺。那里的和尚看到我们来了这么多人，又很有“派头”，认为是大官来临，便由方丈出来迎接，并向张将军详细介绍了大佛寺的沿革及其他情况，张听得津津有味，在寺内游览了一番。方丈还准备了三桌丰富可口的素餐招待我们，张和赵四小姐一直赞不绝口。饭后，刘乙光向张说，应该捐点钱给大佛寺。张送了 60 元，说：“这个大佛真不小，可惜庙子没有很好修整。”

张将军在溪口时，书房里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这些书籍画刊，都是从他上海住所运送来的。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等。每次报纸到来时，张都要浏览一遍。他喜欢看外国画报，我们订有一种；宋子文也经常给他寄来，每次都有二三十本。张还经常开书单，趁我们去宁波购买物品时，叫我们替他买。前一段时

间，于凤至和赵绮霞轮流来时，也给他带些书刊来。凡是给他的书报杂志，多是由军统局转寄来的。

张将军有时喜爱开开玩笑，有一次他问我们一个叫韩庆勋的警卫：“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韩答：“我是警官学校毕业的。”张笑着说：“青岛有个警犬学校，你是山东人，我当你是那个警犬学校毕业的哩！”韩说：“哪儿有警犬学校嘛！”张越加高兴地笑了。记得1937年夏季快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打了防疫针，张也打了，只有我不肯打，我说：“打针反应我受不了，我愿意害霍乱病，宁死了都不打针。”张听了后，对我开玩笑说：“你害霍乱病死了不要紧，传染给我们，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要打哟！”说完，他就到房间里拿了两片药给我，说：“我算怕你，这是德国拜耳药厂的防疫药片，与注射打针有同样效力，又没有任何反应，快吃了吧！”他一直看着我吃了药才放心。

每天晚饭后，张都要找我们陪他玩耍。他从房里拿出外国跳棋、高尔夫球和其他玩具，到饭厅里教我们玩，有时他也打乒乓球。

他每天晚上10点钟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有按摩医生滕蔚萱按摩。滕原在上海一个外国医师开设的医院里当护士，后来由这个外国医师介绍给张当按摩医生。

张将军在雪窦山的时候，国民党的一些首脑和高级官员、将领，通过蒋介石的允许，曾经到雪窦山看望过他。与张将军的父亲张作霖是好朋友的东北耆宿、国民参政员莫德惠老先生，也不远千里来看望他。莫老是长辈，张对他非常尊敬。会见时，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张将军像会见自己的亲人一样，几乎掉下泪来。

还有一个特殊来宾，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同宋美龄一道去西安的蒋介石的外国顾问端纳。他来雪窦山看望张将军，张还特别用

西餐招待了这个外国顾问。事后张说：“想不到他也跑来看我。”

凡是来人看望张将军，大都由溪口武岭学校校长邓士萍先来电报通知，我们派轿子至人山亭迎来宾上山。当时来看望过张的有宋子文、汪精卫、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组、祝绍周、何柱国、宋子良、董显光……有的人只坐一二小时就下山了。先后在山上被张招待吃过饭的有汪精卫、端纳、董显光、贺耀组、莫德惠、宋子文等。

汪精卫来时，有董显光随同前来。吃过午饭后，张与汪、董乘轿同游山上名胜。张对汪很客气。那次汪游览的兴趣很高，张曾好几次问汪累不累，汪都回答说不累。游览后，在半山分别，双方均极客气。

宋子文上山来看张时，张也陪同宋游览山上名胜。他们谈话比较随便自然，没有什么拘束。宋在山上住了一晚，晚间与张抵足长谈，第二天清晨始离去。分别时，有依依不舍的表情。于凤至带来的老妈子王奶奶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司令同宋部长很好。”虽然张、宋之间的私谊是如此密切，但据我所知，宋子文来看他和带物品来，也要经过蒋介石的允许才行。

何柱国是东北将领，他来看张时，态度很恭敬。到饭厅就餐时，何向张立正致敬，是部下见长官的样子。张与他握手，两次请何坐，何才很谦恭地坐下。

雪窦寺的方丈太虚法师（中国佛教界领袖之一），由外地回来，拟在雪窦寺讲经几天。他请求见张，张很乐意地接见了。过了几天，太虚又来，张又接见了。太虚走后，张对刘乙光说：“太虚现在正帮助某地修建庙宇，他找我捐送他200元，他还不满意哩！”

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

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张的情绪很好，有两次乘竹轿到山下桃园中去摘桃子，他边摘边吃，连说：“这味道美极了！”有一次，他对邵先生说：“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像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先生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

邵力子先生夫妇离开雪窦山不久，又有国民党中国银行总裁贝松荪（祖貽）夫妇上山来陪他住了半个月才走。贝夫妇离开后，原浙江省会警察局局长赵龙文（军统特务）夫妇也上山来陪住十几天才走。

1937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锡侯死了^①，在溪口坟庄开吊。当时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都前来溪口吊孝。开吊那天，张将军也去了，队长刘乙光率队员四人跟随前往。在这段时间，国民党要人来雪窦山看张的人比较多。有些是吊孝蒋锡侯，顺便来看张将军的。

张将军和赵绮霞生的一个儿子，当时6岁了。这年3月间从美国来看望他的父母。这个儿子一直是寄养在美国，所以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来到雪窦山，现学中国话，讲起来非常别扭，如他要吃蛋炒饭，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氏夫妇很喜欢他，留他住了一个时候，仍然把他送回美国去。记得临别时，张、赵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又要离开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呢？他们夫妇对视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赵绮霞忍不住流了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

这年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张将军指名要到附近名胜妙高台

^① 张明镐《张学良软禁于奉化溪口》记载，蒋锡侯于1936年12月底去世。蒋介石于1937年1月2日飞返奉化，料理其兄丧事。

去过节。特务组织备了几桌菜饭，由队长、队附、便衣警卫陪同张氏夫妇到妙高台。张氏夫妇与队长、队附一桌，便衣警卫两桌。这时卢沟桥七七事变已经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我们祖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全国人民正在奋力抗战。这天，平常不喝酒的张将军却喝了一点酒。他看到祖国的锦绣河山，正在被日军铁蹄践踏，想到祖国同胞在受着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他慷慨激昂地挥着手对我们说：“现在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祖国了，我带你们打日本去！”张将军的爱国热忱，丝毫没有因为被囚禁而消失。后来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告诉我们，张将军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抗日，蒋介石回信不同意，叫张先生“好好读书”。接着军统局局长戴笠还来雪窦山住了两天，暗中观察张的行动。

蒋介石回信要张“好好读书”，不久，就以“关怀”张读书为名，派来一个姓步的老头子来雪窦山给张当老师。大家称这位老头为步老先生。据说这位步老先生是清朝的进士，旧学很渊博，是蒋介石特别派来教张读古书的。这当然是蒋介石要消磨张将军爱国壮志的一种办法。于是，特务组织奉命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这些平常从不读书的特务们，也居然煞有介事地买了书，准备了纸笔。参加的有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以及几个便衣警卫，张将军是主角。每天由步老先生讲授一个半钟头的《论语》和《中庸》。步老先生摇头晃脑哼哼叽叽地在那儿大讲孔孟之道，可是张将军的兴趣不浓，陪将军读书的特务们更是不知所云，被“之乎也者”弄得昏昏欲睡，但还是勉强维持了六七次。最后张实在不愿意学，特务们也巴不得这个“读书会”早点垮台。在大家都不愿意的情况下，这位步老先生也感到自己这一套在这里不吃香，颇有自知之明，灰溜溜地夹着他的《论语》和《中庸》离开了雪窦山。

在雪窦山时，有一件事使张将军非常不愉快。那是3月的一天，张坐着滑竿游山归来，从坡上看见在雪窦山寺庙门口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指手大骂，方向是朝着我们的。当时还听不清楚她在骂谁，越走越近，骂的话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原来这女人连哭带骂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将军。张当时很生气。后来去了解，这个女人便是在西安事变时被打死的前宪兵团团长蒋孝先的老婆，因他的丈夫被打死，便衔恨张。她是来雪窦寺给死去的丈夫做佛事的，探知张也住在这里，见张游山归来，就破口大骂起来。张只是生气，什么话也没说就回房里去了。

蒋孝先的老婆在雪窦山住了一个时期。当时，军统特务组织发现监视张的宪兵团特务连连长陆文康，曾是蒋孝先的部下，对蒋的老婆特别奉承，经常去拉关系。我们见情况不对，便打电报给军统局。后来宪兵司令部就把陆文康全连调开，另调宪兵第八团第七连连长童鹤年配合执行监视勤务。

1937年10月，有一天上午9点钟左右，张住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烟囱失火^①，附近又无水源，无法抢救，一时火势熊熊，不到一个小时，招待所全部被烧毁，张的东西也损失了一部分。监视张的特务组织一面立即向军统局请示如何安排，一面叫张暂时搬到雪窦寺中去住。过了两天，军统局派了宁波警察局长、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民前来溪口处理。最后决定搬家，指定的地点是安徽黄山。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装运人和物件，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排人在前面打冲锋开路，张将军坐他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子离开溪口，向指定地点黄山前进。

张将军在溪口这段时期，经常有人前来看望，陪着他游玩，

^① 张明镛《张学良软禁于奉化溪口》记载，失火发生于1937年阴历八月十七日（公历9月21日）。

生活和各方面招待也都比较好。雪窦山名胜较多，活动范围广阔，住所也较宽敞舒适，当时张并不感寂寞。他住在招待所时，对外没有保密，当地人和外地游客，都知道张住在这里。从表面上看，张在溪口期间，情绪还不是很苦闷的。

在安徽黄山

我们从浙江奉化溪口出发，是在1937年初冬，到了安徽黄山，已觉寒气逼人。我们住的一幢新建筑的房子，房屋很大，布置也很幽雅。这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修建的一所别墅，大门上挂着一块横匾，写着“居士林”三个大字。看来是段祺瑞打算退隐后学佛谈经的场所。这些房子原来未住人，房间都是空空洞洞的。我们以为可以在此定居了。张将军对这“居士林”也很感兴趣，那块匾他曾看了几遍。

不料，刚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就有安徽歙县县政府的一个职员来到“居士林”，神色紧张地声言要找“军委会秘书刘乙光到歙县去接重要电话”，说是军委会打来的。刘马上到歙县，才知道这个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给他的。蒋介石命令我们马上离开黄山，到江西萍乡去待命。刘回答说：“现在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钱。”蒋介石又硬性指示，没有交通工具，就在屯溪封车；至于钱，可以向歙县县长借用。刘乙光把电话筒递给歙县县长，蒋亲自命令这个县长赶快借钱给我们，不得有误。县长听见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吓得立即答应借3000元。刘乙光回到“居士林”，马上与宪兵连长童鹤年商量。这时，原来浙江保安处送我们来的车子都已经回去，只剩下一部1936年福特车。于是，童就派排长韩仪带领一排宪兵随我到屯溪去封车。当我们到达屯溪时，由于日本军队已接近南京，屯溪市面秩序很乱。到哪里去封车呢？左转右转，看着再不下手，就无法封车了。我们不管三

七二十一，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大封条贴封了江西省公路局的客车四辆（其中一辆还是柴油车），但还不够，又封了安徽省公路局的福特卡车三辆（这三辆车正在修理厂装车身，尚未装好），客车一辆。在汤口镇还封了一辆私人出租的小包车，这是供游客去游览黄山用的车，因太老，途中就甩了。这次一共封了八辆车，司机、助手共 15 人。本来封车人家就不愿意，还要“封人”，有的就更不愿意，但一看我们贴的是“军事委员会”的封条，又带有武装宪兵，不愿意也得跟着去。那个歙县县长这时也在屯溪，他看见我们封好了车，立即派了 10 个武警兵押车，他本人也随车同上黄山。那些司机、助手见此情况，也只好哭丧着脸把车子开到黄山。

歙县县长送来了法币 3000 元，我们在黄山仅住了三天，第四天就向江西出发了。

在黄山时，我们住所不远有个温泉，中国旅行社设有招待所，大都是国民党空军人员在此疗养。张在第二天曾去温泉参观，本想在温泉洗澡，后来听说温泉水的温度不高，就未洗，在附近看了一下，就回来了。

到黄山第二天下午，有一个穿长袍的、年约 60 岁左右的老头来看望张将军，对张很是恭敬，谈了一个多小时就下山了。此人是当时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刘尚清，是张作霖老师的部下。

我们在黄山的三天，是在忙乱中度过的。蒋介石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离开黄山呢？据刘乙光说：蒋认为张不宜在黄山，就是在萍乡也不是目的地，所以叫待命。这三天中，张将军也因这突然的迁移而感到不安。

在江西萍乡

从黄山出发走了两天就到了萍乡。这时由外地逃来的难民很

多，街上秩序有点乱，我们一时没有住处，就在萍乡城内最热闹的一条大街上找了一家名叫赣西饭店的大旅社，在二楼开了六个房间，暂时住下。封来的汽车也决定不让回去，并派人监视着“封”来的司机和助手，怕再迁移又找不到交通工具。气候已经很冷，便发给他们每人棉大衣一件，法币 10 元，叫他们安下心来，并且告诉他们：我们是“军委会”的，若敢逃跑，捉回来就不客气。那 15 个司机、助手也无可奈何，只好和我们一起在萍乡“待命”。

在萍乡，我们没有可以去联系的单位，也无熟人，更无任何人协助我们办事，真是人地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对张的监视不得不更加严密。我们把张氏夫妇安排在中间房间，特务队全体队员分住他两旁的隔壁房间，完全是便衣警卫。宪兵连全部住在附近的一所学校里。后队长刘乙光动员大家上街去找房子，在城内专员公署附近一个巷内找到了一所房子，房屋很大，是私人的，在萍乡算是最好的了。房主姓肖，在外省任大学教授，只有眷属三四人住在这里。我们将他家二楼的七个房间全部租下，楼下三间饭厅共用，每月租金 160 元，就这样暂时住了下来。

张将军在萍乡感到非常苦闷，萍乡街道不多，也不热闹，附近也无名胜古迹，当然更无球场。由于居住拥挤，连象棋也少下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穿便衣，宪兵连的哨兵也改穿便衣游动。对肖家我们只说是“军委会”的。他家也只知道张是一位大官，但到底是谁，并不知道。张平时极少出门，仅去逛街两次，买了点日用品，当地人也无从认识他。

在萍乡“待命”不到一个月，军统局又来电命令我们立即迁到湖南郴州。晚间，刘乙光和我到张的房里，告诉他又奉命要迁到湖南郴州，并叫我看看他的物品、家具如何装车。张的表情很沉闷，他叹了一口气对我们说：“唉！日本人打来比我们跑得还

要快，我们还没有住定，又要奉命跑了，跑远一点多好呢！”张说后，就去看看墙上挂着的地图，不住地摇头，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由于有交通工具，只用一天时间就准备好了。张氏夫妇坐小汽车，卡车装载物品，人乘坐客车，向郴州方向出发。

在湖南郴州苏仙岭

车子走了两天就到了湖南郴州，军统局指定我们住苏仙岭。到郴州，我们先在城内南门大街的上海旅社暂时住下。两天以后，我们上苏仙岭观看。岭上有一古庙叫“苏仙庙”，空屋很多，只有两个道士居住。这里荒烟蔓草，荆棘丛生，庙宇也很陈旧，显得非常荒凉。据民间传说，这个古庙，白天都曾发现过“鬼”和“狐仙”，很少有人到此。苏仙岭离城有四华里左右，从山脚登山顶古庙，有七八里路。山路崎岖，苍松古道，森林矗立，自然风景很是不错。清晨，浓雾弥漫，行人就好像是踩着白云登山。

苏仙庙是四合院的古式建筑，大小有 20 多间房屋，年久失修，破垣颓壁。附近亦无村寨，只有散落的几户人家。我们先雇人修好三间房子给张住，其余人员则集中住在庙内。四天以后，房子修好，就全部搬家上山了。又在当地雇了四顶轿子，八个轿夫，准备给张上山下山，或队长、队附接客人上下山之用。张将军很少下山，他以为这就是目的地，以后都在山上度过，情绪比较安定，很多时间都是看书看报。张存书不少，每次搬家时，我装运物品，就有四大木箱子书籍。他很关心时事，看报纸杂志都很仔细，有时还要查对地图。赵绮霞也爱看书，多是在房间里看。

1938 年春节，我们是在苏仙岭庙中度过的。除夕晚上，张

将军很高兴，在饭厅里推牌九玩。他当庄，有十几个队员去参加，结果，我们都赢了，赢得最多的达100多元。张大约输了将近1000元。他虽然输了钱，但那晚精神特别愉快，一直到深夜一点钟，张才说：“算了！我也没有现款了，搞不赢你们。”春节正午，我们有个姓吴的警卫见到他还说：“司令，再来推牌九，我们来押。”张笑着说：“还推？我没有那么多钱来输。”大家都笑了。

春节后，张要下山理发。他当时穿一件蓝色的丝绸棉袍，戴一顶鸭舌帽，风度很潇洒。刘乙光陪着他进城，派了12个警卫随行。张在街上逛了一会儿，找了一家女子理发店理发，给他理发的是一个10多岁的女性，脸上有麻子。回山后，他连称这个女的修面用刀手轻，手艺好。不到一个月，张叫我去要将这个女理发员找来给他理发。我到该店去，开始她不肯来，说我们住的地方离城太远，山高、路又不好走。我雇了轿子她才上山，给张理完发后，又用轿子送她。张知道这件事，以后就不再找她来理发了。

在郴州时，军统局派了一个名叫黄静宜的，指定他常驻城里邮局，负责秘密检查我们这个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的信件。同时又再三指示我们所有人员（包括宪兵连）与亲友、家属通信，决不允许谈到有关张学良的任何情况，如果发现，要受到严厉处分。军统局还对黄着重指示：如有外面的人在来往信件中，有涉及张学良的地方，一定要根据收信人、寄信人的具体情况严加追究；应将信件有关的话涂去，或将信扣留。张学良本人对外寄信，必须交给刘乙光，由刘寄给军统局，再由军统局审查或送蒋介石批示后始能发出；外面寄给张学良的信，全部由军统局转交给刘乙光，再给张。这说明张是没有通信自由的。

2月中旬，张要下山到城内东大街一家浴室去洗盆浴。照例

是刘乙光陪同，12个警卫随行。那天，张将军穿的仍是长袍，刘与他在街上并肩而行，我们则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戴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发现张后，立即向张恭敬地立正敬军礼。张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还礼，也不与那个军官谈话。可是当时却把我们吓得手足无措。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而且还是个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门口，先派人联系，然后向张、刘汇报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事实上，我们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谎，只希望张赶快回到山上去。张笑了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刘乙光要去找军统驻城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上午向张敬礼的那个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我找到了黄，告知情况，他立即与我去找郴州专员公署中校联络参谋曹某。曹是军统特务派驻专署搞情报的。经过我们三人的调查了解，才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驻郴州。下辖两个炮兵团。在这个旅中，有两三个中级军官是由东北军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敬礼的军官，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现任这个旅的炮兵团中校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情况弄清以后，我与黄马上上山向刘汇报。刘听了后，非常着急，他马上召集了有队附许建业、宪兵连长董鹤年以及我和黄静宜参加的紧急会议。他说：惟恐这军官知道张住在苏仙岭，了解我们的力量，采取突然行动，他们的枪和人比我们多，此地又无救援，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得了。大家议论一下，最后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军统局。但估计军统局也不会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电报请示，一方面加强警卫戒备。当晚由宪兵连增加岗哨，特务队也在庙门口附近增加游动哨。但大家惊恐的情绪并未清除，只愿晚上不要出事。

刘乙光是郴州邻县永兴高亭司镇的人，他的家乡离郴州约40公里。刘惟恐住在苏仙岭出问题，便想迁往他家乡去。第二天清晨，刘找我与他乘小车去高亭司镇看有无空房子可以搬家。我们从郴州出发，过永兴栖风渡镇，快到油榨树镇时，在公路旁发现一所学校。停车去看，这所小学本学期没有办，有房子20间左右，门窗尚好。刘喜出望外，决定搬到这里。我和刘找到当地乡公所，告诉他们，我们是军委会的，要借这学校暂住一下。乡公所哪里敢拒绝，刘就要我留在这里，赶快到街上找泥、木工先修整三间房子出来给张住，他回苏仙岭去准备搬家。我找了人，一天一夜就把房子修好了。第三天早晨，全部人马就搬了过来。此地离郴州30公里，我们特别注意马路上来往的军队。又分别派一个宪兵班和便衣警卫二人住栖风渡汽车站；高亭司汽车站也同样派宪兵一班和警卫二人。高亭司和汽车站相隔约七公里，我们驻地便夹在中间。刘乙光认为这比住苏仙岭保险得多，有了情况也便于应付。

这所小学房子虽不宽敞，但院子很大，空气也好。这里离油榨树镇有二华里多路，张氏夫妇常去镇上赶场。张表面上对于这次突然搬家，好像不在乎。当然他也知道是与那位炮兵中校向他敬礼有关。在住了10天以后，刘乙光对我说：“昨天张先生突然问我：‘那天去洗澡，在路上碰见的那位军官是谁？我不认识他呀！’我说我们也不认识。可见我们搬家如此急促，张先生是晓得原因的。”

我们在油榨树镇小学住了不到一个月，军统局又命令我们迁往湖南沅陵，先派队附许建业前往整修房子，然后再搬家。张听见这个消息，闷闷不乐。在搬家前一天，我去他房中看要搬动的物件，张将军正在看墙上贴着的地图，并说：“东北这块好地方，现在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接着又指着湖南的地图说：“你看，

我们就在这儿，但是又能住多久呢？”张将军怀念着他的可爱家乡，东北沦亡，自己又是这样的处境，一直东迁西移，不能安定下来，他内心的苦闷和忿恨可想而知了。

次日，我们从永兴出发，张氏夫妇与队长、队附同坐小车。司机名叫张阿采，开了几公里，张学良要张阿采让他开车。他开了有90公里，在耒阳过去的一个地方，见前面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头挑着柴禾，便将车减速，让这个老头，不知怎么搞的却把老头撞倒了。张即停车。这老头说：“我腿轧坏了。”我们下车检查，只是右腿有微伤，张掏出30元给他医治，就开车走了。晚间住在旅社中，张对我们开玩笑说：“今天在路上碰倒那个老头，要是公路上有警察的话，他要抓我去，你们才没有办法呢。”

在湖南沅陵凤凰山

军统局命令我们迁往沅陵，指定住凤凰山。我们到达沅陵时，遍街都是逃难的人，秩序紊乱。当时国民党刚成立湖南沅陵行署，主任是湘西有名的陈渠珍。他就驻在沅陵，负责军政事务。陈的旧部很多，各县来沅陵接受改编的部队也不少，所以说沅陵情况是很复杂的。

262 凤凰山距城只有二华里，风景幽美，上山的路也是修整过的。军统在沅陵设有办事处，邮电检查所也是军统的人负责。我们对外是用军委会的名义。这时军统局局长戴笠也来到沅陵。为了对张加强监视，就派从上海退出来在沅陵待命的军统高级头目黄家持为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戴笠在沅陵住了两天，送了一些食品给张，就匆匆走了。

由于这里下山方便，距河很近，张每天都要到河边去钓鱼。谁知被内迁到沅陵的江苏医学院和国立柳州艺专的学生发现了，有的就写信给亲友，把张学良在沅陵作为新闻来传播。这些信被

邮检所查获。后张要去钓鱼都由刘乙光或许建业陪同坐在船上，钓到以后，就在船上煮吃。在沅陵时，军统局对张的生活待遇已经逐步下降，远远不如从前。他的心情更加苦闷，只有借钓鱼来消磨岁月。

在贵州修文阳明洞

在沅陵凤凰山也是好景不长。刚刚安定住了几个月，由于日军节节进攻，国民党军队连凤凰山也呆不住了。军委会军统局又指令我们，将张学良迁移到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由队附许建业先行布置一切。

我们走了三天才到贵阳。当天已不能去修文，就住在贵阳南厂军营军委会特务团，团长是楼秉国。这时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陈世贤也派了很多人来招呼。次日只花半天时间，就到了修文县阳明洞。阳明洞是明朝王守仁读书讲学之地，距修文城才三华里，是贵州名胜古迹之一。阳明洞的洞外原有房屋数间，张将军就住在这屋子里。当时修文有土匪 10 多股，经常出没抢劫，军统很注意这个地方的治安情况，加强了外围警戒。

在阳明洞附近我们修建了一个篮球场，因张喜爱打球。

张囚禁在修文以后，军统局特别拨有一部电台，由刘麟台负责，专门汇报张在阳明洞的情况。那时，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于是军统局又特别调军委会特务第四团前来，以加强对张、杨的监视。团长是张止戈，他住在息烽。驻在修文的是第二营，营长徐启龙。军统局还指示，监视张、杨的特务人员互相之间不得有任何联系。当然，张学良将军对于杨虎城近在邻县是完全不知道的。

贵州省立高中当时迁在修文，有少数学生知道张住阳明洞，但警卫森严，谁也不敢超越警戒线。为了防止省高学生泄漏消

息，特务组织派我去负责邮电检查，我每天都要亲自去检查学生的来往信件。又派了六个便衣警卫分别到各乡镇去调查当地土匪活动情况和严密监视学生。虽然如此严密，但学生放假回家，就无法监视，所以，张囚禁在阳明洞，知道的人还是很多的。

1939年元月，军委会派傅仲芳兼任贵州保安处处长。为了加强对张的监视，军统局认为除军委会特务第四团而外，还应掌握地方的全部武装，所以派傅仲芳兼任保安处处长。傅到任后便亲自来修文，详细询问了张在阳明洞的情况。他认为还要再加强监视，征得刘乙光的同意，委派我为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大队附，大队长是县长兼的。于是地方武装的实权便掌握在军统手中。后来军统局发现修文县县长胡立五与中统特务有关，又不是军统的人。军、中统是矛盾的，便另派军统特务王崇武为修文县长。至此，整个修文县都为军统所控制，并使我们有公开的身份来掩护对张的监视。修文当地人，只知道我们是县长、大队附，看见增加军队，还以为是为了防止土匪的活动。

张将军住在阳明洞，越感无聊、苦闷，只好常常以打麻将来消遣。由赵绮霞、王奶奶、杜副官陪他打，刘乙光的老婆和一两个特务队员也陪他打过。张除了打麻将之外，每天都看报，看见报载某某地又被日本占领了，他总是感慨万分地说：“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

1939年10月，军统局调我为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由熊仲青接任修文保警大队附。从表面上看，我已离开了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其实这也是军统为了加强对张监视的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因当时据报，在贵阳已有很多人都知道张在阳明洞，有的还准备借名赶场去修文看张学良。军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才调我到贵阳公开搞侦缉工作。我在贵阳的家，实际上就是修文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来人都住我这里，交换情报。如像

在邮检中，查获写信来贵阳告诉张在修文的信件，便由我来调查在贵阳的收信人情况，向修文特务组织汇报。有重要事，我也到修文去。

1940年春天，我到修文向刘乙光汇报情况后，到阳明洞去看张将军。他一见了我，就开玩笑地问我：“邱秀虎，你在警察局，敲了多少竹杠呀！”我这次看见张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显得很苍老，情绪也很坏。他常由警卫随行着去赶场，主要是买点食品。

1941年5月，一天，刘乙光非常着急地跑来贵阳找我，说张患了急性盲肠炎，问我怎么办？因为军统局曾有指示，如张学良患病，外科找名医师沈克非，内科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现在张病情严重，来不及打电报到重庆军统局去请示。若等到回电来，人都死了，这个责任谁来担负？刘和我商量后，只好去找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送到贵阳再研究。当即会见了吴鼎昌，吴同意先把张送到贵阳来。我们又去贵阳医学院找杨静波给张开刀。决定后，我们就把贵阳中央医院的后院全部包下来，把张从阳明洞送来，由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指定侦缉队便衣在中央医院附近放哨监视。

杨静波大夫给张做了40分钟手术，切除了阑尾，情况良好。刘乙光和我才放了心，迅速打电报给重庆军统局汇报详情。张在医院住了三个礼拜，只有吴鼎昌来看过他，外边的人根本不知道张住在中央医院。

张在住院期间，曾向刘乙光提出，要求出院以后不回阳明洞，在贵阳住一段时间。刘不敢随便答应，向军统局请示，同意暂住贵阳。决定住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占用了新建的九间房子。张开刀后，身体正在复原，住在麒麟洞闷得无聊，经过军统局同意，通知军委会运输统计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侠、军委会

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少将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州缉私处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高级特务经常陪他打扑克或作其他娱乐。实际上也是由于贵阳情况较修文复杂，通过这些高级特务和张接近，以加强监视。

但是，蒋介石和军统局并不愿意张将军久住贵阳，因为当时贵阳已有些人知道张住麒麟洞。麒麟洞离市区太近，省会警察局要派便衣到黔灵山去放哨，遇有可疑人还要严加盘查，军统局始终不放心。于是在1942年2月，军统局又指示我们，叫立即将张学良搬到贵州开阳县刘育乡去。刘育乡俗称刘衙，距开阳县城六七华里。由于要把张迁往开阳，军统局便要控制开阳县，就派军统特务李毓楨当开阳县县长，特务小组长王尧为刘育乡乡长。王是该乡的人。张在刘育乡住的房子都是新建的，有砖木结构的“洋房”十几间。1943年春，我特意到刘育乡去看张。他精神更加颓丧，身体更加瘦弱，他对我说：“在这里闷得发慌，无聊得很，只好养鸡，你看，我辛辛苦苦养了七八十只鸡，都是白色的广东良种，可惜害鸡瘟，一夜就死光了！”他的表情悲伤，足见他的心情是很凄凉的。他在这里无聊时，还自己到厨房里去做菜。

迁往桐梓 离开大陆

266

1944年冬，军统局又把张将军迁往贵州桐梓县，住在南门外原四十一兵工厂的天门洞，距城约10华里。天门洞前边有一个湖，张的住房便建筑在湖边。他每天无事便在湖边钓鱼。张这时的生活情况越来越不如从前。据我所知，他带在身边的私人存款这么多年也花光了，后期去赶场，购买食品，也很简单了。身体已很衰弱，每天只是在湖边默默垂钓。

由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政府已面临崩溃，他们准备逃往台湾。可是对于这位已经囚禁了十几年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将

军，在精神上、生活上给予很大的折磨之后，还是不肯放过，在1947年的春天，又把张弄到台湾去。离开大陆时，除赵绮霞等外，军统局同去的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队附熊仲青和六个老队员。据说张到台湾住在新竹县竹东区。

至此，张学良将军便在蒋介石的迫害下离开了祖国大陆。据我所知，蒋介石对于张将军的囚禁是非常残酷的，仅从不断地迁移来说，就已经使他在精神上受尽了折磨。这么多年来，除在溪口囚禁初期，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张将军“宽宏大量”，以蒙蔽一些人，还允许少数国民党要人、张的故旧去看看他而外，从萍乡起，对外就绝对秘密了，很少有人再去看他。在修文时，就连贵州保安处处长傅仲芳和贵州财政厅厅长周诒春要求去看张，军统局也不批准，因傅、周不是军统有关的人。

（邱秀虎，黄 炜整理。）

五 三访少帅

我同张汉卿早先并不认识，在他易帜（1928年）以后才相熟。我喜欢他说话爽快，待人热诚。他也很看得起我。他每次到南京，我们都有往还，后来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在西安事变以后，我钦佩汉卿的胆量义气，并同情他的遭遇，所以一有机会总想去看他。从1936年汉卿被拘之日起到1947年这10年间，我看过他三次，这三次会见的情形如下：

第一次会见是1936年12月26日，张汉卿送蒋到了南京，住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警卫森严，形同拘禁。大概是他到南京后三几天，我已经知道他是不能再回西安去了。我到宋公馆去看他时，他似乎已有所觉察，表现出很不安的样子。他说，他希望即日返回西安，否则西安方面会发生事故，请我向蒋传达他

的意见。我一面表示对他同情，一面安慰他不要着急。有些话我也不好明讲，只是空话安慰他一番，即告辞而别。

第二次会见是1938年八九月间。那时抗战已爆发年余，武汉正在吃紧，我在湖南省当主席，张汉卿就被拘禁在湘西沅陵县城对河的一个寺庙里。我因到湘西去视察，所以特意到沅陵去看他。寺庙不大，在一个小山顶上，山上林木丛密，山下有一条小河。庙中特别腾出几间房，简单地布置了一下，床、帐、桌、凳，均很简陋。由一个刘副官（戴笠系统下的特工人员）带一部分宪兵守卫监视。张汉卿住在那里，有小范围的自由。庙里有一个篮球架，他每天可以同副官卫兵扔一扔篮球。山下河边有一只小船，他有时也可以在附近划一划船。他的活动只能局限在这个范围内，不能远出。那个地区寂静得很，附近没有任何居民，也不许任何人到那里去。屋中摆着一些旧书，任凭他阅读。那时陪同他居住的是他的夫人于凤至。他的身体看样子还好。我同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饭菜尚过得去。

我们那次谈话中，汉卿向我表示：“国家正是有事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情，不论什么事都可以。”他托我向蒋去说，我请他写封信给蒋。他立即写了一封给蒋的信，写得很简单，除问候外，只说有许多话，希望能见蒋一面，当面陈说。

我回长沙后，把他的信立即转给蒋。蒋没有给我回话，我想蒋更不会直接回答张汉卿。

第三次会见是1947年10月间，地点在台湾新竹。当时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作休假旅行，到了台湾。张汉卿那时关在台中新竹。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緝是我的学生，我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汉卿。彭很犹豫，不敢答应。我当即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

你。”彭才勉强答应。

1947年12月30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女儿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再改乘汽车去看张汉卿。汉卿住的地方叫井上温泉，距新竹约有两小时汽车的行程。公路在山谷中蜿蜒而上，风景别具一格。刚走不远，就遇到一个宪兵分驻所，有几个宪兵走出来盘问。经放行后，不久汽车就在一个木桥旁边停下，司机说：到了。我们下车走过大木桥，上了一个小坡，就见一个大木牌，上书“井上温泉”四个大字。再上一级石阶便是张汉卿住处。他住的是一所平房，四周全是山，屋旁有一个温泉，风景林木很幽静，附近没有居民居住。我们是上午10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我们谈到中午，一同吃午饭，饭菜还不错。记得有一碗红烧肉，张汉卿说这是他照自己的做法教会厨师做的，果然肉很烂，味道很好。吃过午饭，我们两人又继续谈话，这时他托我向蒋同时向宋美龄提两点要求：

第一点，他希望能够恢复自由。他对我说，他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住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他除了恢复自由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请求，也不一定做事情，可以先考察他一个时期以后再说。

他谈到第二点请求时，声音极小，惟恐被那个刘副官听见。他说，那个副官带着家眷，还有几个孩子，同他住在一个房子

里，副官对他名为照料生活，实际上干涉的地方很多，孩子又吵闹，使他感到既不方便，又不安静。他希望能让刘副官搬出他的房子，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清静。

我答应了他的请托，并保证一定能够向蒋、宋说到。

张汉卿在井上的日常生活仍是小范围的自由，可以在屋内屋外自由活动，打打篮球，洗洗温泉澡。他的屋里摆了一些线装书，记得还有一部《鲁迅全集》，这部书大概他全部阅览过。他对我说，鲁迅笔锋锐利，骂人很厉害。他看过不少中国史书，对明史很有研究。他还学会了做新旧体诗，那次他还做了一首送给我，诗曰：“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原诗当时在上海《大公报》曾发表过。我们两人还在一起照了一张相片，和汉卿的亲笔原诗稿一并制版发表。

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4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

我回到南京后，即去见蒋，报告看望张汉卿的情况，并传达他向蒋提出的两点请求。蒋听了马上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只“啊，啊”地哼了几声，对张汉卿的请求不置一辞，即用旁的话岔开。我看蒋的那种神气，也就不再追问下去。我只有再去找宋美龄，把张的话又向她说了一遍。宋当时第一句就叹息着说：“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然后接着说：“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这一句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从她这一句话里，可以推想其中包含着许多问题啊！

以后听说蒋介石对我去看张汉卿一事，极为不满，曾下手谕，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

(张治中)

六 森严军统

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由西安送蒋介石到达洛阳，26日到达南京，一下飞机张就被军统局监禁，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关于他的囚禁生活，我不完全清楚，但张学良开始被监禁，以及1946年11月由重庆解到台湾去，都是我计划执行的，现就回忆略述如下：

—

1936年，我在南京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担任书记长。12月24日，戴笠从西安回南京来了。晚上9时，戴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找我和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去，他非常高兴，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张学良将于明天（25日）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他又说：“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10个人来，要机灵可靠的、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25日下午5时，消息证实，蒋介石已经由西安到达洛阳，住在洛阳西工第一军分校，因天晚，改于26日回南京。张学良同蒋介石一起到洛阳的消息，经蒋介石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并经祝绍周来电和戴笠取得了联系，严密封锁了消息。晚间，

戴笠又找我同刘乙光去，他说：“委员长决定明日先到，飞机在明故宫飞机场降落。10分钟后，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你们都到飞机场去照料，宪兵方面，乙光去和他们联络好，派一排人到飞机场警戒就行了。委员长离开飞机场后，除了宪兵和特务队，任何人都不得在机场逗留。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和宋部长的汽车直开宋公馆，乙光带便衣警卫坐警卫汽车跟在后面。”

26日下午3时，蒋介石飞抵明故宫机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何应钦等簇拥而去，只有戴和我们少数人还留在机场。宪兵特务重新布置了警戒，10分钟后另一架飞机到了，张学良下了飞机，即由戴、宋两人陪着上汽车开走了。我到飞机场去是对张学良执行扣押任务的，自觉同他打照面最好，于是混在宪兵特务人群里，没有同他见面。这就是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到达南京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此后，从1936年12月到1949年，军统局一直派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没有换过第二个人。刘原先是戴笠指派的，由于他长年累月执行看管，毫不放松，并且把张学良的思想、生活以至片言只字点滴不漏地经常向军统局和蒋介石作详尽汇报，从而得到了军统局和蒋介石对他的绝对信任。1946年戴笠毙命之后，就由蒋介石直接指定刘乙光继续看管下去，不准换别人。1940年，刘乙光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除了几十名便衣特务，还有一连宪兵归刘乙光指挥，特务担任内层看守，宪兵负责外围警戒。张学良所在地划为禁区，与外界隔绝，不准老百姓接近和通过。入夜，张学良的房子周围，通宵不离宪兵岗哨和便衣特务来回巡逻，窥伺室内动静。

张学良被关押后，张夫人于凤至同他住了一个时期。1940年张夫人和子女到美国去了，一直没有回国。从这个时候起，赵四小姐经常同张学良住在一起。生活食用方面，抽烟喝酒，添购

什物，不受限制。宋子文、宋美龄和张的亲友，不时还送他一些日用品、香烟名酒之类。通过特务检查，也可以和外面通信。国民党要人宋子文、吴鼎昌、陈仪、张治中、莫德惠等，有时去看望张学良，但当他们去看望的时候，特务紧跟着坐在一旁，名为照应，实际是蒋介石和军统局规定的暗中监视。1947年10月，张学良对我说：“1945年在贵州，莫德惠来看我，住了几天，老戴（指戴笠）派特检处处长李肖白陪老莫来的，老莫和我一起，李肖白寸步不离，惟恐我同老莫谈私话，你想，我和老莫有什么可说的？我还能希望他些什么？”蒋介石吩咐戴笠替张学良搜集了不少书籍，其中大部分是线装书，供张学良阅读，也订有《大公报》、《中央日报》和经过审查的外国杂志画报等等，只是不准看马列主义进步书籍和当时的《新华日报》。张学良押在贵州、台湾时期，军统局派特务周念行等冒称学者同张学良住了一两个月，名之曰讲学，辅导张学良研究学问，实际是进行思想考察。戴笠、宋子文都三番五次去探望过张学良，有时还住了一两天以进行考察。戴笠对张学良说：“派刘乙光跟你一起，是为了保护你的。”蒋介石不同张学良直接通信，却叫宋美龄写信给张学良，并且馈送一些日用品衣物之类以表示关切。张学良被准许离禁区三五里范围内散步、游泳、钓鱼、打网球等等。但张学良很少出来散步，他说：“每逢我出去散步，警戒森严，前后左右，都是宪兵、特务，他们提心吊胆，惟恐出事情，实在太紧张了，也太麻烦。”张学良囚禁之初，一向跟他的随从副官和一个女佣还跟在他和赵四小姐身边。到了1946年冬，副官和女佣都被强迫弄走了。从1937年起，张学良由浙江莫干山、安徽黄山、湖南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县、开阳县、桐梓县等地辗转关押，在贵州境内有七八年之久，1946年11月由桐梓赴重庆转解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继续监禁。

1946年11月，我在重庆担任军统局结束时期的办事处主任。南京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电称：“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随后刘乙光到了重庆，我和他商定：张学良到后，住在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我指派办事处保管组组长侯桢祥、警卫组组长庞进祥协同刘乙光看守。同时，我派总务组组长郭斌向航空委员会交涉由重庆直飞台北市的巨型专机。张学良由桐梓来重庆解往台湾的消息，对外封锁。因此，刘乙光押解张学良由贵州来重庆时，在离重庆市30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汽车不经过重庆市，以免被人发觉，张扬出去。一面对张学良诡称，蒋介石有电报来，送他到南京去，不把解往台湾的实在情形告诉他。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附近没有居民。关于张学良到重庆后的生活，我指派侯桢祥专门照料。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张学良在重庆住了一个礼拜，专机已经交涉好了，决定起飞前夕，我到松林坡面告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60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相当高兴。刘乙光向我说：“跟在张学良身边的×副官是他的心腹，又和宪兵特务厮混熟了，妨碍看管，不能再让他到台湾去，明天动身之前，请你把这个人留下。”我同意了，立即指示侯桢祥、庞进祥照办，并令把他押在军统局渣滓洞看守所。我为了欺骗张学良，防有意外，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和我的爱人李兴黄赶到白市驿飞机场照料，对张学良和

赵四小姐伪称是来送行的。

三

1947年10月，我在南京保密局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某天找我去。郑介民说：“张学良现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同刘乙光搞不好，而刘乙光的老婆又有神经病，夫妻吵闹，这个女人，还同赵四小姐处得不好。刘乙光已经把她送到台北市进医院去了，他要求请假一个月到医院去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你与王新衡过去和张学良还好，但王新衡现任上海站站长，不能抽身，打算派你去陪张学良住一个月，并对他进行考察（实际是派我去接替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怕我不肯去当看守，故意说得好听一些）。”我这个空头设计委员会主任，正无事可做，又跟毛人凤怄气，闷得慌，借机会到台湾去一趟也好，就答应了。郑介民叫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准备美国货“加利克”牌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他食物作为郑介民和我的礼物送给张学良。我由上海坐飞机先到台北市和刘乙光见了面，第二天坐火车到新竹，然后坐汽车进入山区到了井上温泉张学良被监禁的地方。那里是高山族聚居之地，树木参天，峰峦起伏，风景优美，温泉是硫磺质的，最适于疗养，井上温泉就以此得名。张学良连同刘乙光等100多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原先招待游人旅客疗养的住所，有网球场和温泉浴室。在那里，两山之间还有一座铁索桥，面对高山，下横流水，足有四五十丈高，十分壮观。我到后第二天，刘乙光就赴台北市休假去了。关于张学良的看守警卫日常工作，我叫刘乙光交给他的一个助手多负实际责任，以便我腾出工夫来和张学良攀谈，进行考察。刘乙光暂时离开了，换上一个伪善者，张学良思想上稍微松了口气，比较高兴一些。刘乙光走的那个晚

上，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倾泻了：他谈到了10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第二天早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里他自己做成的一首诗交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写“张学良敬赠”。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张学良同我所谈的话，已经记不完全了，我现在把印象深一些的写出来。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说“老戴（戴笠）、老宋（宋子文）当初都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我相信老戴他们的话，不应该是骗我的。但十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张学良看作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他找好的。我现在的几间房，光线和建筑都比较好，外面有宽阔的走廊。因为我不好随便到外面去，有了走廊，早晚可以散步，也可以看书报，免得刘乙光他们时时为我操

心，岂不很好。而现在刘乙光一家住的那几间房，背着太阳，比较阴暗。陈仪交代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光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竟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这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房，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的不对，叫他把这几间房让给我们住。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不几天，被刘乙光打发走了。十几年来，夫人（指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经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们夫妻闹翻了，更受罪，只好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六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些事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婆婆有时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而暗地却是骂四小姐。可好，你来了，刘乙光一家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顿清爽饭，你看这样好的菜饭，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预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张学良又说：“今年2月，台湾人闹事（指1947年二二八事件），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像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他指挥宪兵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特务来回不停地在我屋子周围巡逻，并向室内窥伺动静。夜深了，我还听得刘乙光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传话，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就在这个时候，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

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台湾乱民前来劫狱所为。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与宪兵有大部分人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这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准备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张学良说完这段话，感情十分激动。我看他对刘乙光恨极了，也看不起刘乙光。我反问张学良：“你凭什么可以掌握刘乙光的部下，他们同你通声气，刘乙光能坐在鼓里？”张学良觉得说话走了口，有些后悔，于是他又说：“像刘乙光这个蠢才，他平日对待部下那样刻薄，一味死扣，加上他那个又蠢又恶的老婆，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两个人都那么狠，还能够得到部下心服吗？我张学良真要同刘乙光拼，我还拼不过他？这里面情形，我不应再向你说下去了。我想你能够相信我的，我张学良决不是因为有了刘乙光看管我，才不敢越狱逃跑，才不寻什么短见！碰上了刘乙光不过多受些闲气，本来就算不得什么。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份，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以上是我到后，张学良头次向我倾吐的话。往后，张学良同我谈到了当前的时局，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那时正当陈诚到了东北，提到陈诚，张学良就非常厌恶，他说：“陈诚到东北去，等于火上加油，更糟，东北的颓势，决不是陈诚可以挽回得了的。”张学良不止一次和我谈到了陈仪，他说：“到了台湾后，陈仪看过我几次，对我非常关切，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向来敬重他的，我看他比较正派。”

1947年2月台湾人民起义时期，省府主席为陈仪，但我到台湾从各方面了解，台湾人民并不恨陈仪，而对于执行血腥镇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彭孟緝，则恨之入骨。当时台湾民间有这样一种传说“一代不如一代”，指的是魏道明不如陈仪，而陈仪又不如日本人。我到台湾的时候，正是魏道明接替了陈仪当台湾主席。因此，张学良同我谈到了魏道明。他说：“魏道明是一个十足的傀儡，他完全受他的老婆郑某的摆布。很多人知道宋美龄受孔祥熙老婆宋霭龄的操纵而在幕后左右政局，却不知道郑某还在幕后操纵宋霭龄。”我在井上温泉的时候，张治中先生偕同夫人、女儿看望了张学良，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他两人谈了两三个钟头。我避开了，不晓得他们谈些什么，事后也没有问张学良。倒是张学良和我谈起了他和四弟张学思，他说：“老四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期生，当时军校教育长是张文白，因此，老四是张文白的学生。”张学良说：“我相信老四，他是有前途的。”张学良以十分关切和怀念的心情不止一次同我谈起了张学思。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同张学良谈做诗，谈明史和历史上的人物，也同他打网球。他的饭量少得令人吃惊，经常每餐大半小碗，最多一小碗，饭后吃水果则特别多。他几乎完全秃头了，牙齿很坏，赵四小姐的牙也不好。1947年张学良不过47岁，看来他的身体在长期囚禁生活中，已经拖得很坏了。我快要离开了，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张学良说：“你到了南京，如果看见莫德惠，请把我在这里的情形告诉他。”我到南京后，把张学良和我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考察所得，连同张学良亲笔写给我的诗，用书面报告了郑介民，并由郑介民转报了蒋介石。

1947年12月，刘乙光到了南京。他见过蒋介石后对我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1949年春，蒋介石

在南京被迫下台回到奉化去了。代总统李宗仁曾经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所有政治犯。同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企图借此收拾人心，也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可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所谓释放张学良，落得空话一场。

(张严佛)

七 台湾新竹

我的师部驻新竹市后，得台湾警备总司令的通知，才知道从贵州息烽移台被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住在划定给我的“绥靖”区域内的高山族井上温泉。警备总司令部仅通知我这一情况，并没有给我对张学良的任何任务。以张住我负责的区内，觉得是件大事，总想去访晤了解一番。因初到新竹，事务较忙，就不得不搁置下来。

我初步了解到，张学良住在台湾，除极少数有关方面外，其他人是不知道的。警备总司令部对我的通知，也极其简单。但因“绥靖”任务，交通监察，尤其进入高山族地区，更要严格诘问；监视看管张的人员，为免经常盘诘，必须向我联系；再因张的住区内，食物和生活用品，大部必须在台北，部分在新竹采购，而且必须通过新竹市运进去，无其他道路可通，这就必须使我知道才容易办事；张住在我“绥靖”区内，我当然多少有点责任。由于这些原因，逐步才能了解到以下情形：(1) 井上温泉距新竹市东北约 80 余公里，在高山族腹地。这个温泉是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因该温泉不同于一般硫磺泉，属于锌氧性质，据说食此泉水可治疗甲状腺等毛病，为供日本皇家使用。在温泉附近，修建了几间精舍，张学良即被禁在那里。(2) 负责监管张学良的湖南人刘某，系军统局专员，在新竹几次应酬场合，据刘专员告诉

我，他从息烽起就“照料”张学良，到现在已经近10年了（当时是1947年）。刘专员的妻子和两个小孩也住在井上温泉。这样陪同受禁，与外世隔绝，失掉自由，小孩失学，有时刘也流露无可奈何的哀怨之情。（3）负责监视张学良的武力为宪兵一个连，这个连大约每半年左右调换一次，由其他宪兵连轮替。（4）井上温泉因在人迹不多的苦寒的高山地区，所以一切食物、蔬菜和所有日用杂品，均须在台北、新竹备办。暑天大约三四天车运一次，冬天一周或半月车运一次。从上面了解到的这些情形，我遥想到当年一时豪杰和风流人物的“张少帅”这样多年以来悠悠地度着孤寂的生活，和人世隔绝的不自由的处境也常引起我的好奇与同情，更想去访晤他了。

我想访晤张学良，曾向刘专员谈过，刘推辞说问问张和在食用等作一番准备后，再陪我去访晤。实际上他不是问张而是向他的上司请示罢了，说准备不过是等待指示而已。我因公去台北，在警备总司令部会见了陆大同期同学贵州人傅砚农，当时他任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偶谈及张学良，傅告诉我他在息烽就见过张学良几次，是熟识的。和刘专员也是熟人，将来一同前去。他说他见到刘专员时也催催他。我回新竹不久，刘专员特到师部见我，说他就去台北，回来可一同去看张学良。我想大概是指示回来了。我告诉刘，要他在台北顺便通知傅砚农，最好一道回来同去，刘答应照办。

约在1947年5月下旬的一个清早，我、刘专员和傅同坐师部的一辆小吉普车，我带的九个卫士坐刘专员运东西的一辆中吉普车，由新竹向东北出发（由此有单行公路直通井上温泉）。车行约一小时，车被横木阻拦突然停止，刘专员告诉我，过此是高山族地区，族人设有关卡，任何人是不能进去的，等向管卡的人打过招呼再走。刘专员用高山族语说明后，车再开行。车愈

前走，山势愈形复杂，有时车在悬崖半空中飞驰，旁临深溪，颇感危险。公路两旁多长荆棘，遍地虽尽呈葱绿，但成材林木很少。车行约三个小时，才到达井上温泉。当我们进入高山族地区后，车行两个多小时途中，仅看到三四个高山族男人和一个女人，未见到小孩。男人着汗浸而又破又烂缝补过的白色和蓝色中式汗衫，长不及膝的破短裤，头顶留有一撮短发，头上缠着不大的头帕巾，都是赤足，腰间都插有尖刀或日本战刀或长刀，有的还背着弓弩，箭装在箭囊中悬挂在腰际。男人中我们看见两人，其中一人是以蓝色纹面，一人以蓝红色纹面，俨为戏剧中的人。所看见的那女人，头戴着帽子，当额处有珠一颗装饰着，穿的是皮肘到膝的颇为宽敞的衣服，袖大约尺余，并在袖口及沿着上胸上背以及大襟都镶有一寸多宽的花边，另穿裤管有尺余大，长达脚面在裤脚口上镶缝着花边的裤子。包扎很少的脚，穿着弓鞋，并有布裹足。这完全是清朝时代的装束。又公路两旁，住屋极少，偶尔看见一二间，仅为树枝支撑既无横梁又无门窗的极简单的茅棚而已。从这些可以看出高山族在日本统治者长期剥削压榨下贫穷、落后和困苦的程度。与台北、新竹等城市相比，凡以前属日本的机关，无不极尽巍峨宏伟，所谓官舍也极为华美。更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殖民地和对少数民族残酷政策的一斑了。

我们到了井上温泉，由刘专员引见了张学良，张穿着咖啡色中式绸衣裤，白袜布鞋。我以前没有见过他，看去比较清瘦，面色不甚健康。张发际特高，发向后梳，头前顶已开顶见光，门齿不密，齿缝呈黑色。当时他不过四十七八岁，较年龄苍老得多。我们见面后，张介绍坐在他左边的一位中年妇女，才知道是当年名噪北京的赵四小姐，她着灰布旗袍，短发及颈，着布便鞋，丝毫未加修饰，当时她正在纳布鞋底。后据刘专员告诉我，自息烽以来，赵即伴随张学良，未有怨意。她度此生活而甘之如饴，想

象以前的闺秀名花，看看当时荆钗布裙的赵四小姐，实令人钦敬。同去的傅砚农在息烽就见过他们，所以见面后谈话较多，傅会作诗，以前和张、赵有过吟和。他们偶也谈到和唱过的诗中的一句两句，这样气氛也渐渐自然，陌生的我，也感到有话可谈了。我们谈时，刘专员始终在座，大家都很知趣，谈问的无非是有关张的日常生活情况。从张的谈话中知道他在读研明史，报纸是一两种当时国民党的报，要隔几天才能看到（由运食物车带去）。另外没有任何读物。明史是蒋介石指定他研究的，报纸也是指定的，当然不会给他安置收音机之类。那里无电路设备，晚上点的是煤油灯。他告诉我们，生活很有规律，入夜睡得很早。除读书练字外，打网球、洗温泉，附近里外散步，生活过得还好。其他由张说得较多，主要是谈他父亲张作霖与日本人折冲斗争的情形实况，记得对郭松龄倒戈，皇姑屯事件谈得较详，他的谈锋也健，余则一概没有涉及。我们和张晤面到午饭，就是如上谈的约二小时左右，同吃过午饭后，各自休整。

午后我们没有打扰张学良，刘专员去布置他所谓“照料”的事，我同傅砚农则看看温泉附近情景。

井上温泉在四周约二里多的山谷里，有宽约20多米的小溪横流，温泉在溪流的北岸，为天坛式建筑。温泉左侧有一硬地网球场，场的左后即为张的住所。日本式建筑，三开间，前后不过住房六间，尚称精致。厨房在房后。屋的右后有一排平房，还有草房两大间，住的是监护张的宪兵连，张平时打网球就由宪兵陪他。屋后就是从低浅而渐高的重山了。溪流南岸空地幅员较北岸为狭，山势也较陡急，两岸山与山之间，架有横流而临空的板道索桥，长达百余米，我曾与傅试行通过，走了不到四分之一，因俯视10余米以下的深溪，不禁心悸而返。但看见高山族土人，背负柴草，过桥如履平地。在溪旁有柳成荫，房舍四周，也多灌

木，山间野花不少，缤纷满目。谈到这温泉的自然环境，倒颇清幽，但联系社会环境则不啻鬼域愁城，我和傅两人交谈观感，实不胜为张哀叹啊！

晚饭前，张学良陪我们去访的三人打了一场网球。我们球艺甚差，因无多谈之话，为了消磨时间，排遣无聊，对来访之客不得不奉陪一番。晚饭备有酒肴，同席为张、赵，傅和刘专员两夫妇及其六七岁的小孩。张、赵都豪于饮，我那时年壮，也能喝上几杯，傅、刘凑兴。张、赵喝得不少，席问他俩和傅又有新作吟唱，赵小姐也谙韵律，即席也赋得一首，惜已记忆不起了。晚上我们在温泉洗浴，泉水甚沸，确无硫磺气味。当晚就住在那里，在晚饭后没有与张谈晤。

翌日早餐后，即和刘专员同返新竹。刘、傅去台北。临行时与张、赵告别。他俩有不胜依依之情。他们与我和傅并无深交，我是陌生的，但长年累月中偶得一二来訪，确可慰藉他们的寂寞时光，不由得不流露其感慨之真情。

这次以后直到我的部队于1948年初由台湾调苏北一段时期中，莫德惠曾三上温泉，来往必经新竹，我也必须尽东道主之谊，但仅此而已。没有询问和多谈到张学良。

（岳星明，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副军长，1946年11月调任为该军一四六师师长。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时，二十一军开赴台湾进行镇压，岳也于该年3月下旬到达台湾，并被任命为新竹“绥靖区”指挥官。）

张学良的身后传奇

王海晨

在中国 20 世纪历史上，张学良可谓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在世时，不断有传奇传出，他人走了，又丢下一串谜团。

生在马车上：飘泊百年

张学良不是像今天的人们都出生在医院里，也不像与他同时代出生的东北农村娃们生在自家的炕头上，而是出生在疾驰于荒郊野外的马车之上。这是不是预示着他一生的颠沛流离？

他自从 1931 年离开东北，一直再未回过东北；1933 年离开北平，1935 年离开武汉，1936 年离开西安，1937 年离开南京，一路永别。此后，在幽居的岁月之中，更是永别一路，一直到 1946 年告别大陆，永别大陆。他于 1993 年离开台湾，也再未回过台湾，一直到终老夏威夷。可谓飘泊一生。

285

两个 01 年：“生命的密码”

他是世纪老人，地地道道的世纪老人。1901 年出生，2001 年逝世，从人生起点到终点都是 01 年，都是新世纪的起点。1901 年他出生的那天是星期一，2001 年 10 月 15 日，他死的那天，也是星期一。

谁都有生，谁也难免一死，但生死都在 01 年，都是星期一，

而且赶上了一个千禧之年的第一年，这得多少个千年之中，多少个世纪老人之内，才能出现一个“101”？

两个四月十七：过生日之谜

近年来，每到张学良过生日这天，华人世界就将目光聚焦于他。如果把这些资料聚集在一起，人们就会感到困惑，他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呢？

九秩寿庆于1990年6月1日举行，张学良亲自出席并讲话。他妻子赵一荻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文中说：“今天是他的90岁生日”。

91岁华诞就更复杂了，1991年5月29日、31日和6月1日，旅美华侨先后三次为张学良举行祝寿宴会，张学良都亲自出席。《张学良年谱》记载：5月29日，做寿当天，人人要与张学良照相、握手……显然91岁正式华诞在5月29日。

而他的百岁华诞，小型家宴却是5月28日。

他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一般人过生日，有过公历的，有过农历的，不管是公历还是农历只有一天。按公历，张学良的生日是6月3日；按农历是四月十七。显然，张学良过的不是公历生日。不是公历，只能是农历。但1990年6月1日农历是五月初九；1991年5月29日是农历四月十六；2000年5月28日农历是四月二十五。显然过的也不是农历。那他过的是什么生日？他按什么原则选择过生日的日子？

他过生日的原则是：一般不过。要过，有一条铁打不变的原则：绝对避开农历四月十七和公历6月4日。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在6月4日，这一天的农历是四月十七，正是张学良生日这天。因此，张学良年轻时不过生日，有人问起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他也总是设法回避。

后来年事渐高，不忍拂大家好意，他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过生日可以，但要避开父亲的祭日。所以，有了上述5月28日、5月29日、5月31日、6月1日、6月2日等。但没有在6月3日以后过的，因为按中国传统，祝寿只可提前不可后延。另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赵一荻的生日是5月28日，所以有时他的生日和赵一荻的生日合在一天过（赵一荻的最后一个生日和张学良的百岁华诞选择的都是赵一荻的生日）；二是选择5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日，和在教堂作礼拜合在一起。

每个人都有生日，每个人都有祭日，但一喜一悲在一个日子里重合，而且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死时是国家元首，一个生后成为国家之干城、民族之功臣，查遍中外历史上的所有国家元首和民族功臣绝无仅有。

两个“九一八”：一荣一辱

1930年的“九一八”，张学良一纸和平通电，使中原大战各方偃旗息鼓，张学良一跃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跃向权力最高峰。

1931年的“九一八”，是众所周知的国耻日，也是张学良的耻辱日。从这天起，他失去了东北，被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跌入名誉最低谷。

人生荣辱如草之荣枯，并没什么稀奇，但荣之至，辱之极，仅隔一年，且在一个日子，恐怕并不多见。

两个就职典礼同在3月1日：

一个是丢了家的司令，一个是被革命推翻了的皇帝

1934年3月1日，张学良在武昌“剿匪”总部，宣誓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职。

1934年3月1日，溥仪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在长春举行“登基大典”。

如果张学良愿意，他早就当上“皇帝”了。张学良在谈到东北易帜时曾说：“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话，东北不是没有了？我跟日本合作我就是东北皇帝啊！日本人讲明了请我做皇帝，就是土肥原顾问的‘王道论’中说明了，意思是不要我跟中央合作，日本人就捧我帮我”，“父亲死后日本派元老林权助来吊丧，事后我请他吃饭。他说，我这么大岁数来了，没得你一句话，我回去无法交待啊，意思是不要挂青天白日旗。我说你忘掉我是中国人啊！”

东北三省自从1918年张作霖就任东三省巡阅使，直到“九一八”，13年之中一直是张氏天下。日本人几次鼓动张氏父子宣布东北独立，成立一个脱离中国的“独立王国”，张氏父子坚决不从。最后，张作霖被日本炸死了，张学良被日本逼出东北。张学良离开后，日本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将末代皇帝溥仪接到东北，于1932年3月就任“执政”，1934年又改称皇帝。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两个就职典礼都在同一天，两个典礼又有着那么密切的联系。如果张学良不是东北人，如果张学良没当过“东北王”，如果日本人没劝过张学良让他做东北的“皇帝”，如果东北不是在张学良手里丢掉的，这两件事即使发生在同一天，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写的。而恰恰溥仪捡的“皇帝”帽子是张学良不要的，但溥仪“统治”的疆土正是张学良要夺回的；老家的房子、土地被人占了，又被别人改了姓（本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却变成了“满洲国”），他却在武汉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而且他要打的人正是想帮助他夺回老家的人。

东三省的司令跑到豫鄂皖三省当副司令，亡了国的皇帝捡个东三省皇帝，两人选同一天就职，悲哉！怪哉！

两个1月13日：夜幕降临的一天和天快亮的一天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被武装押离南京，他正式地踏上了漫长的、颠沛流离的囚徒生涯，他的一切希望开始破灭，等待他的将是漫漫长夜。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他暗无天日的幽居岁月才正式开始逐渐解禁，他清楚地意识到黑夜即将过去。

第一个1月13日，对于张学良来说，是最黑暗的一天。

第二个1月13日，是他看到光明的一天。

他因为扣押蒋介石而被囚，蒋家王朝不垮，就没有他重见天日的一天。张学良被囚和被放没有十分明确的日子为标记。如果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的那天（1936年12月26日）开始算，那时还没宣布他有罪；如果从1936年12月31日宣判那天开始算，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又发布特赦令。解禁也是这样，1959年蒋介石就给了他“自由”，但他并没有得到，蒋介石死了，蒋经国上台，他和“小蒋”个人关系不错，但“小蒋”给他的自由也只是下“小馆”、上教堂而已。

最实际的起点应该是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被押离南京。张学良也是在这一天真正明白了蒋介石不会放他了。不离开南京，他还有一线希望，一离开南京，即说明蒋介石不允许任何人再替张学良“求情”了。

最实际的终点是1988年蒋经国去世。因为张学良被囚，不是依据党规，不是依据国法，也不是军法，而是蒋家的家法。既然是家法，那只有蒋家人退出历史舞台，他才有希望。后来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所以说，两个1月13日，是张学良幽居岁月的实际起点和终点，最起码在张学良的心里感受上应该是这样。

两个 36 年：72 年真爱如歌，一半时间“非法”

张学良与赵一荻的爱情故事被文学界奉为世纪经典、世纪之恋，这是不为过的，就是史学界也无疑义。1928 年开始，张学良与赵一荻就成了夫妻，但 1964 年以前只是事实上的夫妻，并不合法，他的合法妻子是于凤至。直到 1964 年，张学良才和于凤至解除婚约，和赵一荻正式结婚。

巧的是张学良与赵一荻生活了 72 年，以 1964 年为分界线，正好划分成前后两个 36 年：

1928 年至 1964 年，属于“非法”同居，感情至上的 36 年；

1964 年至 2000 年，才是名正言顺，情法相合的 36 年。

赵一荻与张学良“非法”同居了 36 年，同时代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仅没有人去责怪，反而人人赞颂。赞颂者并不都是法盲，但这给法律研究、社会史研究、人物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案例”。

两个 45 年：大陆生活 45 年，一去未归乡；

在台湾被囚 45 年，一步未离岛

1901 年至 1946 年：张学良在大陆生活了 45 年，自离开大陆，即一去未归。

1946 年至 1991 年：张学良在台湾这 45 年里，没有离开台湾岛一步。直到 1991 年去美国探亲，张学良才算走出台湾。台湾有人说，张学良一直是自由的，不像大陆人说的那样，“什么幽居”。既然是自由的，为什么等到 91 岁才去美国走一趟呢？哪有一个无事可做的老人愿意在一个孤岛上一呆就是 45 年呢？妻子病了，不能去照顾，儿子死了，不能去看上一眼，这“自由”的含义是什么呢？

两个8年：看着都自由，实际都不幸福

1928年至1936年是张学良执政的8年。

1993年至2001年是张学良在夏威夷飘泊的8年。

两个8年似乎都是自由的、幸福的，其间苦衷大概只有张学良自己知道。正是这两个8年里，张学良的后脑勺上生出了两条政治“辫子”，被人抓住了。前一个8年被抓住一条，后一个8年又被抓住一条，之所以被抓住，大概都与他的自由度有关。

两条“辫子”：生前留下一条，死后留下一条

第一条是“不抵抗”的辫子。

第二条是不回大陆的辫子。

最近网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张学良三问》，主要是抓住了这两条“辫子”。文章说：“东北军（奉系军阀张学良之私家军队）在不到两万日本侵略军面前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未放一枪一弹撤出山海关，将东三省大好河山拱手让出”，“如果说撤出东三省为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那么长城抗战为当时之中央政府之决断，那么背负家仇国恨的张学良将军为何不率领我东北军之健儿奋勇抗战收复失地呢，不要忘记无论作为军政首长，一名军人，还是一名中国人，炎黄子孙都有守土保民之责”，“张学良对促成全国一致抗日确有功劳，但其历史的污点也同样不能否认甚至加以美化。”

291

文章的第三个题目就是《张学良为什么不愿叶落归根？》“我们一直宣传说张学良如何爱国，那就有一点，爱国为什么不回国？”

有一位美籍华人曾说：“张学良葬于夏威夷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这两条辫子恐怕要被永远抓下去了。第一条辫子永远也洗不净，东北确实是在他手里丢的；第二条则是千古遗憾，夏威夷的基地是他自己选的。

两个关键的女人：

一个是情感鸳鸯，一个是生命护卫者

张学良之所以能活到 101 岁，与两位高龄女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陪伴他 72 年的“牢狱夫妻”，情感鸳鸯赵一荻；另一位是宋美龄，生命“护卫者”。

张学良早年风流倜傥。1925 年，张学良率兵打败了孙传芳，首次进入上海，在上海认识了宋美龄。宋美龄当时是知名闺秀，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立即为她出众的气质所倾倒，称她“美如天仙”，约会数次，从心底里钦佩这位“佳人”，称她“绝顶聪明”。1928 年，蒋宋结婚第二年，在北京饭店与张学良聚餐。见宋美龄和张学良谈得很亲热，蒋介石就问：“你们怎么认识的？”张学良说：“我们几年前就是好朋友了。”说这话时，很有一种先蒋而识宋的得意之感。

张学良自己说，蒋先生没有杀他，主要是宋美龄保了他。“蒋夫人承认我，蒋夫人管我叫 Gentleman。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认识。”张学良曾说：“宋美龄活着一天，我也能活一天。”

张学良认为宋美龄是中国当代了不起的女性。美国乔治城大学王冀教授曾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管束岁月中，如果没有蒋夫人的关照，我想张将军的日子会是很难过的。对此，张将军也是心领神会的。”

宋美龄对张学良影响很大，有保命之恩；张学良对宋美龄很信服，宋美龄对张学良很愧疚。

张学良信基督，是听了宋美龄的话。

张学良与赵一荻举行结婚典礼、与于凤至办理离婚手续，都是受宋美龄指点。

张学良晚年，每次过生日几乎都能接到宋美龄的祝福。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不只一次说过：“我们对不起汉卿！”

为何叶落不归根

张学良为什么没有回大陆呢？有多方面的原因。根据 1991 年，张学良在美国和吕正操将军会见时说的话和他在其他场合说的，综合起来看，主要是：

一是不愿给海峡两岸带来麻烦；

二是不愿见记者，愿见老百姓，“因为我也是个老百姓”。

吕将军问他能否提供回大陆的日程，张将军说：“我得回去跟李登辉说一说。东北是我的老家，我到大陆看看眼睛，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就告诉你们日程。”

后来，张将军捎信说，“我的眼睛最近好多了，暂不回去”。

据张学良的东北同乡、台湾前“立法院院长”梁肃戎透露，有一次外界报道张学良有意赴祖国大陆，台湾当局便通过渠道告知，希望他最好不回去，张学良的大陆行因此作罢。这是第三条原因。

293

四是晚年身体确实不好。在异国他乡安度晚年之时，张学良虽然非常适应夏威夷的环境、气候，生活得舒适、悠闲。但是，他多次表示希望有一天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以老兵的身份回东北与乡亲叙旧。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那就是谜团了。最大的谜团是，他为什么亲自在夏威夷选定墓地？也有“难言之隐”？

西安事变：他说了究竟能伤害谁

1990年日本NHK记者采访张学良时曾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日本记者：“蒋介石先生在西安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当时张先生您在场吧？”

张学良：“你问到这个事情，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往下再问我这个事情。不单是我在场，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

日本记者：“您现在能不能稍微讲讲当时谈话的内容？”

张学良：“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我很不愿意回答这个主要的问题。简单说，请体谅我的苦衷就是了。”

日本记者：“宋美龄的回忆录中写了当时宋子文、宋美龄和周恩来三人会谈的情况，您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吗？”

张学良：“当然知道，我就在那里。关于谈话的内容，对不起，我不能讲。当然我也能找个借口，说我忘了，但我不能那样讲。”

“我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请你们体谅我的苦衷。因为你们两位这么诚意地问这件事情，我简单答两句话：一个是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的口，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成了自夸自满了，我不想让别人夸奖我，另外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二是我也不愿意伤害人，如果我在这里全都说了，就会伤害许多人。”

从张学良的这些话可以看出：

1. 关于西安事变，仍有外界至今不知道的“重大机密”，张学良有话没说。
2. 这些“机密”的知情者只有张学良、蒋介石、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等5人。
3. 这些事情公布之后，肯定会伤害某人的性格。

4. 受伤害的人不是一个人。
5. 这些“机密”不会伤害张学良本人。

那我们可以运用排除法来分析。根据张学良晚年历次公开谈话，和接近张学良的人透露出的观点：张学良佩服周恩来，对周恩来评价很高，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把我刺透了，他也相当佩服我。”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如果根据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分析，受伤害者不大可能是周恩来。不是周恩来，不是张学良，那是谁呢？

为什么选定 2002 年

选定 2002 年公布张学良口述历史和个人保存的资料，是张学良自己选定的。

之所以要选定 2002 年，只有他自己最知道。从现在披露的情况看他从来没有谈及，或谈了现在还没人披露。

他选定公布的时间不是仓促的选择。他之所以选定 2002 年，一定与公布的内容和他作出选择的当时仍然在世的人有关。

295

首先看将公布的是什么内容。其内容一定是他所亲身经历的，与他有关，而且包含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容，并具有一定伤害性。什么内容能既具有神秘性又具有伤害性？那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主要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问题。西安事变后，内战停止了，和共产党也联合了，也一致对外了，所以不具有什么神秘性和伤害性；如果蒋介石对共产党背信弃义，根据当时国共

两党的关系，共产党会予以揭露，保密不了，所以涉及到共产党的事也不大可能。

那就是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问题和国民政府军政改组问题。

蒋介石一定是背信弃义了。

在什么地方背信弃义了呢？当时谈的内容最有可能的：一是张学良在国民政府中的职务问题，比如指挥或参与指挥全国军队抗战等，而且蒋介石点了头，宋氏兄妹担了保；二是国民政府军政改组问题，如调整何应钦等“亲日派”的职务或削减他们的权力等。

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张学良的存在就对蒋介石构成巨大威胁。因此，蒋介石对张学良几次心起杀机。

张学良说：“我的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蒋先生是要把我枪毙了，（这事）我不知道，这个情形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一个东西我才知道。”（即美国公使写的东西）“他写道，‘宋（决不是宋子文）对蒋先生说，你对那个小家伙（他们都管我叫小家伙）要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走开台湾，我把你的事情都给你公布了。’这句话很厉害”，“她说他西安事变，她说他不要金钱，他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

296

选定2002年公布自己的口述和保存的资料，是张学良在1996年前后决定的。当时，知道这些核心秘密的人5个人已经走了3个，只剩他和宋美龄两个人健在。那么，选定2002年主要是考虑他们两个人。两个人如果在2002年都作古了，最好；如果剩一个，不管剩谁，也无所谓了。

张学良与宋家兄妹有着很好的私交，在解决西安事变——尤其是在放蒋这件大事上，宋家兄妹是对张将军打了保票的。可是后来，他们在西安说的话都变成了一纸空文。这些事情如果从张

学良口中说出，他认为对活着的宋美龄是一种不敬。

所以他要选定在他死后的时间公布，他推断自己生命结束的时间极限是 2002 年。

张学良神机妙算，真的在 2002 年到来之前的第 76 天他走了。怪不得他走得那么平静，那么安详。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我所知道的张学良

作者=

页数= 2 9 7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页			
第一章	烜赫家庭	名媛伴侣	蹈险犯难见真情
	一	烜赫身世	
	二	盟兄挚友	
	三	元配夫人	
	四	红粉知己	
第二章	学贯中西	真情至性	一诺千金重泰山
	一	家庭教师	
	二	风神俊逸	
	三	公馆裁缝	
第三章	锐意新政	求贤若渴	造福桑梓唱大风
	一	关山飞渡	
	二	爱将反目	
	三	大帅斥子	
第四章	少年元戎	折冲樽俎	易帜统一成大统
	一	东瀛野心	
	二	统一易帜	
	三	政见分歧	
第五章	痛失疆土	詈声鼎沸	血性男儿背罪名
	一	痛失疆土	
	二	白山黑水	
	三	黯然下野	
第六章	民族大义	赤子情怀	惊天伟业震环宇
	一	骤雨将至	
	二	未雨绸缪	
	三	事变前后	
	四	难忘 1 9 3 6	
	五	延安谈判	
	六	临潼扣蒋	
第七章	摆队送客	南京受审	山崩于前色不改
	一	身陷南京	
	二	噩梦伊始	
	三	军法会审	
	四	虎落平阳	
第八章	羁旅天涯	传奇人生	少帅英名万古传
	一	斜阳暮草	
	二	奉化溪口	
	三	雪窦山上	
	四	恶风邪雨	
	五	三访少帅	
	六	森严军统	
	七	台湾新竹	
附：张学良的身后传奇			

